

新西域文库 · 欧亚战略丛书
中亚文化研究工作室 编

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

潘志平 主编

ZHONGYADE DIYUAN ZHENGZHI WEN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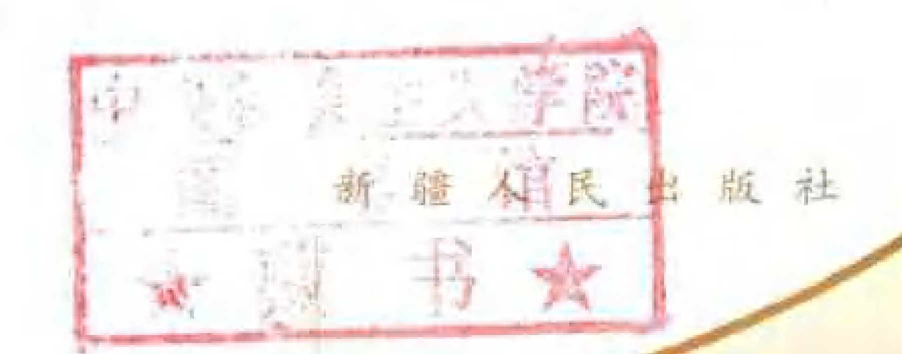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

潘志平 主编

ZHONGYADE
DIYUAN
ZHENGZHI
WENHUA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潘志平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9
(新西域文库.欧亚战略丛书)
ISBN 7-228-08315-6

Ⅰ.中... Ⅱ.潘... Ⅲ.政治地理学—研究—中亚
Ⅳ.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4558号

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
潘志平 著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18号)
印　　刷: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字　　数:320千字
印　　数:1～3 000册

ISBN 7-228-08315-6　定价:23.00元

中亚文化研究工作室

《欧亚战略丛书》序言

众所周知,新疆地处我们伟大祖国的大西北,与其它省区相比、其最大特点是拥有最漫长的国境线,自东向西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八个国家接壤;新疆又是多民族聚居和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其中一些少数民族跨国界而居,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族在语言、宗教、文化上有着传统的联系。因此,新疆不得不深切地感受到周边的民族、宗教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然要认认真真地了解、分析和研究新疆周边的国际问题。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五本)关于新疆周边国际问题的学术专著,就是我们的国际问题学者近年来潜心研究的丰硕成果。

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我始终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讲政治。江泽民同志1998年视察新疆时指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对我们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保障国家的安全和边防巩固,具有重要意义"。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这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这五本书讨论和研

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立场坚定、鲜明。

二要紧贴现实。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这五本书，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大背景，阐述了新疆的地缘政治文化，分析了美国的欧亚战略、中亚的民族关系，探讨了阿富汗战争和克什米尔冲突的来龙去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对周边的民族、宗教冲突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给人启迪乃至发人深思的观点。如此有意义的研究，确确实实紧紧贴着新疆的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最重大的现实，服务于这个现实。

三要理论创新。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套书广泛使用了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学的方法。一般以为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者在一百年前创立的。其实，孔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近者说，远者来"，就包含着朴素的地缘政治思想。清末，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徒骚扰南疆、沙俄强占伊犁，新疆这块热土面临着被分裂出去的危机中。在"弃"还是"收"的激烈争论中，杰出的政治家左宗棠力主规复新疆，提出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的命题——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新疆地缘政治形势的冷静

分析。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一百年里，经历了“海权说”、“陆权说”、“陆缘说”、“中心—外围说”等等，但这些都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理论模式。这五本书的创新在于，立足新疆，关注周边，提出了“中南亚的地缘政治文化”这一新的理论模式。其理论支柱是：一、民族宗教冲突，总有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从这一点引出地缘文化的概念；二、“中南亚”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亚”和“南亚”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新疆周边地缘政治文化的认真严肃地分析，将它界定为：“在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中南亚的地缘政治文化”的提出，将新疆周边的“三个主义”的发展态势归纳、概括成恐怖主义“双月带”和“四个火药桶”，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当然，此说能否成立，还要学术界的认可，并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毕竟是中国新疆的国际问题学者关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学的当代思考，其创新意义可圈可点。

因此，这五部专著的问世，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喜事，也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我之所以说是阶段性成果，是因为由新疆羚羊建筑装饰公司中亚文化工作室策划、组织、赞助的这套丛书，还将不断推出一批批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将国内这方面最优秀学者的力作奉献给广大读者。我衷心地祝愿这项为国家最高利益的事业兴旺发达。

张秀明

中亚文化研究工作室与《欧亚战略丛书》

一般认为，中亚指的是我国新疆境外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共和国，但如果将"中亚"理解成欧亚大陆的腹地，那它还包括新疆在内的更为广袤地区。无论怎样理解，这都可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文底蕴深厚：

这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

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民族在这里融合；

这是宗教传承的胜境，多种宗教在这里争奇斗艳，交相辉映。

今日之中亚，民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三个主义"兴风作浪，大国争斗盘根错节，中亚的地缘政治走向，至关重要，它愈来愈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左右，愈来愈复杂多变，愈来愈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大局。其中有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题，亟待展开。

为此，我公司成立中亚文化研究工作室，并推出这套《欧亚战略丛书》。

中亚文化研究工作室属非实体性民间社科工作机构，其宗旨在于繁荣中亚文化学术研究，弘扬企业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在羚羊公司设办公室，聘一名有造诣学者为工作

室主任(兼职),受公司委托主持工作室学术活动,并向公司负责;

——公司聘若干顾问指导工作,聘若干资深学者组成非常设学术委员会,负责审议工作室课题立项,鉴定成果;

——工作室规划、拟定、资助研究课题;

——公司参与课题的拟定,但不干涉课题的具体研究活动。

——自2002年起,羚羊公司每一年度资助10万元支持若干项课题的研究和出版,先拟定五个年度,共资助50万元。

企业搞文化研究,资助出版高深学术著作,或以为奇事。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不仅以自己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服务于社会,也愿组织、资助出版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奉献于社会。

在推出本《丛书》第一批五部书之际,面向广大学术界征稿。来稿请寄:乌鲁木齐市新疆社会科学院(邮编:830011)潘志平;或发电子邮件:panzhipin@163.com;联系电话:0991-8812941。

新疆羚羊建筑装饰企业有限公司

2002年8月18日

前　言

这是我多年从事关于中亚与新疆历史、现状研究的结晶。直观上看，它是部论文集，因为其中大多数篇章是不同时期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但经整合后归于"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主题之下，就实质而言，则是关于该主题的学术研究专著。

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开始考虑地理环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受到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一些城邦国家由于濒临海洋，商业活动发展因此受到刺激；气候温和有利于国家的特征、人类的活力和智慧的发展[①]。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圣武记》写道：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此可谓中国学者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30年后，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左宗棠(1812~1885)，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收复新疆：

①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62页。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①]。

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

然而，最初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当作一门国际政治的学科建立起来，并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却是19~20世纪之交的一些西方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克吉伦(Rudolf Kjellen，1864~1922)、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1861~1947)、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等。法西斯地缘政治学家、德国陆军退役少将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1869~1946)将地缘政治学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发展成"生存空间"说和"边界不确定性"说，为纳粹德国实行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谋划策，地缘政治学也因此一度臭名昭著，以致不少地缘政治学者至今宁愿用"地理政治"(Geopolitics)，而忌讳"地缘政治"(Geopolitik)。

然而，客观事实是：不同的国家都有特定的周边国家，与哪些国家为邻是自己的意志无法选择的，邻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达程度、政局稳定状况、社会制度选择，虽然都是其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对于自己的稳定和发展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诸如边界纠纷、民族宗教冲突、跨境犯罪、跨界河流管理和使用的分歧、环境保护等问题，离不开地缘政治。简而言之，政治地理环境不可选择，地缘政治因素就不可回避，因此，"生存空间"论固然不可取，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

本书论及的是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这里的"中亚"，本身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模糊概念。狭义的"中亚"，一般指的是今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天的中亚五国。广义的“中亚”，即“大中亚”[①]，包括我国的新疆在内的大片西部地区。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看，它可能涵盖环里海的高加索地区。而从地缘政治文化角度看，它又可能还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部——在西方，这一地区往往被认为是“中东”延伸区[②]。关于新疆以西的周边地区，过去我们习惯称之为中亚、西亚，实际上，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并不十分方便，也不十分准确。“9·11”后美英打响了针对塔利班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按一般说法，阿富汗属西亚地区，但事实上，阿富汗及其周边，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与中亚相近，而与印度的腹地、西亚阿拉伯地区却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地带正处于南亚、西亚、中亚连接地带，在遥远的古代，就是中亚和西亚走向南亚次大陆的民族迁徙和征战的走廊。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亚利安人经由中亚进入印度。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经由西亚征伐印度，在这一带建立东方行省。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亚草原上的塞人、大月氏、乌孙、厌哒等部相继南下，在这一带建立巴克特里亚王国、贵霜帝国和厌哒强国。阿富汗的北部与伊朗的东北部在历史上大体属于中亚文化圈，从这里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的大多数居民在宗教信仰上又是共同的，有史以来就是几大文明的边缘、连接地带，其北部草原经常出现过一些庞大的游牧“行国”，但来去匆匆。南部绿洲多为小国寡民，中世纪以来，只有奥斯曼帝国、帖木耳帝国，还有一个由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耳后王在今印度河流建立的莫卧尔帝国，显赫一时。此后乌兹别克诸汗国的领地还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北的阿姆河左岸。从这

①本书所谓的“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取包括新疆在内的“大中亚”，但在具体篇章中又因讨论范围而有具体界定。

②如两位美国学者所言：“我们称之为‘中东’的那个地区，在中国人看来是‘西亚’，只是从伊拉克和伊朗穿过中亚直到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这样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而已。”见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12页。

一文化背景看，不仅阿富汗属于这一文化区域，而且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也在这一文化区域之内。明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今天阿富汗内战、克什米尔原教旨主义活动强烈影响到中亚的安全稳定，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在车臣、中亚、阿富汗、克什米尔广阔地域连成一片而困惑迷惘。反过来说，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亚的地缘政治①。

冷战后，地缘政治文化(Geoculture)开始为学者重视。美国的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 M. Wallerstein)发表专著，从地缘政治文化阐释了美国霸权的衰退和苏联的崩溃②。美国比较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Crash of Civilizations)，引起哄动，也有很大争议。大多数中国学者因他把作为儒家文明的中国看成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义愤填膺。但实际上如果撇开他由此所引申的这样一些政治偏见，其论也并非一无所取。事实上，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文化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不容漠视。在国内，王逸舟、王缉思、李慎之、宋新宁、资中筠、冯绍雷、陈岳、何新、郝时远、邢广程、安维华、张振国等先生的有关研究，表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步入这一学科领域的前沿。

本书正文分两部分：上编五篇，是宏观的、鸟瞰式的综述；下编七篇，是较具体的个案分析或有关理论的阐述。本人本质上是历史学者，以上研究、分析实际上是建立在较严谨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正文之后附录四篇中亚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的考证文章，以助于感兴趣的读者交流。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泛突厥主义文化观透视"、"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两章是本人分别与王淑梅女士、蒋莉莉女士合作的成果。在此，向她们致谢。

---

①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拟提出"中南亚"的概念，与"东北亚"、"东南亚"相对，大体界定在今天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

② Immanue M.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Essava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atem Cambridge:Cambridge U.O.,1991.

目 录

附　录

上编

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

ZHONGYADE
DIYUAN
ZHENGZHI
WENHUA

中亚:意味着什么

——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

一、中亚五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当代分析

二、中亚和高加索:地缘经济前景的憧憬

三、"内亚":地缘文化底蕴的历史考察

"中亚"不是一个界定很明确的概念。它可以看成"中部亚洲"或"中央亚细亚的"缩写,在中文里这两者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区别,但在俄文中,它们则是有区分的(虽不很严格)。按权威的《苏联百科词典》,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部亚洲)指的是,原"苏联亚洲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一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边界",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另外,Средняя Азия又特指当时乌、吉、塔、土四加盟共和国构成的"中亚经济圈",故此又把这五个共和国称谓"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中央亚细亚)指的是,"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自然地区"①。自然地理学通常把一个辽阔的大陆按水系划分成内流和外流两大区域,内流是它的腹地。欧亚大陆的腹地,即凡北冰洋水系、太平洋水系、印度洋水系和大西洋水系以外的广大地区统称内亚,这甚至于比上述的"中部亚洲"和"中央亚细亚"的相加还要大,且实际上已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历史文化概念上的"内亚"也很大,但大体在亚洲范围,并不等同于自然地理学中"内亚"。我们还注意到,经济学学者习惯于围绕里海把中亚五国与高加索联系在一起考察,甚至于主张中亚包括高加索。其实,"中亚"意味着什么,这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学者及不同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媒体,都有各自的说法和认识,实际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的角度的观察与思考。

近年,随着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而极大程度地超越地理障碍,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世界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小,认为地缘政治论过时无用的说法悄然而起,但是这些

①《苏联百科辞典》,莫斯科,1980年,第1272页,1481页。

论调似不大符合实际。因为,高科技武器超越地理障碍只是有限度的,它的兵力部署、基地设施、后勤保障、打击目标的筛选等,是无法脱离地理因素的分析。比如说,敌国(包括它的军事部署)远在天边或近在咫尺,由此所受到的威胁感就完全不一样;虽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正向高科技技术型产业转移,但经济对资源尤其是能源的需求、依赖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石油、天然气作为日渐稀少的战略资源仍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全球经济乃至于国际政治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战略资源的地理分布相当程度左右着地缘政治的形势。此外,与地缘有关的文化问题也不可忽视。本文讨论的则是中亚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地缘经济的前景及地缘文化的底蕴。

一、中亚五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当代分析

现一般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统称"中亚五国"。这五个国家是近十年独立的新国家。此前,它们只是苏联亚洲部分的一个辽阔边区。苏联解体标志着东西对抗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地缘政治形势都发生深刻变化:

——随着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两极时代告罄,严重威胁全球安全的东西问题已成为过去,但强权政治横行,和平并未降临。美国自以为一霸独立,情不自禁地要搞新霸权主义,同时,原先被掩盖的或未被密切关注的民族、宗教冲突骤起,民族分立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崛起,国际政治格局走势扑朔迷离。

——随着冷战的终结,东西问题不复存在,而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南北问题突出,近年的实际情况是"北方"富国更富,而"南方"穷国更穷,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经济发展问题还日益向政治、安全、环境等领域扩展。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领土完整不容破坏、内政不容他国

干涉，国际严重争端由联合国及安理会调节、裁决，这些半个多世纪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曾较有效地维护了国际秩序，这也是当年冷战没有演变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后冷战时代的一个极明显的动向是，国家主权在弱化。这一方面受到来自一些超国家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经济组织、超级的跨国公司的运作与发展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则主要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所致，科索沃之战后安南秘书长竟主张重新定义国家主权，鼓吹对"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国际干涉的必要性、合法性。如果说前者体现国际一体化、全球化的某种趋向，或利或弊，均而有之；那么以人权为借口对别国纯粹内政问题横加指责、粗暴干涉，甚至于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维护国际安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世界和平、发展和稳定构成极大的危害。

然而，冷战后最直观的变化是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地缘政治形势由此不得不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苏联一分为十五，紧接着是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再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之一的华约解散，从东欧到中亚一下子出现了一大堆新的独立国家，同时也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权力真空"。地缘政治的争夺战由此成为国际政治的世纪之战。

欧亚大陆占世界陆地面积的34%，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西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产值之和差不多是全球总量的2/3，因此欧亚大陆在国际地缘政治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按照麦金斯经典的"陆权论"，从东欧到中亚是亚欧非大陆这个"世界岛"的"心脏地带"，麦金斯认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冷战后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心脏地带"发生了裂变，出现了"权力真空"，地缘政治在此的争夺势所必然，于是麦金斯之说又炙手可热。问题是，麦氏所谓的"心脏地带"

究竟是东欧还是中亚，本来就模糊，看重东欧或中亚的正好各取所需。但事实上当年苏联既控制东欧又统治中亚，却并未能控制“世界岛”，更谈不上控制世界。

近年布热津斯基有“大棋局”问世，值得玩味。但我想，如果把欧亚大陆看成一副大棋盘，那它更像副围棋盘，东亚、南亚、西欧是边角，东欧、中亚则是腹地，只有经营好边角，方可在腹地收官时决胜，否则那只是个草包肚子。从历史上看，文明首先发源于东亚中国、西亚、东南欧的希腊、罗马和南亚印度，中亚至东欧一带向来是这四大文明的结合部；现实也依然如此，仍然是东亚、西欧、南亚和西亚几个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的连接地带。苏联凭借战胜德国法西斯之余威，其锋芒直逼西欧，东西方在中欧的对峙成为冷战的重头戏。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之交，中亚、东欧从苏联的统治、控制中游离出来，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热点，但由于所处的地缘政治地位的不平衡，争夺首先发生在东欧。华约解散，北约非但不解散还要咄咄逼人地东扩，亮出“新概念”。“维谢格拉德”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中的波、匈、捷三国1997年首先获准加入北约，北约的前沿由此向俄罗斯方向推进了600~700公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早就急不可耐地要求挤进北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从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巴尔干诸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正排着队等候入北约；“古阿姆”五国（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都不同程度地向北约靠近，其中格鲁吉亚特别向往加入北约。除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结盟外，也只有南斯拉夫在巴尔干不买北约的账。从这一点看，1999年的科索沃之战是非打不可，因为它是北约东扩的钉子，非拔不可。如果说在东欧的争夺大体上表现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东进与俄罗斯狭路相逢，那么在中亚则是另外的一种地缘政治格局：它在俄罗斯、中国与南部的伊斯兰国家之间。

——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可还在独联体内，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试图拉开同俄罗斯的距离，但与俄罗斯在经济、政治乃至于军事上的关系仍是千丝万缕的；同时俄罗斯仍习惯地视中亚为自己的后院，后院失火当然不是俄罗斯所愿意的。

——中亚五国是中国的近邻，特别是其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与中国的新疆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与中亚国家的国家关系以及这些中亚国家的稳定，对中国西部，特别是对新疆的安全、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亚西南缘是一些伊斯兰国家：其中伊朗、阿富汗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有共同边界；而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等重要的伊斯兰国家也可算是中亚的近邻。中亚是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地区，因此，这些伊斯兰国家对中亚国家的独立发生浓厚兴趣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对伊斯兰的朦胧兴致，也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还看到，近年日本、韩国以及一些欧洲大国向中亚渗透，施加影响，但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很难得到更高的评估。美国作为冷战后的惟一的超级大国，当然要插足于中亚，于美国而言，一可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空间；二可从西面向中国施压；三可牵制与己敌对的伊斯兰国家和势力，如伊朗、阿富汗的塔利班，也就是说有一石三鸟的作用；此外，里海发现大量石油的消息和传说不断。事实上，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亚的活动已十分活跃，从1992年起北约与中亚国家开始建立"和平伙伴计划"关系，与中亚国家的"维和营"军事演习自1997年以来年年在搞，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在中亚也开始有些影响。问题是中亚五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上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在美国的欧亚战略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中亚五国合起来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不可谓小，但只是亚洲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弱，且又分割成大小五块，更重要的是它的总人口只有5 000多万，分别是中国、印度二十几分之一，与一个欧

洲中等国家如意大利、波兰相仿,且人口素质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中亚五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在当今世界,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其对外贸易除了跟周边的有限的几个国家可直接展开外,都要通过第三国进行,现在中亚国家为自己的油气资源寻求出路,正生动地反映了其尴尬境地。综观世界,确实还没有一个内陆国家进入世界强国行列,正是这个条件所限,内陆国家中不大可能有谁将会跻身于这一行列;更何况中亚向来是前苏联经济欠发达地区,独立以来经济急剧下滑,在相当长时期里不会有很大起色。关于这一点在地缘经济的分析中还将展开讨论。

中亚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至今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国防体系。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可能是中亚国家中国防力量较强的,但在世界军事地位上是微不足道的;而像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国家,离开俄罗斯军事保护,恐怕连一天都难以维持。

因此,中亚五国尽管地理位置处于欧亚大陆中部,但只是内陆的中小国家的组合,其综合实力所限,现在、将来都不大可能成为国际地缘政治的中心。其实,中亚一直处于若干政治、经济板块的边缘或其间的衔接地带,当其间出现"权力真空"之时而诱发地缘政治的竞争,不足为奇。从这一点出发以为中亚是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之一,亦未不可,而说它是中心的"中心"[1],似有点言过其实。其实,至少在目前,这个中心的"中心"还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与俄罗斯正面交手的东欧,冷战后美国注意到提升中亚的地位,但与西欧相比还等而次之。1999年的科索沃之战就是明证。毫无疑问的是,中亚在美国欧亚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上所述,至少在地缘政治上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但对此也应有客观估计。我比较同意这样的分析:美国的新欧亚战略有三个基本支撑点,即欧洲至中东、东亚和中亚,这三点着力并不均衡,其顺序也是如上述

①孙壮志:"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

的排列[1]。更重要的是，美国在中亚与俄罗斯有冲突的一面，俄罗斯对美国的介入是有很大的戒心的；同时也有相互谅解的一面，特别是近几年来，表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由阿富汗急剧向中亚蔓延。1998年下半年起，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在费尔干纳地区展开反政府的恐怖活动；1999年2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爆炸了针对卡里莫夫总统的六枚炸弹；1999年8~10月在费尔干纳谷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交界的巴特肯地区绑架了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部长及四名日本地质学家；2000年8月这伙匪徒在塔利班等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下在费尔干纳谷地乌、吉、塔边境武装骚扰，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大有从车臣通过中亚至阿富汗、克什米尔连成一片之势，引起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的警惕。

伊斯兰文化在中亚有深远影响，中亚各国独立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该地兴起，最初主要表现为由中亚各国政府所倡导的以民族主义为内涵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开始受周边宗教极端主义愈来愈大的影响。中亚南缘的阿富汗在冷战时期是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90年代崛起的塔利班早先是美国扶持起来的，它的宗教极端主义趋向不仅反东方(共产主义)，也反西方，特别是与本·拉丹搞在一起，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个中心。中亚西南缘的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土耳其和沙特是美国及西方的坚强盟友，近邻中亚的伊朗被美国认为是最危险的“无赖国家”之一，中亚国家东南缘的巴基斯坦则是渐被美国冷落的过去的盟友。在国际恐怖主义从阿富汗向中亚蔓延之时，这些国家反映是不大一样的。巴基斯坦、沙特是当初承认塔利班三个国家中的两个，而巴基斯坦曾是塔利班的最坚强的支持者。伊朗与塔利班十分对立，它也未如先前有人猜测的那样向其输出“伊斯兰革命”。土耳其在中亚国家的要求下为其提

①王鸣野：《美国的新欧亚战略与中西亚地区大国》，研究报告，2000年。

供反恐怖主义的援助。

早在1992年，中亚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四国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协定。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这四个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发表阿拉木图声明，采取行动以加强独联体南部边界的安全。1998年5月，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反宗教极端主义的三国政治同盟。叶利钦于1998年10月访问中亚，此后普京两次专访中亚，联手对付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议题。2000年1月独联体最高级会晤支持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制定打击恐怖主义计划，决定成立统一的独联体反恐怖主义中心。2000年3月俄罗斯与中亚四国在塔吉克斯坦进行反恐怖主义的“独联体南部盾牌-'2000”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军事、安全高级官员在2000年春扬言，不排除对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基地先发制人的打击[①]。

面对恐怖主义向中亚扩张和中亚原教旨主义化的趋势，美国也有较强烈反映。2000年4月，奥尔布赖特出访中亚，许诺以巨款支持中亚国家反恐怖主义，但同时敦促中亚国家改善恶劣的人权状况。6月初，美俄首脑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向塔利班发出警告，敦促塔利班不要在中亚和南亚散布恐怖主义。8月初，在美俄高级官员华盛顿会谈后，美国务院声明，两国“再次谴责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重申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的决心”[②]。在中亚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点上，美俄两国找到了共同点。

美国对中亚国家援助承诺的同时附加有政治条件，奥尔布赖特直截了当地告诫中亚国家：“以打击恐怖主义或恢复稳定为名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中亚国家除了认为美国的援助“远水解不了近渴”外，还对美国的人权说教极为不满，纳扎

①俄塔社2000年4月8日、5月25日电。
②路透社2000年8月5日电。

尔巴耶夫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会再紧紧地跟着美国后面跑,而我们却还要勒紧裤带。”普京的态度与奥尔布赖特大不一样,他对卡里莫夫说:“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威胁就是对俄罗斯的威胁”,卡里莫夫则说:“俄罗斯是惟一一个能够帮助确保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国家。”[1]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不懈地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早些时候已宣布退出独联体安全体系,后又积极参加独联体防空体系和加入俄与中亚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总之,前几年的情况是,中亚国家有冷落俄罗斯向西方靠拢趋势,但随后则有回靠俄罗斯而疏远美国和西方的迹象。转折点是1999年下半年。这种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动因是,由于阿富汗塔利班不仅与本·拉丹相勾结,而且同车臣恐怖分子相呼应,成为危害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最危险的因素。“9.11”事件后,美国对庇护本·拉丹的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中亚的地缘政治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打破几个世纪的游戏规则,将中亚走廊让与美军使用,其贴近美国的转向是其彻底的实用主义的表现。在俄罗斯默许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新的选择是与美国全面合作,为美国和西方提供地面军事基地。此前,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集中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西亚的海湾、小亚细亚地区。中亚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认为是自己的“后院”。近年,北约东扩的劲头很足,通过“古阿姆联盟”和“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向中亚渗透之意日显。但按常规,它要越过高加索真正在中亚落地,还不知猴年马月。此次对塔利班的“反恐”行动,给美军一步到位地进入中亚以千载难逢之机。俗话说:请神易送神难。如果美军就此长驻,那就是将其在亚洲东西两端的军事部署在中亚实现战略衔接。

---

① 《华尔街日报》2000年5月22日文“莫斯科又把中亚国家吸引到它的周围”。

由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与塔利班、中亚的恐怖主义勾结紧密，印度也对中亚的政局极其关注。2000年6月，印度外长辛格称印度关注的安全环境不限于南亚，而是包括中亚在内的更大范围[1]。2000年10月，普京出访印度，俄印声明联手对付塔利班。国际观察家评论说，他除了以此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外，还希望通过鲜明地提出俄印中三大国的协调路线，与美印首脑互访进行对抗[2]。然而，在印度总有一种声音在鼓吹联美抗衡中国，主张从地缘政治出发，构筑一个以印度为战略支点的针对中国的亚洲安全体系[3]。在俄罗斯也有一种声音是，与其俄印中战略三角，不如俄印美战略三角[4]。中国不仅与中亚国家地缘相接，而且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立场。1996年开始的“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本为解决这五国边界与安全信任问题，连续几年的首脑会晤已形成一种机制。1999年“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宣言明确回击北约的“有限主权论”。2000年春，“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安全部门负责人会晤，表明这一机制在深化。2000年7月，卡里莫夫总统以观察员身份首次参加“上海五国”杜尚别会晤，为此取消了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的会晤，被媒体认为是“对北约的不恭”[5]。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聚会上海，在“上海五国”五国机制的基础上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相信，由中俄主导的这一机制的深化、发展，是左右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积极因素，对于维护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①新华社新加坡2000年6月3日电。

②[日]《产经新闻》2000年10月2日。

③《印度时报》2000年9月6日。

④《莫斯科新闻》周报2000年39期：“俄罗斯需要怎样的战略三角”。

⑤美联社2000年7月4日。

二、中亚和高加索：地缘经济前景的憧憬

我们注意到，不少论者把中亚五国与外高加索三国联系在一起讨论，甚至主张中亚包括整个高加索地区，其理由是，处于欧亚大陆结合部、东西文明和伊斯兰文化与斯拉夫文化交汇处的这一区域一下子出现八个新独立的国家，这既是个"权力真空"地区，又是一个领土、民族、宗教纷争的多发地区，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武器扩散、毒品走私等"非对称性威胁"集中地带，势必引起周边及世界大国的密切注意。

这八国正处于俄罗斯南缘，与俄罗斯的"穆斯林区"相接，也就是正对着俄罗斯防卫上的"软肋"。这几年来令俄罗斯担忧的是：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介入、挺进。如，这八国中除塔吉克斯坦外都已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在北约轰炸南联盟前后退出独联体安全条约并同乌克兰、摩尔多瓦结成"古阿姆联盟"向北约靠拢。二是宗教极端主义北上。早在1994年俄罗斯学者就告诫政府："攻击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从高加索和中亚两个方向以钳形进逼，危及着俄罗斯的生存①。如前所述，1999年下半年，北高加索车臣匪徒与阿富汗塔利班及在中亚费尔干纳骚扰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遥相呼应，大有连成一片之势，引起中亚和高加索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是实情。然而，中亚与高加索更重要的联系是里海，确切地说是里海及其周边的待开发的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里海西岸阿塞拜疆的巴库一带早就发现有石油，并已开采上百年之久，但在里海东岸的哈萨克斯坦，特别是里海海底蕴藏的石油天然气尚未开发。近年来不断有人说，里海将是第二个波斯

①[俄]《独立报》1994年10月4日。

湾、又一个中东，21世纪的世界战略能源供应基地。仅此一点，里海左右的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地缘经济地位陡升，世人为之瞩目。

美国及西方大石油公司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积极介入里海事务，美已获得拥有储量近10亿吨的田吉兹油田的开采权，美还与阿塞拜疆签署多项开发石油合同。在阿同外国公司签署的总投资额近300亿美元的10个巨额石油合同中，美参加了7个，在3个多边合同中美国公司所占份额分别为30%、40%、55%；另外4个双边合同中，美占50%；而俄罗斯参加了其中的4个，但所占份额不太多。

里海油气输出线路的选取，也成为各方竞争的焦点。目前至少有五个方向：北线通过俄罗斯，这是一条传统线路；东线经中国新疆至太平洋沿岸，路线最长；南线有两条都较短，一条经阿富汗至印度洋，那儿正打仗，很不现实，一条经伊朗至波斯湾，美国最不喜欢；西线绕开俄罗斯取道高加索、土耳其，这是美国及西方最中意的一条线路。能源问题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某些美国战略家心目中，控制了波斯湾就掌握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命脉，而控制了第二个波斯湾——里海就意味着掌握21世纪的世界经济命脉。因此，北约东扩——从土耳其东延至高加索、中亚，以确保里海石油从西线输出的安全，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有两座"大陆桥"，都通过俄罗斯：一是由俄罗斯的太平洋港口海参崴通过西伯利亚西去直抵荷兰的鹿特丹港，一是由中国新疆西出哈萨克斯坦经俄罗斯等国至鹿特丹。近年有关国家提出"振兴古丝绸之路"，开始启动、实施绕开俄罗斯的第三座"大陆桥"计划——"欧洲—高加索—亚洲交通走廊(TRACECA)"。该计划包括修建、修复一系列工程，如捷詹(土库曼斯坦)—马什哈德(伊朗)铁路，1996年已完工；叶拉利耶夫(哈萨克斯坦)—土库曼巴什(土库曼斯坦)—阿特列克(伊朗)铁路；巴统(格鲁吉亚)—埃里温(亚美尼亚)—纳希切万(阿塞拜疆)—德黑兰

(伊朗)铁路；卡尔斯(土耳其)—居米里(亚美尼亚)—第比利斯(格鲁吉亚)等铁路以及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的扩建和一些公路的修筑、改造。这是一个不经过俄罗斯的欧亚通道系统，因此得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资金、技术的大力支持，而俄罗斯的反映就十分冷淡。这也生动地体现地缘政治、经济的竞争。

然而，制约中亚、高加索地区地缘经济地位的因素还不少。

中亚、高加索的八国总人口不过6 000多万，除格鲁吉亚外都是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原苏联时期经济欠发达地区，独立后经济大滑坡，至1995年，中亚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总量下降至1989年的一半，人均收入、消费水平、消费层次都较低。近年有的国家经济略有复苏，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难以恢复到苏联解体时的水平。故此，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十分有限[①]。

独立以来，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并酝酿着一些“一体化”，诸如独联体国家一体化，中亚三国一体化，中亚西亚十国经济合作组织(ECO)，“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土耳其六国)，由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六国组成的“古阿姆”(GUUAM)联盟，还有近日建立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值得注意的是，“古阿姆”联盟明说是为了构筑欧亚交通走廊，实有背弃俄罗斯而贴近西方之意。“突厥语国家”首脑自1992年起隔年举行峰会，起初颇有点泛突厥的味道，可2000年春召开的巴库会议，除了呼吁复兴丝绸之路——欧亚交通

---

①杨恕、李艳认为中亚五国整个市场容量相当于一个广东省。《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4期。其实，它可能还不及一个广东省。1999年，广东省的人口有7270万，CDP已达1 000多亿美元，而五国人口总计5 000多万，GDP合计400多亿美元(哈萨克斯坦为157亿、乌兹别克斯坦为146亿、吉尔吉斯斯坦为10亿、土库曼斯坦为77亿、塔吉克斯坦为9亿多)。

走廊外，还表明在打击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分裂主义方面建立国际合作机制的愿望[①]。然而，现在愈来愈多的人在说，毒品是中亚冲突的主要原因，腐败是中亚倒退的因素[②]。连有的西方分析家也认为“西方能源公司宁愿让这些国家软弱无能、腐败成风，以保住油井和管道”[③]。总的来看，这些国家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建立起像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经济结构畸形、官场腐败、效率低下、投资环境恶劣等问题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在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一体化”和经济起飞，也只能是些空话。

诚然，里海附近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极其丰富，但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还是个问题。哈萨克斯坦最近宣布，仅哈萨克斯坦的里海地区就发现蕴藏量至少70亿吨石油的油田[④]。关于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估计说法不一，其中估计的最大数字是：石油2 000多亿桶或300亿吨，天然气10万亿立方米。但这只是很不确切的“远景储量”。真正有用的、可以实实在在拿到手的是“剩余探明可采储量”。据统计，里海附近的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目前只有10亿多吨石油和5万多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只是波斯湾地区910亿吨石油、48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可采储量的零头[⑤]。由此可见，所谓的里海为第二个波斯湾之说，实乃地缘经济前景的憧憬。

三、“内亚”：地缘文化底蕴的历史考察

前些年，美国名教授亨廷顿提出引起极大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的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

①俄塔社2000年4月8日电。

②路透社2000年9月12日电。

③英《经济学家》周刊2000年8月19日。

④法新社2000年7月6日电。

⑤蒲开夫：“中哈石油合作与我国塔里木石油的开发”；《当代中亚研究》，中亚区域发展研究中心1999年报。

同的最大层面。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反之则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也就是说，冷战后，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文化方面的差异将成为造成人类分歧与冲突的主导因素。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此论一出，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遭到广泛批判。大多数中国学者则因他把作为儒家文明的中国看成是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义愤填膺。但实际上如果撇开他由此所引申的这样一些政治偏见，其论也并非一无所取。"文明冲突论"把文化差异看成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确实过于武断；但平心而论，如果完全否认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任何作用，也未必妥当。事实上，文化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不容漠视。最明显的是，1999年科索沃之战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与以信仰东正教居民为主的国家的反映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明也好，文化也好(这两个概念通常被混用)，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形成的。文明的发展、扩散，文化的传播、交流，既依赖于时间的流逝，又凭借空间的转移，脱离历史和地理因素的文明或文化，都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①]。我们已讨论了中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也不应忘却与这一地缘有关的历史文化，探讨它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内陆亚洲有两个共生的"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或称"双泛"，经常被提到。须注意的是：如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506页。

果仅仅是泛伊斯兰主义，其流行的地方可能更大一些，而作为两个“主义”共生的“双泛”，其盛行的区域要小点，但相当稳定：土耳其、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俄国的鞑靼斯坦（喀山和克里米亚）、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我国新疆。我们姑且把这一地域称之为“内亚”（当然这不是自然地理学上的“内亚”）。“双泛”的产生、发展，自有许多现实的原因[1]，但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内亚”的历史文化底蕴。实际上，稍加考察，“双泛”流行的“内亚”，在近一千年的历史上都经历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里从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北部草原的游牧民一浪浪地南下，由此不断地发生着民族大融合。公元6世纪突厥部兴起称霸蒙古和中亚草原，后来该部虽衰败退出历史舞台，但广大“内亚”地区实现了“突厥化”，即活动在这里的众多民族、部族，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这里又历来是多种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及原始的萨满教都在这里盛行过；然而，伊斯兰教自兴起、扩张至这里后，逐渐地取代其他宗教而居于主导地位，实现“伊斯兰化”。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本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2]。“内亚”的历史千头万绪，但这两个“化”是“内亚”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正是“双泛”涌动的历史文化背景。没有这一文化背景的地方就没有“双泛”发生的土壤。所以，“双泛”之横行超越了许许多多现代国家的边界，一度在新疆也闹得很凶，但其影响过不了星星峡，也越不过昆仑山。

“内亚”有史以来就是几大文明的边缘、连接地带，其北部草原经常出现过一些庞大的游牧“行国”，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南部

---

①王淑梅：“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世界民族》2000年2期。

②关于“突厥化”、“伊斯兰化”，参见潘志平、王智娟：“鸟瞰中亚宗教、民族之历史与现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2期。

绿洲多为小国寡民，中世纪以来，只有奥斯曼帝国、帖木耳帝国，还有一个由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耳后王在今印度河流域建立的莫卧尔帝国，显赫一时。此后，乌兹别克诸汗国的领地还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北的阿姆河左岸。从这一文化背景看，不仅土耳其属于这一文化区域，而且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也在这一文化区域之内。明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今天阿富汗内战、克什米尔原教旨主义活动强烈影响到中亚的安全稳定，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在车臣、中亚、阿富汗、克什米尔广阔地域连成一片而困惑迷惘。

近年，关于中亚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政治家、媒体甚至于一些学者都异口同声地斥之为"瓦哈比"。最近有学者提出那里可能并非是瓦哈比问题，我很同意。我还想强调，中亚的极端主义本质上是极端政治运动，不能因为它披着宗教外衣，就将其与宗教甚至宗教派别混为一谈①。这些年来一些国际问题观察家常把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什叶派、苏非派、瓦哈比派一锅煮了，问题就在对于"内亚"的历史文化底蕴缺乏了解。

总而言之，从历史、现实到未来，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系统和思考是有意义的。中亚意味着什么，它迈人新世纪将以动荡不安、扑朔迷离而富有魅力。它与我国地域相联，那里发生的事或多或少地关系到我国西部的安全稳定和大开发，须予以严密关注。

---

①关于这一问题在本书下编"'瓦哈比'：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宗教现实问题"有专门讨论。

鸟瞰中亚：地理、历史和文化

一、 自然地理

地形和地貌

山脉和山谷盆地

河流和湖泊

荒漠和草原

气候

矿产资源

二、人文地理

民族的构成

宗教情况

语言状况

三、简史

上古的居民

东西关系和伊斯兰化

南北关系和突厥化

沙俄南下与殖民主义

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本章所说的"中亚"指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它东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邻,南与伊朗、阿富汗接壤,北与俄罗斯联邦相接,西与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隔里海相望;五国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 400万。

各共和国的具体情况是:

	面积(万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哈萨克斯坦	271.73	1484.4
乌兹别克斯坦	44.74	2490.0
吉尔吉斯斯坦	19.81	490.8
土库曼斯坦	48.81	536.9
塔吉克斯坦	14.31	619.9

其中哈萨克斯坦领土辽阔,是其它四个共和国总面积的两倍,而乌兹别克斯坦领土虽然仅为哈萨克斯坦的1/6,但人口却比它多出六成多。现就中亚五国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简史概述如下。

一、自然地理

中亚的东部以西天山的南脉为界,南部以科毕达山脉和阿姆河的中游及其上源喷赤河为界,与中亚的自然地理界线并不吻合,这是上个世纪沙俄征服中亚和蚕食我国西部领土的结果。它的北部已越过哈萨克草原,深人到西西伯利亚南缘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也是不与那里的自然地理界线吻合。惟有它的西界是天然界线,那里是里海的东岸,海岸线蜿蜒,形成一些半岛、岛屿和冲积的沙嘴。在自然地理风貌上它大致为南部的荒漠、绿洲和山区与北部的草

原、平原和丘陵，其界线大体在伊犁河、锡尔河的北岸到里海一线。

地形和地貌

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低。在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天山地区山势陡峭，海拔在4 000~5 000米，其中海拔7 495米的共产主义峰和海拔7 134米的列宁峰是世界最著名的山峰；而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附近卡拉吉耶洼地发现有前苏联陆上最低点——海平面下132米。在这东西之间的广阔地区，荒漠、绿洲在200~400米之间，丘陵草原在300~500米之间，而东部山区在1 000米左右，中亚绵亘着温带最壮观的山地，冰川超过4 000条，总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费德钦科冰川长71公里，它包括33条支流，面积达900平方公里。而山脚下却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干旱炎热的荒漠，荒漠的水平线在弥漫如烟的粉尘黄土中渐趋消失。崇山环抱的山谷盆地和撒在广袤荒漠中的绿洲是中亚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它滋养着这一方农人，而辽阔的北部草原和山坡草地驰骋着一个个骑马民族。

山脉和山谷盆地

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号称“世界屋脊”，无疑是中亚的制高点。它的东部占优势的是剥蚀高原和垅岗地形，这里的山脉相对高度不大，徐缓地向绝对高度3 500~4 000米的山间谷地倾斜；它的西部占优势的是切割剧烈的高山地形，狭窄而幽深的峡谷。帕米尔高原北缘是两座平行的高山——阿赖山脉和外阿赖山脉，由东向西倾斜。阿赖山在海拔5 301米的伊格拉峰附近又分成平行的三支山脉——突厥斯坦山、泽拉夫尚山和吉萨尔山，继续向西倾斜而最终消失在撒马尔罕绿洲附近的荒漠。由阿赖山向东北方向延伸是巍峨的天山山脉，西部天山的主峰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交界的汗腾格里峰——海拔6 995米。由汗腾格里峰往西有两支平行天山支脉——昆格阿拉套—吉尔吉斯山的捷尔斯克依阿拉套山，环抱着高山湖泊——伊塞克湖。在天山隘口中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口岸吐尔尕特附近，又有一支脉费尔干纳山往西北延伸再转西南恰特卡尔—库拉明山，圈出中亚最著名的盆地——费尔干纳。费尔干纳盆地东西300公里，南北最宽150公里，形如一只巨大的椭圆形的碟子，缓缓地由东向西倾斜。哈萨克斯坦东部边缘地带有几组平行山脉：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阿拉套山，在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联邦交界线上的别卢哈峰海拔也达4 506米。在中亚的西南缘土库曼斯坦的科佩特山是由帕米尔向东南伸出的兴都库什山的余脉，其高峰卡拉古拉峰仅有1 977米。哈萨克斯坦西部还有几座山，但与东部的高山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河流和湖泊

作为自然地理的中亚来说，它的所有河流都没有通向大洋的出口，河水除了被引走用于灌溉外，或者“消失”于荒漠，或者没于内陆湖泊中。锡尔河是中亚最大的河流，全长3 019公里（含上游纳伦河），发源于西部天山山区，它所灌溉的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绿洲，是中亚最重要的经济区；千百年来人们为争取水源而斗争，充分地利用了锡尔河及其支流的水，创造出费尔干纳绿洲繁荣富庶的景观：绿荫如盖的果园、碧绿的田野和银链似的渠道。阿姆河全长2 394公里（含上游喷赤河），是中亚水量最充沛的大河，发源于帕米尔山区，水量丰富、落差大，拥有巨大的水电资源，其上游建成最大的努列克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70万千瓦。锡尔河、阿姆河这两条大河最终注入中亚最大的湖泊——咸海。咸海面积约64万平方公里，按面积来说，它是世界第四，但由于过度滥用这两条大河河水，咸海水位已急剧下降，悲观者相信它将因供水枯竭而迅速消失，由此产生

咸海生态危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是条重要的河流，它发源于阿赖山。“泽拉夫尚”意即含金的，它哺育着中亚腹地美丽的绿洲——撒马尔罕绿洲和布哈拉绿洲，没于克孜尔库姆沙漠。

阿姆河左方有两条河——卡拉捷詹河和穆尔加布河，它们发源于伊朗、阿富汗高原，滋润着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绿洲和马雷绿洲。锡尔河的右方有发源于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山区的两条河——塔拉斯河和楚河。楚河灌溉着比什凯克附近的沃土，它在与中亚最美丽的高山湖泊伊塞克湖西岸仅3公里处擦肩而过。伊塞克湖为高山深水湖，已知最大深度为702米，在欧亚大陆的所有湖泊中仅次于贝加尔湖。伊塞克湖以巨大的容水量影响着湖区的气候，它虽高踞海拔1 600米，但即使在隆冬也不结冻，因此又以“热海”闻名于世。

在哈萨克斯坦东西两端有两条重要的河流——伊犁河和乌拉尔河。伊犁河发源于我国新疆天山深处，全长1 439公里，在哈萨克斯坦境内802公里，注入巴尔喀什湖。巴尔喀什湖面积1.7~2.2万平方公里，它的奇特景观是：西半部咸水，东半部淡水，其间仅有极窄的水道相通连。流入巴尔喀什湖的至少有七条较大的河流，因此这一地区又被称作谢米列契（七河）地区。乌拉尔河发源于俄罗斯联邦的南乌拉尔山，在哈萨克斯坦境内1 084公里，注入世界最大的内陆湖——里海。里海面积37.1万平方公里，低于海平面28.5米，它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和伊朗的国际湖泊。

越出自然地理的亚洲腹地，在北哈萨克斯坦有条大河额尔齐斯河，发源于我国阿尔泰山区，携带其支流伊希姆河、托博尔河汇入俄罗斯联邦的鄂毕河而最终注入北冰洋。额尔齐斯河长4 248公里，在哈萨克斯坦境内1 400公里，它河道平稳、水量充足，在航运、灌溉、城市供水方面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荒漠和草原

荒漠、半荒漠和草原占据从里海到天山山地之间的巨大面积。阿姆河与卡拉捷詹河之间的卡拉库姆沙漠(35万平方公里)和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克孜尔库姆沙漠(30万平方公里)是中亚最大的沙漠,地势平坦,海拔均在300米以下,大部分为沙垄、龟裂地,间有闭塞的洼地和孤山。极度干旱、贫瘠,缺少植被,如克孜尔库姆沙漠东南部就被称为"饥饿草原"。在哈萨克斯坦,草原覆盖在长1 200公里的哈萨克丘陵和长630公里的图尔盖谷地,海拔在300米左右。由于受到北冰洋湿气影响,比起中亚腹地的荒漠要湿润些。在北部台地、丘陵与南部沙漠之间的是别克帕克达拉草原,其地貌处于草原、半荒漠、荒漠的过渡地带。撒在荒漠中的绿洲,拥有丰富的栽培植被,它的翠绿色彩在灰黄荒漠作底色衬托下显得格外赏心悦目,1954~1960年在中哈萨克斯坦,里海沿岸低地开展的大垦荒,使那里出现了大片的播种面积,这是人类与自然斗争创造的新的地理景观。

气候

由于处于欧亚大陆腹地,尤其是东南缘高山阻隔印度洋、太平洋的暖湿气流,该地区气候为典型大陆性气候,其突出特征是:第一,雨水稀少、极其干燥。一般年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下,咸海附近和土库曼斯坦的荒漠年降水量仅75~100毫米,而山区年降水时可在1 000毫米,费尔干纳山西南坡甚至可达2 000毫米,但山地中也有雨量少于沙漠地区,如帕米尔的年降水量仅60毫米。第二,日光充沛、蒸发量大。中亚每平方厘米地面由于阳光辐射每年可获10~13万卡热量,在土库曼斯坦则几乎达到16万卡。科学测试,在中亚北纬40度地方每季所获阳光照射量并不逊于热带地区。空气极其干燥和高温引起大量的蒸发,阿姆河三角洲水面的年蒸发量达

1 798毫米，即比这里的降水量大21倍。第三，温度变化急剧。许多地方白天最高气温与夜晚最低气温之间可相差20℃~30℃。在帕米尔高原则有日温差40℃的记录。从哈萨克斯坦最北端到土库曼斯坦最南端，纵跨北纬57°到35°，表现为寒温带经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在盛夏7月，除山区外平均气温一般在26℃至32℃之间，而在隆冬1月，平均气温由北端的-20℃到南端的2℃过渡。

矿产资源

各种矿藏丰富，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品种比较齐全，煤探明储量为1 624亿吨（1972年），集中分布在卡拉干达、埃基巴斯图兹、图尔盖、日兰奇克、楚河、伊犁河等大型煤田。此外，还有铁矿、锰矿、铜矿、钾盐等矿藏，其中铬铁矿探明储量有2亿吨，仅次于南非、津巴布韦居世界第三。吉尔吉斯斯坦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汞、锑的储量可观。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主要是铜矿、铅锌矿、钨矿、钼矿，此外费尔干纳的石油和布哈拉、希瓦的天然气有比较丰富储藏。然而，石油的最丰富储藏在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资源丰富，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水电资源达6 400万千瓦。

二、人文地理

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决定了它的人口分布及构成的突出特点是：第一，人口密度很小，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12人。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6.1人和7.2人，只有乌兹别克斯坦较密，达到51.4人。第二，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山区，每平方公里只有1~2人，在卡拉库姆沙漠、克孜尔库姆沙漠及哈萨克斯坦中部的荒漠几乎是渺无人烟；而绿洲及大城市

周围密集了大量人口，如富庶的费尔干纳盆地每平方公里高达300~400人，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所在的楚河盆地仅占共和国国土1/12，却集中了共和国的35%的人口。第三，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外，出生率普遍在30%以上，自然增长率在25%左右。这一情况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似，与其经济发展是不适应的。第四，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绝对人口增加迅速。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在20世纪90年中人口增加了5.6倍，近30年人口翻了一番，绝对人口增加了200多万。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如此，1959年为500万，1979年翻了一番，达1050万，1989年接近2 000万，又差不多翻了一番。第五，20世纪以来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城市人口由原先的10%左右增长到40%左右，其中哈萨克斯坦一些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如卡拉干达州、杰兹卡兹州、曼格斯套州城市居民已占这些州总人口的80%~90%。70年代以前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欧洲地区的移民，70年代以后主要是共和国内部人口流动的因素。然而在中亚有些地方，如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农村的自然增长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俄罗斯人迁出，近年城市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民族的构成

20世纪初中亚的主要人口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卡拉卡尔帕克等土著民族。苏维埃时期，随着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大量俄罗斯及斯拉夫语居民迁入，另外还有一些民族，如鞑靼人、德意志人、朝鲜人是被政府当局以强行手段迁入中亚的。目前，中亚各共和国都是多民族的共和国。据原苏联1989年人口统计资料，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已有130多个民族和部族成分的居民。构成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居民民族成分主要是：土著民族即各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和俄罗斯人，下表是关于各共和国人口最多的五个民族占共和国总人口比例：

中亚五国民族比例一览表

民族\国家	哈萨克斯坦(1996年)	乌兹别克斯坦(1994年)	吉尔吉斯斯坦(1994年)	塔吉克斯坦(1994年)	土库曼斯坦(1990年)
1	哈萨克48.1%	乌兹别克73%	吉尔吉斯56.5%	塔吉克65%	土库曼72%
2	俄罗斯34.1%	俄罗斯8%	俄罗斯18.8%	乌兹别克26%	俄罗斯10%
3	乌克兰4.9%	塔吉克5%	乌兹别克12.9%	俄罗斯2%	乌兹别克9%
4	德意志2.4%	哈萨克4%	乌克兰2.1%	鞑 靼1.4%	哈萨克3%
5	乌兹别克2.3%	卡拉卡尔帕克2%	德意志1%	吉尔吉斯1.3%	乌克兰1%

可以看出，这些民族总和占各共和国人口的90%左右。这里再简单分析一下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的情况。

主体民族，或者说共和国以其命名的民族，只有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占绝对多数（2/3以上）。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1959年占30%，1979年占36%，直到1989年才达到39.7%而成为共和国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但仍未达到共和国人口总数的简单多数(1/2以上)。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建立的是“自决的哈萨克民族国家”，对哈萨克族不占共和国总人口的多数十分忧虑，近年来采取一些措施号召境外哈萨克人“回故乡”，同时有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斯拉夫语民族居民迁出，哈萨克族在总人口占有比例有所提高。但是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景气，对境外哈萨克人吸引力不大，同时以牺牲非哈萨克人特别是俄罗斯人的利益可能迫使这部分人的加速流失，不仅会造成族际关系紧张和社会动荡，而且会对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损害。目前，该国正在调整其民族政策以阻止具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俄罗斯人的出走。因此，在短期内

哈萨克族还不能达到共和国人口的简单多数①。

俄罗斯人,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共约1 000万,其中约600万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在城市。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几个州占有很大比重。近二三十年俄罗斯人在一些地方的绝对人口有所增加,但占共和国总人口比重却逐年下降。如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人口由1970年的147.3万增加至1989年的162.4万,但人口比重由12.5%降至8%;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人口由1959年的62.4万增至1990年的94万,但人口比重由30.2%降至21.5%。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也是苏联解体后抛在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人的40%,因此俄罗斯人在中亚各国地位问题,不仅是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民族问题,也是俄罗斯联邦与这些国家关系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宗教情况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是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多宗教地区。中亚各国主体民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族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所谓穆斯林民族,此外这里居住的卡拉卡尔巴克人、维吾尔人、东干人、鞑靼人也属于穆斯林民族。这些民族群众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至今信教人数在其人口中仍占有相当大比重。中亚地区伊斯兰化差不多有千年的历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始终把宗教认定是最保守的社会意识形态,70年来把反宗教宣传、无神论宣传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伊斯兰宗教意识在中亚淡漠,尤其是在本来宗教观念淡漠的哈萨克人、吉尔

①据报道:哈萨克斯坦官方宣称,1996年初哈萨克族人口已占该国总人口一半以上,即达800多万。就是说自1989年至1996年八年中,哈萨克族绝对人口增加了170多万人,即每年平均达25万人之多。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自然增长和境外迁入之和无论如何不可能如此之多。看来,这种说法对于渴望主体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主义是有政治意义的。

吉斯人中更是如此。中亚地区究竟有多少教徒还是一个不清楚的问题,官方不曾进行过这样的统计,也从未公布过这类数字。一些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些数字,但相距甚远(从穆斯林居民中的1/3到1/2到80%)。因为没有科学根据,很难说哪个数字更为准确。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宗教思想在中亚出现"复兴",这与社会主义被抛弃后信仰发生危机有直接联系,同时也受到来自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塔吉克斯坦内战就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亚各国政府尽管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但迄今仍坚持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立场。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只有塔吉克族穆斯林属什叶派。此外,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斯拉夫语族居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东正教教徒,还有部分群众信仰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这些教徒的数量不多。

语言状况

中亚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1989年全苏人口普查资料称,认为本民族语言为母语者占90%以上,但这种情况并未准确地反映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以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而言,官方统计资料说,99.6%的哈萨克族认为哈萨克语为母语,62.8%的哈萨克族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流利掌握。但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撰文指出:"主体民族的语言(指哈语)未在国家机关里使用,成了生活的'厨房'语言了。几乎有30%的哈萨克人要么一般不讲哈萨克语,要么就是掌握得很差。爷爷已经不能用母语同自己的小孙子谈话了。"在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各国都颁布语言法,确立主体民族的语言的国语地位,将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这一规定在俄罗斯人中引起不安,统计数字表明,哈萨克斯坦622万俄罗斯人中只有0.9%的人把哈语作为第二语言流利掌握。1995年通过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虽然没有明确予以俄语第二国语地位,但也在事实上承认俄语与哈语同等地位。

三、简　　史

上古的居民

史前中亚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前苏联考古学家在土库曼斯坦西南、塔吉克斯坦中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地挖掘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那里发现的石器、禽兽骨头和烤火堆遗迹，表明其主要谋生方式是狩猎和采集。南土库曼斯坦的哲通文化可能是中亚地区的最早期农业文化，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属于公元前第七千纪末到公元前第六千纪。考古和人类学家研究认为，中亚最早的居民是古欧罗巴人。19世纪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雅利安人起源于奥克苏斯河（阿姆河）和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草原。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雅利安人的故乡在欧亚草原，雅利安人大多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瓦解迁徙，一支迁入印度，一支迁入伊朗高原，大约还有一支迁到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盆地以至河西走廊一带。也就说，青铜器时代，有一部分雅利安人部落在迁徙过程中进入中亚并居住下来，这些部落一方面构成上古中亚民族的主要成分，另一方面把雅利安语传到更遥远的地区：伊朗东部、阿富汗和印度。南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和花剌子模的塔扎巴格雅布文化都能提供这种迁徙的证据。

关于中亚古代居民的最早文字记录是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登铭文（刻于公元前521年左右）提到的Saka人，即中国史书《汉书·西域传》说的塞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经说："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西徐亚人）都称为Saka人。"然而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似乎是对黑海以北南俄草原上早期游牧人泛称。Saka人与斯基泰人种族和语言上可能有共同的地方，但似有所区别。关于塞人的历史极为模糊，现有学者考证说：公元前7世纪末，塞人Asii部已出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稍后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当

地的土著Massagetac人。此后,他们被波斯人称为Saka。公元前2世纪,由于大月氏人西迁,塞人被迫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批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费尔干纳建大宛,一支进巴克特尼亚灭当地希腊殖民政权建大夏,另一支顺锡尔河而下,建康居,奄蔡。不久又有乌孙人、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楚河流域,而大月氏再次西迁达阿姆河,击败大夏,于是又有乌孙国和大月氏国成立。Asii等部塞人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但还有人认为乌孙是突厥语族。比较谨慎的说法是,在公元前后,雅利安人或类似他们的民族分布于整个中亚地区,其中也混有突厥语族或与其类似的部族。关于中亚古代历史可以从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两个方面来分析。

东西关系和伊斯兰化

古代中亚处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埃及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中间地带,由此受到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它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而相互远隔的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接起来。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文化上。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它将古代人民东西友好往来概括得既形象又富于诗意。但这终究是个艺术化了的概念,和任何美好的东西一样,总有其不足之处,至少它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丝绸之路即丝绸贸易之路。其实通过中亚的古代商路上远远不止丝绸贸易。一般以为,15世纪海路贸易兴起后,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衰落了、断绝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海路兴起而东西陆路交通退居其后并不意味着这条商路的衰落乃至废弃,中世纪以来大黄贸易曾在丝绸之路上繁荣兴旺了一千来年,就是一证。大黄分布较广,但其中品质最优良的是产于中国的甘肃、青海山地的野生大黄。在中国使用大黄的历史极为悠久,是一种常用常备药材。然而它在中亚、西亚及至欧洲长期以来

被认为是一种珍贵的灵丹妙药,其价格甚至以黄金计算。因此中国的大黄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中亚、西亚及至欧洲最紧俏的商品之一。所谓15世纪后丝绸之路断绝的说法恐怕是西方基督传教士的说法。基督徒视之为畏途,并不能证明此路不通。这条路的这段或那段在某一时期因战乱中断是可能的，但整个陆路交通并不会因此完全中断,因为它是由许多平行的纵横相联的网络构成的。此路不通,彼路通;你走不通,他却可通行无阻。实际上,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成东西文明的交流之路,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东西文明的交流不存在中断问题。

东西文明的交流除了丝绸、大黄、茶叶、瓷器等商品贸易活动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交流。首先是祆教,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为国教,很快传播于中亚各地,再东传至中国。唐代长安、洛阳均有火祆祠供来华胡商祈福。其次是摩尼教,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摩尼教不容于波斯,摩尼本人亦被处死,但其外传却甚为迅速,公元3~6世纪传遍中亚。后东传,在回鹘尤受尊崇，安史之乱回鹘人应召人关以助平乱，摩尼教借此势在中原大大发展。再次是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其说被东罗马认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祆教、摩尼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三大宗教,流行中亚,亦东传中国。然而在古代中亚影响最大的宗教还是佛教。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阿育王朝代佛教广泛传播于印度次大陆,公元前1世纪中期已有关于大夏地流行佛教的记载。佛教何时传人中亚的中心粟特地区虽不能判定，但应在摩尼教传人当地的270年以前。阿姆河上游大夏地亦称巴克特利亚,后来又叫吐火罗斯坦。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于该地,后又为塞琉古王朝所征服,希腊人在此建立希腊巴克特尼亚王国,把希腊文化引人这一地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正是大夏希腊文化艺术的

鼎盛阶段，故此传入该地的佛教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由陆路中亚东传的早期佛教文化，又被称为希腊化佛教文化，这与由海路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然而最终在中亚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起源于7世纪的西亚阿拉伯半岛，在中亚绿洲城市中，佛教的衰落是与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相联系的。至10世纪，中亚南部基本上实现伊斯兰化。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中亚伊斯兰化后，再没有任何宗教能够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

伊斯兰文化进入中亚是叠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中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造”伊斯兰教。14世纪后，中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帖木儿帝国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的分裂一直延续到俄罗斯人的到来。这一时期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在中亚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苏非即阿拉伯文sufi，“羊毛”意，大抵与最初的神秘主义托钵僧依禅们身披长袍修行有关。苏非派不是以诵念《古兰经》来求得对安拉的认识，而是凭借个人的灵魂的闪光所获得一种神秘的直觉，以虔修默祷来“近主”，最终达到与“安拉”合而为一。苏非派以秘密传教的方式发展，吸收各地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圣人崇拜、圣墓麻扎崇拜和民间的祖先崇拜的诸因素。苏非的依禅、和卓们以行使“奇迹”(诸如水上走、天上飞、吹气治病、使死人复活、与动植物交谈、点石成金等等)赢得各阶层的信徒狂热崇拜，凡此种种，都远离伊斯兰“正统”的“原教旨”，构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中亚模式”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7世纪后的一段时间，那是与阿拉伯武功相联系的；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后，那是与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广泛传播相联系的。“中亚模式”伊斯兰的最突出特点是和卓崇拜。和卓即自称穆罕默德后裔的人，在和卓崇拜狂热年代，和卓就是信徒心目中的神。苏非神秘主义让信

徒相信人神之间有一条接近的途径，并制造活生生的神——和卓，推给信徒，这显然要比那种“正统”的抽象说教更富于吸引力。历史证明，它“常常比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取得更大成功”。帖木儿朝、昔班尼朝的速檀、艾米尔们争先恐后地拜苏非大依禅、和卓为其精神导师。通过与世俗封建主的结盟，和卓僧侣团攫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权益。如和卓阿赫罗尔(1404~1490年)通过“坦霍”、“瓦克甫”名义捐赠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其庄园遍布河中和费尔干纳，成为当时中亚最大的僧侣封建主。他的40年宗教统治，威名远扬，权势甚至超过可汗。和卓势力最强大时还一度攫取过世俗权力，但那多半是在世俗权力薄弱的地方，如塔什干、费尔干纳和新疆的叶尔羌。19世纪中叶，和卓崇拜衰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卓作为僧侣封建主与世俗封建主勾结、结盟过程中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但它一旦要与世俗封建主争夺统治权时，这种联盟必然瓦解，并必然地遭到世俗封建势力的严厉打击。和卓崇拜在中亚没落，但苏非神秘主义在中亚继续发展，苏非主义依禅们在秘密活动，一直到近现代。

从历史上看，各种宗教在欧亚大陆的传播都是以中亚为媒介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渐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不例外。当中亚伊斯兰化时，中国的新疆也开始了这一进程。而中亚和卓政治发展的结果是，在明清之际三支和卓家族东人新疆，苏非神秘主义由此继续向关内推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西北伊斯兰各门宦。

南北关系和突厥化

如果说与丝绸之路相联系的是东西文化交流问题，那末历史上欧亚大陆上还有个南北文化交流的问题。日本的新一代学者认为：对中亚文化发展史的研究要突破传统的东西关系的框架，提出以“东西南北交流和对立为中心来掌握每个地区和民族”。这里所谓的“南北关系”是北部的游牧社会和南部的农耕社会的关系，这

两个社会的分界线大体沿着中国的长城、天山，穿咸海、里海至遥远的欧洲。

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迥然不同的。比如，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义认为：农业是神圣的职业，其信徒必然从事农业。中亚的农业是绿洲灌溉农业，这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一份当地古文书写道：

农夫额头上满是汗水，他们的手掌肿胀粗糙，脚掌也裂了口子。他们的血液冻住了，他们干渴，饥肠辘辘。他们在坎坷不平的田野上走来走去，手扶犁，弯着腰，忧愁使他们日益消瘦。他们播种，用尖嘴锄刨地。他们衰弱了，他们辛苦地干活，不能坐下来歇一下。他们把种子撒到地里，及时地覆盖上（泥土），他们饱受艰辛，直到通过渠道把土地浇灌完为止。

绿洲中的城镇是某种较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们不仅吸收了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新技术新思想传播给邻近地区。比如人们在这些绿洲中发现过16种语言、24种文字书写的世俗文书和宗教文书，这又反映出绿洲的对外开放性。然而绿洲是经常受到威胁的，那些用夯土筑成的城墙的残垣断壁，就是证明。因此，绿洲居民的这狭小天地既是内部平静的封闭世界，也是动荡不定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骑马的游牧民的文化信念可以成吉思汗的扎撒（法令）为代表，该扎撒规定："永世流动，任何地方也不要定居下来。"游牧部落的生活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伴随他们的畜群，在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来回游动。但是在极低水平的生活方式下牧场的载畜量是有限的，因此为追逐、争夺肥美牧场不断发生部族战争和迁徙。局势的动荡很可能危及绿洲农业区的安全。农耕民为保护自己的文化区域不受到所谓"蛮族"游牧民侵扰，耗费巨资和人力沿着这南北两个社会分界线修筑防御线。这条防御线在中国就是长城，在中亚则是锡尔河北岸的墙垣、壕堑。乍看起来，长城、墙垣、壕堑

是古代南北关系对立、冲突的产物，但是南北的交往是必需的，人为的工事阻遏不了这交往。近年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作为军事防御线的长城、墙垣，往往同时成为经济、文化的会聚线，碰撞与融合的界碑。在和平时期，游牧民也经常到农业区和城镇进行抢掠，但绿洲与游牧民之间也存在着井然有序的贸易联系，游牧民用自己的皮毛、牲畜换取粮食等农产品。在交换过程中丝束、棉布都曾成为等价物。公元1世纪中亚就有了金属硬币，而1260年以后才开始一定范围内使用纸币。

在中亚，南北关系文化交流既表现在往返其间的商人活动，又更多地体现在民族迁徙和融合。如果说"东西关系"中大量表现为宗教传播自西而东的渐进的过程，那么"南北关系"中突出的是一个个骑马牧民不断南下的特点。"永世流动"，是游牧民的信念，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要定居下来"成为一种法令，这就从反面证明，游牧民南下走向定居，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趋势。在中亚，我们所看到的是：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雅利安人南下，以后有塞人、乌孙、大月氏、哌哒、突厥、乌古思、黠戛斯、蒙古、月即别人的南下，一浪又一浪，一个个游牧部族南下中亚，在自然地理环境和当地文化氛围作用下，大多转入定居农耕，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同时又给当地文化注入活力。前文已提到，上古中亚居民主要是雅利安种，操印欧语，具体地说是一种东伊朗语，即今天塔吉克族的祖先。大约公元6世纪中亚落入突厥部的统治之下，公元13世纪中亚遭到蒙古铁骑入侵，其结果是中亚居民加入了大量蒙古人种成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逐渐突厥化(Turkisierung)。所谓突厥化的正确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突厥人"。学者举例说：黠戛斯(吉尔吉斯)人原先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再如，威震一时的帖木儿大帝就是出自突厥化的蒙古巴鲁剌思部。

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大体是同步的，也就是一千多年前

开始的。学者指出:"每一次突厥人入迁的浪潮都把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更远地赶进山里去。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人是城市居民的主要部分,但在锡尔河右岸,他们的比例就少得多。"蒙古人侵是中亚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其结果是原先诸突厥语族(如葛逻禄、突骑施、炽俟、样磨、乌古斯等)和哈拉契丹、乃蛮、克烈等部消失了,而月即别(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形成了。这实际上经历了一次民族、部族分解、重新组合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中都发现有乃蛮部。中亚民族进程本质上是游牧民和定居民在政治、经济权益上的不断再分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Sart概念的演变。Sart源于梵文Sūrtavāho,基本含义是商人,后演变为定居民。穆斯林文化的代表人物首先以商人身份来到北方草原,蒙古人由此将他们那儿的定居穆斯林称作撒里达 (Sart)。游牧的"突厥人"跟着蒙古人把塔吉克人称作Sart,在这时Sart和"突厥人"相对,以区别定居民和游牧民。当然"突厥人"还含有统治定居民的意思,因此那些后来已过着定居生活的"突厥人"不愿以Sart自称。16世纪游牧月即别人的一部分南下中亚,在他们看来"突厥人"和塔吉克人都是自己统治的定居民,都是Sart。南下的这支月即别人也很快定居,与当地"突厥人"融合成乌兹别克人,于是被那些留在草原的月即别人(即后来的哈萨克人)看成同塔吉克人一样,都是Sart人。总之Sart定居民的内涵不变,而其外延却随着民族迁徙、融合的过程不断发生变化,在中亚的一千多年历史中,谁定居,谁就是Sart。Sart与游牧民的斗争有时是极为残酷的流血斗争,但本质上不是宗教或政治上的对立,而是处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人们面对愈来愈窘迫的水和土地资源的忧虑所致。总之,中亚的民族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中亚的现代民族就是这种复杂的古代部落、部族的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产物。

塔吉克族。其先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来自欧亚草原的一些使用东伊朗语的部落,这些部落在很长时期广泛分布在阿

姆河、泽拉夫尚河流域、费尔干纳盆地和今天中亚以南的一些地区。也就是说,在大批操突厥语部族南下前,塔吉克先民是中亚的土著,从这个意义上说,塔吉克古代史就是突厥化前的中亚史。在最初的意义上,塔吉克与Sart同义——定居民。波斯人先把征服者阿拉伯人称为Tajik(大食),后来把这个称呼扩大到信仰伊斯兰教的自己的同部族人,后来的突厥人把所有定居穆斯林称为Tajik,而不论其民族出身。当阿拉伯征服者(除极少数外)与土著居民融合后,Tajik一词变成确定波斯人的民族学术语,这个词就完全不再用于阿拉伯人。中亚突厥化后,有一些塔吉克人被突厥化,但更多的塔吉克人被迫往南部山区迁徙,这样就有草原塔吉克人和山地塔吉克人,前者定居农耕,后者以畜牧为主,塔吉克语仍然被保存下来,塔吉克最终成为中亚当地主要民族中惟一操印欧语系的现代民族。

吉尔吉斯族。其族源可追溯到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鬲昆、契骨、黠戛斯。7世纪后,其先民开始向天山地区发展;蒙古人侵后又往帕米尔、费尔干纳、昆仑山区迁徙,其间吸收了葛逻禄、回鹘、诺盖等部落(可能还有哈拉契丹)的一些人,一直到形成现代民族之前仍以血缘联系的互不相统属的几十个部落,部落散居于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麓。俄国史料一直把哈萨克人称作吉尔吉斯,而把吉尔吉斯称作喀拉吉尔吉斯,直到苏维埃时代成立民族共和国时,哈萨克人恢复自己民族的名称的同时吉尔吉斯才恢复自己的名称。

乌兹别克族。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中亚突厥化后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下游的操突厥语诸部族,但其族名可追溯到14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的月即别可汗。金帐汗国衰落之时,里海以北广大地区的不同来源的突厥——蒙古部落游牧民都笼统地被称作“游牧月即别”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部分游牧月即别人在成吉思汗术赤系昔班尼可汗率领下进入中亚农业区,与当地操突厥语居民融合。在

200年前的当地文字文献中还有乌兹别克92部落的说法，但长期的定居、融合逐渐打破部落界线，形成了现代乌兹别克族。这种融合过程是极为漫长的过程。如20世纪初，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支半农半牧克普恰克部族集团，直到30年代才完全消逝，其大部融入乌兹别克，也有一部分进入吉尔吉斯。

哈萨克族。其名称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当时里海以北游牧月即别人的一支由于内讧东迁至亦力巴里统属下楚河、塔拉斯河、七河流域一带游牧。有人认为，"哈萨克"是"避难者"或"脱离者"之意。昔班尼汗所率一支月即别人南下后，这些"脱离者"就占有里海、咸海以北至七河广大地区，并一度形成统一的草原汗国——哈萨克汗国。16世纪后半叶，哈萨克人及其分布地区形成以血缘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大、中、小三玉兹。大玉兹各部落领地是七河至锡尔河之间；中玉兹各部落领地是锡尔河以北，其冬牧场是锡尔河中游、卡腊套山地区，夏牧场是托波尔河、撒里苏河流域；小玉兹各部领地在今西哈萨克斯坦，其冬牧场在锡尔河下游和里海东岸，夏牧场在托波尔河上游及里海北部。

土库曼族。其远祖可追溯到5世纪后来到里海沿岸草原地带的突厥部族和9~10世纪迁来的乌古斯人(塞尔柱人)。塞尔柱人建立过征服西亚和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王朝。若干世纪以来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先民先后受制于花剌子模朝、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直到本世纪初形成现代民族，但还保持着半农半牧生活方式和部落和氏族划分。

卡拉卡尔帕克族。其先民可以追溯到6~8世纪咸海草原地带的佩彻涅格人和乌古斯人部落。10世纪初，一部分佩彻涅格人西迁至南俄草原，俄国文献称之为高筒黑帽。"卡拉卡尔帕克"一词在突厥语中意为"黑帽子"。留居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佩彻涅格人东支逐渐与来自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克普恰克人融合，后又与近邻诺盖人结合形成卡拉卡尔帕克人，先后受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

国统治，从事牧业和农业、渔业相结合的多种经济活动，过半定居生活，直到20世纪初还保留氏族部落残余。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中亚的几个主要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还停滞在比较落后的状态，其中只有乌兹别克人和平原塔吉克人的文化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得以飞速发展。

关于中亚，学者有句名言："定居区为绿洲，游牧区广袤无垠，这就是处于几个文明之间的广大'中亚'地区的普遍特征。"没有一个大国在这个地区长期存在过。南部农业区绿洲星星点点，大者为若干相近绿洲相连接，可能构成相对来说独立的小世界，其中心建城筑堡，形成绿洲城郭小国，如汉代的大宛(分费尔干纳)和唐代在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石、康、米、安、史、何、曹等国；小者如花剌子模的居兹利、克尔古城，实际上只是一个建了围墙的村子。北方草原上则是一个个崛起的庞大的游牧"行国"，如匈奴、突厥，以及后来的哈萨克汗国，一般过了几代后就衰落，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西亚或来自更西的入侵者建立过庞大的帝国，曾将中亚南部边缘地带作为其帝国的边疆省区，如波斯阿契美尼德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朝、安息朝等，但严格地说这些不是中亚的国家。二是北方游牧部族南下、定居，建立过一些较大的国家，如贵霜朝、嚈哒国、哈拉汗朝、帖木儿帝国，但不是很快覆亡，也是很快分裂。至沙俄入侵前夕，中亚的北部草原是哈萨克大、中、小三玉兹，南部则主要是乌兹别克布哈拉、希瓦和浩罕三汗国。

沙俄南下与殖民主义

沙俄觊觎中亚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对中亚的不成功的远征，沙俄从此认识到：要占有亚洲腹地，必须先在哈萨克草原站稳脚跟。彼得一世说："惟此汗

国为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之咽喉及大门。”1731年沙俄开始推行征服哈萨克的计划。1762年俄国把实际控制线推进到奥伦堡—奥尔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斜米巴拉金斯克一线。至18世纪末沙俄在这一地区筑乌拉尔河、奥伦堡、伊施姆河和额尔齐斯四条堡垒线，长达3 500俄里。1822年沙俄实施斯佩兰斯基草原条例，逐步控制了哈萨克草原的西部和中部，并逼近咸海附近的希瓦汗国和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1839年俄军征希瓦由于遭暴风雪袭击失败，但沙俄用兵中亚的计划并未停止，它的战略目标转向锡尔河流域的乌兹别克浩罕汗国。1846年俄军开始征服浩罕汗国的军事行动，至1876年俄军完全占领浩罕汗国，在其地置费尔干纳省。在此期间，被俄军彻底打垮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相继归降，成为俄国统治下的附属国。1884年俄国最终以武力征服土库曼部。1891年俄军开进帕米尔。这样整个中亚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俄国征服中亚的直接目的在于给农奴制发展起来的军事服役贵族和官僚开辟施展其力量的新天地，给农奴制改革后发展起来的本国工商业开发新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而战略目标在于南下印度洋，夺取英国殖民帝国的明珠——印度，以谋求世界霸权。俄罗斯人与古代历史上征服者一样都是从北方进入中亚的，但是它绝不同于那些古代的征服者。

1. 它不是传统的民族或部族的迁徙，而是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

2. 它不是游牧“蛮族”对高于自己文明的人们的征服，而是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超过当地土著民的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都是有文明作用。”

3. 它不像古代征服者那样，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正是俄罗斯的征服，中亚经济、文化纳入俄罗斯经济文化圈，中亚由此步入近代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沙俄的沉重的民族压迫给中亚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1892年安集延起义和1916年中亚各地的大起义，就是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抗俄民族解放运动。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苏非主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民族运动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开始在中亚传播。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的是，以伊斯兰统一全世界，把世界置于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集中领导之下，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而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今天的世界中虚构出一个现代"突厥民族"，并试图把它统一起来。泛突厥主义偶尔也对泛伊斯兰主义有所攻讦，认为它实际上阻碍着穆斯林民族的进步，可中亚的所谓"突厥民族"又广泛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泛突厥主义从它一出世便与泛伊斯兰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亚，其创始人为自称阿富汗人的哲马鲁丁，后来土耳其苏丹哈里发哈米德二世为保住自己的宝座，竭力鼓吹过泛伊斯兰主义。自16世纪初，土耳其苏丹开始自称哈里发，并以"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保护者"自居，虽然这并没有为全体穆斯林认可，但是至少在19世纪初中亚地区尊崇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思想已十分深厚。因此，由土耳其苏丹哈里发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传播，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以致于泛突厥主义思想首先萌发于沙俄境内鞑靼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在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影响下，泛突厥主义于20世纪初开始在土耳其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土耳其遂成为其活动中心。随着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广泛传播，Turkuk（突厥主义）和Turkuculuk（土耳其主义）两个概念被故意混淆了。这样就把中世纪以来关于对土耳其苏丹哈里发尊崇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土耳其主义或以土耳其为中心的泛突厥主义联系起来，表现出得到西方支持的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借助泛突厥主义向中亚、新疆扩张势力的野心。

泛伊斯兰主义的初衷是革新伊斯兰教以保卫伊斯兰教，使之

成为能与西方文化抗衡的先进宗教。一批宗教改革家鼓吹“扎吉德”(即“新的教学法”),反对维持沙俄统治的保守的“卡吉木”运动。早期的泛突厥主义为了复兴所谓“突厥民族”,则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学规范语言和文化的途径,反对沙皇专制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但是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大多脱胎于封建主和官僚,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不仅最终能与封建主义相容,又能为其服务;既与俄国及西方列强的扩张有冲突的一面,更有互为利用的一面。1905年随着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的召开,一个松散软弱的穆斯林“团结联盟”形成,标志着一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向沙皇专制主义妥协。1914年鞑靼资产阶级分子高唱俄国国歌,为沙皇的健康祈祷,以感谢沙俄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政策给他们大发战争财的机会,表明这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拥护者完全放弃了与沙俄对抗而成为沙俄专制制度“最为忠诚的臣民”。十月革命后,中亚的反动势力巴斯马奇分子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作乱一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则完全沦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潮。

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中国的先秦古籍《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庄子》、《国语》、《楚辞》、《管子》、《尚书》、《吕氏春秋》、《战国策》等都提到西域的情况,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提到的西王母之国中的瑶池,可能就是额尔齐斯河上的斋桑泊。根据考古资料和东西方文献,先秦时代,中西商路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公元前2世纪张骞奉旨出使西域,经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等地,为中国与中亚首次建立直接官方联系。公元前1世纪,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征伐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终于导致西域都护的建立,中

西交通畅通，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发展，中亚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中亚地区同中国西北各民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时期在政治上隶属关系也是不可分的。如前文所述，中亚的南北关系中突出表现在北方游牧部族的不断南下，其中大多数部族是来自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古代的匈奴、高车、突厥、铁勒、回鹘、契丹、蒙古等族所建政权，有的统治到这一地区，有的则对这一地区有着直接影响。这里首先提到的是突厥族。自哌哒亡后，中亚落入突厥的统治之下，西突厥的势力范围西面达到了咸海，西南抵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斯坦。唐高宗时期，西突厥与中亚合并于唐王朝。史料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府百二十七"。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以吐火罗、哌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其中，石国，或称拓支、赭时，即今天塔什干地区；米国，或曰弭秣贺、或曰弥末，即今天撒马尔罕地区的泽拉夫尚河以南；史国，或曰佉沙、或曰羯霜那，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夏勃兹；曹国，又称西曹，在今撒马尔罕西北；拔汗那，又作钹汗、破洛那、宁远，即今费尔干纳盆地。龙朔年间唐朝所置都督府及州县，主要在阿姆河中上游及今阿富汗境内，主要有：鸟飞都督府，相当于今阿富汗的瓦罕地区；拨州都督府，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达尔瓦兹地区；天马都督府，在今塔吉克斯坦卡非尔尼汗河盆地；悦般州都督府，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迭纳乌；高附都督府，在瓦赫什河与喷赤河之间的山区；王庭州都督府，在塔吉克斯坦西南角；姑墨州都督府，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帖尔美兹；昆墟州都督府，在今土库曼斯坦东南，等等。清代是中国对中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时期。18世纪中叶，清王朝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新疆，中亚的左右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东西布鲁特(吉尔吉斯)各部，帕米尔以西的巴达克

山、博罗尔、爱乌罕(阿富汗)、浩罕(费尔干纳)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清朝对中亚各藩部的基本政策是“俾使天朝通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只要“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即“不加兵骚扰”，强调的是自愿归附的原则，追求的是互不骚扰的和平睦邻关系，只要做到这一点，清政府并不干预其内政、外交，亦不责贡赋。这里清朝政府最重视哈萨克布鲁特的关系，与之关系相当紧密。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的许多部落几乎年年派人进京朝贡，其部落头目更换时往往要取得清政府册封。布鲁特，特别是喀什噶尔、乌什附近的一些部落首领接受清政府的顶戴。乌兹别克诸汗国中，浩罕汗国与新疆接壤，同中国关系密切，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它作为清朝边外附属国，受清朝驻边大臣节制。19世纪下半叶，沙俄征服中亚的结果是，沙俄从中国西部割去大片领土而与中国西部边疆接壤，因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成为中俄边界上的跨国民族。

1759~1911：新疆的变乱

一、基本情况

　　规模

　　热点地区

　　多发时期

二、变乱的性质

　　白山宗和卓家族的作乱

　　外国势力加入侵、骚扰

　　暴动、农民起义

　　宗教纠纷引发的变乱

三、内外因素

四、治疆策评估

　　战略评估

　　战术评估

五、结语

18世纪中叶清王朝统一新疆,结束了新疆自元朝末年以来数百年的战乱。1759~1911年,即清朝统治新疆时期,仍发生过一些变乱事件[①],有时还达到一定规模,然而最终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统一。关于清朝统治新疆时期的变乱事件已有许多研究,对其中的一些事件始末搞得比较细致。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一时期历次变乱作为一个事件群,进行宏观、系统、动态地考察,透过种种表面的偶然性探求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既富有学术价值,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的稳定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本情况

自1759年新疆统一至1911年清王朝覆亡的152年间,形成一定规模、产生较大影响的变乱并不多。如果把所有微小型变乱事件都算上,约有20来起,可作如下简单分析。

规模

大小不一,归纳起来可分四个层次:

1. 大型,波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仅两起:同治年间发生的新疆农民起义(1864年)和阿古柏入侵(1865~1877年)。这两起实际上是连接、交织在一起的。

2. 中型,跨几个"回城"(相当于今天的县)的五起,张格尔之乱(1820~1828年),浩罕入侵(1830年)、七和卓之乱(1847年)、倭里罕之乱(1857年)和沙俄入侵(1871~1882年)。

3. 小型,范围限一"回城"的,仅乌什事件(1765年)一起。

4. 微型:范围在一个或几个"回庄"(相当于今天的乡)的有迈

①本文使用的"变乱事件"包括叛乱、暴动、农民起义、宗教纠纷、外国入侵等引起社会动荡、混乱的一切事件。

喇木事件(1760年)、犯屯暴动(1767年)、孜牙墩事件(1815年)、玉散霍卓依善事件(1855年)、贸易圈事件(1855年)、迈买铁里事件(1857年)、额帕尔事件(1860年)、杨三腥事件(1863年)、吴勒者子事件(1899年)、吐尔巴克事件(1907年)等。甚至还有事件仅在卡伦附近发生,如胡完事件(1845年)、铁完库里事件(1852年)、沙木蒙事件(1845年)等,规模就更小了。

从时间上看,只有阿古柏入侵和沙俄入侵事件交织在一起,延续十几年。张格尔之乱前后七八年,但只是在1826年至1827年秋春之际形成一定规模。乌什事件前后半年多时间,但范围仅乌什一城。其余事件长不过两三月,短则几天。

热点地区

半数以上事件(迈喇木事件、孜牙墩事件、张格尔之乱、浩罕入侵、胡完事件、七和卓之乱、铁完库里事件、沙木蒙事件、玉散霍卓依善事件、倭里罕之乱、额帕尔事件、阿古柏入侵)发生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一带。

多发时期

绝大多数事件,包括所有的大、中型事件集中在19世纪20~70年代,即清朝统治新疆中期。1759年至1819年的60年间仅四起,除乌什事件是小型的,其它三起都是微小型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仅有两起微小型事件。因此可以认为,清朝统治新疆经历了一个“治—乱—治”的过程。

二、变乱的性质

对以上事件简单分析后,必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喀什噶尔地区是发生变乱的热点地区?为什么清朝统治新疆中期是变乱

发生的多发时期？其中后一个问题更耐人寻味。须知光绪、宣统为清朝覆亡前的最后时期，新疆偏居西北一隅，处于俄英两个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势力夹击之下，而此时此刻的新疆为什么反而相对平静、安宁？这种现象是不能用历史的偶然来搪塞的。本节首先从剖析历次变乱的性质入手进行讨论。

这一时期的历次变乱事件，在西方著作中往往被称为"叛乱"、"反满圣战"[①]。在原苏联的论著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不正常时期），它几乎都被称颂为"人民起义"、"民族解放运动"[②]。近年国内的研究，一般分别以"叛乱"、"入侵"、"起义"等概念对其性质加以认真地识别[③]，但在一些具体事件上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看来，这里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实际上情况比较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类：

白山宗和卓家族的作乱

属于这类的主要是张格尔之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等中型变乱。还有许多微型变乱，如1760年迈喇木事件明显是大、小和卓之乱的余波；再如胡完事件、铁完库里事件、沙木蒙事件的肇事者，或诈称和卓后裔煽惑民众，或与和卓后裔勾结作乱。此外另有些变乱主要是由境外入侵势力搞起来的，但和卓后裔玉素普、倭里罕、布素鲁克等积极参与其中。总的说来，和卓作乱或有和卓积极参与的变乱共11起，这就是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变乱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和卓作乱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新疆变乱的热点地区。

和卓为伊斯兰宗教贵族，自称穆罕默德的"后裔"，并以此攫取信徒的无比崇拜（参见本书下编"和卓崇拜：一个已消逝的政治宗教现象"）。在和卓崇拜最疯狂的年代，和卓就是信徒心目中的神。

①《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②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上海：三联书店，1974年。

③《新疆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册、第2册。

和卓崇拜源于中亚，其派系林立相互讧斗。明清之际，中亚和卓势力向新疆渗透，和卓间的斗争也强烈反映到新疆，具体表现为白山宗与黑山宗的对立。17世纪末，白山和卓阿帕克在以喀什噶尔、叶尔羌为中心的南疆西部塔里木盆地建立了准噶尔贵族卵翼下的神权统治，取代了察合台后王政权。18世纪初，准噶尔把阿帕克后裔阿合玛特囚禁伊犁，另委黑山宗和卓治理南疆。阿合玛特被囚期间生二子：长子波罗泥都，即大和卓；次子霍集占，即小和卓。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期，大、小和卓投诚清王朝。清朝听说大、小和卓"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遂以兵送大和卓归叶尔羌，招服当地民众，留小和卓居伊犁掌当地"回务"。不久，小和卓参加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潜回南疆，杀清副都统阿敏道，自立"巴图尔汗"，并煽动大和卓造反，是为大、小和卓之乱。

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过程中统一了新疆。与清朝对抗的阿帕克系白山宗和卓后裔流亡境外浩罕等地，并时刻妄想复辟。这些亡命之徒本身成不了气候，但是自19世纪20年代起，他们得到浩罕封建主的支持，开始由境外入侵、骚扰，造成清朝统治新疆中期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的历次变乱。和卓作乱发生在祖国统一、新疆统一时期，其目的就是要把一些地方和人民从祖国分裂出去。史料记载：大和卓对发起叛乱很犹豫，认为："从前受辱于厄鲁特，非大国兵力安能复归故土，恩不可负。"小和卓却煽动道："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指准噶尔）已灭，无处偪者，不以此时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可不战挫也。"[①]张格尔被擒后在《供词》中称："我思想喀什噶尔等处都是我祖上的地方，因何如此欺压我。"[②]倭里罕公开宣称为张

---

①《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58；魏源：《圣武记》，卷4。

②《明清史料》，台北：1960年，庚编第10本，1000页。

格尔报仇一次次窜犯喀什噶尔。显然和卓作乱的全部动机是在中国之外“立国”，称王，为祖宗报仇，复家族之业。为此，张格尔和卓勾结外国，甚至不惜与浩罕封建主约定事成后“子女、玉帛共之”，许诺割喀什噶尔城“酬劳”浩罕[1]。这哪里有“人民起义”、“民族解放运动”的味道。

外国势力的入侵、骚扰

属于这类变乱大体上由沙俄入侵和浩罕封建主入侵而引发。

沙俄入侵势力引发事件两起：其一是同治年间沙俄出兵霸占伊犁，也就是发生在浩罕军事封建主阿古柏大举进军南疆，而清政府已对新疆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时刻，直到光绪初年清军平定阿古柏收复南北疆大部分地区后，沙俄才被迫撤兵退还伊犁。其二是咸丰年间，塔尔巴哈台民众为反抗沙俄霸占雅尔噶图金矿，焚毁了沙俄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类似租界性质的贸易圈，由此引发涉外事变，但规模影响仅塔尔巴哈台一地。

浩罕入侵势力制造的变乱事件四起，规模较大的是1830年入侵和1865年阿古柏入侵，其它两起（玉散霍卓依善事件和额帕尔事件）是微小型的变乱。1830年事件在西方论著中一般称作“玉素普圣战”。这种提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一事件肇事元凶是浩罕入侵军。浩罕入侵军有两三万，由浩罕宰相明巴什阿哈胡里统领。玉素普和卓参与其间，但只是胁从。当时玉素普流落在布哈拉乞讨为生，浩罕汗派人去布哈拉把他接来，对他说：“你兄弟张格尔被天朝杀了，你该到喀什噶尔报仇去。”玉素普说：“我无钱使用，带几百人怎么去呢？”浩罕汗说：“你的钱、人、衣服、口粮，我都管着。”[2]显然，玉素普在浩罕入侵军中充其量为一附庸。浩罕军为乱三个月，一度

---

①魏源：《圣武记》，卷4。
②《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

抢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两地回城，但当清援兵赶到前夕即窜出边卡。浩罕封建主的这次入侵完全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连浩罕史料都承认，这是"掠夺性远征"[①]。1865年阿古柏事件是浩罕封建主对新疆的军事入侵。阿古柏是浩罕国的高级军官，生于塔什干附近的皮斯坎特，乌兹别克人(一说塔吉克人)。1864年库车农民暴动引发了新疆农民大起义。喀什噶尔白山宗头目托合提马木提、塔什密里克庄柯尔克孜头目思得克、伽师回民头目金相印先后起事，并发生讧斗。思得克为控制喀什噶尔联合金相印等，派人去浩罕迎请白山宗和卓后裔。浩罕摄政王毛拉阿里木库里遂派阿古柏护送和卓后裔布素鲁克来到南疆。阿古柏入侵喀什噶尔不久便将布素鲁克踢到一边，并通过一系列战争，攻灭了当时南疆各地占地为王的封建主，建立了浩罕殖民政权，即所谓的"哲德沙尔"(七城)伪政权。近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认为，阿古柏政权的各级军政官吏绝大多数是外来者，浩罕汗国人。结论是："征服者的特权军事集团是覆盖在相对独立的几个地区性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和进行掠夺统治的军事寄生国家的形象是没有矛盾的。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说，把阿古柏政权断定为维吾尔族的政权是有困难的。"[②]这一研究是认真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有认为阿古柏问题是内乱性质，理由是浩罕国属于中国，这种认识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诚然浩罕国在乾隆时期曾在政治上依附于清朝，但清王朝从来没有在浩罕设官、驻兵，也没有在该地征收赋税。其时它仅仅是清朝中国版图外的附属国。至于把阿古柏颂扬成维吾尔族"民族英雄"，把清朝平定阿古柏说成是镇压维吾尔人民起义，在学术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别有用心的。

---

①米尔扎·舍姆西·布哈拉："关于布哈拉、浩罕和喀什噶尔的某些事件"，转自《维吾尔学面临的问题》(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уйгуроведения)，Алма-Ата，1983，页246。

②新免康："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考察"，载日本《史学杂志》，96编，4号。

暴动、农民起义

这类事件主要有1765年乌什事件和1864年新疆农民大暴动。1857年库车迈买铁里事件、1863年伊犁杨三腥事件是微小型的，但显然是1864年新疆农民大暴动的先声。1765年乌什事件是小型事件，但影响较大，值得注意。另外两起，即1767年昌吉犯屯暴动[①]和1907年哈密吐尔巴克事件，都是微小型变乱。同治年间新疆农民大暴动是当时新疆社会阶级矛盾总暴发，其性质是反封建的农民起义。但是由于起义农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致使起义的领导权几乎从一开始就为世俗和宗教封建主把持。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很快变成宗教封建主"圣战"和地方封建主之间互相攻伐的战场。这种混乱局面很快导致了浩罕封建主的入侵，整个变乱由此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

1765年乌什事件却是当时当地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后来清朝方面的调查证实，"乌什回人（维吾尔民众）作乱实因扰累所致"[②]。乌什事件发起者最初反对的是作恶多端的哈密籍阿奇木伯克阿不都拉及驻扎大臣素诚，但面对清政府的严厉镇压，乌什人民别无出路，只有誓死反抗到底。乌什事件本质上是反封建的起义，其斗争是极为悲壮的，但亦有同治年间农民大暴动的趋势。一是乌什事变发起者曾派人到境外向浩罕求援；二是阿克苏、叶尔羌、库车等地一些伯克、阿訇"人情汹汹"，企图起事。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可能发生如同100年后的那种情况，由农民暴动演变成封建主的大混战，甚至导致来自境外的入侵。这对于新疆各族人民来说，只能是更大的悲剧。乌什事件并没有扩大，主要原因是，除乌什一地外，当时南疆社会阶级矛盾远没有激化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再就

①这次暴动有偶发性质，且参加人员成分复杂，史学界对它的性质尚有不同认识。

②《平定准噶尔方略》，卷29。

是，企图趁乱闹事的伯克、阿訇毕竟是少数。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及其妻热依木、阿克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等，反对闹事，表现出大多数维吾尔伯克维护新疆政局稳定和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总之，对乌什事件的革命性质应予肯定，但是这种肯定并不意味着肯定那些趁乱闹事的伯克、阿訇。把他们的这些活动简单地等同于人民起义的观点，把反对闹事的鄂对等人视为镇压人民起义刽子手的认识[①]，似不可取。

宗教纠纷引发的变乱

伊斯兰教在新疆有着广泛传播和影响。清朝统治新疆时期的许多变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往有的论著把它们称之"圣战"。前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曾正确地论证了张格尔运动的反动性，但他提出张格尔之乱是"封建神权分离主义运动"，理由是，张格尔之乱"本身归根结底成为依靠外援的白山宗反对黑山宗所支持的清朝的斗争"[②]。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事实上阿帕克系白山宗和卓反对清政府，并没有任何宗教上的理由。清政府首先任用的是大、小和卓，只是因为他们搞叛乱才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即便如此，清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仍持谨慎态度，乾隆帝还下令保护喀什噶尔城郊的阿帕克和卓坟[③]。白山黑山之间并不是以反清、拥清来划分的。白山宗的其它派系，如容妃(俗称"香妃")家族就是支持清朝政府反对大、小和卓叛乱的。和卓打出"圣战"旗号，意在煽动民众，表现出浓厚宗教色彩。在清代，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天国、义和团几乎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几乎没有谁把这些斗争看作宗教斗争。因为宗教不是产生这些斗争的原因，实际上它只是斗争的

---

①陈慧生："18世纪60年代乌什维吾尔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载《西域史论丛》，第3辑。

②库兹涅佐夫："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性"，载Известия АН КазССР, серия ист.арх.и этногра.вып.3，1961。

③《清高宗实录》，卷609。

工具。革命阶级尚能利用宗教，反动阶级当然也会利用宗教。和卓之乱正是宗教封建主打着宗教旗号的叛乱活动，它们与清朝的斗争，本质上不是宗教斗争。

清朝统治新疆时期宗教纠纷常有，但由此引发变乱的只有1815年孜牙墩事件和1899年吴勒者子事件。

孜牙墩只是喀什噶尔附近一回庄的阿訇，属黑山宗，他为迎娶白山和卓家族之女，违反了黑山与白山间互不往来的戒律，遭到阿奇木伯克粗暴干涉，愤而起来。这本是宗教教派中的纷争，可清朝官吏中好事者小题大作，抓获孜牙墩后以严刑逼供，迫使这位小小回庄的阿訇承认要做南疆王。此事被渲染得如此声色，以致西方和日本的有关著作①都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叙述。但总的来看它只是件最低层次的微小事件。吴勒者子为绥来（玛纳斯）回民新教头目，清政府在"新旧争教"中偏袒旧教压制新教，由此引发这一变乱事件。它同孜牙墩事件一样属微小事件，所不同的是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②。

以上仅对历次变乱的性质做了大致划分。实际上变乱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如道光、咸丰年间喀什噶尔地区的变乱都是和卓复辟势力与浩罕入侵势力勾结的结果。有时和卓煽动民众在前打冲锋，浩罕封建主在背后出力、出兵支持，如1826年张格尔攻打喀什噶尔；有时是浩罕直接出兵，和卓积极参与，如1830年事件；有时是和卓在城外骚扰，侨居在喀什噶尔城内的浩罕商头领人放火内应，如1857年倭里罕之乱。从以上讨论和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新疆变乱毫无疑问地具有浓厚民族宗教色彩，但本质上并非民族、宗教问题，

①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剑桥中国晚清史》；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近年才有魏长洪先生的专题论文："试论1899年新疆回民起义"，《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始末。但作者把它与义和团联系起来，说它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缺乏说服力。

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政治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还必须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新疆境外环境的演变进行深入考察。

三、内外因素

新疆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以天山为界形成传统的北疆游牧社会和南疆绿洲农业社会。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比重上南疆地区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清朝初年，北疆大部为西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南疆塔里木盆地为准噶尔的属部，但实际上被分割成封建主林立的伯克领地。在没有强大中央政权的控制下，绿洲领主制经济基础决定了这种政治格局。南疆地区的东部和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哈密、吐鲁番盆地大体还处于比较纯粹的早期领主制经济发展阶段，该地维吾尔农民都是哈密王、鲁克沁王的“阿拉巴图”——农奴。西部塔里木盆地情况比较复杂些。被统治阶级有伯克领地上“燕齐”(yanchi)，公田上的“塔里雅沁”(terimqi)，即农奴；还有“庶民”(pukra)，包括有耕种私田的“民人”(raaya)，即自耕农和佃农。庶民不同于阿拉巴图，有相对人身自由，但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封建主的超经济强制。清朝统一新疆后征收赋税的统计资料表明，庶民已有相当数量[①]，说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正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封建领主制。整体上，新疆社会经济形态落后于内地的发展。随着新疆的统一，内地社会经济对新疆发生愈来愈大影响。至乾隆后期已有大批内地民人来新疆开荒屯田，主要在巴里坤至乌鲁木齐一带。清政府面对这一现实在新疆实行三种行政建制：(1)伯克制，实行于南疆的西部，即塔里木盆地(还包括伊犁维吾尔回屯区)；(2)扎萨克制，实行于哈密、吐鲁番地区和游牧的蒙古、哈萨克等部；(3)郡县制，实行于巴里坤至乌

①关于这一点可参阅《18至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

鲁木齐一带内地民人屯区。

维吾尔社会早已存在着伯克统治，伯克原本是维吾尔世袭封建主。清朝利用并改革了这一制度，其要点是：

1. 将伯克完全置于军府统治之下。清朝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驻伊犁，曰伊犁将军。伊犁将军下辖：一都统，驻乌鲁木齐；两参赞大臣分驻南北疆。驻南疆的曰总理回疆参赞大臣，又管辖驻南疆诸城的办事或领队大臣。各级伯克均听命于驻各城的军事大臣。

2. 改伯克世袭为任命。伯克之任免、补缺、选调、升迁、罢黜均由各城驻扎大臣掌管。伯克之首阿奇木还要报北京，由清廷任命。

3. 众建伯克，而不设全族的总管伯克。一城一地以阿奇木为首，负责民政，但凡事须与副手伊沙噶伯克“会商”。同时规定大伯克回避本城，小伯克回避本庄，提防伯克成为土王或一方豪强。

4. 政教分离。清政府严格规定阿訇只准念习经典，不得干预政事。阿訇有当差及充任伯克者，不得再兼阿訇之职，特别警惕宗教干涉政治。同样，政府一般也不干涉宗教。

这样伯克便由世袭土官改为朝廷流官。军府制下的伯克制本质上是“因俗而治”原则下的有限度的“改土归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央政权在新疆统治制度上的重大变革。扎萨克制是比伯克制落后的世袭领主制，实行这一制度主要是面对这些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争取这些民族头目的支持。在哈密、吐鲁番地区还有对最早归附的封建主的优惠。同于内地的郡县制，比伯克制进步，但仅实行于内地屯民地区，也是遵循政策适应于现实的原则。以伯克制为主、扎萨克制和郡县制为辅的一区三制，表现了清政府行政建制的灵活性。清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采取较宽容政策，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前提下，甚至还一般承认“回人例”和宗教法庭。对于维吾尔权贵，首先重视的是早归附于己的哈密、吐鲁番王公，其次是积极参加平定和卓之乱的阿克苏、库车等地东四城伯克，再次是叶尔羌等地的伊斯兰黑山宗贵族，严厉打

击的是搞叛乱的喀什噶尔等地的伊斯兰白山宗阿帕克系和卓。总的看来,依靠面广泛,打击面狭小[①]。

直至光绪建省前,清政府沿用历朝以军队为支柱的军府制统治,和历朝不同的是,清朝始终把军府统治重心放在天山北路,在军事布局上划分三大区域: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地区,乌鲁木齐、巴里坤一线的东疆地区,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为中心的南疆地区。伊犁及其附近常驻有精锐的八旗驻防兵1.5万至2万名。乌鲁木齐一带驻有5 000满兵及相当数量的绿营屯兵。喀喇沙尔(焉耆)至和阗广大塔里木盆地不设常驻兵,只有少量的换防兵。如喀什噶尔这座南疆第一重镇,仅有不携眷属的换防满兵330名,锡伯、索伦兵96人,绿营汉兵625名,而和阗总共仅有绿营兵223名。总的来看,南疆驻兵仅占新疆驻军的十分之一二。一般认为,这种军事布局与准噶尔部曾长期据守伊犁进行叛乱有关,又有警惕沙俄东方扩张的意图。同时,清政府似乎把外有天山和帕米尔作为屏障的塔里木盆地视为政治和军事上的死角。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军事格局对于稳定北疆,抵御沙俄侵略扩张有着愈来愈明显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以后处理、平息和卓与浩罕封建主在喀什噶尔地区制造的骚乱却显得愈来愈不得力。重兵云集伊犁、乌鲁木齐,粮饷就必须解决。清政府沿袭历代办法开展屯田活动,其规模成绩远远超过历代。初期以兵屯形式为主,乾隆后期重心转为民屯。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屯田垦地仅乌鲁木齐、巴里坤地区就达百万亩[②]。屯田主要在天山北路驻军附近开办,不仅充分就近保证数万驻军官兵的用粮,而且开发了北疆地区,使之从此由牧业区变成农业牧业区。清朝政府如此军事部署最成功之处是在人烟稠密的南疆地区派驻极少数量

①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②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重心的转移及其意义",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

的军队。驻兵少，耗费也少，对地方的赋役课派也相对少。南疆维吾尔农民向清政府缴纳十分之一税，而过去要将自己收成一半以上缴纳准噶尔贵族。以喀什噶尔地区为例，准噶尔时期岁征田赋4万多帕特玛（约合18.4万石），人头税6.7万腾格（1腾格合1两）。清朝在新疆建立统治后立即丈量土地核实人丁，额定喀什噶尔年征田赋2.5万石，正赋（人头税）2.6万腾格，分别仅为准噶尔统治时期的七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强。因该地驻兵极少，所征有限钱粮，不仅足以支付当地驻兵费用，且有剩余。日本学者认真研究这一情形得出的结论是：当时清朝政府"没有过分地剥夺维吾尔农民的必要"[①]。从这一点看，清朝在新疆的统治，至少是最初时期，维吾尔农民的负担有相当程度的减轻，除了个别地方（如乌什）外，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这就是乾隆、嘉庆时期新疆60年间政局稳定的根本原因。

道光年间和卓后裔开始在喀什噶尔地区闹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伯克制的弊端。前面我们谈到军府制下的伯克制之建立是历史的变革，但这种有限度的"改土归流"，其弊端是固有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强化。大臣凌驾于伯克之上，但一般只管军政，民政事务全部放手于伯克。伯克虽不再是世袭土官，但伯克选拔范围完全限于维吾尔权贵，伯克特别是高级伯克子弟再贪纵暴虐，也可能选中。伯克任期长，有的伯克甚至可在一城一地为所欲为10年、20年，直至老死，俨然一方土王。激发乌什事件的阿奇木伯克阿不都拉，就是哈密郡王的弟弟，他把领主制完全的搬到乌什，把乌什庶民统统当作任意驱使的阿拉巴图，当时乌什地区阶级矛盾的激化还不带有普遍意义，但已显示出伯克制的弊端。清政府总结乌什事件教训时提出一些"革弊安良"措施，即"阿奇木之权宜分，格纳坦（苛捐杂税）之私派宜革，回人之差役宜均，赋役之定额宜明"等等。但是伯克制中的弊病只能暂时收敛，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因为伯克制是建立在落后的封建领主制

---

①《18至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第249页。

基础之上。伯克不仅领取政府薪金——养廉银，还享有带燕齐的大片养廉田。按规定，三品高级伯克司占有百户燕齐和150帕特玛(约合4 000亩)养廉田，可实际上伯克凭借权势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扩大领地。其时内地已普遍实行摊丁入亩的田赋制度，而塔里木盆地仍实行按丁索赋制度。富户田多丁少赋役轻，贫户地少或无地丁多，赋役反重。拥有大量田地、燕齐的伯克甚至可免纳钱粮。贫户破产无力完纳钱粮，往往被迫充当伯克领地上的燕齐。各地应纳钱粮总额不变，势必转嫁贫户，致使更多贫户破产，这是制造"民穷"的恶性循环。如历史资料揭示：塔里木盆地"豪强兼并习染成风，伯克土霸日增其富，小回子少有积蓄，皆为咀嚼而去，以故人户不能殷实，多缺衣无食之人"①。故此，清政府在塔里木盆地虽然施行的是低赋税，但受惠者并非庶民。这种以落后的领主制为经济基础的伯克制，愈来愈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19世纪，伯克们的领主性质愈来愈强化，"民穷"问题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从而为变乱提供社会基础。

在张格尔作乱时，思想家龚自珍已看到伯克制的弊病，撰文《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大声疾呼："建省"，"夺伯克之权"，但没有得到清朝当局的重视。若干年后，领兵平定浩罕人侵的长龄将军策划在南疆各城设置同知、巡检等文职官员，以改变军府大臣不问民政，伯克权势过重的状况，但遭到道光帝的断然否决。理由是，如果有这个必要，60年前"定当早经筹及，讵待今日"②！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风气。再者，龚自珍的"夺伯克之权"之议，还面临着谁来夺，如何夺的难题。龚自珍的思路是，培植地主势力，排斥领主势力，从而割断"燕齐"对伯克的人身依附，使他们成为向国家交纳地丁钱赋的编户③。这种以

①福庆：《异域竹枝词》，卷1。

②《清宣宗实录》，卷200、201。

③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载《新疆历史论文集》。

地主夺伯克之权的办法，说之不易，行之更难。诚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大臣想做点具体事。张格尔之乱后，负责善后的大臣那彦成提出"革除阿奇木伯克陋规"的措施，"严革贿补伯克之弊，定其资格，慎其保举，制其回避"[①]。倭里罕之乱后，又一位将军扎拉芬泰提出"严查办以重职守，简伯克以重抚绥，干差徭以杜苛派"的善后办法[②]。但所有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又限于公文范围，几乎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军府制下的伯克制遂不可抑制地演化成社会毒瘤，最终酿成同治年间新疆农民大暴动。

事实上，阻碍历史前进的伯克制最终还是由人民去埋葬。同治年间农民暴动烈火燃遍大半个新疆，待左宗棠领兵规复新疆时，维吾尔王公伯克都已"家产荡尽"，衰败没落，农奴对王公的伯克的人身依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挣脱。用一位清朝将军的话来说，"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③]。左宗棠认为"际此天事、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④]，力主废伯克，置行省。1884年新疆建省，同时裁撤各城伯克。一部分伯克在地方政府中留任书吏或乡约，虽分有田地作办公薪资，却不再分得"燕齐"。战乱后新疆实行与内地同一的摊丁人亩赋税制度，徭役地租被无偿劳役与收获分成地租形态所取代，比之过去显然是社会的进步。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另一成果是清政府赋税收人得到长足增长。以往论者认为这是对农民赋税剥削加重的证据，其实不然。左宗棠军入新伊始，因地亩册籍无存，暂以产量1/11征收田赋，较乾隆嘉庆时期的1/10税略低。1887年地亩丈量工作结束后，开始按耕地上中下三等分别征收粮食。根据历史资料分析，乌鲁木齐地区所纳田赋比乾隆嘉庆时期降低27.31%到68.85%[⑤]。摊丁人亩、分

①魏源：《圣武记》，卷4；《那文毅公奏议》，卷77。
②《清文宗实录》，卷235。
③《刘襄勤公奏稿》，卷3。
④《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
⑤纪大椿："论晚清新疆以建省为中心的改革"，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等课粮，对封建主和农民一样，一律按其占有田亩多寡好孬课征税粮，虽然单位征收标准降低，但原先占有大量田亩而又不纳税粮的封建主也得完纳税粮，结果必然是，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占有土地不多的农民实际负担减轻。总之，以建省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既加强了新疆与祖国内地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从而为清朝统治最后时期新疆政局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综上所述，围绕军府制下的伯克制的建与废表现为分两步走的"改土归流"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它对新疆政局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新疆地处边疆地区，境外政治局势的变化不能不对新疆政局产生影响，特别是来自境外的军事入侵，则直接引发或加剧新疆的变乱。关于这一点，我们试做如下讨论：

清朝统一新疆伊始，由伊犁往西广大草原地区为哈萨克各部落游牧地，喀什噶尔附近及天山西部山区为柯尔克孜各部落游牧地。清朝政府以哈萨克、柯尔克孜为新疆西境边塞卫士，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唯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两部落而已。"①直至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还在苦心经营恒河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而俄国殖民者的实际控制线尚在奥伦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斜米巴拉金斯克一带，离开中国西部边界都还很遥远。在俄英殖民者之间的新疆以西亚洲腹地则是大大小小各行其事的汗国、土邦、部落，它们大多以依附、朝贡等方式与清朝建立友好、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

19世纪初，在与喀什噶尔西境柯尔克孜牧地相邻的费尔干纳盆地，由乌兹别克族建立的浩罕汗国迅速崛起。它不仅在政治上逐渐脱离了对清朝的依附，而且出于垄断控制通往喀什噶尔东方贸易的野心，加紧向清朝边境乃至喀什噶尔地区多方渗透。嘉庆末年，浩罕封建主一再试图把自己的征税官派到喀什噶尔收取商税。

①魏源：《圣武记》，卷4。

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政府的严辞拒绝。浩罕一地滞留了一些亡命的和卓后裔，一向为浩罕封建主不齿，浩罕称他们为“无赖”、“歹徒”[①]。但是由于对清政府的日益不满，浩罕封建主遂支持和卓闹事，好为自己火中取栗。张格尔之乱发生后，浩罕封建主认为这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一位浩罕军官鼓吹：与其让“某个不维护和卓尊严的人带领一些暴徒攻打异教徒的要塞”，不如“让我们把胜利之军开进喀什噶尔，占领它，使之听命于我们威严的汗的统治”[②]。清朝统治新疆中期浩罕的历次入侵、骚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也正是浩罕的入侵、骚扰加剧了喀什噶尔附近地区的社会动荡。

19世纪中叶，俄国在征服哈萨克草原后分兵两路向亚洲腹地挺进，其东路军不顾清朝政府的抗议，由斜米巴拉金斯克南下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直迫伊犁卡伦；其西路军溯锡尔河而上，锋芒所指浩罕汗国。与此同时，英国在锡克战争、信德事件后占据了整个印度河流域，进而北上克什米尔，从南面逼近新疆西南边境。英俄殖民主义的扩张，全面改变了新疆以西亚洲腹地的政治格局，英俄殖民主义势力遂成为影响新疆政局的主要的外部因素，阿古柏入侵南疆妄图在南疆“立国”。英国非法承认阿古柏伪政权，以武器供应阿古柏，并为阿古柏“立国”奔走，旨在控制天山南路以拱卫自己在印度的既得利益。俄国则一方面与阿古柏伪政权建立非法政治关系，一方面直接出兵抢在阿古柏之前占领伊犁，意在染指整个天山北路。但是，英俄瓜分新疆的阴谋终于在清朝平定阿古柏、收复伊犁后化为泡影。

19世纪80年代，为争夺朝鲜巨文岛，英俄间爆发激烈对抗，英俄角逐焦点由此转向远东地区[③]。俄英殖民主义在阿姆河一线划定

---

①毛拉木萨：《伊米德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现代维吾尔文版，第149页。

②《沙鲁赫史》转自《维吾尔学面临的问题》。

③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3~43页。

了各自领地和势力范围，各自都急需要消化、稳定自己新攫取的新土地，俄国在交还伊犁时，除了索取赔款、割地外还攫取了商业免税权益。学者认为，俄国吐出它已吞并的土地，"英国对俄国施加压力虽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它仅仅是个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俄国政府对贸易和财政的考虑。对于俄国来说，中国为赎回伊犁而给予俄国上述商业特权要比中亚的几千平方英里山地和沙漠更有价值"①。英国如果确实对俄国施行了压力，也不是为中国领土完整着想，这无非表明，英俄在亚洲腹地、在新疆争夺而又相互牵制。新疆建省后，内部社会相对稳定，外来入侵者失去了可乘之机，英俄在新疆的角逐则主要转向经济侵略手段。这样，建省后的新疆尽管处于两大资本主义列强的夹击之下，但又如同在飓风的风眼中，相对平静。

讨论至此，可以对本文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清朝统治新疆中期多变乱、两头却是相当平静？)作出解释。这归根结底是新疆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与来自境外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必须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对新疆的统一、稳定起着决定作用。

四、治疆策评估

以上两方面因素合力决定了新疆政局的演变的基本轨迹。此外，清政府治疆的战略思想，基本对策，疆吏面对变乱的应变举措及新疆吏治状况，也对变乱的发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

①路易斯·伊·弗莱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JRCAS，26，3(1939)。

战略评估

清政府处理新疆变乱的基本对策，主要取决于其治疆的战略思想。新疆问题在清朝统治者心目中占怎样的地位是其治疆思想的核心。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统一新疆无疑是“建非常之功者以非常之事”，但即便在“辟新疆”伊始，他也感到人臣中的“疑”与“惑”，遂特制《开惑论》。论者气势恢弘，滔滔不绝，但不外两点：一是“天恩助顺”，即“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二是“成旧志”，即“继述祖宗（指康熙、雍正帝）未竟之志事”[①]。新疆驻有数万军队，虽然屯田解决用粮问题，但官兵的俸银等开支仍然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协饷”支持。这笔不大不小的耗费经常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1771年，乾隆帝针对一位官员的非议谕曰：“自平定西陲以来，酌减沿边防秋兵马，及酌裁各省驻防汉军粮饷、马乾等次，除抵补新疆军费外，每年节省银九十余万两。历今十有余载，岁出较少，约积存千有余万。”魏源就此评论道：“乾隆初年户部库银止三千三四百万，今已多至七千八百余万，有盈无绌，是新疆不惟未尝縻饷，而且节帑，其费财者又安在？”[②]

每当新疆变乱骤起，军费开支剧增，朝廷上下未免议论纷纷。1830年，正是和卓骚扰、浩罕入侵的多事之秋，一位大臣奏言：“西四城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与其靡有用兵饷用于无用之处，不若归并东四城”[③]，提出放弃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等西四城之议。1874年，正是出征阿古柏前夕，李鸿章说，乾隆朝定新疆“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当是之时“实不及专顾西域”，“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公开反对规复新疆[④]。清朝皇帝有时也发生动摇，一

①《清高宗实录》，卷599。

②魏源：《圣武记》，卷4。

③魏源：《圣武记》，卷4。

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份谕令充分表达了这种忧虑："如此长途远戍，即获平安；无非代内地回众看守家园……于奸夷(指浩罕入侵者)毫无损伤，试问成何事体？"[①]然而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并不是这样认识的。龚自珍奋笔疾书道："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这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左宗棠强调的是："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内地，甚至京师都"无宴眠之日"[②]。事实上，这种把新疆政治、军事战略上地位与本朝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的观点，对形成清朝治疆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清政府终于认定，放弃新疆"虽欲闭关自守，其势不能"[③]。另一方面看，清朝政府一般确实视新疆在经济上为"无用之地"，对新疆经济发展问题从来不屑一顾。嘉庆朝一位疆臣曾提出要在某地开办铅厂，据称年可得税银1万两，于新疆财政有所弥补，但遭到清帝的拒绝和斥责。清帝再三告诫的是："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讨好之念"，至于税银些许实属蝇头小利，还可能"滋生事端"。在和卓发难，浩罕军入侵之时，指挥平乱的将军一再要求在南疆增添驻军。道光则忧虑重重："欲添兵不能不添粮，添粮不能不采买，采买即不能不扰累，回众寒心势将勾通震罕，更难办理，终必归朕所云：内外交困而后已。"不愿扰累民众的想法当然可贵，可长期实行低赋税，维护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致使社会发展相对停滞，只能为大规模变乱暴发提供条件。总之，清政府加强军事、政治建设，成绩应予肯定，但视新疆在经济上为"无用之地"的认识，发展新疆经济无所作为的观点，却是其战略思想上的最大失误。正因如此，清朝政府为新疆边务不得不以"协饷"形式提供财政支持。乾隆后期清朝国力下降，鸦片战争后为支付战争赔款，协饷供给日绌。至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陕甘农民起义暴发，通往西北交通中断，

①《清宣宗实录》，卷192。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③《清德宗实录》，卷4。

协饷供应亦完全断绝，新疆的边务也随之陷于绝境。这也是同治年间新疆被外敌侵占，社会动荡一时无法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术评估

变乱的发生、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然而具体变乱事件的发展轨迹通常又与疆吏应变举措有着重要联系。左宗棠统兵入疆，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了阿古柏匪帮，又以大无畏精神部署抗俄军事力促中俄伊犁交涉成功，继而抓住历史契机完成新疆建省，总之他在军事、政治上的作为给新疆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再如，张格尔骚乱及浩罕入侵时刻，钦差大臣那彦成揭示南疆积弊；扬威将军长龄两次出征平乱指挥若定，善后部署有章有法[①]；参赞大臣璧昌团结广大维吾尔民众坚守孤城叶尔羌，都为平息变乱发挥过积极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某些疆吏举措失误导致严重后果，亦不止一二例而已。如1765年乌什事件，起初起事者仅几百人，且只是反对阿奇木伯克和办事大臣，清兵赶来时乌什民众还开城门相迎，但清兵在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指挥下开炮轰城，遂致全城造反。再如张格尔自1820年起开始闹事，但一直是在边卡上流窜，追随者也仅百十来人。可是到1825年事态急剧恶化，缘由是：一位名叫巴彦巴图的军官领兵追捕张格尔，未获，便将当地柯尔克孜头人亲属及许多无辜牧民杀戮，还谎称遇贼杀敌以报功。这场滥杀的后果是把大批柯尔克孜人推向张格尔一边，张格尔由此气焰嚣张。历史学家对此评述道："如果不是一位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变乱本不该发生，或本不该扩大到那样的规模，但由于疆吏应变举措严重失误，终于发生了、扩大了。

应变过激会致使事态人为扩大，过缓消极，本想息事宁人，往往适得其反。浩罕在张格尔骚乱伊始就深深卷入其中，但还不时派

①参见本书下编："长龄、那彦成与南疆之乱"。

遣使者向清朝表示"恭顺",请求觐见清帝,但只字不提张格尔事。当时的驻扎大臣庆祥不愿深究,宁愿"佯信为实,以示大言",装糊涂了事。姑息养奸造成后果更为严重,事隔不久,张格尔在浩罕全力支持下攻破喀什噶尔汉城,庆祥被迫自尽。平息张格尔之乱后,那彦成主持善后,对浩罕采取禁绝贸易措施。此策貌似强硬,实则消极,况且这是以浩罕"专以贸易为生"的错误判断为前提的。切断贸易往来对浩罕经济可能是沉重打击,但并不能使之就范。那彦成一心以为"浩罕生计日蹙,不久即叩关效顺",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准备。所以当浩罕以优势兵力突然入侵,清朝方面应战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待清朝从万里外调集重兵驰援,浩罕军又缩了回去。清朝为摆脱不战不和进退两难的困境,只得全面妥协,与浩罕媾和①。自此以后浩罕益发骄横,直接插手了以后许多次喀什噶尔地区变乱,清廷对浩罕闹事始终拿不出个办法,惟有消极应付。1858年潜入喀什噶尔刺探情报的俄人瓦里汉诺夫,作为旁观者清楚地看到"浩罕人积极参加了一切反叛风潮",然而使他震惊的是:"中国人对胡作非为的浩罕人所持的忍耐政策", 正如他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秩序和安宁无时可确立"②。还应指出的是:应变过激多半发生在基层,其失误一般是战术性的;而应变过缓则是高层决策过程中的问题,其失误往往是战略性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

吏治问题。疆吏应变失当,有其能力素质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那彦成,此人政治目光敏锐,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南疆政治生活中的积弊,但其军事才干平平,又不求谋议,致使对浩罕入侵的军事防备上不得要领,但疆吏的举措失当,更多缘由其个人品质恶劣、低下。巴彦巴图滥杀无辜谎报军功,无论从什么标准上看,都是一恶棍。这里还有个官员腐败问题。应该承认,清朝在统治新疆初期,还比较注意整肃吏治。乌什事件中乾隆帝下令将开炮轰城的卞塔

①参见本书附录:"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

②《瓦里汉诺夫选集》,阿拉木图,1962年,第531页。

海等以骚扰罪在军前正法。此后不久又发生"高朴扰累"案。高朴为慧贤皇贵妃之侄,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时勒索民众金宝诸物,私自役使当地民众3 000余人为他采玉,然后私贩苏州倒卖牟取暴利数十万两。乾隆将高朴就地正法,并告诫新疆驻扎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激发乌什事件之办事大臣)覆辙,贻误国事。"[1]但自乾隆后期吏治已不清明,嘉庆、道光年间更是每况愈下。当时新疆的大臣一律由满员充任,随着八旗之腐化,满员中的腐败问题已达到极严重程度。如那彦成指出的:"文武荒嬉,复犬羊其民而虐用之","大臣又伪手阿奇木厚敛于民"[2]。官吏如此腐化,民众当然"仇视",政局也难保稳定。建省后,新疆不再是荒淫无度的满员一统天下,官吏素质相对有所提高,对新疆政局的稳定亦有积极意义。

五、结　　语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上一两个世纪的历史问题。由此可以感到:祖国的统一和新疆的稳定是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它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的矛盾运动,始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影响。从这一点出发,有益的启示是:破除发展新疆经济可有可无、无所作为的观念,不断解放生产力,积极发展经济。回顾历史,需要记取的教训还有一条就是,要努力提高干部素质,清除腐败现象。因为它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左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也要看到历史与现实又是有区别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旧东西已经或正在消失,而一些新问题正在或已经产生。以本题所论新疆而言,人民受压迫、民族不平等的历史已经永远地过去,这无疑是最根本的变化。导致新疆政局不稳定的一些因素也发生

①《清高宗实录》,卷1068。

②《那文毅公奏议》,卷77;《新疆图志》,卷22。

变化，比如伊斯兰和卓政治消亡于上个世纪下半叶，已成为历史；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孕育出的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分裂主义，就是21世纪出现的新问题。民族分裂主义除了祭出“圣战”的宗教旗帜外，还增添了一块“民族”的招牌。另一方面看，区别中亦有共同之处，即联系：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所发生的问题，本质上既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的较量。

20世纪的新疆:面对的历史遗产

一、国内外的政治环境

国际环境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危机

清末新疆的政治走向

二、以建省为中心的新疆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

政治体制:废伯克制、建行省

经济体制: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

司法制度:因俗而治

三、社会变迁与整合

移民实边,维吾尔族人口增长

政治意识

民族分布和民族意识

宗教状况和宗教意识

双重的教育体制

四、小　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社会进步,新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新世纪之初,不妨回顾一下,百年前——1901年,历史给新疆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这对于认识新疆百年间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及估计在到来的新世纪中将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一、国内外的政治环境

国际环境

新疆是我国西北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省区，在这里，新疆的战略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比之于内地一般省区最大特点是：新疆地域辽阔，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总面积1/6；同时又是一个边疆省区，在古代新疆境外是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汗国、土邦、部落。因此，新疆的区情既受到国内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英俄殖民主义在中亚展开激烈争夺，新疆境外的大大小小汗国、土邦、部落相继沦为俄英两国的殖民地。这些汗国、土邦、部落的覆灭是必然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还处于极落后的古代社会，无论如何无法抗御近代资本主义的侵人。总之，19世纪下半叶中亚政治地图根本改观的结果是：在1900年至20世纪的起点，新疆直接面对着当年世界最强大的侵略者——英俄殖民主义。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危机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起始点。在此之前，中国的封建社会缓慢发展，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虽然不断有学者证明，早在明代

就有些资本主义萌芽，但至爆发鸦片战争的1840年，中国整体上包括沿海经济发达地方仍是东方的古代社会。当然，就东方范围而言，中国的社会经济仍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国的皇帝故以自己的高度文明傲视周边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鸦片战争的爆发，使这种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天朝"开始面对的是英、法、俄军"红毛番国"，它们拥有坚船利炮，绝非历史上的匈奴、鲜卑、蒙古可比。至18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已有长足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通商、攫取和扩张海外资源和市场，是其发展的必然逻辑。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是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清朝方面对于西方通商要求是不屑一顾，甚至是鄙视的。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本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准其贸易通市，是"格外施恩"，归根结底是控驭"犬羊成性"者的羁縻之策。事实上，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大宗货物可以销售给中国人，往往是用现银购取中国的茶叶等物，这样的通商连现银都流失了，还惶及什么资源和市场，于是鸦片这种毒品贸易被发现并很快改变了对中国贸易的困境。资本主义的原始发展本身就是伤天害理的。英国人在国内禁烟，但厚颜无耻地将毒品向中国倾销，因为这不仅关系该国的通商大利，也是英国政府收入之大宗，为此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故此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及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由此开端。割地、赔款，毫无疑问是耻辱的，但最令时人痛心疾首的是五口通商，清朝方面以为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已引起祸乱，而有五口通商，外人可横行，防不胜防，直到很久以后，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祸中之祸。但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就几乎没有什么人懂得是怎么回事。在那个时代"精英"的心目中，治外法权似乎是让夷人管夷的，那正是古训中以夷制夷的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新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略高，这是不是外交的"成功"，清统治者不

免洋洋自得，其实哪里想到因此牺牲了国家的主权，对国家的危害难以估价。鸦片战争中，中国无可挽回的失败，根本原因是落后，正如学者所言：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古代的军器和军队，我们的政府是古代的政府，我们的人民就当时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状态而言，也是停滞于古代。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可以归纳为物质生产领域的落后，但战后和战前意识并未有多少变化，依然是麻木不仁、妄自尊大。故此，亦可以说，精神、观念的落后更可悲，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根本原因，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20年后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中国的古代社会才真正受到震动。鸦片战争后，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列强，中国人民拼命反抗，太平天国运动、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其斗争可歌可泣，但一次一次地失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割去，大片国土被几个西方列强划作其势力范围，社会经济受到西方列强严重侵蚀，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虽一次次失败，但社会的进步，向近代化的转型却是不可逆转的，在迈入新的世纪之初，连最顽固、最保守的西太后集团也不得不打出预备立宪的"新政"，便是明证。

清末新疆的政治走向

在上述国际、国内环境下，清末新疆的政治走向大体体现在同治农民起义、外敌入侵、驱逐阿古柏、收复伊犁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新疆本世纪政治局势的发展。

同治农民大起义。18世纪中叶清王朝在平定伊斯兰宗教贵族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结束了新疆自元朝末年以来数百年的战乱，自此以后半个多世纪新疆政局相当稳定。1820年以后开始发生变乱，主要表现为和卓后裔的叛乱。在中亚浩罕国封建主的支持下，大和卓的后裔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不断由中亚潜入喀什

噶尔、叶尔羌等地，制造了一起起骚乱事件。这些事件形成一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清朝当时统治南疆的基础伯克制日益显现的弊端。伯克原本是维吾尔世袭封建主，清政府利用并改革了这一制度，将世袭土官伯克变为朝廷的流官，并置于军府统治之下，本质上是中央政权在新疆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但是这种“改土归流”是有限度的，不彻底的，这种以落后的领主制为基础的伯克制，愈来愈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进入19世纪，伯克们的领主性质愈来愈强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军府制下的伯克制遂不可抑制地演化为社会毒瘤，最终酿成同治年间新疆农民大暴动。

新疆政局发展比之于内地总是晚上一拍。1861年末，咸丰驾崩，新帝即位，改年号为同治。同治是《书经》中的“同归于治”的简称，从字面上看，它指的是政府和人民“共同回到井井有序的状态”。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士大夫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在走向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空前规模的叛乱从而走向复兴，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屈指可数。但是另一场暴乱即陕甘回民起义方兴未艾，接着，在新疆的腹地库车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很快席卷大半个新疆。由于这是发生在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暴动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宗教色彩，暴动的领导权为民族、宗教上层所把持。原蛰伏在清真寺里的库车大阿訇拉西丁和卓摇身一变成为库车暴动的领袖。他发出的第一号法瓦特(宗教法令)说：“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卡菲尔(异教徒)残暴者脚下，卑贱地忍气吞声地过着日子”，“宽仁的真主给予我们力量，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砍在卡菲尔的头上，我们现在需要干的是：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沿着真主的指点去圣战”，“应本着‘在什么地方发现卡菲尔，就在什么地方把他们消灭干净’去干”。在伊斯兰的口

号下，这场暴动被引向民族仇杀和宗教狂热的歧途，新疆陷入空前的大乱，为外敌入侵提供良机。

1865年，乌兹别克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以护送和卓后裔布素鲁克为名入侵喀什噶尔，他东征西讨，在南疆建立起得到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入侵者“哲德莎尔”政权。1871年，俄国以“代收代守”的名义，悍然出兵抢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分裂的严重危机之中。

驱逐阿古柏。清朝在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开始着手规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受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大营进驻肃州，各路大军开抵新疆。这年秋季，左宗棠大军迅速攻克古牧地（米泉）、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全歼在北疆的阿古柏军。次年春，清军由乌鲁木齐、哈密两方面夹击，攻克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等地，彻底摧毁阿古柏在天山关隘布设的防线，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在清军一连串的打击下，阿古柏统治集团内部乱作一团。1877年5月，阿古柏在一场内讧中身亡。此后，清军长驱直入南疆，浩罕残余势力作鸟兽散，国土规复，英殖民主义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至1878年新疆在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动荡后终于平静下来，一方面清朝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动乱，新疆未被分裂出去。

收复伊犁。1851年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沙俄逼签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三个勘界子约，割占了中国西北北起阿穆喀山脉，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迫塔城、伊犁，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71年沙俄趁乱攻入、霸占伊犁，它选择这一时机动手是为了抢在阿古柏之前侵占伊犁，而且它以为清政府再也不可能收复新疆，以图永久霸占伊犁。扫荡阿古柏入侵势力后，从俄国收回伊犁提上议程。清政府先后派崇厚、曾纪泽赴俄交涉收回伊犁。1881年曾纪泽在俄都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以割地、赔款、通商为代价收回伊犁。

1882~1884年根据中俄《改定条约》勘界条款俄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又割占7万多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从1864年至1884年短短20年时间，中国西部约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丧失。

上述政治事件虽说未导致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但在俄英殖民主义的夹击下不可避免地半殖民地化。俄国在交还伊犁时，除了索取赔款、割地外，还攫取了商业免税权益，俄英在新疆的争夺在继续，表现在经济侵略进入更深的层次。相比之下，俄商在这一争夺中更占优势。这里的重要因素是，由英印的拉达克之列城至南疆莎车间要经过数百英里的险峻山路，其中有11座高耸的山口。据估计，这条山路上的商队，每次往往要损失25%~40%的驮畜。俄商借助地理交通优势，大力进行经济渗透。1893年俄国对新疆出口已达303.6万卢布，占俄国对华出口总值的74.3%。1892年至1901年俄国与新疆贸易总额增长30.6%。苏联学者研究认为："到19世纪90年代，新疆几乎只同俄国一国贸易。"新疆对俄国输出90%以上是原料，俄国对新疆的输出则几乎全是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因此就贸易性质而论，新疆已变成俄国的工业原料供应者和工业品的消费者。清季新疆大体上形成迪化—古城，伊犁—塔城，阿克苏—库车—焉耆，喀什噶尔—莎车，和阗—于阗五个区域流通市场，也就是五个中间市场，而迪化、古城、伊犁、塔城、疏附、莎车则是连接新疆与关内及国外的中心市场。中心市场、中间市场及各县和各县以下的巴扎的基层市场的层次愈来愈分明。在殖民主义特别是沙俄殖民主义经济侵略下，清末新疆的中心市场和中间市场基本上为俄商垄断资本把持，惟有基层市场特别是南疆小城镇的巴扎还大体上维持旧式的传统的封建贸易方式。总体上，新疆的商业经济已半殖民地化。

二、以建省为中心的新疆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

纵观整个清朝统治新疆时期，中期(1820~1877)多变乱，两头却是相当平静，究其主要原因是，在驱逐阿古柏、收复伊犁后，境外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进行了以建省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一变革可能更重要，它相比于内地更晚得多，但适应了当时新疆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关于这一点在前文"1759~1911：新疆的变乱"中已有较详细地论证，因此在相关地方提纲挈领地述及。

政治体制：废伯克制、建行省

驱逐阿古柏后，清朝政府在新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伯克制、建行省。早在张格尔作乱时，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已清楚地看到了其严重弊病，曾撰文大声疾呼："夺伯克之权。"但"夺伯克之权"还面临着谁来夺、如何夺的难题。同治年间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个新疆，各驻城大臣、官吏，或举家自焚，或被起义者处死，维吾尔王公伯克，不是被当作叛教者杀戮，就是见风转舵随机应变。把持各地农民暴动的维吾尔权贵又各立山头，相互攻伐，相互残杀。后来，阿古柏、沙俄入侵后，又将一批不听命于自己的权势人物打下去，搞得他们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清军收复新疆后，那些卖身投靠侵略者的人又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前线指挥清军西进的刘锦棠亲眼目睹了战乱后的新疆状况是：除哈密王"所部回众尚多，差堪自立"，各地王公伯克都已"家产荡尽"，失去往昔的养廉田和燕齐，许多耕地"听兵民自占"，原先的秩序都被破坏，农奴对王公伯克的人身依附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挣脱。刘锦棠由此清醒地认识到："旧制……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清军初定新疆时，在各地设立善后局、保甲局、征粮局等总分各局，全面接管了地方一切事务，如征收田赋、诉讼案件、修治水利、修葺城垣等。爱国伯克，

特别是那些投奔清军“颇为出力”者，受局员令从中做些具体工作。伯克工作不力者，随时予以撤换。善后局事实上起着军事管制性质的地方政府职能，为政治实权过渡到地方官员手中，为郡县制在南疆实施铺平道路。

1882年起，刘锦棠就再三上奏折请裁伯克。1885年他以首任新疆巡抚身份再奏请裁伯克。他特别指出：目前南路各官“委署已历年余，规模渐具”，正是裁废伯克的大好时机，否则“过此以往，必有积重难返之势”。他不待朝廷批准，便采取实际行动，在各地召集伯克，宣布裁撤伯克，原伯克可名誉上保留原品级顶戴，有能力者可授乡约或书吏为政府做事。这一工作进行得非常平稳，直到1887年，吏部奏报“所有伯克各名目全行裁汰”，清廷最终认可了这一改制。

由当初实行军事大臣控驭下的伯克制，到伯克制的完全废除，历时一百二十多年，本质上是分两步走的“改土归流”。这一改制顺应了历史的进步又符合新疆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特别是第二步废伯克这一关键步骤，抓准了百年难遇的良好时机，因此过渡平稳，没有发生如四川大小金川“改土归流”时出现的激烈对抗。当然这一变革还不能说做到完全彻底。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牧区完全没有触动。哈密的王公制还完整地维持下去。就广大维吾尔社会而言，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仍由原伯克充当乡约，所有这些作为历史遗产留给了20世纪的新疆。

自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新疆设官置守，新疆由此纳人中国的版图。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册封、赐印绶与当地少数民族头目，进行间接统治，客观上体现了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权益的尊重，但是这种“自治”权益是给予少数民族上层权贵的，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因此，当发生战乱，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部相互之间发生纠纷、战乱时，全国的大一统就会受到严重破坏。清初，雄居西北的准噶尔部势力膨

胀，不仅把战乱引到蒙古、青藏地区，有时甚至危及中央政权的安危。清朝统一新疆后依传统建立军府制。伊犁将军总统新疆全境各地满汉官兵，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他节制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塔尔巴哈台和总理回疆事务的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有时驻乌什或叶尔羌），节制南疆各军镇办事、领队大臣。将军、参赞、办事、领队诸驻扎军事大臣的职责一是管军政，二是管伯克。一般民政事务则由各级伯克自理。这种体制与以往历朝相比，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一管理，同时还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益的尊重。如前所述，维吾尔社会传统的世袭土官改为朝廷任命的流官，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民族的分权，但军府制下的伯克制本质上仍是民族上层的“自治”，而不是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的自治。军事大臣不管民政，军政和行政分离，中央政令难以畅通下达基层，况且驻扎军事大臣日益腐败，聚敛民财，任满回京，无不箱囊充物，大为民害，愈来愈影响到清朝政府在新疆统治地位的巩固。同治新疆农民起义爆发，伊犁将军、各参赞、办事、领队大臣或被杀、或自杀，军府制几乎完全被摧毁。

当年龚自珍在提出“夺伯克之权”的同时提议在新疆置行省，设总督、巡抚。后来一位封疆大吏奏请在南疆各城置同知、巡检等文职官员，吏部业已准行，但遭到清廷断然拒绝。当时年轻的左宗棠有感于新疆不宁，赋诗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40多年后，这位年轻学子已官至陕甘总督，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在新疆“立省设郡县”的计划在他头脑中开始全面筹划。两年后（1877年）他统兵出关，将自己深思熟虑的建省方案奏报朝廷。他指出：“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玩狎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其所管头目。”这是只管军政不理民事的军府制的最大弊端，早已行不通了。新疆长治久安，惟有当机立断，设行

省，改郡县。左宗棠大声疾呼，并提请清廷，这是最好时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

清廷终于接受了建省之议，于1884年在新疆设行省。新疆最高行政长官为甘肃新疆巡抚，驻省会迪化(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镇迪、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三道。次年(1885年)在伊犁、塔城另设伊塔道，伊犁仍保留将军，专管伊塔边防。道以下设府、厅、州、县等，至1902年，全疆设四道、六府、十厅、二直隶州、一州、21个县或分县，新疆行省体制规模初具。

巡抚属文官序列，但为便于督军，一般兼兵部侍郎。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军功卓著，破例兼兵部尚书衔，以后各任巡抚兼提督衔。建省之初，设抚标、提标、镇标以下各营，计员弁勇丁及2.4万余，后因协饷维艰，大加裁减，全省仅存1.4万余，已营不成营、旗不成旗，军事布防力量十分空虚，幸而建省后社会政局平稳，未出大乱。

新疆建省后，县级和县以上行政与内地划一，保证了中央政令下达通畅，县以下的基层仍是作为乡约的维吾尔权贵把持，这也是民族上层"自治"的体现，在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有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新疆建省意义重大，它强化了中央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剑桥中国晚清史》说："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这一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经济体制：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过渡

如前所述，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建立在落后的领主制基础上。在同治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各地王公伯克失去了往昔的养廉田和燕齐。建省后，伯克的养廉田已交由官府，招佃承租，燕齐早已自占耕地并直接向官府缴纳租赋。伯克制废止后，一部分伯克在地方政府充任书吏和乡约，虽有土地作为办公藉资，却不再分配燕齐(农奴)。在维吾尔社会中，徭役地租被一种无偿劳役与收获物

分成制相结合的地租形态取代。建行省、废伯克的变革反映在生产关系上的变化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这是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进步。与生产关系变化相适应的是赋税制度的变革。在南疆，政府田赋本不沉重。但是在南疆，苛重的是摊派，军事大臣本身就贪墨，任意摊派，大臣要米一石，伯克则摊派数石。再就是徭役，特别是伯克强占大量土地和燕齐(农奴)，把所有负担转嫁小户农民，致使其负担日益沉重。故此，清政府在南疆虽施行的是低赋税，但受惠者并非庶民。

建省后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另一项成果是清政府的赋税收入得到长足增长。左宗棠等人新伊始，因地亩田籍无存，暂以产量的十一分之一征收田赋，较乾隆嘉庆时期的十分之一税略低，并不再征人头税。1887年地亩丈量工作结束后，开始按耕地上中下三等分别征收粮食。摊丁入亩、分等课粮，对封建主和农民一样一律按其占有田亩多寡好孬征税银，虽然单位征收标准降低，但原先占有大量田亩而又不纳税粮的封建主也得完纳税粮，结果是，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占有土地不多的农民实际负担减轻了。总之，这一系列的变革，既加强了新疆同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上的统一，又一定程度减轻农民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解放了生产力，从而为清朝统治末期新疆政局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当然这种变革仍有其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对宗教瓦合甫地触动不大，哈密王属下的阿拉巴图(农奴)仍承受着无度徭役之苦，该地的“改土归流”问题至20世纪初期仍未解决。

就全疆而言，除了以上广大维吾尔聚居区的农业经济外，在北疆还有屯田经济和小农经济。如前所述，清朝驻军重兵部署在伊犁、乌鲁木齐一带。为了解决驻军粮饷，清政府沿袭历代办法开办屯田活动。屯田有兵屯、旗屯、回屯、犯屯、民屯五种，前期以兵屯为主，乾隆后期重心转为民屯。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屯田垦地仅乌鲁木齐、巴里坤地区就达百万亩。政府向屯兵提供屯地、耕

畜、农屯、籽种等生产资料，屯兵向国家全部上缴所生产的屯粮，每月领取粮饷维持本人和家口的生活。这是典型的国有经济，屯兵事实上是国家的农工。民屯，即户屯，其兴办过程就是在国家组织帮助下，通过迁徙、招募、安置等手段，使各类无业之民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安家立户于天山北路，成为自耕农的过程。民户认垦生产、生活资料时，其经济生活还处于国家扶助之下，还具有国有经济属性，但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并开始升科，即承担国家赋税和偿还国家借项之时，他们即成为完全的自耕农，这种小农经济就是典型地主经济。随着民屯的兴起，他们向政府提供的税粮以及向市场提供的余粮数额越来越大，而兵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核算各项费用，屯粮生产投入费用远远高于市场粮价。在这种情况下，兵屯向民屯乃至小农经济的转化成为大势所趋，也就是封建国有经济制度向封建地主经济制度的转化。自雍正初年清政府把摊丁入亩的赋税征收方法推广全国后，地丁合一成为划一的赋税制度。但天山北路新开州县原无丁银额，故自耕农所纳税为单一的田赋。当时，内地受商品经济的影响，田赋已基本上货币化，但天山北路自耕农的田赋还完全是实物税，亩征京石粮九升六合三勺，折合细粮八升。建省后将田分等征收，税额又有所减轻，此时南疆也撤销丁银(人头税)，就国家征税来说，新疆与内地大体划一，这是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明显进步。

司法制度:因俗而治

清代新疆大体形成三个社会：天山南路绿洲为维吾尔族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天山北路及山区为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传统牧业社会，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为汉、回等族的移民社会。牧业社会一直盛行部落原则和草原习惯法。清统一新疆后，在那里始终实行扎萨克制，依靠各部落首领实行间接统治，始终没

有触动其传统社会包括其司法制度。东疆移民区，建立的与内地划一的郡县制，其司法制度也与内地划一。维吾尔农业区随着伯克制的改造和废止，变化最大，司法制度也有很大变化。

清朝统一新疆前，维吾尔社会通行的是“回法”，即传统的土著伊斯兰法。据《新疆回部志》记载：

回人虽有刑法，然而律例，惟听阿浑(訇)看经论定，伯克及犯者无不服。亦有杀人者死亡说，若犯者能出一千或数百腾格尔、普尔给死者家，亦可免抵斩罪。非军阵不用致死，则押赴巴杂尔(集市)当众挂死。剁手折足，施于惯逃积贼，枷号木鞋施于窃盗匪徒。其囚禁罪人，则掘一深坑，上用柴棚留一小窍，置人于中，谓之地牢，其余鞭棍朴责而已。

所谓“阿浑(訇)看经论定”，指的是，执法者为“阿浑”，即伊斯兰教法官，依据的法律是伊斯兰教经典，因此大体遵行的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穆斯林在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所应遵守的规则总和。伊斯兰教法在移植于新疆维吾尔社会时必然受到传统习俗影响，糅和成土著伊斯兰法。其特点是体制过于粗糙，执法过程又是“看经论定”，既无概念清晰的例律，又不依据判例，故“均未从善”。

清朝统一新疆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并将清朝的法律制度引入新疆各地，即所谓“迩今各即归一，自应遵我朝之律”。清朝的各项法律成为各衙门的统治依据，为在新疆各地依法进行量刑，根据新疆官员请求将律例各书发放。据《回疆通志》载，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衙署内，存贮汉印房法律文书有：《大清律》、《新纂大清律》、《蒙古则律》、《蒙古律》、《督捕则例》、《中枢政考》、《八旗则例》、《吏部则例》、《新例》、《大清续纂条例》、《洗冤录》等等，几乎囊括了清朝所颁的法律。对于严重危害皇权、政权及封建统治秩序的犯罪，如谋反、谋叛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严格

按清律实行惩处。

在实施大清律的同时，考虑到地方、民族历史、文化和习俗的特殊性，在与大清律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对新疆原有的传统法律体系采取了宽容态度。清沿用、改造了传统的伯克制，任命了执法伯克——哈子伯克。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准许使用传统的土著伊斯兰法。哈子伯克"职理词讼"，原为伊斯兰教法官，现为清政府的行政官职，一般处理民事纠纷和非政治刑事外的普通案犯。如清廷上谕所云："办理回众事务，宜因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非可尽以内地之法也"，"回人盗本处及内地人马匹，及内地人盗回人马匹，俱照回疆例办理"。

但是两法混用，界线并不明晰，总会发生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杀人案件，按清律杀人案件属于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必须严惩，而在伊斯兰教法里，保留了部落习惯规范的基本特征，即杀人和伤害一样被视为一般民事纠纷，可采用同态复仇及赔偿恤金的方式解决，两法抵触强烈。从历史记载来看，除最初的第一例杀人案(1761年伊斯拉木杀人案)以回法结案外，以后都是严格照清律办。境外旅行家报导："新疆执法极严，王公杀了穷人，也终于免不了被处于死刑"，"那里的凶杀惨案几乎绝迹"。

清政府实行"因俗而治"的司法制度，两种法系在较长时间里可以共存的内在原因是：清律属中华法系，重在刑法，法典严整，结构缜密，而维吾尔社会的土著伊斯兰法，基本上属于家教伦理性质的，重"私法"，轻"公法"，其核心部分于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法规，在国家政权之下，伊斯兰教法不能独立使用，而必须补充以地方习惯法、行政法和王权。因此，在清代新疆，大清法律和当地伊斯兰教法能够大体协调，在行政法、刑法等领域以中华法系为主，清政府专门制定《回疆则例》，依法治理，而在民事纠纷方面，则尊重当地民俗，准许实用伊斯兰教法量刑，这在当时西方人看来是十分惊奇的是："在我们面前呈

现了富有教益的景象，佛教法的征服居然与穆斯林制度适应，调和起来。"其所谓"征服"，固然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但"适应"、"调和"，确实说明了清政府"因俗而治"的司法制度的成功。法律，特别是刑法中两种法律体系的并存不符合清大一统政治格局。光绪年间清军西征，光复新疆，每克复一地即向人民宣传清政府的法律，用"中刊汉文、意注回字"的方式译刊《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卷，"刷印分发各城义塾及大小伯克头目诵读讲解，并令传知乡民共知观感"。废伯克、建省后，一些命盗刑事案件直接由地方官吏按清律审理，历史的惯性也使得回律不可能消失。新疆巡抚刘锦棠感叹说："新疆命盗重案，暂难遵典照章，只能于变通之中，分别情形办理。"至于穆斯林民事诉讼纠纷，至进入20世纪的清末仍"一般由毛拉、乡约根据习惯及伊斯兰法典调处"。

三、社会变迁与整合

移民实边，维吾尔族人口增长

清代新疆人口主要集中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的绿洲农业区。清朝统一新疆时，维吾尔族人口大约25万人，而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地共约17万人，占维吾尔总人口的70%。天山北路原为准噶尔蒙古部的广阔牧场。清文献将这种民族人口的分布概括为"北准南回"，与此相应的经济结构是"北牧南农"。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由于战乱和瘟疫，人口损失严重，以至清朝统一新疆时，北疆广大地区"千里空虚，渺无人烟"，据估计也只有6万人，因此，当时新疆总人口仅32万余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移住的各营眷兵和归来的土尔扈特各部人口)，人力资源十分薄弱，且发展不平衡，势必要整合。

移民实边是历代中央政府加强边疆建设、巩固边防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调整人口分布、实行社会整合的有效方法之一。新疆

地广人稀，有理由成为清政府积极发展人口实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地区。

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便在巴里坤、哈密等处屯田，“凡发往军前效力人等，有愿种地者，许其耕种”。新疆统一后，社会安定，人口的发展有了保证。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一道圣谕曰：

国家出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

这是把移民实边，社会整合，置于国家宏观建设的大局中考虑、规划，显示了这位杰出封建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次年(1761年)，乌鲁木齐的兵屯大获丰收，“谷石赢余”，清廷由此大受鼓舞，谕令有关部门加快新疆移民实边进程。在封建国家的强有力推动下，新疆人口发展开始了辉煌时代。

直观上看，清代移民实边沿袭的是屯田老方式，但开办形式多样，在规模和成效上远远超过历朝历代。首先是兵屯：即绿营兵屯，发端于康熙末年，乾隆清朝统一新疆后则得到大规模发展，先后在哈密、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设18个屯区，屯兵总人数达1万余人。其次是民屯，又名户屯。清政府在发展绿营正规军兵屯时，开始在甘肃等地招募无业贫民赴新疆垦荒。由于实行官费资送、借给牛种、代建房屋的从优安置政策，民屯取得巨大成功。1761~1781年20年间大约有5万民人迁移落户天山北路各地。移民新疆的局面打开后，不待招募而主动出关的民人与日俱增，1781年后，政府主持的有组织的

移民活动基本结束，而自行出关的热潮却方兴未艾。民屯经营方式灵活，管理成本低廉，生产效率高，逐渐取代兵屯成为新疆屯田的主要方式。再次是回屯，即从人烟较稠密的南疆迁徙维吾尔民人赴伊犁盆地屯垦，这是在新疆本地进行的局部人口迁徙，以此整合农业劳动力的分布。由于政府出面主持，实行"捐助资送"、"官办起程"有力措施，6 000余户数万维吾尔农民在伊犁盆地安家落户。此外，还有犯屯和旗屯。总之，清代新疆屯田的成功，根本改变了北疆地区"渺无人烟"的状况，至1820年天山北路认垦人口大约在20万人，地亩在108万亩以上。同治年间战乱，新疆人口受到严重损失。建省后，清政府又大兴屯田，制定《新疆屯垦章程》，广招民户，1884~1905年，新疆新垦荒地达960万亩，人口又一次进入增长高峰。"北牧南农"的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清朝统一新疆后，政局平稳，社会经济发展，维吾尔人口随之稳步发展，至1820年大约增至65万人，比之于1760年翻了一番。这以后由于战乱，其增长速度放缓。1884年新疆建省后，废伯克制，取消"按丁索赋"的人头税，社会平稳，经济迅速恢复，维吾尔人口高速增长。1902年有了较全面的人口统计数字，全疆人口已达206万，其中维吾尔人口超过157万。与1760年相比，全疆人口增加5.4倍，维吾尔人口增加5.3倍，新疆地广人稀的面貌为之一变。这对于新疆的开发和边防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是积极的，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移民实边过程中还以严刑苛法强制实行消极的民族分离政策。其一是令维吾尔人与汉人相分离，严禁内地民人前赴天山南路垦荒种地。虽然它还允许内地商人去那里做买卖，但在肃州、托克逊等地设关建卡以控制。内地商人赴南疆，不得携眷，只准居住在各城附近的专门筑的"汉城"内，与维吾尔人完全隔离。其二是令维吾尔人与"内地回民"相分离，"内地回民"，或曰"汉回"，即回族，与维吾尔族同信伊斯兰教，因抗清反满斗志

高昂，深受满清当局猜忌。清政府既严禁他们出关充当阿訇，“擅娶回妇”，又严禁维吾尔人私留回民。其三是令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柯尔克孜人相分离，虽然清政府原则上不禁止维吾尔与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往来贸易，但它制定了极严格的贸易章程以加强控制。其四，在维吾尔人中也实行隔离，维吾尔人来往各地也要领取“路票”。路票注明年龄、相貌及因何事前往何处。没有路票私自奔走者将会受到严惩。以上种种隔离措施的要旨在于提防各族“杂处”、“日久滋事”。建省后，以上隔离法令似乎未再重申，人员交流松动得多，但民族隔离状况成为历史遗产留给了20世纪。

政治意识

官方的儒家统治思想。战国以后，中国就进入封建社会。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信仰经典的儒家教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作为上天之子居于一个和谐的、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文明秩序的边缘或之外的是“蛮夷”之邦，天子和政府的职责是“俾通天朝声教”而“启迪教化”之。原为“蛮夷”的满清入关后，清朝皇帝得到社会认同，取得在中国这片辽阔土地上统治的合法地位，归根结底是他们完全接受了儒家思想并以捍卫文明的儒家教义为己任。

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乾隆帝御制碑文、谕诏、宣示中外：此系“开万古未辟之区，斯声教益溥于要荒，将惠恺愈覃于海寓”；强调“不藉非常之人，而举非常之事，终建非常之人，而举非常之事，终建非常之功者”实乃“天恩助顺”；并要求：五嶽四渎、历代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等，“应遣官致祭，著照例举行”。所有这些既是对儒家教义的现实诠释，又是将儒家统治思想实施于新疆的要求。乌鲁木齐一度改名“迪化”，正是取“启迪教化”之意。事

实上清代封疆大吏、边臣大体尊奉儒家统治思想，并身体力行。如一位将军所言："安边之保，振威为上，羁縻次之。"所谓"振威"，即是谁"取行倡乱，必当痛加惩创"，而如"恭顺"，则"可享大皇帝无疆之福"。又一位总理南疆的参赞大臣撰文称：自己的职守牧羊，南疆八城，就是八群羊，牧好羊就必须豢好犬，以对付狼。他所谓的"羊"，指的是维吾尔民众。这里流露出对少数民族的鄙视思想，当然不可取，但也不能苛求封建统治者要有现代的民族平等思想，其中守土安民的思想不宜全盘否定。

官方的儒家统治思想大体局限于封疆大臣和满汉官吏这个层面，但是这种政治意识深入到新疆却是开历史之先河。残存的几十种清末乡土志表明，在各县、甚至包括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各县，都修建有文庙、孔祠、昭忠祠等，这是清以前所未有的现象。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全疆各县还普遍建有关帝庙，在奇台除了古城、满城外，在三个泉、大石头、色必口、达布库乡镇都建有关帝庙。所祭奉的关羽(162~220年)是神化了的三国时代的英雄，在一千多年中，通过小说、戏剧、官方和民间的塑像以及秘密宗教之中的传说，关羽的神话家喻户晓，自宋以来封建国家不断地向关羽及其后代加封进爵以至尊之为武神，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的"帝"。1614年关帝被尊加"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关帝的祀典提高到与孔子并列，官私文书中关羽不仅是忠义的楷模，且熟读儒家经典，深明《春秋》大义，这时的关帝已儒家化了。建于乾隆二十八年伊犁惠远城的关帝庙，庙正门悬挂"神佑新疆"之匾。当然清朝统治者抬高关羽地位，更多的是以关羽抵消崇敬岳飞、于谦的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儒家化的关羽重点在"愚忠"这个儒家思想中反动的层面。但用之于新疆，主观上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客观上却是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1828年春，受命平定新疆战乱、擒获张格尔和卓的一位将军报告：上年与张格尔军在阿克苏附近作战，至少在两次危急之中，陡起大风，尘沙飞

扬，红光烛天，关帝显灵，是以官军大获全胜。道光帝闻知大为喜悦，颁谕称："我朝定鼎以来，关帝屡彰灵佑"，这次阿克苏之战又"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魄"，下令礼部再予关帝加"威显"封号。清代关帝庙遍立新疆城乡，洪亮吉的《天山客话》记有："塞外员三两家，村必有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接于西海云。"正是官方儒家意识形态通过祭祀崇拜关羽在新疆的深人的生动表现。

建省后，左宗棠通令各地局员、防营创办学塾，教授《千字文》、《百家姓》、《小学》、《六经》等课。这是通过教育向基层传播儒家思想的尝试，无论成效、利弊如何，清政府在强化儒家政治意识上又前进了一步。

民族上层的"盐的义务"。早在10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但是直到14世纪察合台后裔蒙古可汗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后，以强制手段迫使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才成为南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然而17世纪准噶尔蒙古部正式占领南疆，建立起受它保护下的伊斯兰和卓集团的神权统治，也就是说在清朝统一新疆以前南疆的穆斯林就处于"异教"的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后来的清朝统治，对于维吾尔族上层来说，同样接受"异教"的统治，并没有特别困难的地方。维吾尔族上层一方面顺从"异教"的统治，另一方面实际上以"沙里亚特"维持着伊斯兰社会，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与清朝"因俗而治"的原则是协调的，而且在理论上未必没有自圆其说的根据，那就是"盐的义务"。1864年库车爆发起义时，爱玛特伯克面对劝说他担任起义领袖的暴动者的回答是："我祖祖辈辈都是效力于大汗(指清帝)的。大汗委我以重任，赐我土地、水和若干户的人口，还颁发给我们祖孙充满恩宠的敕书，不仅如此，我还几次觐见到大汗。我为什么要对大汗做坏事呢？不管他信不信伊斯兰教，我是从祖辈吃着他的盐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应背叛赐给我们盐的主人。恪守这'盐的义务'，

是所有作为人的应尽的责任。”

不能认为“盐的义务”只是爱玛特伯克的随意托辞，它所体现的伦理观在新疆有着悠久的历史。11世纪的名著《福乐智慧》就写道：“当将军的人如果宽以待人，值得依赖，战士就会履行盐和面包的义务。你吃了谁的食物就得为他服务，吃了他的食物，忠节就是理所应当。作为人，应当恪守盐和面包的义务，为了供你吃的人可以献出自己的头颅。”(5796~5797行)事实上，在周边诸民族中(如乌兹别克、柯尔克孜、花剌子模)都有类似的古老谚语：不忘盐和面包是为报恩；吃了盐又朝盐罐吐唾沫，是为忘恩负义。爱玛特伯克宁死恪守“盐的义务”，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将之提到与不信伊斯兰教的清朝皇帝的关系上来阐述，这一点尤为可贵。

“圣战”思想。“圣战”是《古兰经》中的基本概念，但还不是穆斯林必尽的五功(念、礼、纳、斋、觐)义务。它原指穆罕默德与麦加多神教徒进行的战争，后指在伊斯兰旗帜下为宗教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伊斯兰共同体成员的一部分履行了“圣战”义务的话，其他人可以免除同类义务。但是若是伊玛目发布了总动员令的情况下，“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绝对义务。通常情况下，“圣战”是号召穆斯林同异教徒作战，但新疆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1826年张格尔和卓入侵时，曾散发传单说，张格尔如何爱怜和想念穆斯林，要求他们献上生命和财产来迎接自己。可以说和卓在鼓吹“圣战”。但是他的这一号召在新疆穆斯林中并没有引起普遍共鸣。维吾尔民众愈来愈认识到，号称圣裔的和卓其实是“盗贼”，“狼狈的安集延人”(外国人)。1831年叶尔羌大阿訇就发布“圣战”号召，要求信徒起来抵抗，倡言“回教经典戒杀好人，不戒杀贼”。1857年叶尔羌的阿奇木阿普哩敦为动员维吾尔民众抗击倭里罕和卓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

请把这份法特瓦分发到城乡，不管智者愚者，都要理解阿里

亚特的命令。无论强盗从哪里来都要把他消灭。这是沙里亚特的命令。保护生命是我们的义务。抓住机会把敌人逮住。没有人支持他们。屈服于教人便是叛教，丧失信仰。

同治新疆大暴动中，库车大阿訇热西丁发出的第一号“法特瓦”，就是挥起“伊斯兰的宝剑”杀异教徒，在“圣战”的旗帜下杀异教的清朝官吏和满、汉、蒙民众外，还操起屠刀杀各地的维吾尔民众。那时的民族宗教上层钻入各地暴动队伍号召“圣战”，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穆斯林群众在反动民族宗教上层蛊惑下自相残杀。后来，乌兹别克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打的旗号也是“圣战”，同样地除了杀异教徒外，更多地屠杀新疆各地的穆斯林。清军西征驱逐阿古柏，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持，当地维吾尔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维吾尔史料也证实：“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指清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阿古柏搞的“圣战”，最终自取灭亡。

阿古柏被驱逐、新疆规复后，社会恢复了和平。目睹这一切的维吾尔史学家毛拉木萨，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反复思索地写道：“真正的行为者是真主，既已如此，那么不但是坚持伊斯兰信仰的帕夏(皇帝)，或是没有信仰的帕夏，只要至高无上的真主认为他具有与自身相应的永恒的智慧，就可以让他成为民众的主人。如果帕夏是穆斯林，那么为他祈祷是比太阳还要光明的事。然而即使存在无信仰的帕夏，也要为他的正义和幸福祈祷，这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帕夏也是神的恩宠的一部分。”毛拉木萨说了半天，实际上承认：让非伊斯兰教者支配穆斯林是真主的旨意，而真主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

总之，清政府在强化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时，仍十分注意“因俗而制”，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民族上层的有识之士的“盐的义务”和把“圣战”与杀贼相联系，也是高度的现实主义。毛拉木萨引诗为证曰：“对所有的状况都应感谢，这是要紧的事——为

了不再变得比这更差"，这里也体现了民族知识精英的高度的现实主义。现实是什么，是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尽管新疆作为伊斯兰(Dar al-Islam)与非伊斯兰(Dar al-Harb)的接壤地带，情况显得异常复杂，尽管经历了同治大暴动及以后十分混乱时期，新疆没有从祖国大家庭中分割出去，这也是19世纪的新疆留给20世纪的宝贵的遗产。

民族分布和民族意识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代民族迁徙的走廊，这决定了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杂处的格局。塔里木盆地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结合文字史料和近百年的考古研究，那时塔里木盆地绿洲上居住着几个具有较高文化发展水平的、操不同语言的部族集团。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迁入并居住于天山南北的就有塞、乌孙、月氏、匈奴、粟特、羌、吐蕃、哌哒、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蒙古等等。汉族也是到达新疆较早的民族之一，有明确记载的是早在西汉武帝时期。

公元6~9世纪，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操突厥语的一些部族南下这一地区，使得大部分当地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原先的语言，操起突厥语，成为讲突厥语的"突厥人"，用学术语言说就是"突厥化"。在大中亚范围历史上有个突厥化的过程，在新疆(主要是南疆)则表现为"回鹘化"，或"维吾尔化"的进程，这是新疆多民族聚居杂处、相互融合，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浓于水的亲情。许多古代民族，如乌孙、匈奴、哌哒、突厥、契丹等已相继消失，但并未被消灭，而是分别以不同比例变成后来某些民族的成员，有的实体一直延续下来，但内部成分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魏晋的袁纥，唐为回纥、回鹘，元明为畏兀儿，近代称维吾尔，其演变过程中不断有其他民族成分融人。公元499~640年吐鲁番地区有过一个"麴氏高昌"政权，那里汉人云集，读的是汉文书

籍，说的却是“胡语”，即少数民族语言，后来这些汉人回鹘化了，融入了维吾尔族之中。这种民族交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多民族问题凝聚意识不断强化、历史文化认同扩大和深化的结果。

在清朝统一新疆时，天山南北民族分布格局是“南回北准”，所谓的“回”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族。此后不久，这种格局就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准噶尔蒙古部战乱、瘟疫而人口锐减，清政府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大量内地汉族、回族迁入天山北路，南疆维吾尔族中的一部分亦被迁人伊犁盆地；早在准噶尔时期被迫迁出的土尔扈特蒙古和哈萨克族这时也陆续回归；还有满族官吏、旗兵进疆，从东北、内蒙古等地调人锡伯、索伦(达斡尔)、察哈尔、厄鲁特营兵赴伊犁戍边垦荒，天山北路人口由此得到较大发展，民族成分也随之丰富多彩。清朝统一新疆后，政局平稳，国际贸易也得到长足发展，境外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塔塔尔)、“安集延”(乌兹别克人)商贾前来贸易，其中不少人落籍人户。至清末，新疆的民族成分主要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塔吉克、满、乌孜别克、锡伯、达斡尔、塔塔尔等12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占总人口70%以上。

尽管如此，但在清末编纂的乡土志“人类项”中一般只列有“缠回”、“汉回”、“汉”数种。这里表现出官方在民族识别上的迷惘无知及漫不经心。“缠回”或“缠”，是满汉统治者对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除回族)的泛称蔑称。“缠回”主要指维吾尔族，但也包括哈萨克(有时叫“哈回”)、柯尔克孜(时称“布鲁特”，又称“布回”)、塔吉克(政府当局又一般称之归于“布鲁特”)。乌孜别克、塔塔尔也属“缠回”，或曰“安集延人”、“安回”，“老尕夷”(诺盖)。

“汉回”，或“回回”、“回”、“东干”，指的是由陕甘青迁人的回族。因语言、服装汉化较深，虽同属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但以“汉

回"、"缠回"相区别。

汉、满、蒙古、锡伯、达斡尔的民族界线一般是清晰的，但新疆穆斯林往往又把他们泛称"和台"，"和台"源于"契丹"，类似于俄文中的китай。当时的民族称谓上除了模糊不清外，许多并不是本民族的自称，而是他称，如"布鲁特"、"和台"；有的是带侮辱性的蔑称，如"缠回"、"老尕夷"。而人口数量最多的维吾尔族，似乎也没有统一的自称，或曰喀什噶尔人、和阗人、阿克苏人、吐鲁番人等与地域概念相联系的称谓，或塔兰其人(迁往伊犁盆地的种地人)、多浪人、罗布人等。甚至20世纪初，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者毛拉木萨在他的历史名著《伊米德史》中，还有称"蒙兀儿斯坦人"，或阿克苏人、喀什噶尔人等七城人。所有这些充分表现出，直至20世纪初，新疆地区许多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朦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和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操突厥语民族占新疆人口的绝大多数，新疆由此成为我国操突厥语诸民族最集中的地区，这正是20世纪泛突厥主义在新疆并仅仅在新疆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宗教状况和宗教意识

新疆是多宗教广泛传播、并存的地区。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远古时代新疆居民就已经产生了宗教观念。最初信仰多种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古代，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景教)先后由南亚、西亚传人新疆，很长时期以佛教为主诸教并存。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人新疆西南部，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才使新疆大部分居民皈依了伊斯兰教，近代维吾尔族广大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但他的先民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直到15世纪以后才在宗教上认同伊斯兰教。明代，吐鲁番、哈密的维吾尔人最终由佛教改宗伊斯兰教，佛教在新疆地区全面衰落，但并没有消失，准噶尔蒙古各部仍信仰藏传佛教。清代，

随着内地汉民迁入新疆，佛教在新疆仍留有一席之地，而后来随着殖民主义势力逼近，西方传教士进入新疆，基督教、天主教也开始在新疆有所活动、传播。至20世纪，新疆的宗教状况是：伊斯兰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

伊斯兰教起源于西亚阿拉伯民族，它向外扩张、发展并立下足来必然有个地方化、民族化的过程，新疆伊斯兰教发展也有个本地化、民族化的过程，从而表现出新疆的地域、民族特点，概括起来是：

1. 新疆伊斯兰文化是叠化在本土原始宗教（萨满教）和古代宗教（佛教、袄教、摩尼教）文化之上，必然受到这些宗教文化深刻影响，如尊崇圣人、圣墓（麻扎）等，离伊斯兰"原教旨"有一定距离。

2. 新疆的伊斯兰教徒多为穆斯林两大教派中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在新疆各民族中发展并不平衡，维吾尔民众的宗教意识相对浓厚，而哈萨克、柯尔克孜牧民只是在近二三百年才接受伊斯兰教，其宗教观念相对淡漠。

3. 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近千年，但只是在14世纪后经过苏非神秘主义活动才真正扎下根来。新疆苏非活动的特点是尊崇号称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在和卓崇拜的疯狂年代，和卓就是神。当时的清朝将军对此深有感触，让维吾尔民众崇信和卓犹如西藏崇信达赖。明末清初，新疆和卓分裂成白山派和黑山派对立的两派。清朝统一新疆时，属白山派阿帕克系的大、小和卓搞叛乱，被镇压的其后裔流亡中亚。1820年这股流亡中亚的和卓后裔不断骚扰南疆，起初还能蛊惑一部分信徒，后来在维吾尔广大民众心目中完全沦落为盗匪。19世纪下半叶，和卓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但伊斯兰各教派中的苏非主义犹存，它以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信徒，且很难为世俗政府所控制，其极端势力煽动性极强，往往构成对社会的破坏力量。

4. 16世纪后的土耳其苏丹以哈里发名义号令伊斯兰世界，显

然并未被普遍认可，但迟至18世纪，中亚已有崇尚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氛围。新疆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受此影响。同治暴动后，中亚乌兹别克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他受土耳其苏丹册封，尊土耳其为上国。后来维吾尔史家毛拉木萨著书，题名《伊米德史》，意思就是尊奉土耳其苏丹伊米德二世。当时阿富汗人哲马鲁丁倡泛伊斯兰主义，受到伊米德二世的全力支持。毛拉木萨尊崇伊米德二世，表明新疆的民族知识精英观念上的动向，这点值得注意，它正是20世纪上半叶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并仅仅在新疆得以传播的历史渊源。

双重的教育体制

清代新疆，除维吾尔族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十分落后，几乎没有什么教育事业。维吾尔的教育大体上是伊斯兰经文教育。历史资料记有：

> 回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肄习之。传教者曰阿浑(訇)，师之谓也。其人不受官职，诵经讲礼，立品端方，不饮酒、不吸菸，恪守遗规，期为表率。常劝人行善事，学好样。老幼男妇，莫不亲敬。伯克、台吉等不敢以势加之，另与王同坐，亦重道隆师之意也。

建省前，军府政府不理民事，更不过问教育，维吾尔教育则完全为伊斯兰宗教教育。而内地迁来汉、回民，或为农夫、或小本经商者，其子弟不读书，即便想读书也没有学校和教师。建省后，行政建置与内地划一，官办教育开始起步，各地设立义塾，逐渐形成官办和民族宗教开办的双重教育体制。官办义塾不仅在汉回聚居区兴办，而且在南疆维吾尔聚居区开办，教授维吾尔儿童学习汉语文。当时规定，凡入学维吾尔族每年赴各府州县考试一次，及格者给予童生和监生顶戴，成年后准予充当头目，不论是否出任头目，经过道一级复试合格者，准予更换五品以下顶戴。

其目的是培养一批懂汉语的地方基层的民族官员。至1883年，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共设学塾77所，每塾聘塾师1名，教授生童15~20人不等。

新疆童生毕业即授予顶戴，部议认为于例不符，考虑到新疆情况特殊，准予另行奖励，即仿内地书院章程，取其粗通文义者按酌给膏火银粮以示鼓励。行之数年后，竟有带领子弟恳求入塾者。但入学者多半图个按月领取钱粮，于是雇替穷民子弟成了普遍现象。这种办学的弊端十分明显，为师者上投侍文不教实学，学童只能死记硬背课文而不识文字，更不知其义，办学者只求多设学塾，而不问实效。后来有所改进，南疆各地学塾改聘通车(翻译)教识汉字、学汉话，课本改用较为浅近读本。继而又将这类学塾与维吾尔族的宗教学教合并，作为两种文字同时讲授。

在北疆地区，除了地方政府和各地驻防营旗普遍设立义塾外，又于1891年在省城设立博达书院，次年(1892年)又建俄文学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新式教育才开始萌发，但双重教育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四、小　　结

立足于20世纪起点的1900年，新疆内外环境似乎并没有什么令人鼓舞的地方：

——在此之前不久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战乱。

——当时的清帝国病入膏肓，在内忧外患中已走到它生命的尽头。

——新疆西部境外不再是一个个弱小、分散的封建汗国、土邦、部落，而是英俄这两个当时最强大、最富于侵略野心的殖民强国。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新疆非但没有因战乱分崩离析而从中国

分裂出去，反而在上个世纪之交奇迹般地出现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恢复、发展的现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内地的统一、划一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究竟为什么呢？

我认为，重要的是，19世纪80年代新疆经历了一场以建省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建行省、废伯克、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分等课粮，向地主制过渡，新疆的局面为之一变。这是政治体制的变革，更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调整，既顺应了历史进步方向，又切合新疆当时实际。领导这场变革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改革家、思想家。除了左宗棠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并接触过洋务，或许还有些粗线条的变革思想外，具体操办者都是文化程度有限的行伍军官。他们所做的主要是把自己在内地早已习惯的东西粗略地用于新疆实践，却获得成功。这个成功似乎有点出乎意外，但却在情理之中。我们的国家幅员如此辽阔，地区间特别是内地与边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内地实行已久，快要被抛弃掉的那一套，用于落后好几拍的新疆，正赶上时机，成了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新东西。尤其是在强邻逼迫之下，与内地政治、经济的统一、划一，对于推动祖国统一、削弱打击分裂势力，有着积极意义。由此的启示是，在变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不失时机地实行切合实际的变革，对于发展、稳定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整合亦很重要，如当年的移民实边，官方儒家思想与民族上层"盐的义务"的契合，双重教育体制的推行，都很有意义。在这里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当年中国北部的东北、蒙古和新疆三大块，都是处于沙俄殖民势力的威胁之下，都是地广人稀，且没有建省。按一般逻辑，新疆远在西北边陲，民族宗教状况最为复杂，处境最危急，但后来却是外蒙分裂出去。分析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新疆首先建省，后来又建有东三省，而外

蒙始终未建行省，没有经历过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二是清代新疆进行了移民实边、人口整合；东北后来也放开"柳条边"，上千万的华北农民浩浩荡荡进入东北，一下子把东北填得严严实实；惟有外蒙始终未允许人口迁移、社会整合，结果外有强邻蛊惑，内有王公易帜，最终分裂出去。今天，新疆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改革进程中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整合，仍是需要解决的课题。

当然，我们高度评价清季新疆以建省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变革及其社会整合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不彻底性和弊端。比如，废除伯克制的变革广泛实施于塔里木盆地，但还未深刻地触及到乡以下的基层，特别是比伯克制还要落后的扎萨克制仍在哈密地区完整地保留下来， 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平衡在新疆内部突兀起来。困扰政局稳定的动乱区从此由塔里木盆地西缘东移至哈密一带的东疆地区，这一点在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的新疆史得到充分证明。

此外，新疆民族、宗教发展进程的特殊性，是20世纪新疆不得不面临的历史遗产。一方面，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得到传播，不断造成麻烦，并不偶然；当然，另一方面它们可能喧嚣一时一地，但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因为，它们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没有前途的。

主要参考文献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民族所辑，1978年铅印本。

刘锦藻编撰：《清朝续文献考》。

魏源：《圣武记》。

《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印中心出版，1990年。

袁大化：《新疆图志》。

福庆:《异域竹枝词》。

和宁编:《回疆通志》。

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

《历代西域散文选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甘肃省图书馆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1985年。

《古西行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毛拉木萨:《伊米德史》(维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伊万诺夫:《中亚史纲》，莫斯科，1958年。

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莫理斯·古朗:《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亚细亚》，《蒙古族厄鲁特历史资料译文集》第14辑。

捷连杰耶夫:《征服中亚》，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爱伦·F.C.:《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1994年。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新疆社会科学院，1993年。

纪大椿："论晚清新疆以建省为中心的改革"、《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1期。

小松久男："浩罕与伊斯坦布尔"，[日]《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研究》XV，1989年。

滨田正美："'盐的义务'与'圣战'之间"，[日]《东洋史研究》52卷2期(1993年)。

陈延琪:"1840~1949年新疆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初探",《西域研究》1992年1期。

苗普生："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1期。

王智娟等:《中亚政局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新疆的稳定》,乌鲁木齐，1996年。

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

陈国光:"清朝统治时期新疆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教法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2期。

潘志平等:"乌瞰中亚宗教、民族之历史与现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2期。

潘志平:"1759~1911年：新疆的变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3期。

潘志平:"清季英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3期。

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一、东新疆西屏国

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

三、孤悬塞外的新疆

四、友好的后院——"反修前线"

五、新威胁：三个"动向"和三个"主义"

六、"9·11"后：新问题

七、结论

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不得不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即受到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也不宜、不该对邻邦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但邻邦的强大或弱小、稳定或混乱、友好或敌对，都会给自己以显著不同的感觉。中国陆界有2万多公里，与15个国家相邻，其中，新疆的边境线就有5 000多公里，现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蒙古和俄罗斯等八个国家接壤。新疆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从来就是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广泛传播的地区，其中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宗教、文化、语言、习俗上与周边国家的一些民族有着不解之缘。故此，新疆的地缘政治因素是独特的、动态的，即随着历史的推移、周边政治地图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中国西部安全和新疆社会政治稳定，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一、东新疆西属国

新疆地处亚洲大陆腹地——我们姑且称之为“内亚”。内亚除新疆外还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的北部和蒙古，在历史上是古代四大文明的连接和中间地带，即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因此，整个内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联系。但总的来看，内亚又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屋脊帕米尔居中；其东，新疆、蒙古地区主要受华夏文明的强烈熏陶；其西，则更多受到南亚、西亚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里，地缘因素是明显的。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其中天山和昆仑山巍峨高耸，这两座大山都是东西走向的，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会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

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相对方便得多，这就是新疆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文化传播和经济贸易交流，中国的政治影响早已波及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但是除了唐元盛期，中国的军队部署和行政建置还是大体局限于新疆、蒙古。在漫长的古代，新疆一直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它的西部境外还没有出现过能向中央王朝挑战的敌对势力。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其时新疆西部境外是向清王朝称臣纳贡又各行其事的大大小小封建汗国、土邦、部落，新疆的外部环境是安全的。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圣武记》写道：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所谓的“东新疆西属国”，乃当时新疆地缘政治的高度概括。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新疆境外哈萨克、布鲁特各部、浩罕(乌兹别克)、博罗尔、克什米尔、爱乌罕(阿富汗)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清朝对这些境外部落的基本政策是“俾通天朝声教而已”。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言：“(当时)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它的实际的作用……只限于保持藩属入贡者之间的和平，要求他们尊重并保护帝国的领土。”[①]清朝官方

①莫理斯·古朗:《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亚细亚》,《蒙古族厄鲁特历史资料译文集》,第14集。

文书一般将境外各部统称为"新疆藩属"、"边外诸部"、"属国"。清朝政府不在其地驻军、置官、征税，不干预其内政、外交。当然，藩部与清朝的关系疏亲又多半取决于地理位置远近，如魏源所说："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两部而已。""东新疆西属国"的格局正是内亚腹地政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在清朝统一新疆后的很长时间里，中亚一直处于汗国、土邦、部落间的相互攻伐之中，战事频繁，中亚的动荡与新疆的稳定成鲜明的对照。事实上，在沙俄入侵中亚之前，危害塔里木盆地稳定的是，与之一山之隔的费尔干纳盆地那里的政治斗争局势。乌兹别克浩罕汗国18世纪中叶在费尔干纳盆地崛起，并向外扩张势力。自182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唆使、支持新疆伊斯兰权贵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叶尔羌(今莎车)等地搞分裂、叛乱活动。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一度建立浩罕殖民政权。阿古柏号称"阿塔勒克阿孜"，即"圣战者之父"，说明这一时期来自中亚的敌对势力打的旗帜是伊斯兰。

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英俄殖民主义在亚洲腹地的扩张和争夺。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入侵印度，在相继排除了葡萄牙、荷兰、法国殖民势力后逐步将整个印度变成其东方最大的殖民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亚渗透，主要方面是由印度向阿富汗、伊朗扩张，其战略是警惕、防范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

沙俄垂涎中亚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远征中亚，但都失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扩张，沙俄大体上控制了哈萨克草原的北部和西部。英俄在内亚的扩张

首先在1837~1838年的“赫拉特危机”中发生撞车。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历史上属于中亚帖木儿帝国南部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恩格斯曾指出：“赫拉特在强国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坦的。”[1]当时英俄围绕着反对还是支持伊朗攻打赫拉特，揭开角逐中亚的序幕。为了与英国对抗，1839年俄军征伐希瓦，这支由奥伦堡武官省长彼洛夫斯基率领的远征军受到暴风雪的袭击而遭到失败，但沙俄用兵中亚的计划并未停止，它的战略目标由此向东转——乌兹别克浩罕汗国和中国的新疆地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应付海疆危机和太平天国起义，越来越难于顾及西北边疆的统治和防务。在这种情况下，俄英殖民主义加紧了对中亚和我国新疆的侵略步伐。1846~1847年，俄军分两路南下：一支俄军不顾清政府的抗议，由阿亚古斯潜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行建科帕尔堡；另一支俄军悄悄进入锡尔河河口，在离河口60俄里处建拉伊姆堡。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势力也积极北上。1846年英国征服克什米尔，建查谟—克什米尔邦，1849年吞并旁遮普，把他们的统治推进到开伯尔山口。19世纪50年代，俄军稳步南下。1853年一支俄军溯锡尔河挺进，攻克了浩罕汗国西北军事重镇阿克美切克堡（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尔奥尔达），筑锡尔河堡垒线。1850年另一支俄军深入伊犁河畔，建外伊犁堡（后更名维尔内，即今阿拉木图），筑新西伯利亚堡垒线。随后沙俄将锡尔河堡垒线和新西伯利亚堡垒线不断延伸，呈钳形合拢。1857年印度爆发反英大起义，沙俄趁机加快了进军中亚的步伐。1860年起俄军分两路征浩罕，1864年两军会师在奇姆肯特，次年强攻占领塔什干。1868年俄军兵临浩罕城下，迫使浩罕汗国投降。同年俄军占撒马尔罕，迫使布哈拉艾米尔国投降。1873年俄军攻希瓦，希瓦汗国投降。1876年俄国攻灭浩罕，在其地建费尔干纳州，隶属于驻塔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2卷，133页。

什干的突厥斯坦总督，而布哈拉、希瓦作为俄国的属国亦隶属于突厥斯坦总督。1881~1884年俄军以血腥屠杀征服了土库曼人。1891年俄军进入帕米尔，开始与英军直接对峙，1895年俄英背着中国私分了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帕米尔地区。新疆从此处于最富于侵略野心的英俄两大殖民势力的夹击之下。也就是沙俄大举出征中亚之时，乌兹别克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建立起得到英国殖民主义支持的“哲德莎尔”政权。1871年沙俄趁乱攻入北疆，霸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分裂的严重危机之中。清朝政府在平息了陕甘一带的动乱后决心规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1812~1885)受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秋，左宗棠大军全歼在北疆的阿古柏军。次年春，攻克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等地，彻底摧毁阿古柏在天山关隘布设的防线，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在清军一连串的打击下，穷途末路的阿古柏在一场内讧中身亡。此时，英国公使威妥玛递照会，要求新疆各城都归英国保护，请清政府封阿古柏为南疆王，为阿古柏乞降“立国”。作为全军统帅左宗棠的坚定立场是：“尽复旧疆，岂容他人饶舌？”1877年8月至是年年底，清军长驱直人南疆，转战两千余里，先后收复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喀什噶尔、乌什、叶尔羌、和阗等地，浩罕残余势力作鸟兽散，国土规复，英国殖民主义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881年，沙俄殖民者也不得不归还伊犁。19世纪90年代，俄英在阿姆河—帕米尔一线划定了各自领地和势力范围，各自都急需消化、稳定自己所攫取的新土地。英俄殖民势力对新疆都有野心，在无力独吞的情况下也都不愿对方占上风。它们之间这种既争夺又相互牵制的结果是，新疆成为两大资本主义列强军事夹击下的缓冲地、经济争夺的前沿地。

19世纪80年代新疆的规复，无论如何也是件大事。事实上，在弃还是收新疆这样的大事上，清廷内有过激烈的争论。左宗棠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站在清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收复新疆：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①]。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这既是对新疆战略地位的确认，也是对当时新疆地缘政治形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冷静分析。在此后20年，德人拉采尔(F.Ratzel)方才构筑地缘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而左宗棠的这段地缘政治的精彩分析，时至今日也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三、孤悬塞外的新疆

20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终于引发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远离这场大战主战场的新疆及其周边地区，一时还感受不到战争的硝烟。对当时新疆政局直接冲击的是一次大战前后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两场伟大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满清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在这场大战前后走到它的生命尽头，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也发生重大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新疆各族人民举旗响应，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和全国形势一样，新疆的政权落入了旧官僚手中，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军阀统治。早在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后，"库仑、恰克图之间已入俄人势力范围"[②]。辛亥革命后，各省自立，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沙俄唆使和武力支持下，库仑活佛哲布尊丹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外蒙之独立破坏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并直接威胁到新疆安全。1912年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②《沙俄侵华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727页。

刚刚就任新疆督军的杨增新将军(1863~1928)在一次演讲中说:

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其重,倘若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①]。

杨增新此所谓的“孤悬塞外”,是辛亥革命后整个民国时期新疆地缘政治的基本形势概括。此时对新疆局势构成威胁的为左右两个方向:

右面是外蒙“独立”。当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并举兵东犯科布多时,杨增新立即派出三个营精锐部队前往驰援[②],但援军未到,科布多已于1912年8月20日陷落。1913年6~7月,俄蒙军进犯阿勒泰,挑起科阿之战,新疆省军迎头痛击,守住了这片疆土。阿勒泰旧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隶属镇守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将军。1905年,阿勒泰从科布多析出,设办事大臣,直隶中央政府。1919年应杨增新的要求,北京政府撤阿勒泰办事长官,置阿山道,并入新疆省。十月革命后,外蒙地区成为俄国白匪军活动的天地,俄国白匪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积极推行“大蒙古计划”,企图建立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国。1921年7月苏俄红军在未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下入蒙作战,击溃了白匪军,宣布成立蒙古人民政府。1924年5月,苏俄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外蒙事实上被分裂出去而成为当时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新疆三面受到苏联的包围。

左面是苏联的五个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相继建立。十月革命后,

①白振声等:《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3页。

②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31页。

沙俄遗留下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是首先面临的问题。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具体说,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识别"、组建独立的民族国家,然后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重新联合",建立苏维埃联邦——按斯大林的话来说:"如果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联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布尔什维克找到东方人民群众深远意向的一把钥匙。"[①]1920年8月,在原沙俄草原总督区建立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尔吉斯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的前身)——这是中亚第一个民族国家。在平息白卫军和巴斯马奇叛乱后,苏俄在中亚"识别"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并用人工方式组建了这五个民族共和国[②]。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布宣言:

我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民居住在东方,与东方民族有密切接触,我们要做俄罗斯革命影响的传导者。我们认为,革命的东方,从零散的行动正转向同全世界强盗进行积极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共产主义思想透入东方各国,并号召东方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解放……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加入俄罗斯联邦行列,希望成为一座东方革命学校。当此伟大时代,我们声明,我们将用一切办法把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扩大到东方[③]。

这是一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向东方"输出革命"的宣言,杨增新对此立即有所反应,他在一份《陈说对待俄事意见》电文中报告:

现俄人许俄属缠(按指乌兹别克)、布(按指吉尔吉斯)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八九,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

---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287页。
②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中央民委参事室译:《苏联民族政策文件汇编》,1954年。

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盖俄人之能否图我，当在印度事定以后，而目前最当严防者，惟此回教独立问题[①]。

看来，这位新疆督军早在1920年就已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中亚的“民族自决”思潮的冲击。如果说，“民族自决”在新疆还是个比较抽象的说法，那么，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分裂新疆过程中有着具体的鼓动内容。这两个主义分别发端于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和阿富汗。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的是以伊斯兰统一全世界，把世界置于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当今世界虚构一个“大突厥民族”，并以此建立一个“大突厥国”，其基本原则是民族或种族的。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人民中广泛传播，且中亚的当地主要民族除塔吉克外都是操突厥语民族，因此，这两个主义——“双泛”，很快在中亚得到发展，并紧密交织在一起，有时还是互为表里的。新疆和中亚在历史文化上最重要的联系在于——按学术语言说——都大体上经历过“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的过程，因此，“双泛”很方便地由中亚传人新疆。1933年和1944年的11月12日，在南疆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先后建立了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是“双泛”孕育出的怪胎。前者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动的；后者则是当年苏联出自利己的沙文主义动机插手“三区革命”的具体表现。苏联曾深受“双泛”之苦，十月革命时期，英国、土耳其势力所支持的反苏维埃的巴斯马奇匪徒，打出的旗帜就是“双泛”，但是这并不妨碍苏联政府利用“双泛”向新疆渗透。

从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期，“孤悬塞外” 新疆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其间还有来自中亚难民（1912年、1916年、1929年）白俄败兵窜人（1920年）、苏联红军人新（1921年、1933年、1937年）、中蒙北塔山事件（1947年）。按一般逻辑，新疆不仅孤悬塞外，而且

①《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民国9年），台北，1967年，81页。

民族宗教情势极为复杂、处境最危急,在"三北"(东北、外蒙和西北)中最有可能被分裂出去,但并未像外蒙那样分裂出去,其原因如同前文"20世纪的新疆:面对的历史遗产"所分析的,兹不赘述。

四、友好的后院——"反修前线"

第二次大战后,美苏由联盟走向对抗,世界格局出现了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开始了中苏两国最友好的时期,新疆和中亚作为两个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后院,也进入最友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和中亚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其间经济关系发展、人员友好往来,增进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印度也在二次大战后获得独立,成为中苏的友好邻邦。整个50年代,新疆的地缘政治关系十分和谐,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50年代末,中共和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意见分歧。起初,这种分歧还在两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展开争论,后来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中苏两党的分歧影响到两国的国家关系。1962年春,苏联在其驻新疆的领事馆引诱、煽动、胁迫中国公民逃苏,制造了"5·29伊塔事件"。其后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在新疆塔城巴尔鲁克山地区制造军事冲突,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增兵中苏、中蒙边境,至1975年,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达45个师近百万军队①。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之时,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紧张,时值国内又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又趁机挑起中印边界战争,西战场就在新疆西南缘的阿克赛钦地区。

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309页。

1969年，苏联已完成从东欧向中亚调动战略轰炸机的部署，还将大量核弹头瞄准了中国，实施核讹诈和武力威胁。1979年，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对新疆已形成三面包抄之势，“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一判断表明，中国不得不认真地看待新疆所面临的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缓和。

中苏对抗时期，中亚的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电台每天以4至6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反华宣传，广播各类文章2万余篇，3 000万字之多，主要是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煽动给维吾尔“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1]。这些反华宣传和分裂破坏活动给新疆稳定带来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1969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暴乱事件。该党的《章程》称：“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政权”，并先后12次派人到苏联、蒙古乞求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苏联间谍机关曾多次派遣特务携武器、发报机和活动经费潜入新疆与“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联络。美国学者指出：“很明显，苏联还抱有将新疆变成蒙古这样的缓冲国的企图。不断有关于拼凑‘自由突厥斯坦运动’组织的权威人士的报导。这个组织有自己的武装，由1962年伊犁骚乱中逃离新疆的人士组成，其基地在阿拉木图，以一位前新疆维吾尔族领袖泰波夫(音译)将军为首，它在70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2]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开始活跃，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它与苏联60~80年代以民族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开干系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多少牵制了苏联对中国的“北方威胁”的压力，也多少缓解了新疆地缘政治恶劣环境。

---

①蒲开夫：《60~80年代苏联对我区的分裂主义宣传》。

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290页。

五、新威胁：三个"动向"和三个"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格局，也结束了一个时代——冷战时代，但世界仍不太平。在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原先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凸现、失控，国际关系格局并未定型。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主题更为鲜明，许多积极的因素孕育、发展，并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比如，始于1996年的中、俄、哈、吉、塔首脑每年定期会晤的"上海五国"机制已形成，2001年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它对于维护中亚、亚洲乃至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然而，恶化国际大环境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滋长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明显的基本动向：

其一，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寻找新的"敌人"。苏联解体在西方是一片欢腾。然而新问题是，原来的老敌人不复存在，那么"新敌人"在哪里呢？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所质疑的："随着赤色威胁的不复存在，把西方连结在一起的胶水没有黏性了，剩下的能够使西方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①] 哈佛大学的亨廷顿(S.P.Huntington)教授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引起巨大反响。如果他当时还闪烁其辞地指责与伊斯兰教文明勾结的儒教文明，那么到1997年则明确地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一个新敌人"，他提醒美国公众，正是因为没有明确这一点，"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忽视"，"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的认同"[②]。这无非是：(1)美国必须要有敌人，否则国将不国；(2)认识不到中国将是美国的新敌人，美国也国将不国。在这种冷战思维的制导下，"中国威胁论"、"即将来到的美中冲突论"等不胫而走，如西方的一篇评论所说："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③]2001年，布

①[美]《时代周刊》，1993年10月号。
②[美]《外交》杂志，1997年10月号。
③[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

什总统一上台就确定：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对手，这就给美中关系定下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强硬基调。2001年3月，美国国防部报告“要求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人们愈来愈相信：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苏联的敌人，美国的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1]。

其二，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随着苏联解体，出现了世界性的当代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高潮。它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主权国家里，搞民族分离、分裂、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可以说，除拉美外世界各地都有民族分立主义。苏联一分为十五和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之后，车臣和科索沃继续在闹分立，当代民族分立主义泛滥之势仍在继续。

其三，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泛滥。确切地说，自70年代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并很快地蔓延自北非至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建一个极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以达到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的政治目标。其典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在“圣战”的狂热鼓动下大搞血腥的恐怖活动，对有关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许多伊斯兰国家(在极端势力看来，不是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权仍是“非法”的)生存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它是对政治与宗教分离、世俗化进程的反动，因而也是当代国际政治最严重的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新疆地缘政治的新问题是民族分裂主义、宗

①[美]《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

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这三个“主义”，或曰“三股势力”：

民族分裂主义。苏联解体在中亚最直观的变化是政治地图的变化，在新疆西部出现五个不大的新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苏联的解体，意味新疆曾面临的“北方威胁”已不复存在，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或许不是坏事，但这只是其一；另一方面看，如前所述，美国愈来愈看中中国，让中国充当第一假想敌国，这并不是件好事；再者，中亚新独立的国家直观上看是民族共和国，车臣、科索沃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分立主义在后冷战时期崛起，这在客观上对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有鼓舞作用。

宗教极端主义。中亚诸共和国很快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进程，它明显地表现出两股潮流：一是由政府引导的以民族复兴为内涵的宗教文化的认同，一是与反政府势力相勾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崛起。在1995年以前，前者为主流，随着民族国家建设步入轨道，这种内涵为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复兴趋于平稳；在1995年以后，后者为主流，特别是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如费尔干纳，营造了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至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 Movemet of Uzbekistan）”和“伊扎布特（Hizbut Tahrih）”等极端组织的活跃，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严重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冷战结束前后便在西亚地区兴起。90年代中期，由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并与本·拉丹搞在一起，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基地之一。我们认为，恐怖主义都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爆炸、绑架、劫机、投毒、暗杀等残暴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和政府行政、执法机关，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而将其政治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以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标。有无政治目标是界定恐怖主义的重要标尺。中南亚一带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民族分裂，就是宗教极端；有的既搞民族分裂，又搞宗教极端，因此中南亚的这“三股势力”总是错综复杂地缠在一起。本·拉丹的

“基地”组织、塔利班，与车臣、克什米尔民族分立主义、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和新疆民族分裂组织相勾结，推波助澜，造就了危害地区稳定的一个个火药桶，其中阿富汗、克什米尔、费尔干纳三个火药桶就在与新疆毗邻地区，它们与中亚西北缘的车臣恐怖分子遥相呼应，形成恐怖主义的“双月”带：

车臣——中亚——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

“双月”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前沿在南疆对面的费尔干纳谷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军事基地加尔姆、吉尔加塔尔、塔维尔达拉和前些年频繁出击的巴特肯山区距中国边境也只有两百多公里，从这一点看，新疆已处于反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一线。这是千年之际新疆地缘政治的突出特点。

六、“9·11”后：新问题

2001年注定是个非常之年，其“非常”不是因为它是世纪、千年之初，而是这一年在美国的心脏纽约、华盛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9·11”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政治大格局从此发生重大变化，并至少影响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最为关注的是大国关系的变化。

美国。“9·11”后，美国总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提出以是否支持其反恐划线，但问题是：敌人、敌国是谁？拉丹是敌人，但他只是一个人，代表着恐怖势力的恐怖分子。塔利班是敌国？但它只是一支收藏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事实上它的“政权”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在“反恐”战争之初，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给“胜利”下的定义是：“将使美国国民不再因恐怖主义而恐惧。”这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除了在阿富汗还要对付上山打游击的塔利班残余分

子外,还有个对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网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据报导,美国政府正拉开四大洲“反恐”阵势,新一轮打击目标为:伊拉克、也门、苏丹、索马里及菲律宾、巴拉圭、乌拉圭、巴尔干国家、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2002年年初,布什提出了引起广泛争议的“邪恶轴心”,更加明确了美国的这一目标。然而,随之而来的巴以冲突白热化,多少干扰了美国的这一政治军事部署。如果还按现在这种做法,朝这个目标奔,“没完没了”的事够它不断地去忙了。美国如深深陷于“没完没了”的“反恐”泥潭之中,它将不得不重新定义美中关系, 如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的说法:“华盛顿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好战分子威胁的关注,将使对中国的担心暂时退居次要地位”①,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外交大环境。从这点考虑,中国未来的外交大环境可能要好一些,至少要好于小布什刚上台的那段时间。美国防部2001年12月的一份报告仍将中国列为“对美国国家安保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威胁”的“第二大威胁国”②。2002年3月9日,美国媒体披露的《美国核态势评估》秘密报告称:五角大楼需要准备向中国、俄罗斯等七国使用核武器。在“9·11”后不久(2001年10月17~18日),欧洲议会竟将自己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大厦借给新疆民族分裂分子举行“研讨会”。从这一点看,“9·11”还不大可能改变几百年的对抗模式,也不可能改变美国及西方的价值观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态度。

俄罗斯。苏联解体以来的10年中俄罗斯外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普京上台标志的第三阶段“新欧亚主义”的浮出,其基本点是:实用主义。“9·11”后,俄罗斯打破几个世纪的游戏规则,将中亚走廊让与美军使用, 其贴近美国的转向是其彻底的实用主义的表现。俄罗斯与印度一直关系良好,“9·11”后更趋向于好。俄罗斯近年与中国在反霸、反恐、反NMD、反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双边关系已为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体现,也在双

①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网站,2001年9月5日文:“中美关系被重新定义”。

②[台湾]中央社2001年12月5日汉城电。

方共同主导、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中得到深化。“9·11”后，俄罗斯过于贴近美国，是个新动向，它的发展及对俄中关系影响，还有待于观察、研究。

印度。近年它一直在做世界大国之梦，热衷于扩军备战，是一种迷失方向的渴望。它与俄罗斯关系最密切。俄罗斯政界的主流一直有“俄—印—中”的“普里马科夫三角”的设想，但它似乎更倾向于“印—美—俄三角”。“9·11”前后，印度支持NMD和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有在印巴冲突和克什米尔问题上得到美国的回报希望，同时还有点为此焦虑。同时也应看到：达赖集团是分裂主义，印度在克什米尔等地也面临着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在打击“三个主义”问题上中印是有共同语言的。在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的大气候下，中印两国取得进一步的谅解、合作的机遇还是有可能的。

“9·11”后，“反恐”军事打击在阿富汗如火如荼，全世界聚焦于紧贴新疆的这个我们的邻国。因此，新疆的地缘政治形势从来没有如2001年那样发生那样大的变化。

最危险的火药桶——克什米尔。如前所述，近年由于“三个主义”的横行，在新疆西南缘出现克什米尔—阿富汗—费尔干纳三个火药桶。“9·11”后，塔利班、本·拉丹的“基地”组织和以阿富汗为基地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已受到沉重打击，只有克什米尔的极端组织仍继续活动，克什米尔局势升温，已到了爆炸的临界点。

克什米尔问题是半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制造出来的难题。印巴两国独立的第二天就为争夺克什米尔开战，结果是在1949年固定下的军事控制线左右各占一部分。五十多年来这两个国家在这里大战三次，平日的冲突、磨擦始终未断。如观察家所说：“对巴基斯坦来说，克什米尔代表了它未能实现的梦想，那就是成为穆斯林的家园；对印度来说，克什米尔象征着印度政教分离的特性。在印度对克什米尔实施政治控制几十年后，克什米尔人与印度

人疏远了。克什米尔地区的许多穆斯林宁愿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愿属于印巴任何一方。”近几年，克什米尔分离运动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使这一地区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2001年12月13日克什米尔极端组织袭击印度国会，印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边界附近陈兵百万，印度仅在其控制的狭小的克什米尔地区就部署了50万大军，在长达1 800英里的印巴前线任何一个地点只要闪过一颗火星，都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军事冲突，核战争阴云密布。据估算，一旦核战发生，第一天就将有1 200万人死亡[①]。人们可以相信瓦杰帕依和穆沙拉夫本人不打核战的表示，但意外事件和误解却是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人们比较担心的是：

——恐怖主义惟恐天下不乱，一直在努力引爆克什米尔这个火药桶。舆论普遍认为，恐怖主义这只毒手在操纵着这场核危机。

——印巴中只要有一方错误地以为对方已经发动或即将发动核攻击，而决定报复或先发制人。

——印巴发生第四次常规战失控，在混战中，某位掌握核武器的战场指挥官在与大本营失去联系时可能会做出发射核弹的决定。

因此，在当前，克什米尔是一个最具危险的火药桶，新疆紧挨着这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不得不为此捏把汗。只要发生战事，特别是核战，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后塔利班”问题。实际上，美国一开战，这一问题就已被提出来。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能为阿富汗各方接受并与各国特别是与邻国友好相处的联合政府，在阿富汗实现永久和平，是善良的人们的愿望，但也可能是几十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在波恩召开的阿富汗各派代表会议达成建立新的临时政府协议，并经国民大会产生过渡政府，该政府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阿富汗各派之间、各派内部分歧是固有的。“后塔利班”的前景还不能太乐观，但

①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网站2002年5月28日。

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只要阿富汗不能恢复和平，中南亚的和平安宁就不能实现。

“前线”国家。美国军事打击塔利班以来，各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当属阿富汗周边各国，而麻烦最大的是“前线”国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

巴基斯坦一直是塔利班的盟友和主要支持者。美国宣布将对恐怖分子及其庇护者给予打击之后，巴基斯坦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巴基斯坦政府在劝说塔利班的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与美军全面合作，由此换来一定的外交和经济收获。2001年11月9日，巴基斯坦爆发百万人的反美反政府抗议游行。在美国对塔利班军事打击的一个月时间里，约4 000巴基斯坦人进入阿富汗与塔利班并肩作战。对此，穆沙拉夫总统一再呼吁：在如此危急时刻，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问题之一是，顶着国内极端势力的压力跟着美国，能走多远？问题之二是，在美国和国内的双重压力的夹缝中穆沙拉夫政权能支撑多久？问题之三是，如何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这场危机的最危险的“震中”会在巴基斯坦。2002年4月30日的全民公决结果显示，穆沙拉夫的努力似乎得到较广泛的认可。巴基斯坦现政府最困难时刻是否过去，仍需密切关注，巴基斯坦不大乱，中南亚的局势就不至于太糟。

乌兹别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不懈地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前些年还加入了具有亲西方色彩的古阿姆联盟，作为这一联盟（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等五个成员国[①]。近两年来，由于受到了以塔利班为后盾的IMU武装恐怖分子的侵袭，乌兹别克斯坦加大了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力度。这一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同时却受到西方的广泛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并与俄罗斯改善了关系。然而，“9·11”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新的选择是与美国全面合作，为美国军人和飞机等提供一个地面空军基地，这是美军在阿富汗周边所获得的

①2002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退出这一联盟。

惟一扎实的地面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因此得到的回报是,美国不再在"人权"上为难它,并在新公布的国际恐怖主义黑名单中再次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明确列入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择给人以政策摇摆不定的印象,因而受到俄罗斯和许多中亚国家的猜疑和批评。同巴基斯坦一样的问题是,乌兹别克斯坦紧跟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此外,阿富汗的邻国伊朗也是个地区大国。它曾是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当代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但二十多年的发展,它正走出极端。"9·11"后,伊朗既"反恐",又坚定地反美,敢对美国说"不",十分引人注目。

"三个主义"合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分析家认为:它的政治目标依然含糊不清。其缺陷在于,圣战是它的惟一选择,它还没有其它政治形式可以借用[①]。然而2001年5月传来的消息是:它组建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其目标定在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穆斯林聚居区新疆,实现伊斯兰化。它的这一新的政治定位非常引人注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官员以及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媒体纷纷评论说:重新命名的新运动如今将新疆和克什米尔的分裂主义分子招募其中,以便于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其目标也被认为是建立一个东起西中国,西至里海的伊斯兰国家。面对各方舆论反映强烈,一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高级领导人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②]显然,"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杂烩,以泛突厥主义整合力量,是它的一个政治选择。看来,泛突厥主义对于这一地区各种反现政府的极端势力是有较高的政治利用价值的,质言之,当代泛

①巴基斯坦学者阿赫迈德·拉什德文:"IMU的军事基地:塔维尔达拉",《中亚西亚情况反映》,24号。
②《中亚西亚情况反映》28号。

突厥主义的新动向——极端地反现政府。它也充分地体现:中亚的"三个主义"正在寻求合流。

美军进驻中南亚。此前,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集中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和西亚的海湾、小亚细亚地区。中亚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认为是自己的"后院"。近年,北约东扩的劲头很足,通过"古阿姆联盟"和"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向中亚渗透之意日显。但按常规,它要越过高加索真正在中亚落地,还不知猴年马月。此次对塔利班的"反恐"行动,给美军一步到位地进入中亚以千载难逢之机。俗话说:请神易送神难。如果美军就此长驻,那就是将其在亚洲东西两端的军事部署在中亚实现战略衔接。俄罗斯前国防部官员认为,美国为了称霸世界,企图借反恐控制欧亚大陆,目前正在实施的手段是:美在俄周围下"蟒蛇套"[①]——表明了俄罗斯方面愈来愈大的忧虑。实际上,从安全角度上看,最近的地缘政治变化可能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连旁观者都已看到:"鉴于美国在日本、韩国、印度洋以及中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空军基地都有驻军,事实上,中国的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极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现在,只有中国的北部,即俄罗斯,没有美国驻军。中国的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地大量报章对允许英美使用哈萨克斯坦东部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南部城市塔尔迪库尔干的机场的可能性展开讨论,这引起了中国的特别关注。"[②]事实上,哈萨克斯坦已原则上允许美国使用其基地用于"反恐"。毫无疑问,美军进驻中亚已成事实,新疆的地缘政治走势,复杂多变,确实不容乐观。

七、结　论

新疆的地缘政治走势至关重要,特别近代以来,愈来愈事关国家安全大局,愈来愈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进程愈来愈复杂多变。

①[俄]《议会报》2002年4月5日。
②《哈萨克快报》2002年4月11日。

下编

ZHONGYADE
DIYUAN
ZHENGZHI
WENHUA

长龄、那彦成与南疆之乱

一、问题的提出

二、张格尔之乱与长龄出山

三、那彦成善后

四、玉素普之乱与长龄再出山

五、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一、问题的提出

清道光前期，新疆伊斯兰和卓复辟势力与中亚浩罕扩张势力相勾结，在南疆制造的动乱长达10年之久，平息这场动乱，是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军机事务。大学士长龄和直隶总督那彦成分别受命扬威将军和钦差大臣，赴南疆前线平乱、善后，主持处理这一军机要务。

长龄，字懋亭，姓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生。和当时另一重臣松筠一样，长龄最初由翻译生员步入仕途，早年从征甘肃、台湾、廓尔喀。嘉庆年间参加过镇压白莲教起义，历任总兵、领队大臣、提督、巡抚。道光初年，长龄年过花甲，这时才真正走红；加太子少保，以直隶总督任内擢文华殿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平定南疆之乱后返京，更是步步高升；晋太傅，加恩在紫禁城内乘车，擢大学士之首。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享年81岁，谥文襄，入祀贤良祠、伊犁名宦祠，可谓勋高位尊，有清一代蒙古贵族中也是极为注目的。

那彦成，字绎堂，姓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曾祖阿克敦，协办大学士；祖父阿桂，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那彦成的出身门第要比长龄显赫得多。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生，比长龄小六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擢升极快。嘉庆初年，当长龄还在不显眼的总兵职上时，那彦成已荣任工部尚书兼都统，赫赫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钦差大臣总统陕西军务，时年仅35岁。但那彦成一生坎坷，他三岁而孤，是他母亲抚育成人的。在镇压白莲教、天理教起义中，他两次出任钦差大臣督军作战，杀人如麻、"战功"累累。但他宦途不顺，以"军事上不得要领"、"游词荧听，不听人言，自以为是"，多次遭贬斥，屡起屡蹶。嘉庆帝曾手诏诫之曰："汝诚柱石之

臣，有为有守，惟自恃聪明，不求谋议。”[①]他第三次出任钦差大臣是主持南疆善后，曾有一个不凡计划，起初还得道光帝欢心，但很快便遭冷遇，受命仅一年，事不成即被召回，不久南疆动乱再度爆发，诏斥“误国肇衅”，褫职，从此那彦成再没能东山再起。道光十三年(1833年)卒，时年69岁，道光帝追念其镇压白莲教、天理教有功，赐尚书衔，谥文毅。

那彦成最终虽不致身败名裂，但他最后的事业——南疆善后计划却完全失败，这与长龄的飞黄腾达、功成名就，成鲜明的对照。这一败一成，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清王朝西北边疆政策的基本轨迹，此即本文讨论的主题。

二、张格尔之乱与长龄出山

清政府统治新疆后的前期，所推行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相当谨慎。具体做法是：以吐鲁番、哈密回部伯克作为其统治的第一层次，其头目额敏和卓、玉素布不仅晋爵郡王，还被委以参赞大臣之重任轮流坐镇喀什噶尔，协助清驻扎大臣办事；以阿克苏、库车等东四城土著伯克鄂对、噶岱默特、色提巴尔第等充任喀什噶尔、叶尔羌西四城各城阿奇木伯克，作为其统治的第二层次。以西四城黑山权贵充任各级伯克，作为其统治的第三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了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基本依靠力量。清政府严厉打击的是搞叛乱的白山派——大、小和卓(波罗泥都和霍集占两兄弟)及其追随者。总的来看，清政权依靠面广泛、打击面狭小，因此在广袤的天山南路只派有少量换防兵，便能在该地保持半个多世纪的政局基本稳定[②]。

嘉庆末年南疆开始发生骚乱，到了道光初年便演变成一场大

①《清史稿》，卷367。

②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规模的动乱。在这里外部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视。19世纪初,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乌兹别克的浩罕汗国崛起,流亡中亚的白山阿帕克系和卓复辟势力与浩罕扩张势力勾结,打出"圣战"的旗号,入侵喀什噶尔、叶尔羌西四城。清朝内部主要表现在驻扎大臣的骄横和腐化。如,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胡作非为,强占民女、凌辱百姓,引起当地维吾尔民众的极大愤恨。伊犁将军松筠刚愎自用,连续办了玉努斯案、孜牙墩案、吐尔底迈玛特案等,实际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冤案、错案,大失民心。玉努斯系吐鲁番额敏和卓之孙,无端受迫害;孜牙墩系黑山头目,仅为泄私愤闹事受到严厉镇压,而布鲁特头人吐尔底迈玛特也无辜受到株连被处以极刑。所有这些在清政权依靠力量中造成猜疑、惊慌和混乱。清廷虽还没意识到这是大规模动乱前兆,但已多少感到那儿出了问题。嘉庆二十年(1815年)底,长龄受密令赴喀什噶尔调查吐尔底迈玛特案中"种种疑窦"。长龄这次调查结果《清实录》中仅有粗线条的报导,大概情况是:根据长龄的调查,清廷认定松筠办事"实属错谬",革去其太子太保并将之召回,令长龄代之。

查办松筠,并没有从根本上澄清松筠所制造的冤狱,更没有消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玉努斯被流放到伊犁;孜牙墩案内缘坐家属被发放黑龙江、吉林;吐尔底迈玛特和妻子虽被释回原牧地居住,但该部从此被裁撤,不再替补。乾隆以来清政府在南疆谨慎推行的民族政策、边疆政策遭到严重损害,因此,当大和卓波罗泥都之孙张格尔一煽动,西四城就大乱起来。

张格尔发难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始,起初只是在边境地区流窜作案,令清兵穷于应付,西四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道光五年(1825年)夏,清朝的二品大员巴彦巴图竟在乱中殁于那林山区的都伯尔津(今吉尔吉斯斯坦Дюрбельджи),朝野为之震惊。此事很快便查清:这位清朝将军仅领二百余官兵,孤军远出卡伦搜索张格尔,可张格尔早已逃离,于是将当地牧民当作"匪徒"乱砍滥杀,

以报功求赏。但被杀者竟是布鲁特头人汰劣克及属下的家口，因之激起整个部落的愤恨和反抗。巴彦巴图等被围在大山中力战不敌自刎。噩耗传至北京，道光帝痛心疾首："以我堂堂大清，屡锉锐于小丑，成何事体？"遂调伊犁、乌鲁木齐兵增援喀什噶尔，令伊犁将军庆祥改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擒捕张格尔，以大学士长龄署伊犁将军[1]。

道光六年(1826年)初，长龄抵达新疆，便有奏报："此次庆祥所调伊犁、乌鲁木齐及各路换防兵，共有四五千名，均系未经军旅之师，带兵又无得力之员，不识纪律。如必须进兵，尚经妥为斟酌，不可轻举妄动。"长龄熟悉军事，他的意见是谨慎的。道光帝也认为此议"自系老成持重之见"，训令庆祥"一切事宜与长龄札商，不可冒昧轻进"[2]。

但是西四城局势继续恶化；一是巴彦巴图滥杀无辜，把大批布鲁特牧民推到张格尔一边；二是浩罕扩张势力试图插足于喀什噶尔谋取非分要求，遭到清当局断然拒绝，于是变本加厉地鼓动张格尔闹事。但清当局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它根本不相信浩罕敢于与"天朝"对抗。一位驻扎大臣在奏折中写道："该伯克慑乎大国，故亟以得通天朝为护符。是该伯克所赖天朝甚重，且贪厚赏，自不敢不恭顺。"[3]至于张格尔，已"穷蹙已极"，更没放在眼中。道光六年(1826年)夏，张格尔的帮凶奇比勒迪等被击毙、擒获的消息传来，道光帝正在欢庆："张格尔等自更闻风丧胆"[4]，张格尔匪帮开始大举入侵。随后，浩罕迈买底里汗领浩罕五千兵来助战，西四城局势急转直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诸城很快陷于张格尔—浩罕联军的重重围攻之下。长龄急报："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

①《清宣宗实录》，卷91，44页下；《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7，12~13页。
②《清宣宗实录》，卷94，32页。
③《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4，5页。
④《清宣宗实录》，卷99，10~12页。

动,断非伊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服。惟有速发大兵四万,以万五千分护粮台,以二万五千进战。"①

不久,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相继沦陷,驻扎大臣庆祥等殉难,张格尔匪军则横行西四城,其先头部队逼近阿克苏、乌什城下,整个天山南路都处于危急之中。

道光帝接到这一连串的紧急奏报才真正着急起来。是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军机处一道道檄令,调动伊犁、乌鲁木齐兵、甘州兵、陕甘兵、宁夏兵、四川兵、西宁兵、吉林、黑龙江兵共3.6万余,开赴南疆前线,授长龄扬威将军为西征军统帅,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参赞军务。道光帝特颁手书寄谕长龄:"痛加剿洗,令其心胆皆惊,望风披靡",并说:"尔将军等皆朕亲信大臣,万里之外,朕亦不为遥制……朕日日默祝上苍,翘首西望也。"②长龄督大军云集阿克苏时,已是寒冬时节,又接到道光帝的一道感情外露的谕旨:"边外天气沍寒,朕心实深廑念,特赏长龄黄里貂尾马褂一件。"③作为全军统帅的长龄当然不致缺衣少穿而受寒遭冻,但皇上的莫大恩典必然会给这位大将军临战士气以极大鼓舞。

道光七年(1827年)一开春,长龄便亲自指挥满汉精锐官兵2万余,分前后两军由阿克苏开拔。清大军迅猛推进,势如破竹,一周之内与张格尔—浩罕联军会战于洋阿巴特庄、沙布都尔庄、阿瓦巴特庄,在清军凌厉攻势下张格尔—浩罕联军土崩瓦解。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在沦陷半年后相继光复。长龄又移师帕米尔、阿赖山区搜捕张格尔大半年之久,终于在道光七年底将张格尔擒获。生擒张格尔的"红旗捷报"以八百里加急驰报北京。道光正为久久未获元凶张格尔心急如焚,得获捷报喜出望外,当即加恩赐

①魏源:《圣武记》,卷4。
②《清宣宗实录》,卷102,22~25页。
③同上书,卷109,23~24页。

长龄二等威勇公爵，授御前大臣，赏宝石顶、紫缰、乃至小荷包等[1]。数月后，长龄押张格尔还京献俘，在城郊受到亲王大臣的盛大欢迎。道光帝在正大光明殿召见并赐凯旋宴，晋长龄太保、赐三眼花翎，图形紫光阁。有论曰："恩礼优渥，并用乾隆朝事，时称盛焉。"[2]

此时长龄的表现当然是诚惶诚恐、感激涕零，但心情恐怕是极复杂的。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张格尔漏网时道光帝是如何疾言厉色，北京发来的一道道诏书、谕旨除了叱责就是训斥，震耳欲聋。为捕捉张格尔，他督军在大山中来回搜索疲于奔命，竟一时束手无策。怒不可遏的道光帝终于下旨："长龄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只是还找不到可替换人选[3]，于是将他革职留任。然而最让他感到棘手的是善后问题，长龄曾提出两点善后计划：

1. 驻扎大臣撤出西四城，参赞大臣移至阿克苏，在西四城等地留防八千重兵。

2. 将乾隆年间羁留北京的阿布都哈里"放归，总辖西四城"[4]。

就是说，在西四城部署重兵的同时，撤出军府统治机构，将西四城行政管辖权让与白山和卓家族。阿布都哈里是大和卓波罗泥都的幼子，张格尔的亲叔，当年被羁押北京时还是不懂事的幼儿。长龄的计划无非是利用这位被羁押60余年的龙钟老人来对付亡命境外的和卓复辟势力。但这个计划一旦实施，不仅抛弃了与清政权互为依赖的黑山派，而且事实上将放弃对西四城的直接统治，从根本上变更清朝在南疆建立的政体。这一计划遭到道光帝的痛斥："长龄老悖糊涂，一至于此……为今之计，总当遵奉旨，将西四城照旧章办理"[5]。道光帝甚至派人秘密查访他是否刚愎自用。后来，道

①《清宣宗实录》，卷132，20页。
②《清史稿》，卷367。
③《清宣宗实录》，卷124，17页。
④魏源：《圣武记》，卷4。
⑤《清宣宗实录》，卷123，14~16页。

光帝终于物色到可替换长龄之人，那就是直隶总督那彦成，也算长龄运气好，在那彦成已启程但尚未抵达的最后时刻抓获了张格尔。他终于可以凯旋了，且善后的难题自有那彦成去伤脑筋。

三、那彦成善后

早在张格尔作乱伊始，那彦成就条议善后之要："首先剿洗白帽回子，已从逆者童稚不留；未从逆者，按户迁徙云贵闽广各州县安插。"[1]如此剧烈的镇压手段在道光帝看来也是"窒碍难行"，但那彦成的强硬立场显然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道光一再要求长龄"悉心斟酌，能于八千之中再省二三千更好"，终无结果[2]。但那彦成认为长龄的留防八千兵计划应"量为减裁"，他提出只要留防六千五百"足资镇抚"，而且三年后酌减二千，五年后再减二千[3]，这要比长龄的计划节俭得多，因此很快受到宠幸。

那彦成受命钦差大臣于道光七年(1827年)十一月下旬由直隶总督府保定出发，兼程前进，及至关外安西境，适逢生擒张格尔的"红旗捷报"传达。那彦成感到新疆方面已无事可做，上奏请求:是否就此折回。但道光帝以那彦成替换长龄的决心已下，遂下令那彦成仍著驰赴喀什噶尔，并擢升那彦成次子容照为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以示对那彦成的信任和期望。那彦成当然感恩戴德，立即星夜兼程赶赴喀什噶尔。

那彦成于道光八年(1828年)四月下旬抵达喀什噶尔。时浩罕来使为擒获张格尔贺喜。那彦成传谕浩罕使节，语气极为严厉:"天朝威武，从前所灭各国尔等皆知，此次生擒张逆，又何足道喜？尔等部落，弹丸之地，在中国仅一州一县之大。大皇帝如果兴师问罪

①《清宣宗实录》，卷104，15~17页。
②同上书，卷125，12~14页。
③《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55，12~16页。

……又费兵力几何？"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勒令交出张格尔家属。那彦成一反传统礼仪，拒见其使，亦无筵宴赏赉，将其打发回去。道光帝极为赞许，批曰："深得大体，与朕意相同，可嘉之至。"①

那彦成到任后，其奏章如雪片飞往北京，内容大致有安内策和对外策两类。

安内策的中心内容是整顿吏治，那彦成认为："由于回疆大小官员图利剥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以致酿成巨案。"②其对策是：(1)严革各城积弊，在驻扎大臣中建立考核制度，并增其廉俸，许其携眷，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2)严革贿补伯克之弊，定其资格，慎其保举，制其回避，废除克列克里克（摊派）和色里克（续派）之类苛敛。道光帝满口赞同曰："收抚回众人心，是抚绥得人，此为最好。"③那彦成确实看到当时新疆吏治败坏之处，所提出的这些措施理论上有积极意义，但陈规陋习、种种弊端积重难返，实际上没能也不可能得到认真实施。

此外那彦成还提出修建城垣、整饬卡卫、完善卡伦建制，但终因经费拙缺，那彦成也只是在草肥马壮时安排些演习行围，在裁撤驻军上比较积极，而在军事布防上却没认真做多少工作，边防防御能力并没有得到加强。

那彦成的对外策主要对象是浩罕，大致有三：

1. 断绝浩罕贸易。那彦成认为："窃查内地茶叶、大黄、磁器、绸缎等项，为外夷所必需。前因安集延等助逆滋事种种不法，已奉旨严禁卡伦断绝贸易在案……霍罕震慑天威，其势不能不款关、恭顺，求通贸易。"④为了使此禁令不致有名无实，那彦成的办法是：(1)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下简称"档案"）：《那彦成等奏浩罕遣使祝贺逆回就擒未经传见折》。

②《那文毅公奏议》，卷78，6页。

③《那文毅公奏议》，卷78，6页。

④《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在喀什噶尔城西90里明约洛地方建贸易亭子，把对外贸易置于军事监督之下[①]；(2)严密控制对布鲁特贸易，他下令布鲁特购茶不得超过1斤，防止浩罕通过布鲁特搞转手贸易[②]。

2. 驱逐浩罕商人。浩罕商人即清史料中所谓的"安集延人"，自18世纪中叶起就大批流入新疆各地，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浩罕商人长期住下安家置产。那彦成认为，张格尔亦由于安集延人之内外串通遂敢猖狂，还须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否则无以善其后。道光帝考虑到此类人数较多，相沿已久，若办理不善恐激成事端，让那彦成谨慎行事。为此，那彦成决定将流寓当地10年以内的安集延人先行驱逐出境，没收其财产，其余的编入回户，当差种地严加管束。然后每年再驱逐一批，数年后驱逐净尽。道光赞曰："数年后果能驱逐一空，岂非安边之良策。"[③]

3. 开放对布噶尔等部贸易，收抚各布鲁特以全面孤立浩罕。那彦成也意识到，不可因禁绝贸易株连他部而树敌过多，他密令阿奇木伯克伊萨克潜赴布噶尔部(布哈拉汗国)传谕："此时严禁茶黄，专不准浩罕贸易，与尔部落无干，尔部落愿来者在所不禁。"[④]不久，便有布噶尔商队绕道喀拉提锦、达尔瓦斯、巴达克山来喀什噶尔贸易。那彦成为"宣布威德"破例传见了这些商人，事后那彦成在奏折上写道："布噶尔地方殷富，人亦稍强，向来为浩罕所畏……今求皇上施恩，准令该夷由巴达克山行走，该夷深感皇恩，从此浩罕自生疑惧……其势愈孤，实为边防要务。"道光览此奏章批曰："甚好，此议甚是。"[⑤]

那彦成在总结张格尔之乱的教训时认识到："是张逆之变，实

①《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②《清宣宗实录》，卷154，92~94页。
③《那文毅公奏议》，卷80，83页。
④《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⑤《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由于失布鲁特之心，自坏藩篱。"因此他提出，处理善后"惟收服布鲁特为第一要事"[①]。那彦成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喀什噶尔时，卡外布鲁特部来人迎谒请安，那彦成优加赏犒，并明白宣谕："自前任大臣办案错误，妄杀吐尔底迈玛特，嗣又误杀汰劣克家口，以致尔部落心存离衅。大皇帝如天之仁，如日之明，深知尔部落之受屈，已将前任各予惩处。此时张格尔业已生擒，皇恩浩荡，即阿坦台、汰劣克似亦可悬恩宽宥。"[②]

这里，那彦成以钦差大臣身份代表清政府公开作自我批评，并对汰劣克等人表示宽宥，显然是希望以此调整好与布鲁特人的关系，以全力对付浩罕。为此，那彦成做了几件事：(1)收抚畏罪逃亡的布鲁特人；(2)招抚附从浩罕的布鲁特额德格纳部；(3)收纳达尔瓦斯部。那彦成这一系列措施立即产生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内，卡内外18部布鲁特全部归顺。达尔瓦斯部使人甚至表示："天朝如果动兵……我们伯克情愿带领全部人马出力"[③]，那彦成则根据劳绩、资格将布鲁特18部43头人酌定二品至五品顶翎，并高兴地奏报："各外夷无不欢欣顶戴沐浴皇仁，自此布鲁特与浩罕互相携贰，消息亦通，我边疆可以休息。"[④]做了这些事后，那彦成如吃了定心丸，他在一份奏折中写道："照如此办理，可永除边患。"[⑤]那彦成的目的是要浩罕完全低头称臣，"以后应照属国体制称大皇帝，该伯克称奴才"[⑥]。起初，道光帝对那彦成所议极为赞许，满口称道："所议甚是"，"所见远大"，但对他收抚布鲁特的计划颇为不安。在那彦成招致额德格纳部的奏折上批曰："然受降易，抚降难。卿自知之务使其安心效顺，永作藩篱，稍有不妥，必成后顾之虑，慎勿视之易易。"[⑦]

①《那文毅公奏议》，卷73，30页，卷80，14页。
②同上书，卷80，1~2页。
③《那毅公奏议》，卷80，25~30页。
④同上书，卷80，18~23页。
⑤同上书，卷80，43~52页。
⑥同上书，卷80，43~52页。
⑦《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而对那彦成收纳达尔瓦斯的做法，道光帝就很有些不满："欲将该部招致收服，以为钤制霍罕之计，实属不成政体"，"殊不成话"[①]。后来就愈来愈显得不耐烦："前经屡谕及此，该督何以总未领会，岂非必欲邀功转生出许多枝节？览奏徒增烦懑！"[②]道光帝断然拒绝了那彦成为布鲁特18部43头人戴翎顶之请，理由是："国家无此政体。"[③]当他得知那彦成派人到浩罕索取张格尔之子布鲁特时，真正地被激怒了，因谕曰："善后既妥，浩罕之茶黄既断，卿无事矣。为何必欲邀功生出许多情节，如何了结，反令朕又生西顾之忧，烦懑之至。"[④]

那彦成无疑地自认为竭尽忠心报效朝廷的，但道光帝对他的忠心已打下大大的问号。在道光帝看来，那彦成有私心，否则怎么会多事、好事，想必是以此邀功请赏。道光九年(1829年)正月道光帝下令那彦成接旨后即速启程[⑤]，那彦成在南疆的善后使命就此告止。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彦成善后策是不成功的。首先，断贸易，禁茶叶、大黄的对策，貌似强硬，实际上相当消极。历史上中央王朝西北边政不外两种办法：或如武帝之振威以勤贰师之兵，或效光武之闭关以绝西域之贡。每当王朝衰落之时，便采用闭关绝贡的消极方针。明人陈九畴就振振有词道："彼绝贡路，彩缎不去，则彼无华衣；铁锅不去，则彼无美食；大黄不去，则人畜受暑热之灾；麝香不去，则床榻盘虫蛇之害……吾持有益之柄，而彼蒙受害之实。"[⑥]那彦成的思路也是如此，他认为，以此可坐等对方自毙，从而达到不战胜之的效果。这种估计是以浩罕"专以贸易为生"的判断为前提的。其实这一判断是根本脱离实际的，贸易确实在浩罕社会经济上占有

---

①《清宣宗实录》，卷151，33~35页。
②《那文毅公奏议》，卷80，13~14页。
③《清宣宗实录》，卷151，4~5页。
④《那文毅公奏议》，卷79，35~36页。
⑤《那文毅公奏议》、卷150，11~12页。
⑥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19页。

重要地位,但还不是它的经济命脉。浩罕如无中国的茶叶、大黄固然日子不大好过,但也决不是"狠过不下去"。因此,切断贸易对浩罕经济是个沉重打击,但并不能使之就范。浩罕没有请降,也不悔罪,反而另有对策。当时清政府对卡外除浩罕外的各部仍开放贸易,由此商品西运出现了南北两条贸易线,即:

喀什噶尔、叶尔羌—帕米尔—巴达克山、喀拉提锦。

伊犁—伊塞克湖—吹、塔拉斯。

浩罕则出兵南攻帕米尔,北犯吹、塔拉斯,以阻截这两条贸易线。清政府明知浩罕人侵其领地,但基本立场是:"以镇静为本","未便深事苛察,致启疑惧"①,麻木、消极的态度事实上在纵容、鼓励入侵者。总之,以脱离实际为前提的消极对策,失败是难免的。

其次,驱逐浩罕商人的做法,对参予动乱的与安静守法的浩罕商人,不加区别的一律驱逐打击,在策略上是极不明智的;在具体实施中,一些布噶尔、巴达克山商人也无辜受到株连,结果是"本为靖内之谋,转添附外之翼",这是那彦成始料不及的。

再次,收抚布鲁特计划,是那彦成对外策略中的积极措施。但得不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他的计划无法推行实现。那彦成毕竟也是位封建大官僚,在他的思想深处无法摆脱将少数民族视为"犬羊"的偏见,也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团结他们。因此,当他的收抚计划遭到清帝的坚决否决时,他没有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计划。

总的来看,那彦成善后计划中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因素,在具体推行过程中积极因素受到限制或扼杀,而消极因素却蔓延发展着。失败结果可想而知。那彦成离开新疆仅一年,浩罕再次大举人侵,南疆动乱再起,就是明证。

---

①《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四、玉素普之乱与长龄再出山

道光十年(1830年)秋冬之际，浩罕封建主纠集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入侵西四城，南疆又陷于动乱之中。清政府对此在精神上和军事上都是毫无准备。道光八年(1828年)春，长龄曾欣喜奏报："张逆就获之后，人心大定，且冬春屡沾雪泽，麦苗现俱出土，东作方兴，及时耕种，洵属太平景象，可冀丰收。"①次年春，那彦成胸有成竹地报告："浩罕生计日蹙，不久即叩关效顺。"②那彦成去职后，主持南疆军政的参赞大臣札隆阿更是狂妄轻敌。其实，至道光十年夏秋之际，浩罕秣马厉兵，跃跃欲试，战事已迫在眉睫，阿奇木伯克伊萨克一次次密报卡外"贼警"。伊犁将军玉麟也通报了境外动荡局势，要求札隆阿采取紧急防卫措施，可札隆阿皆不信，反指责玉麟"词涉张皇"，且奏到："南路如果有事，唯臣是问。"③

道光十年八月初，浩罕在清守军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偷袭进卡，清帮办大臣塔斯哈迎战阵亡，浩罕大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并很快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回城，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城团团围住。清廷仓促应付，又一次征调伊犁、乌鲁木齐兵、土尔扈特兵、四川兵、陕甘兵、吉林、黑龙江兵各路援军近4万余。长龄再次出任扬威将军兼钦差大臣，由北京启程赶赴南疆督办军务，11月中，清增援大军先锋开抵喀什噶尔城下，围城的浩罕入侵军早在5天前闻风逃窜，此时杨芳、胡超等率领的大部队尚在途中。归根结底，这是一场打了就跑的大规模骚扰。

那彦成慷慨激昂，重陈西陲军务7条，其要点是：对从逆者和胁从者痛加剿杀，从严查办，对布鲁特有劳绩恭顺出力者优加赏赉，俾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密谕各回庄将各贼目逐一缚献；大黄、茶

---

①《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②《那文毅公奏议》，卷79，6页。
③魏源：《圣武记》，卷4；《清宣宗实录》，卷171，18页。

叶仍须严禁出卡以控外夷；参赞大臣退守阿克苏之议万万不可行等。道光帝览后留中未发[1]。其实，道光帝在南疆善后和对浩罕政策上并没有始终如一的立场。当初他任用那彦成处理善后事务，就是指望用闭关绝贡、断贸易手段镇慑浩罕。但浩罕非但没有就范，反而以兵戎相见，可刚从万里之外调来大军，他又闻风逃逸。为此道光帝恼怒、忧愤，同时又不免气馁、沮丧。伊犁将军玉麟提议，再调兵2万，由伊犁出卡塔什坦(塔什干)、吹、塔拉斯，与南路同时夹击进剿浩罕。道光帝在列举了粮饷兵饷、后路接续、台站安设等一大堆困难后认为："此乃攻心之计，然可言而不可行"[2]，否定了这个建议。

此时道光帝把希望寄托在长龄身上，要求他拿出一个万全之策。长龄抵达阿克苏后，便有奏报："喀什噶尔城围之时，有安集延多人环跪城外，称向在卡内多年，未随张格尔造反，前年怎将茶叶、大黄全行入官，并未给价，妻子不得见面，田产也没有，屡次遣人要求通贸易，俱未允准……"

因此长龄断言："此次起衅，系因上届办理善后，驱逐安集延，查抄家产，断了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3]

平心而论，长龄此议并不公正。当时确有失魄商人参与了入侵活动，但他们在浩罕入侵军中人数有限，所起作用也不会很大，长龄非难"上届办理善后"，恐怕还是耿耿于自己失宠的那段往事。这时札隆阿与长龄为伊萨克案发生龃龉，长龄一怒之下拂袖而走。伊萨克是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出身东四城伯克世家，曾率领当地维吾尔民众抗击浩罕，出力甚大，为浩罕所忌恨。浩罕设反间计，散布流言说伊萨克是其内应。札隆阿信以为真将伊萨克拿办并任属下滥杀维吾尔民众。伊萨克向为清廷信用，此事突发，连道光帝都觉

①《那文毅公奏议》，卷80，96~102页。
②《清宣宗实录》，卷174，15~16页。
③档案：《长龄查明浩罕、安集延人卡滋事启衅根由折》。

得蹊跷，下令长龄查访。长龄奉旨调查，札隆阿公然抗令，还串通一伙人搞伪证，甚至想杀人灭迹。长龄请将札隆阿撤职查办，道光帝当即谕准。但长龄未等道光谕旨到达，已撂下新疆军务，径自启程进京，让朝廷另请高明。长龄一走，喀什噶尔前方群龙无首，急报朝廷，请派大员赴喀什噶尔筹办一切。道光帝要求长龄"无论行抵何处，即已进关，必须迅速折回"[①]，长龄跑到肃州才停下，说是"旧疾复发，暂行在彼调养"。长龄此举连道光帝也奈何不得，对他惟有言听计从。长龄指控上届善后办理不善，道光帝即降旨革去那彦成太子太保衔，交部严加议处[②]。尽管当初那彦成大展宏图时得到道光帝的满口赞叹，但现在既然要追查责任，那彦成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但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南疆善后的形势更加严峻，因为此时启衅的祸首是边外一"桀骜不驯"的"外夷"，他还不断扬言：待马肥麦熟再来滋事。不久，长龄病愈并从肃州折回，道光帝闻知才稍稍宽慰。长龄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底进抵喀什噶尔，受到新任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率领2万维吾尔民众数十里夹道欢迎，盛况空前，整个气氛与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张格尔后的景况迥异。长龄感触甚深，为之动容，他在奏折中报告，当地维吾尔民众"畏贼骚扰，助顺守御"，"专盼大兵到来"，因此对善后有些信心了。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善后的难点在于："我兵未至贼先逃，兵久驻而贼无一获"，会同玉麟精心策划，提出"固守"与"嫥和"两点善后计划。

首先是扼要处重兵固守。具体部署是：叶尔羌6 000人，喀什噶尔、巴尔楚克各3 000人，英吉沙尔1 500人，和阗500人。移参赞大臣于叶尔羌，距喀城不远不近，适中扼要；于巴尔楚克设总兵，作为西四城、东四城联络；并于各省绿营兵额中裁撤百分之二，省出银

---

①《清宣宗实录》，卷184，30~31页。

②同上，12~13页。

30万两作为南疆添兵添官军费粮饷支出[1]。从纯军事角度来看,这是较完美的方案,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城成一小犄角,而喀什噶尔、叶尔羌、巴尔楚克三重镇又成一大犄角,是为大犄角套小犄角。这连环套犄角又通过巴尔楚克与阿克苏东四城相呼应、联结,自成一背靠东四城的以参赞大臣驻地叶尔羌为核心的完备防御体系。长龄作为两次平定南疆动乱的军事统帅,设计出这一方案也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的。在这一点上,长龄无疑要比军事上漫无布置的那彦成棋高一筹。惨痛的经验教训也迫使清朝军政当局必须认真对付浩罕在军事上的挑战。长龄这一方案的优点在于:一旦浩罕再犯,这个防御体系本身就可应付,一般不必依赖千里、万里之外增调援兵。问题是驻兵规模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按此计划,清兵分驻喀、英、叶和四城达1.1万,加上巴尔楚克的共1.4万,这个数字将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两倍,道光五年(1825年)的5倍,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7倍,是个空前庞大的驻兵方案,如下表:

	1777年	1825年	1829年	长龄方案
喀什噶尔	679	1250	4900余	3000
英吉沙尔	280	280	480	1500
叶尔羌	890	880	1400余	6000
和阗	232	230	230	500
巴尔楚克	无	无	无	3000
总计	2081	2640	7000余	14000

①档案:《长龄等奏为会筹善后事宜权衡大局折》。

道光对如此大规模的增兵要求极为不满，在谕旨中写道："溯查乾隆年间……六十余年,久安长治,从未议及增兵。如果必须添兵以壮声威,当日诸臣早经议及,何待今日。且从古以来,未见有竭尽内地之兵力堵御四夷,而又能行之久远者",但又不好开罪长龄,只得"勉从所请"[①]。不久,有关方面报告,于各省绿营兵裁撤百分之二所得经费,仅有18万余两,不是长龄估算的30万两[②]。这样长龄的增兵方案将因经费拮据而落空。道光帝认为必须再开导长龄一番,谕曰:"该将军等只顾眼前,不思远图。欲添兵不能不添粮,添粮不能不采买,采买不能不扰累,回众寒心势将沟通霍罕,更难办理,终必自朕所云,内外交困而后已",他敦促长龄缩减驻兵人数,将总数控制在8 000[③]。长龄不愿接受,力辩道:"今既不战而守,必须壮我声威,严我边备,贼再来即加歼剿,无庸内地征调,贼知惧则随宜酌撤,以图渐复旧规。"长龄只是稍稍调整布兵方案,减兵2 500,但仍坚持驻兵万余名,道光帝只得同意。长龄可能早估计到在增兵问题上迟早要与皇上发生争执,当初他借伊萨克案大闹情绪,不一定仅仅发泄怨气而已，或许就是为有朝一日与道光帝讨价还价争取有利地位。如果长龄用心于此,那也是达到目的了。

其次是媾和。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浩罕使者密孜依斯等3人到喀什噶尔乞和求通商。长龄传谕浩罕使者,指名要将滋事的贼目献出,然后尚可议及通商事[④]。这里长龄注意到两点:一是索要贼目以绝后患,二是具体交涉由维吾尔族伯克出面,以维护"天朝"尊严。浩罕使者表示要回复其汗方可定夺。长龄派五品伯克迈买热依木、依山阿吉等人偕同其使前往浩罕。但到了浩罕后遇见麻烦。浩罕明巴什十分蛮横,将清使依山阿吉扣下为质,让迈买热依木回

---

①《清宣宗实录》,卷179,17~18页。

②同上书,卷199,27~28页。

③同上书,卷201,20~23页。

④《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

来传话："如果不要人（贼目），准我们通商，大家和好。"[1]这样长龄就面临一大难题：既为浩罕无礼而恼怒，但又不宜发兵问罪；既想接受浩罕要求，又不知能否得到清廷批准。但这也没难倒长龄，他的计策是同时办两件事。

一是上奏朝廷曰：浩罕怙恶不悛，夜郎自大，实在可恶，如选精兵四五万，分路征讨，可直捣浩罕巢穴，但一出卡外，主客之形既异，劳逸之势殊，山高路险，不值宿师远涉。建议寄信谕知该伯克，不献贼目断不可通商，责以大义，严词峻拒以崇国体[2]。

二是授意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修信一封给浩罕。信曰：回经上不得把本教中的人送与外人，我是知道的；自禁贸易后你们属下人的苦处，我也知道。如今中堂大人已答应代你们奏请通买卖。建议：赶紧再差人前来恳求，如果大皇帝施恩准你们通买卖，就是你们的造化[3]。

乍看这两份文书基调差别很大，但实际作用是异曲同工。对皇上侃侃而谈：战，自是理直气壮；不战，亦是名正言顺。所建议的"寄信谕知"，这仅是一种姿态。对浩罕：没有恐吓、詈词，语调是平缓、宽容、谅解的，发的信息是明确的——再来恳求"天恩"，可如愿以偿。看来，长龄不仅是位战将，还是位熟谙官场和外交的政治家。

殊不知，道光帝为摆脱"重兵久戍、去留两难"的困境，议和之心早已迫不及待，并已连下两谕旨，指示：如果浩罕悔罪投诚，许其通商，茶叶、大黄俱在不禁，并可免其货税，面缚献贼目竟可置之不问，以示大方[4]。接到长龄奏折后又下一道谕旨，训斥："该将军沾沾要人，堂堂天朝转为霍罕牵制，岂不为外夷所揣摩"，并让转告，当

①档案：《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长龄折》。
②同上。
③同上。
④《清宣宗实录》，卷197，17~20页；卷199，17~18页。

年那彦成抄没安集延商人财产亦可发还[①],一心媾和了事。长龄接此谕旨,又让作霍尔敦再修一信,曰:"业经奉到谕旨,蒙大皇帝怜念你们人穷苦,仍准照旧人卡做买卖,并免你们货物纳税,连茶叶、大黄都不禁止。中堂将军、参赞大人叫我给信告诉你,这是大皇帝格外天恩,实在是你们浩罕所有人的造化……你可即速差人前来谢恩。"[②]长龄还把这信译抄给清廷,表明当时也没"沾沾要人",让道光帝尽管放心。

不久,浩罕使者再次来到喀什噶尔,提出媾和的四项先决条件:(1)通商免税;(2)派设商头;(3)讨还田产、茶叶;(4)释回从前喀什噶尔等城发遣回犯。尽管浩罕方面在条件上又加码,但长龄对媾和已胸中有数,他即向清廷报告:浩罕所求四事"尚非窒碍难行",不妨允准[③]。道光十二年(1832年)三月,清廷颁谕:"浩罕伯克遣夷目所求四事,尚属可行",批准了长龄的媾和计划,并随即下旨:"长龄现在善后事宜已竣,著起程回京。"[④]浩罕方面的所有要求均得到满足,又不承担任何义务,当然十分满意。其使者来,表呈"高福高寿管万民的大皇帝":"为此秉心抱经发誓,惟有永远恭顺,常念天朝恩典。"[⑤]此时,在喀什噶尔军营中接受浩罕使者"悔罪投诚","叩头感激"的是参赞大臣哈朗阿,扬威将军长龄已踏上返京的道路。毫无疑问,媾和是在清朝方面全面妥协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清廷看来,付出一些代价,由此安定南疆,又在形式上保住"天朝"尊严,是值得的。

---

①《清宣宗实录》,卷201,16~17页。
②档案:《道光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长龄折》。
③档案:外交卷,军机录副,656卷,4号。
④《清宣宗实录》,卷207,26~27页。
⑤档案:外交类,军机录副,656卷,7号。

五、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长龄和那彦成都是在乾隆后期步入仕途的，其主要政治生涯却是在嘉庆和道光前期度过的。乾隆帝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尤其乾隆前期的励精图治，使清王朝统治进入盛世。乾隆初年，每年国家收入常达3 000万两，国库贮存逾七八千万两。但乾隆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耗资甚巨，加之吏治每况愈下，贪污腐化成风，到了嘉庆帝即位时，已是国库告罄，民穷财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是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官吏办事的准则，讲求兴利除弊只能被认为是无事生非、邀功请赏。这正是龚自珍抨击的"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时代。耳濡目染，长龄对此早有深切体会。嘉庆二十年(1815年)，长龄还在伊犁参赞大臣任上时，曾提议并试办都兰哈拉铅厂，据称每年可得税银1万余两，于经费能有所节省。但立即遭到清廷训斥："新疆地方总以镇静为本，不宜轻易更张"，至于那点税银实为蝇头小利，还可能滋生事端，该厂当永远封闭[①]。一年后，长龄首次出任伊犁将军，嘉庆帝又是一番谆谆告诫："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长讨好之念。"[②]

道光十年(1830年)，浩罕入侵南疆，有人上疏：调重兵分路夹击进剿以"永除边患"，但道光帝却以卡外非"吾土"、"吾人"，无可奈何地拒绝疏请。实际上，国力衰败，力不从心，此时的大清皇帝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那样踌躇满志、叱咤风云了。仅道光六年平张格尔一役，用兵3.6万有奇，用帑银千余万两。道光十年，清虽然击退了浩罕的入侵，但为了对付浩罕威胁不得不在南疆部署重兵。一份报告披露了南疆常年军费剧增的事实：

---

①《清仁宗实录》，卷305，7页。

②同上书，卷319，22页。

道光八年(1828年)前,岁需77 931两。

道光八年后,岁需315 332两,超支238 301两。

道光十一年(1831年),岁需402 362两,超支324 431两[①]。

日益空虚的国库确实无力承担这一沉重军费压力,道光帝的“苦心”和窘境倒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应如何认识道光帝所谓的“卡外”非“吾土”、“吾人”之论。这里我们不妨引证魏源的一段议论:“方王师戡定准、回,已拓版图周二万余里,岂尚有贡译于声教不通之区,臣妾于葱岭以西之部?而天时人事,辗转辐辏,若有意,若无意,不鞭箠而就我衔勒,不招致而附我藩墉。”[②]

“声教不通”说白了就是不知礼义之邦,不读圣贤之人,即“非吾土”,“非吾人”。清统治者是以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其边政同历代王朝最大区别是:不修长城,而以“化外”诸部藩属为拱卫边疆的屏障。当年,清统一新疆时,乾隆帝颁谕哈萨克、布鲁特:“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只要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可照旧安居,不易服色,本朝也不授官爵、不责贡赋,遣使来请安,即加恩赏赉[③]。清统一新疆后,在伊犁驻有重兵控制北路,总统新疆;由于南路三面环宇崇山峻岭,清政府只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乌什各城镇不远入山口隘遍设卡伦,护卫城镇、监守交通,掌管游牧,并每年派有换防兵出伊犁,经特穆尔淖尔、那林赴喀什噶尔兼承担巡边使命。总之,清政府就是通过设置卡伦及卡外巡边羁縻游牧的布鲁特、哈萨克,以行使新疆西部疆界的管辖。起初,清政府对卡伦以外的事尚能认真处理。时有浩罕商人来报被劫事,清政府还查缉严惩,但后来对此愈来愈不耐烦,在清朝方面看来,浩罕商人愚弄布鲁特,间有被劫一面之词,是非曲直难以断

---

①《清宣宗实录》,卷230,23~26页。

②《圣武记》,卷4。

③《清高宗实录》,卷543,13页;卷555,33~34页。

定，干脆晓谕浩罕："凡卡伦内者为之管理，卡伦以外不应管理。"[①]既然清朝对卡伦外大片疆土疏于管理，日益强大起来的浩罕则积极向这一地区渗透、入侵，随着清朝走向衰败，其边防武备日益松弛，嘉庆初年便基本上停止卡伦外的巡边活动。道光年间，张格尔匪徒勾结浩罕在卡外横行，而清廷再三谕令驻扎大臣："可守则守，可战则战，断不许轻出卡邀功。"[②]这时清廷对边务事宜最关心的不外两件事：一是不要"滋生事端"，二是不要让"外夷窃笑"。前者取决于疆吏抚驭是否得当，特别要杜绝疆吏邀功生事；后者关系到"天朝"尊严，除此而外，什么事都是细枝末叶。

那彦成能发现当时南疆积弊和疆吏抚驭失宜问题，并试图兴利除弊，但终究被认为是"邀功多事"而失宠，后又以肇事启衅罪名被查办，最后以悲剧告终。长龄在两次西征平乱中指挥若定，善后部署驻兵有章有法，颇有军事才能。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老成持重，周旋于官场和外交有条不紊、左右逢源，故此获得成功。有论曰："回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难。长龄持重于始，老成之谋。那彦成力祛积弊，善矣，而操切肇衅，未竟厥功"[③]，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彦成善后计划似有可取之处，但要害是不切合实际，它的失败本质上是与衰败中的清边疆政策相联系的。长龄的成功，只能使南疆获得暂时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清政府治边的成功，他主持的与浩罕媾和，是建立在全面妥协的基础上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长龄、那彦成，千秋功罪任人评说。总之，长龄和那彦成的一成一败表明：衰败中的晚清王朝，其边疆政策已步入死胡同，此时沙俄哥萨克正向哈萨克草原纵深挺进，我国西北边疆危机的爆发，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①《新疆识略》，卷3，24页。
②《清宣宗实录》，卷244，39~41页。
③《清史稿》，卷367。

和卓崇拜:一个已消逝的政治宗教现象

一、崛起:从圣裔到神

二、黄金时代:血统和道统的汇合

三、在中亚的没落:和卓的分立和争斗

四、在新疆的穷途:从吐热到盗匪

五、结论

14世纪后中亚政治生活中最瞩目的是，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与之相联系的伊斯兰和卓势力的空前活跃。受其影响，明清之际喀什噶尔和卓势力在南疆崛起，并在准噶尔卵翼下建立神权政权。在清统一新疆及其后的一百多年中，喀什噶尔白山宗阿帕克系和卓集团成为与清统治长期对抗的政治力量。然而，无论在中亚还是新疆，和卓已是个历史概念。19世纪中叶，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最终销声匿迹，也就是说，"和卓崇拜"在中亚和新疆嚣张一时，但终究是一个消逝了的政治宗教现象。中亚和新疆的和卓是怎样崛起的，又是怎样走向没落的，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崛起：从圣裔到神

和卓(Khwaja)，汉文中又有"和加"、"霍加"、"火者"等多种译写。关于和卓，舍斐尔有如下定义：

他们是那些自称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的后裔，但不是先知女儿生的，而是其他妇女生的。他们因此被划成两类：赛义德阿塔(Suyyid—ata)和卓们，他们拥有证书，证明他们的血统；而赘巴依(Juibai)和卓们则遗失了他们的证书，只能求助于传说和声望。他们与赛义德(Sayyid)们不同的是，后者自称起源于哈里发奥斯曼和阿里，是先知的女儿们所生，他们与和卓们相比居于长门[1]。

但是对中亚有深入研究的伊莱阿斯却认为：这个定义在新疆并不适用。他指出：和卓就是赛义德。在新疆，和卓已经成为赛义德的同义语[2]。事实也是如此，众多的和卓谱系均称其血统源于阿里、

①《和卓传·导言和评价》，汉译文载《民族史译文集》第8辑。

②同上。

法蒂玛夫妇,而不是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这里有两点必须指出:(1)当时中亚的和卓家族林立,似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赛义德阿塔和赞巴依两家。(2)有的人名字中冠有和卓之称,但他可能与任何和卓家族无关。

和卓以"圣裔"自居,从而获得善男信女的无比崇敬。在和卓崇拜最疯狂的年代,和卓就是信徒心目中的神。民间有传说:"见其一面,即两世受福。"[①]对和卓的崇拜有时甚至超过真主。一部和卓传记写道:

和卓问信徒:"你怕谁?是怕我还是胡大?"信徒答道:"我怕你,不怕胡大,因为您脸上闪耀着胡大的光芒。"[②]

关于和卓崇拜,清朝官吏有极深刻的印象。长龄将军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当地民众"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锢习"[③]。这种比拟在当时并不过分。

和卓的支柱是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托钵僧中最有影响的纳合西班底耶(Nakshbandiyah)僧侣团。一般认为,苏非源于阿拉伯文sufi,即"羊毛"之意,这大概与最初的神秘主义托钵僧身披粗羊毛长袍修行有关。托钵僧在波斯文中作Dervish,即《西域番国志》中提到的"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的"迭里迷失"。苏非派的活动早在公元8世纪前后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早期的苏非信徒甚至受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攻击和迫害。大约从公元8世纪起,苏非托钵僧开始创立自己的社团。公元14世纪巴哈丁·纳合西班底(1318~1389年)在中亚布哈拉创立纳合西班底耶应团,即苏非僧侣团中最有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僧侣团,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随之成为推行

①《平回方略》卷12,15页。

②买买提·赛来:"我对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和教派的一些体会",载新疆宗教所《论文资料集》。

③魏源:《圣武记》卷4。

神秘主义教义的基地。帖木儿朝时期，正是中亚苏非思潮大发展时期，帖木儿就特别尊崇赛义德族（和卓），他曾将社会分成12个等级，赛义德、舍黑等宗教领袖被列为第一等级。

苏非思想广泛传播与和卓势力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是与阿拉伯人的武力征伐相联系的。在阿拉伯武力耗尽后，特别是蒙古人侵中亚、西亚之后，伊斯兰在东方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非派的活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首先，中亚纳合西班底耶苏非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尊崇和卓，他们认为“真正的神学权威不是官方的神职人员，而是和卓”[①]。正统的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形体特征，也没有任何人介于信徒和真主之间，先知仅仅是真主指示的解释者。而苏非神秘主义却让人们相信人神之间有一条接近的途径，并制造出活生生的“神”——和卓，推给信徒，这显然要比那种抽象的正统说教更富有吸引力，这也迎合了当时的中亚社会。对此，施瓦茨有过精辟阐述：“当伊儿汗完者都洗劫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忒耳迷时，幸存下来的，穆斯林对自己的信仰有了动摇，特别需要从一个所谓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这种口头传说中得到鼓励。”[②]

其次，世俗封建主为了巩固其统治往往需要宗教力量的支持。海答尔说：“当时的风尚是，每一位速檀都请一位哈司剌大毛拉的门徒作精神导师。”[③]帖木儿后王卜撒因聘和卓阿赫罗尔为精神导师，并下令：服从和卓，绝对不违背他的教训和指示。传说这是圣人在梦中给他的指示[④]。传说和半传说反映的事实是：和卓政治愈来

①克留维列夫：《宗教史》，第2卷，第283页，莫斯科，1976年。

②施瓦茨：《新疆的和卓》，汉译文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③《中亚蒙兀儿史》一编，第32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40页；王治来：《中亚史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04~605页。

愈适应当时中亚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再次,苏非派向正统逊尼派接近,在很多情况下公开承认正统派的教条,并得到正统派的宽容,但它依然保持和发展其最能蛊惑人心的神秘主义色彩。比如,和卓们都声称有"喀拉马特"的本领,即"行使奇迹",诸如水上走、天上飞、吹气治病、使死人复活、与动植物交谈、点石成金,等等,竭力"神化"自已,借此赢得各阶层信徒的疯狂崇拜。

二、黄金时代:血统和道统的汇合

和卓政治的顶峰是和卓玛哈图木阿杂木时代(1462~1542年)。玛哈图木阿杂木生于费尔干纳渴塞(Kasan),死后葬在撒马尔罕附近的达赫比德(Dahbid)。和卓传记称颂他为"真理的卫护者"、"神学的源泉"、"天上的启明星"、"圣训学的核心"、"所有人的引路人"、"穆圣后裔之精华"和"两江汇合之地"[①]。所谓"两江汇合之地"的含义是,玛哈图木阿杂木的谱系在血统和道统上都是与穆罕默德相连的,玛哈图木阿杂木就是这血统和道统的"两江汇合之地"[②]。

现代研究者往往面对各种和卓谱系材料的混乱和相互抵触而沮丧,对其血统追溯到穆罕默德尤表怀疑。事实上一般和卓传记也只是从所谓先知的第17代后裔克玛里丁(Kamalu al—Din)才开始有粗线条的描述。传说克玛里丁曾居麦地那,后来移居费尔干纳的讹迹邗,曾娶统治讹答剌、渴塞、费尔干纳、讹迹邗和倭赤的速檀伊利克马吉(SultanIlik Mazi)的女儿为妻,其子布尔哈尼丁(Burhani

---

①《大畲加传》(圣门弟子旅行记),汉译载《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
②买买提·赛来:《买合杜木·艾孜木及其谱系》。

al-Din Kilic)一度还在那里继承其外祖父的王位[①]。从克玛里丁到玛哈图木阿杂木经过了几代人[②]。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要验证和卓谱系中的传说还有困难，至少在严肃的史籍中还找不到克玛里丁和速檀伊利克马吉的确切记载，只是在海答尔的著作中有一处似乎含糊地提到布尔哈尼丁一句[③]。总之，中亚和卓"圣裔"的血统确实值得怀疑。

但是，和卓传说中的道统材料是有研究价值的。比如，《圣门弟子旅行记》中关于玛哈图木阿杂木上溯至和卓巴哈丁纳合西班底的师承关系的记述，可以在海答尔和楚拉斯的著作中得到验证。这里将这三方面的材料对比如下[④]：

《圣门弟子旅行记》	《中亚蒙兀史》	《编年史》
和卓巴哈丁·纳合西班底	Khwaja Baha ul-Din Nakshbandi	Ходжа Баха ал-аккава-Дин Накшбанди
大毛拉亚库甫·奇尔海德	Maulana Yakob Charkhi	Маулана Йакуб Чархи
和卓乌拜都拉·阿赫罗尔	Khwaja Nasir ul-Din Ubaidullah	Ходжа Ахрар
大毛拉马黑麻·哈孜	Maulana Muhammad Kazi	Маулана Мухаммад Кази
玛哈图木阿杂木	——	Махдум Азамд

①《和卓传》。施瓦茨在研究了这份材料后指出：中亚这个地区形势对于进行宗教欺骗是颇为理想的。任何一个会玩弄阴谋诡计的人均可冒充先知的后代并获得成功。看来克玛里丁可能也是这类骗子。

②这里和卓传记说法不一。魏源记有：17代克玛里丁、18代布尔哈尼丁、19代米尔氏瓜纳、20代玛木特、21代布喇尼丁、22代扎拉里丁、23代玛哈图木阿杂木。

③海答尔谈到帖木儿梦见Shaikh Burhan-ud-Din Kilij的故事（《中亚蒙兀儿史》一编，第215页。）

④《圣门弟子旅行记》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楚拉斯：《编年史》第151页，莫斯科，1976年。海答尔《中亚蒙兀儿史》二篇，87页，365页，海答尔似没提到玛哈图木阿杂木，这里综合了有关和卓哈孜、和卓奴烈的师承关系材料。

和卓巴哈丁·纳合西班底，塔吉克人，当时布哈拉著名的圣人。传说，巴哈丁根据梦中突厥圣人哈奇木·阿塔的启示，去追随伊斯兰托钵僧哈里勒。哈里勒去世后，巴哈丁自信今后地上的财富都不过是一场虚空而已，开始了苦行者的生活[1]。如果说和卓巴哈丁是创立纳合西班底教团的第一代教主，那么这个教团的第二代教主是大毛拉亚库甫·奇尔海德，但是此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第三代教主是和卓阿赫罗尔，又名舍黑乌拜都拉(1404~1490年)。阿赫罗尔本是塔什干大毛拉，曾预言卜撒因将成为帖木儿第二，故此卜撒因在夺取政权后将他请到撒马尔罕，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传说卜撒因梦见突厥圣人阿合马·耶西维和和卓阿赫罗尔，阿合马·耶西维把和卓阿赫罗尔指定为他的精神导师[2]。这场结盟的实质是：卜撒因梦想借助宗教势力再度统一分崩离析的帖木儿帝国，而和卓僧侣团通过与世俗封建主的勾结攫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卓阿赫罗尔通过“坦霍”和“瓦克甫”名义捐赠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其庄园遍布河中地和费尔干纳，成为中亚最大的僧侣封建主。和卓阿赫罗尔40年的宗教统治，其权势甚至超过可汗，威名远扬河中地。据海答尔记述，他得知西部蒙兀儿统治者速檀马黑麻骄傲，就下令让他当众用衣襟装土，速檀马黑麻不敢不去装土[3]。另有记载，阿巴乞乞儿攻打哈实哈尔时就是声称奉阿赫罗尔之命的[4]。第四代教主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本不是和卓阿赫罗尔的嫡传弟子。据海答尔记述，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投靠阿赫罗尔门下，管理他的私人厨房，逐渐赢得他的信任，由此遭到阿赫罗尔子女和门徒嫉恨，不得不离开阿赫罗尔[5]。阿赫罗尔死后，他的儿子马黑麻亚西亚在

---

①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10页，240页。

②同上。

③《中亚蒙兀儿史》，二编，第327页。

④《加拉里丁克特柯与秃黑鲁帖木儿传》，转自刘志霄：《维吾尔族简史》，第415页。

⑤《中亚蒙兀儿史》，二编，第89~90页。

撒马尔罕主事，成为河中地的宗教领袖并实际上操纵着世俗权力。但不久(1500年)，撒马尔罕被乌兹别克昔班尼汗攻破，马黑麻亚西亚因此被杀[1]。乌兹别克可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仿效帖木儿朝可汗去寻找和卓支持，所以当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来到布哈拉时，受到昔班尼汗的兄弟马哈木的欢迎。马哈木扶植马黑麻哈孜，本人还在某个冬天登门听讲，"后来大毛拉马黑麻离开布哈拉到安集延和阿黑昔，他决定留在那里，在那里的许多人在他领导下成了纳合西班底派"[2]。这表明，16世纪初中亚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僧俗封建主的联盟。

大毛拉马黑麻哈孜死于921/1515~1516年，他的学生玛哈图木阿杂木成了这一教团的第五代教主。玛哈图木阿杂木的权势和威望超过了他的先辈，其谱系表明，不仅在道统上而且在血统上都是源于先知穆罕默德的，这种双重的神圣身份，无疑使之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玛哈图木阿杂木生有众多儿子[3]，其嫡系长子依禅卡朗(Isan Kalan)，本名玛特额敏(Mahmat Emin)，在其父去世前一年接位，并覆行了正式宗教仪式[4]。玛特额敏死后，他的儿子们又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这在汉籍中有记载。徐松记述道：

阿里传二十五世，曰玛特额敏，产四子，长曰哈色木，迁布哈尔国；仲曰木萨，迁拜勒哈国；叔曰墨敏，居故地；季曰玛木特玉素布，

---

①《乌兹别克共和国史》第1卷第380页．塔什干，1955年。

②《中亚蒙兀儿史》，二编，第89~90页。

③传说玛哈图木阿杂木有13个儿子：1.和卓玛特额敏，2.和卓多斯特，3.依禅和卓巴哈丁，4.和卓伊斯哈克，5.依禅和卓阿不都哈里克，6.依禅和卓谢吉克，7.依禅和卓哈桑，8.依禅和卓伊拉赫，9.依禅和卓马黑麻阿里，10.依禅和卓舍黑，11.依禅和卓马黑麻，12.依禅速檀易卜拉欣，13.依禅和卓乌拜都拉(楚拉斯《编年史》第275~276页)。《西域图志》也记有玛哈图木阿杂木13子为：玛木特额敏、多斯和卓、巴哈古敦、阿布都哈里克玛木特、伊布喇伊木、伊萨木、玛木特阿里、阿拉勒颜、玛木特，色德克、阿三、沙伊赫和卓，阿布都勒拉。

④《大霍加传》。

迁喀什噶尔[1]。

魏源也写道：

(漠罕蓦德)传二十有六世曰玛墨特者，当明之末年与其兄弟分适各国，始墨德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2]。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魏源所谓的"玛墨特"，也就是徐松上述书中所说的玛特额敏的幼子"玛木特玉素布"(Mahmud Yusub)，此人即南疆喀什噶尔白山宗阿帕克的父亲，"故地"指撒马尔罕之达赫比德；"布哈尔国"，即阿施塔乐哈尼朝首邑布哈拉城；"拜勒哈"，即阿施塔尔哈尼朝王储驻地巴力黑(Balkh)。玛哈图木阿杂木子孙在中亚各地立门户，但具体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看来，和卓在中亚的黄金时代似已过去，也许是和卓分立门户并为争夺教团继承权及其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权益发生内讧而削弱了自己，也许是布哈拉乌兹别克世俗封建主慑于和卓膨胀的权势开始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事实上，以后的和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如阿赫罗尔、玛哈图木阿杂木那样威震整个中亚的人物。

三、在中亚的没落：和卓的分立和争斗

自玛哈图木阿杂木死后，中亚和卓派系林立，为争夺教权各和卓派系间在各地展开激烈冲突。

在布哈拉。据《汗王的礼品》(Tuhfat at-khani)所载，布哈拉有四姓和卓家族，即玛哈图木阿杂木家族，赛义德阿塔家族，伊斯拉木赞巴依家族，阿赫罗尔家族。《汗王的礼品》还指出：乌拜都拉汗时期(1532~1539年)伊斯拉木赞巴依在布哈拉占有教主地位，因为没有更值得尊崇的人物，这个职务才转到达赫比德和卓家族，即玛

---

①《西域水道记》卷4。

②魏源：《圣武记》卷4。

哈图木阿杂木家族[①]。看来,那位从伊斯拉木赞巴依家族夺得布哈拉教主职务的极可能是徐松所说的哈色木。另据《天堂花园与宦官之林》(Rauzat arrizvan) 和《追求所寻求真理之宗旨》(Matlab at-talbin)两部和卓传记报导: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布哈拉赞巴依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和卓穆罕默德伊斯拉木 (Muhammad Islam,1492/3~1563年),和卓萨德(Sad,1531/2~1589年),和卓塔扎丁哈桑(Taj al-Din Hasan,1574~1646年),穆罕默德玉素甫(Muhammad Yusuf,1595~1652年)[②]。我们除了知道玛哈图木阿杂木是阿赫罗尔的徒孙外,其他诸姓和卓的关系是不清楚的。

在巴达克山。据《沙赫颂书》,伊斯拉木赞巴依的另一个儿子舍黑哈利拉特(Halilallah)在该地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③]。

在巴力黑。古老托钵僧萨利赫(Salih)和卓一度攫取了统治权。布哈拉速布罕库里汗(Subuhan Quli,1680~1702年)一时对此无可奈何[④]。

在塔什干。据《宗教境界文集》(Dami al-Makamat)报导,那里的舍黑有四姓和卓家族,即和卓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卓胡尔德(Hurd)、和卓伊萨(Isa),和卓塔赫尔(Tahir)。他们都是塔什干圣人哈瓦德·塔胡尔(Hawad Tahur)的后裔[⑤]。哈瓦德·塔胡尔

---

①《汗王的礼品》,作者毛拉卡孜依·瓦德和毛拉阿里木别克,成书年代在1782年以后。详见阿赫麦多夫:《16至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117~118页,塔什干,1983年。

②《天堂花园与宦官之林》,作者巴德尔丁·木·阿不都萨拉木·本·赛义德易卜拉欣,成书不早于1589/90年。《追求所寻求真理之宗旨》,作者阿布·阿巴斯·穆罕默德,塔里伯·萨基克(1608~?)——成书在1663/64年间。详见《16至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182、188页。

③《沙赫颂书》,作者哈费兹·塔雷斯(1549~1589年).书成于1584~1589年之间。见《16至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54页。

④《乌兹别克共和国史》第1卷,第420页。

⑤《宗教境界文集》,作者和卓阿布巴卡,本·巴哈丁,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孙子。成书在1617年。见《16至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179页。

又名安塔乌尔（Antaur），是和卓阿赫罗尔的先人，卒于1355年或1360年[1]。看来，这四姓和卓都不是玛哈图木阿杂木家族的。汉文史料报导：在清统一新疆时，塔什干由莫尔多萨木什、沙达、吐尔占三姓和卓分立，这些和卓间斗争激烈[2]。巴托尔德认为：18世纪塔什干城为库克察（Ku-kcha）、安塔乌尔、西伯扎尔（Sibzar）、伯什阿格奇（Besh-agch）四姓和卓分立，1780年安塔乌尔族和卓玉努斯（Yunus）占据了统治地位[3]。当地史料俄文、汉文史籍上所谓四姓和卓、三姓和卓是什么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费尔干纳。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孙子和卓阿布巴卡·本·巴哈丁曾在该地发挥过重要作用[4]。另据《沙鲁赫史》（Tarikh-i Shahrukh）报导：费尔干纳在17世纪后半期形成独立政权，以居住在恰达克（Chadak）地方的和卓掌握了实权，恰达克地方他们人数众多，团结。约1710年他们的政权为沙鲁赫比所颠覆[5]。17世纪后半期准噶尔称霸中亚，费尔干纳恰达克和卓政权和南疆阿帕克和卓政权一样，是在准噶尔扶植下建立起来。沙鲁赫比就是浩罕汗国统治者的先人[6]。

总之，玛哈图木阿杂木以后，和卓们仍在中亚各地积极活动，有的还一度攫取过世俗权力，但那多半是在布哈拉世俗权力薄弱的外省，如塔什干、巴力黑、费尔干纳。总的来说，和卓各派系争夺教主继承权分立门户，其中的斗争愈演愈烈，和卓政治伴随着这一斗争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到了19世纪，中亚的和卓已丧失了往日的荣耀和地位，有的已

---

①楚拉斯：《编年史》，第314页。

②《西域图志》卷45。

③《巴托尔德文集》第3卷，第501~502页，莫斯科，1965年。

④《宗教境界文集》，作者和卓阿布巴卡，本·巴哈丁，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孙子。成书在1617年。见《16至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179页。

⑤《乌兹别克共和国史》，第1卷，第2分册，第45~46页。

⑥潘志平："中亚浩罕明格朝前史初探"，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沦为下贱的江湖骗子。据纳利夫金记述：

和卓跑遍城市、村庄，装模作样地把自己打扮成传道者，自诩其使命是教导人们信仰伊斯兰真教。他们弄神作鬼而妄称行使奇迹，以最无耻的方式愚弄民众，从中谋取钱财。诸如此类的新布道人或显灵者一出现，爱里木汗（浩罕汗，1798~1811年）就召之入宫，命令当场表演他讲的那些奇迹。如果测验结果并无明显的矛盾之处，或至少没有完全违反穆斯林宗教原则的地方，就把他打发走，有时还要赏赐一笔金钱，有的江湖骗子往往只得以皮肉之苦的代价来支付[①]。

《东方全史》证实：爱里木汗公开反对苏非派，当他听说什么地方有苏非的依禅时，就把他召来，让他从水池上空拉紧的绳子上通过，看他如何行使奇迹。当依禅落入水池时，爱里木汗就下令用乱石击死。据说，在这位汗当政时，别说有人敢称依禅，甚至连这个依禅名称也听不到了[②]。浩罕史家哈克木罕也证实：爱里木汗下令收容托钵僧，强制他们放牧国家的骆驼[③]。爱里木汗的弟弟爱玛尔汗执政（1811~1822年）后，就把费尔干纳的最大和卓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后裔马苏木罕和卓驱逐出境[④]。当时浩罕封建主出于对新疆南部地区的野心，唆使支持喀刊噶尔阿帕克系和卓骚扰南疆地区，但他们却一直认为这些和卓"是毫无威望的人"、"无赖"、"暴徒"、"败类"[⑤]。

由于受到乌兹别克世俗封建主的打击，和卓政治地位下降。据瓦里汉诺夫报导，到世纪中叶，中亚的和卓家族尽管人口众多，但除少数富贵者外，大多穷困潦倒，有的为了糊口常操招摇撞骗之勾

①纳利夫金：《浩罕汗国简史》第113页，巴黎，1889年。

②库尔班外里：《东方全史》，第12~13页，喀山，1910年。

③伊万诺夫：《中亚史纲》，第181页，莫斯科，1958年。

④《浩罕汗国简史》第95页。

⑤《伊米德史》第149页。《沙鲁赫史》，转自《苏联维吾尔学面临的问题》，第246页，阿拉木图，1983年。

当，有的往返于吉尔吉斯牧民间接种痘苗，被称为“种痘人”，有的杂居于吉尔吉斯人中过游牧生活，由于愚昧无知，“已不为定居的中亚人所推崇和敬重了”①。

和卓政治在中亚没落，但苏非神秘主义在中亚继续发展。苏非主义依禅不仅是各种圣徒故事的主人公、神秘体验的导师，而且是当地政治生活中的活动家，在民众中仍拥有极大影响。1894~1895年俄国官吏雷科辛曾对塔什干的苏非主义依禅活动进行过广泛调查。塔什干的有代表性的54名依禅中的纳合西班底耶19名，卡迪里耶14名，苏尔塔尼12名，苏哈拉瓦底3名，库布拉维1名。除了少数大依禅拥有数百名穆里德外，一般依禅只有几十名穆里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塔什干纳合西班底耶不是玛哈图木阿杂木家族，而是阿赫罗尔系统的印度伊玛木热巴尼派，这些依禅没有进人俄国统治的权力机构，在穆斯林民众中有很深的基础，在中亚人民反抗俄国统治的斗争中又往往充当鼓吹者和领导者，1892年塔什干爆发的“霍乱暴动”即是一例。这场暴动的领导者就是塔什干屈指可数的大依禅。当俄国当局被迫释放这位大依禅时，据说有数千居民赶来祝贺。总之，伊斯兰苏非主义依禅的存在及其秘密活动已成为俄国统治中亚的忧患②。

四、在新疆的穷途：从吐热到盗匪

自阿赫罗尔时代，中亚和卓势力便开始向新疆渗透。阿赫罗尔的门徒火者他只丁曾到吐鲁番传教，为蒙兀儿斯坦速檀阿黑麻、满速儿汗两代服务了40年。然而对新疆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玛哈图木阿杂木和卓家族。这个家族有三支于明清之际进人新疆，它的斗

①《瓦里汉诺夫选集》，第520~521页，阿拉木图，1962年。

②小松久男：“塔什干的依禅”，汉译文载《中亚研究》1988年第3期。

争也强烈地反应到新疆，具体表现为黑山宗与白山宗的斗争。黑山宗和卓源于玛哈图木阿杂木的庶出幼子伊斯哈克(Ishak)。玛哈图木阿杂木曾到喀什噶尔进行宗教政治活动，娶托古萨克庄人Bibica为第三房夫人，生伊斯哈克，就是说，伊斯哈克有一半维吾尔血统。伊斯哈克虽然以圣裔自居，但毕竟庶出，遭到歧视，经历坎坷，大约在1580年来到其母亲的故乡喀什噶尔，受到察合台后王阿布都卡里木汗的欢迎。经过一段周折，伊斯哈克掌握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的宗教地盘。在伊斯哈克到喀什噶尔40年后（约1620~1630年），玛哈图木阿杂木嫡传长系玛特额敏的儿子玛木特玉素布也来到喀什噶尔，即上文所引证汉籍中所谓“始墨德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事。玛木特玉素布即为白山宗和卓之祖。玛木特玉素布因中亚已为其兄长分割占据，无所适，只得到喀什噶尔与伊斯哈克的黑山宗抢夺地盘，由此开始了白山黑山的斗争。在这一斗争初期，白山宗往往处于劣势，玛木特玉素布的儿子和卓阿帕克甚至被逐出南疆，长期在外流浪，最后走上与“异教”的准噶尔封建主勾结的道路。1680年准噶尔应阿帕克之请发兵南疆，灭掉察合台后王的世俗政权，和卓阿帕克则在准噶尔卵翼下建立自己的神权政权。

攫取世俗权力的强烈欲望是新疆和卓的鲜明特点。对世俗封号抱有浓厚的兴趣就是一证。一位和卓对世俗王宣称，自己有三种身份：(1)圣裔；(2)王子；(3)学者[1]。阿帕克系后期和卓就号称“吐热”。“吐热”原是蒙古社会里汗王之子的封号。在伊斯兰社会，“吐热”称号被视作可追溯到“圣贤”欧麦尔“圣裔”的尊称，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把‘谢里夫’与‘赛义德’之外的圣门之后，通称‘吐热’，这说明‘和卓’是包含在‘吐热’之中的，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吐热”的后代不能称‘和卓’”[2]。阿帕克系后期和卓号称“吐

①《大霍加传》、《阿帕克霍加传》(新疆宗教所打印本)。

②库尔班外力：《东方全史》，转自陈国光：“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我国新疆和卓、西北门宦”，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第1期。

热”,表明他们在伊斯兰社会地位的下降。

清朝统一新疆时,黑山宗依附清政府,因此成为清王朝在南疆统治的社会基础。而白山宗阿帕克系和卓公然搞叛乱,其首领大小和卓被杀身亡,其后裔长期流亡在中亚继续与清王朝对抗。19世纪上半叶阿帕克系和卓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等一次次流窜入境,成为浩罕乌兹别克封建主骚扰新疆的工具。1826年,和卓张格尔攻破喀什噶尔时还有相当多的信徒盲目地追随,但维吾尔民众很快看清这些和卓的真面目。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随同浩罕入侵军来到喀什噶尔,就再没有什么人跟着他跑了。玉素甫和卓哀叹道:“我上喀什噶尔,连一个高粱馕都不值。”[1]1857年倭里罕为张格尔报仇,在喀什噶尔大肆烧杀,竟用砍下的头颅堆成四座十层高的人头塔,给维吾尔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维吾尔人民视之为禽兽,恨之入骨[2]。1864年新疆爆发农民大起义,浩罕军官阿古柏趁机入侵,起初他还打着护送阿帕克系和卓布素鲁克的招牌。但和卓在新疆已经没有任何号召力了,这个末代和卓也很快被其主子抛弃了,和卓从此完全退出新疆的政治舞台。

和中亚一样,苏非主义在新疆继续发展,并不同程度地响影到内地伊斯兰的各门宦。苏非主义对各民族思想文化进步有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它在清季新疆农民大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中也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某些积极作用。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亚还是新疆,和卓政治都经历了一个崛起、发展到没落、消亡的过程。归根结底,和卓政治是当时中亚和新

①《清代外文史料·道光朝四》。

②瓦里汉诺夫对此有报导,见《瓦里汉诺夫选集》第540页。

疆苏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产物，是与当时中亚和新疆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相适应的。和卓没落和消亡的基本原因是：

1. 和卓作为僧侣封建主是与世俗封建主勾结、结盟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一旦它要与世俗封建主争夺最高统治权时，这种结盟必然瓦解而成为对抗关系，政治和军事动乱将危及和卓的前途。

2. 和卓借"圣裔"来神化自己，自玛哈图木阿杂木以后，和卓完全通过血统世袭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一代代和卓的繁衍而又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度，再加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编谱系冒充"圣裔"，结果是和卓满地走，"圣裔"大泛滥，这必然使和卓政治步入死胡同。

3. 和卓繁衍、分立，为争夺教权继承权，必然导致激烈的内讧斗争。为了私欲和卓可以不择手段，例如，求助"异教"封建主，但只能得势一时，而很容易失去基本信徒的信任。阿帕克系和卓甚至不惜分裂祖国、荼毒人民，沦落成杀人放火的盗匪，在政治上最终为广大穆斯林民众唾弃。

“瓦哈比”：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宗教现实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二、瓦哈比："重新阿拉伯化"的伊斯兰

三、中亚的"瓦哈比派"现象

四、教派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五、几点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伊斯兰复兴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一般来说，当代伊斯兰复兴始于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2月1日，年迈的霍梅尼结束他15年的流亡生涯凯旋回国，在德黑兰机场受到了百万痴迷信徒的盛大欢迎；1979年11月20日，麦加大清真寺爆发震惊世界的血案，数百名暴徒、朝圣者和军警在混战中丧命；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圣战"之火由此爆发；1981年10月6日，在盛大阅兵式进行中，埃及总统萨达特倒在"圣战者"的冲锋枪下；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中东的"真主党"、"哈马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科索沃的"阿族解放军"，车臣匪徒，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的"圣战者"和中亚的"IMU"、"伊扎布特"等极端组织蜂起——充斥着狂热、动乱和恐怖暴力活动的伊斯兰潮席卷西亚、北非和中亚、东南亚广阔地带。

在霍梅尼宣称"伊斯兰革命输出"，发布处死《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的"20世纪最重要的法特瓦(宗教命令)"之时，这股伊斯兰潮被许多政府、政治家、媒体和国际观察家归罪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或霍梅尼主义。可是当中亚附近一带的"IMU"、"伊扎布特"和塔利班、车臣匪徒崛起后，人们异口同声指责的是逊尼派的瓦哈比教派或瓦哈比主义，是为"瓦哈比"问题，但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宗教现实问题。

二、瓦哈比："重新阿拉伯化"的伊斯兰

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就矗立在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大佛在2001

年3月18日轰然倒塌,它成为宗教极端、绝望和20年来阿富汗战乱的牺牲品。泰国《亚洲时报》报导说:"塔利班认为毁佛符合伊斯兰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只有真主安拉才应受到朝拜,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人。"英国《独立报》评论塔利班毁佛"既罪不可赦,又在意料之中。对于这起举世震惊的毁坏世界文化遗产的事件,沙特阿拉伯应承担根本责任,因为是沙特阿拉伯的严格的逊尼派的瓦哈比教派创造了塔利班,而且在沙特穆斯林那里,捣毁佛像的主张被认为是合法的。巴米扬大佛被毁在沙特阿拉伯可以找到根源,早在1802年,受到人们顶礼膜拜的佛像就已被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摧毁了"①。以上这些说法很有代表性,但不尽然正确,关键是如何认识瓦哈比教派问题。

瓦哈比教派的历史是同现代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分不开的,沙特阿拉伯是当今解释伊斯兰的权威。外界也许以为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反动和实行愚民政策的国家,但沙特阿拉伯人绝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瓦哈比派是使伊斯兰摆脱中世纪渗人伊斯兰教的迷信和崇拜的运动,即迷信和崇拜任何偶像和圣人、圣地。瓦哈比教派之名源于它的创立人阿布德·瓦哈布(1703~1792),他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宗教世家,在游历各地时深感民众迷信、崇拜圣徒、圣地、圣墓和腐败、浮华活动,有悖于伊斯兰的非偶像崇拜精髓,遂发起一场宗教改革运动,鼓吹一切回到《古兰经》去,清除被视为"异端"的信仰和行为,恢复严格的一神论信仰。在瓦哈布看来:除真主和《古兰经》外,别的一概不要。如果瓦哈布不与内志望族沙特家族结盟并用军事行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或许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历史过客。瓦哈布的军队横扫阿拉伯半岛,甚至于为其信仰铲平了被穆斯林尊崇的侯赛因的圣墓,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一片大哗。这个教派自称"惟一神派",可是其反对者将之贬称为

①《参考消息》音像版,2001年7期。

"瓦哈比",就是说,"瓦哈比"是他称、贬称,其义可理解为:跟着瓦哈布走的异端分子。

瓦哈比教派大体上是清教主义,宗教意义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1926年,沙特家族的阿卜杜勒·阿齐兹登基为汉志王,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以瓦哈比教为国教,并召开国际伊斯兰会议,目的是弥合瓦哈比派同传统伊斯兰教派之间的鸿沟,自此使它们之间接近的活动开始不断发展,直至瓦哈比派不再置身于宗教主流之外,在许多方面,它成了主流。伊斯兰教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它是从这个半岛的民族宗教逐渐地发展成跨民族的世界宗教,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受到各地各民族原始宗教文化影响,地方化和本土化,必然渗入许多有悖于伊斯兰原教旨的东西。瓦哈比鼓吹回归《古兰经》,本质上是一种"重新阿拉伯化"的伊斯兰。沙特阿拉伯占有麦加、麦地那两圣地,每年接纳世界各地来朝圣的穆斯林,也就很方便地向这些穆斯林推销自己的教义和观点。受此感染许多穆斯林很快发现自己的父母、前辈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在这种背景下,瓦哈比教派就特别具有激情和改宗归一的能力,所以它往往引起其它教派的警惕和担忧,与之相争的"传统"教派就像喊"狼来了"那样惊呼"瓦哈比"。尽管瓦哈比的教义、主张和做法相当激进,但无论如何,它本身还只是伊斯兰逊尼派中的一个教派,如果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仅仅限于个人的信仰的私事,对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一个问题,但所有的问题恰恰就出在它超出了纯宗教领域的政治化,中亚一带近年出现的"瓦哈比"现象就是伊斯兰政治化的突出表现,对此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三、中亚的"瓦哈比派"现象

中亚"瓦哈比"现象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但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中亚就有"瓦哈比"之说。西方资深的苏联问题学者亚历山大·

本尼森1989年著文说："1987年中亚出现两个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伊斯兰回归，表现为'民间伊斯兰'(Parallel Islam)活跃，其代表人物是'未注册的'、'非官方的'(地下的)毛拉。伊斯兰政治在中亚也是最近的现象。它是阿富汗战争的直接产物。今天，伊斯兰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它正迅速成为一种政治倾向——基本力量是突厥斯坦人和高加索民族主义者，同国外穆斯林世界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并无多少差别。一些苏联观察家称这一新宗教——民族共生现象为'瓦哈比主义'。'瓦哈比派'的活动遍及整个中亚，特别是塔吉克斯坦，它是阿富汗战争失败受伤最重的地区。苏联舆论界指出：'瓦哈比派'教徒经常也是苏非派兄弟会的骨干。"①

这位西方学者似乎做了些有价值的实地调查，这里透露有价值的信息是中亚的"瓦哈比"现象早先是苏联官方提出来的。据说，苏联当局甚至动员了安全部门来对付"瓦哈比派"。但把瓦哈比教徒和苏非兄弟会混为一谈，则属常识性的错误。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总统都或多或少地"发现"自己民族精神中的伊斯兰因素。纳扎尔巴耶夫这位来自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在关于社会思想的专论中确认："宗教现已成为社会精神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类一些共同理想作为其人道主义教义的基础。"②而对伊斯兰复兴采取最坚定手段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承认："宗教是人类的最可靠伴侣，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通过伊斯兰教——我们祖辈的宗教的例子，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③至于一些文化人士则鼓吹："没有比古兰经、圣经更好的意识形态。"④外界听到来自中亚伊斯兰复兴的消息是：各地

---

①亚历山大·本尼森："回顾伊斯兰"，《中亚概览》1989年1期。

②《主权哈萨克斯坦报》1993年10月3日。

③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27页。

④《主权哈萨克斯坦报》1993年3月2日。

在兴建清真寺，朝圣的人在大大增加，过宗教节日、按伊斯兰习俗的婚丧活动由地下步入地上，费尔干纳谷地还出现类似中东的伊斯兰卫队的极端组织。在这些喧闹中似乎还未有“瓦哈比”现象的特别报导，但国外学者对此已有反映。《中亚概览》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个很小却在不断扩大的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的瓦哈比派。”[①]另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巴基斯坦学者也在1994年报导：“沙特教徒们曾花了数亿美元支持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东的瓦哈比运动，而今他们又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了中亚”，并警告：“在谋求推翻政府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中，费尔干纳谷地的瓦哈比运动是决心最大、组织最好的。”[②]但是如这位学者后来所说：“我五年前就提到瓦哈比在费尔干纳的出现，而这对于当地的费尔干纳人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来说还是新鲜事。”[③]

“瓦哈比”现象在中亚引起严重关注是在1997年。当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著书说：“瓦哈比的口号在中亚个别地区得到扩散和支持”，“这些现象引起了我们的严重不安”，“我们自己要明确认识瓦哈比派这类思想的欺骗性”，“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让宗教口号成为夺权的旗帜，成为干涉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借口”[④]。1998年4月20日，卡里莫夫在会见欧安会主席时强调：“在中亚，1990年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和瓦哈比势力的迅速发展，对整个中亚局势造成直接威胁。如果不及时防止瓦哈比势力的发展，不但会影响中亚的稳定，而且将会对欧洲局势造成直接的危害。”[⑤]1998年5月1日，卡里莫夫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警告：“我们应该镇压那些狂热的瓦哈比破坏分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要亲手毙了他们。”[⑥]1998年5月

①《中亚概览》1994年2期。

②阿赫迈德·拉什德：《中亚的复兴》。

③阿赫迈德·拉什德：“从迪奥班德主义到巴特肯：伊斯兰继承者的冒险活动”。

④卡里莫夫：《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32~36页。

⑤“自由之声”电台1998年4月23日广播。

⑥同上，1998年5月6日广播。

6日俄塔社报导，在俄罗斯总统的倡导下，成立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别是抵制瓦哈比派的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三国政治集团。此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对"瓦哈比分子"的镇压和打击。与此同时，车臣非法武装也被指责为"瓦哈比分子"。

从1996年开始，中国学者根据外电、外报的报导，也开始认真研究中亚和高加索的"瓦哈比"现象①。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此大体上有两种理论分析。一是认为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于在中国新疆，都出现一个"当代瓦哈比派"。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政治宗教主张不同于沙特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义。那些受瓦哈比主义影响的并接受了当代瓦哈比派资助的人，或是受到当代瓦哈比派训练和派遣的人，在中亚的活动，并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在宗教外衣、信仰的名义下的地地道道的政治活动②。另一种看法是，最近中亚南缘伊斯兰复兴的某种发展，可能并非"瓦哈比"那样的纯宗教问题，而是极端政治性伊斯兰复兴问题，是恐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③。其实，关于它不是宗教运动，而是披着宗教外衣（具体地说是"瓦哈比"）的政治运动的认定上，并无实质分歧。但是，在提法上却不大一样：前者断定它是"瓦哈比教派"，只是加了一个限制性定语——"当代的"；后者对于瓦哈比教派的说法不大同意，表现出谨慎的怀疑。我一直比较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我还想强调，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本质上是极端政治运动，不能因为它披着宗教外衣，就将其与宗教甚至宗教派别混为一谈。

然而，我至今还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已十分清楚地确定它不是

①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186-18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研究报告），2000年4月。

③王智娟："中亚伊斯兰复兴现状透视——可能并非瓦哈比问题"。《中亚研究》，1999年版。

宗教运动，那为什么还要说它是什么“教派”呢？通俗地说，既然已把狼所披的羊外衣剥开，那为何还要把它叫做羊呢？看来还得认真讨论一下教派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

四、教派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和其它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创建后不久便出现内部教派之争，且这种教派之争从未停止。伊斯兰教相比于佛教、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强烈的政治性或政治化的倾向。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创建了伊斯兰国家。在他那里，宗教和政治是一体的，宗教即等于政治。正是它的这一特点，当出现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时，它本能地积极介入政治；也正是这一点，它本身就没有解决被政治利用的问题，极易成为某些政治野心家的宗教外衣。在伊斯兰那里，教派斗争往往是与政治斗争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中亚和高加索一带伊斯兰“传统”教派主要是属逊尼派的哈乃斐派，它之所以得以广泛流行，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是由非阿拉伯人创立的，二是对信徒行动上要求比较灵活。它的毛拉、伊玛目大体上形成一个得到官方认可的体系；与之平行的体系主要是活跃于民间的苏非僧侣，在苏联时代一般处于地下的“未注册的”毛拉，被称“民间伊斯兰”或“平行伊斯兰”。近世，又有鼓吹“扎吉德”的宗教改革思潮——与泛突厥主义共生的泛伊斯兰主义（简称“双泛”）渗入这一地区。“双泛”在苏联时期被严厉打击而几乎没有影响，“民间伊斯兰”不被政府承认，但顽强地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农村地区活动，因此，得到官方认可的“正统的”逊尼哈乃斐派是中亚伊斯兰社会的主流。

从80年代起，乌兹别克斯坦持不同政见者就经历过阿富汗圣战，并通过巴基斯坦被送往沙特阿拉伯学习。1989年他们开始走上归国之路。此时正值苏联解体前夕，宗教生活宽松多了。随着中亚

穆斯林赴沙特朝圣、留学生的出出进进和沙特宗教组织在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这种"重新阿拉伯化"的伊斯兰思潮——瓦哈比思想的渗入，必然给中亚穆斯林宗教生活以某些影响，并对中亚"传统"教派以挑战。瓦哈比思想在沙特阿拉伯出现已二百多年，但对于中亚穆斯林却还十分新鲜。它的清教主义，对于不满"正统的"毛拉、伊玛目的浮华（甚至于腐败）的教民，是会产生共鸣的；它的严格非偶像崇拜，对于不信弄神弄鬼的苏非僧侣的那些年轻人，也是有吸引力的。

虽然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中亚已形成一个瓦哈比教派，但也引起"传统"教派毛拉、伊玛目的恐慌。在纳曼干，一位曾在沙特留过学、讲有一口的流利阿拉伯语、潇洒地大把大把地花来自沙特的石油美元的伊玛目"新贵"，1991年率领自己的"伊斯兰卫队"攻占了市中心的共产党总部，得意宣称："政府别无选择，只好让我们传播伊斯兰教。"而纳曼干市官办清真寺伊玛目沮丧地说："共产党统治时期，整个纳曼干地区只有3座清真寺，而今有130座，而且，瓦哈比派还在到处宣传，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资金。"看来政府从这些老伊玛目那里得知：那些好斗的瓦哈比的目标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先是费尔干纳，接着是全乌兹别克斯坦，其后是整个中亚都将变成伊斯兰社会"①。

这里的问题是，当中亚的"瓦哈比"现象刚一出现，就非常明显地政治化。从那时的"伊斯兰复兴党"、"阿拉什运动"、"阿多拉特运动"、"艾尔克党"、"比尔力克阵线"，到近几年活跃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民族极端组织，几乎都被说成"瓦哈比"。一位俄罗斯伊斯兰问题专家指出："把原教旨主义和瓦哈比主义等同起来的说法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因为前者的概念更为宽泛。中亚当地的'瓦哈比分子'坚决拒绝这样

①阿赫迈德·拉什德：《中亚的复兴》，102页。

称呼他们。'瓦哈比分子'是无知的人们用以描述相互间极为不同的穆斯林组织的用语，一般说来，任何批评官方教职人员的人都被说成是'瓦哈比分子'。"[1]请特别注意，这位专家的意见极为重要！可以调查一下，在中亚各地，"瓦哈比"实际上首先是官方伊斯兰界站在教派斗争的立场上嚷嚷出来的。

被贬斥之为"瓦哈比"的，可能有两类人：一是接受瓦哈比教义的宗教人士，但说他们已组织化，成为中亚的一个新教派，缺乏起码的证据。二是打着教派旗号、披着瓦哈比外衣的极端分子。这些人本身就不是宗教人士，利用宗教搞政治是其一种自以为聪明的选择，但利用宗教就要夺教权，那么借用瓦哈比的名号搞这种勾当就很方便。因为，瓦哈比有着激进的教义、鼓动人心的激情和改宗归一的能力。

总之，中亚的"瓦哈比"是官方宗教界最先喊出来的，它告诉并影响了官方，而后又影响了媒体乃至国际观察家们。仅此一点便可体味中亚一带政治和教派斗争交织一起的复杂性。

五、几点看法

关于中亚"瓦哈比"现象的讨论，并不是什么无价值的提法争论，更不是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问题是中亚，也包括新疆不仅面对着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而且还面对着政治与宗教、政治斗争与宗教、教派斗争交织的复杂局面。国际宗教极端势力所做的事是政治宗教、教派化和宗教、教派政治化，即：政治披上宗教、教派的外衣。我们则应坚决地把它的宗教、教派外衣扒掉。

无论是把中亚一带的宗教极端势力说成是"瓦哈比派"，还是

①新疆国际问题研究组编：《国际反恐怖主义资料汇编》，324页，2000年。

认定为“当代瓦哈比派”,理论上都不可避免地政治宗教、教派化和宗教、教派政治化;实践上,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难题:我们打击的到底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势力,还是一种宗教教派呢?按照宪法和党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以及各宗教的各个派别,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如果把这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认定为某某教派,那是不是要依照法律和政策赋予其合法地位及其与其它教派的平等权利呢?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早在80年代中期,新疆和田地区就开始有“瓦哈比教派”的说法,同其它地方一样,这也是当地“传统派”先嚷嚷的,到90年代中期,这种说法愈来愈盛,一个调查组受委托进行了专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自80年代以来,瓦哈比派成了我区动乱的主要根源和影响我区稳定的主要危险”,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和可能造成决策失误的结论”,并撰文指出:“新疆所谓的‘瓦哈比派’的实质是极端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关于新疆有没有瓦哈比教派一直是个问题。有的同志是肯定的,并对此深信不疑,提出:“应该看到,新疆地区存在当代瓦哈比派的活动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些同志是把“当代瓦哈比派”定义为“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并强调:“从理论上严格区分沙特国家建立前后的瓦哈比派、伊斯兰复兴后的瓦哈比派、沙特信奉的新泛伊斯兰主义的瓦哈比派与沙特民间活动的‘赛莱菲叶’(或新瓦哈比派)十分必要。”[1]问题是,这样不仅最终把它仍定位于“教派”(无论怎样解释都会越解释越让人糊涂),而且在并不存在这一“教派”的新疆,给它命名出这样的“教派”,这是不是有点自找麻烦。因为这些极端分子巴不得以“教派”的名义组织化、合法化。总之,我认为:

——要特别小心地将政治问题与宗教、教派问题区分开来。

---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研究报告),168页,2000年4月。

——要特别小心地将极端分子的宗教、教派外衣剥离开来。

——特别注意,不站在宗教、教派的对立面,不支一派压一派。

——特别注意,在政治斗争中,不要简单地以宗教、教派划线。

就是说,极端势力在搞政治宗教、教派化和宗教、教派政治化的阴谋时候,一定要头脑清醒,不为所动。

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可以说,20世纪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运动世纪。在20世纪之末回顾20世纪的进程，全球范围的民族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民族觉醒、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纠纷、民族冲突、民族斗争等民族问题涵盖了本世纪的全过程。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都与之有不解之缘。首先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各民族"牢狱"的沙俄殖民帝国覆灭了,而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成立了。1936年,斯大林向全世界骄傲地宣布:苏联的"坚固性是世界任何一洲的任何一个单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①]。斯大林的继任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坚决相信,民族问题在苏联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就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这个"坚固"的联盟土崩瓦解了。塔吉克斯坦、高加索、德涅斯特河沿岸、车臣的战火连绵,是前苏联潜伏着的民族矛盾公开化和激化,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在前苏联领土上有180个点,其族际紧张程度正在超出'常规'。民族仇恨的激化已经夺走了不止一千条生命。有几十万人由于恐惧而逃离了或正在逃离舍不得离开的故乡。"[②]这种情况在全球许多地方也蔓延发展着。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说:"1993年有27个地区发生冲突,有12个爆发点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状态，有31个地区局势紧张。1994年的主要事态发展将是,民族关系更加紧张,民族暴力冲突将会增加。"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悲剧:已有25万无辜者丧生和200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379页。

②埃廷格尔:"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原载俄罗斯《自由思想》1993年3期,汉译文刊《民族译丛》1994年6期。

万无家可归的难民。这正应了当年斯大林的断言："资产阶级对于寻求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方法，是根本无能，一筹莫展，软弱无力。"[①]同样，苏联解体的事实本身也表明，苏联的民族理论在寻求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方法，至少也是软弱无力的。

人们不禁要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问题首先出在笼罩在民族理论上的一个迷雾，即"民族自决，建单一制民族国家"的所谓"欧洲方案"、"民族原则"，或者说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的理论。当今世界大大小小国家已接近200个，但真正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又有几个呢？绝大多数的是多民族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恶性膨胀的挑战。在这世纪之交展望未来民族关系的发展，不能不认真检讨、思考当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分离主义。

二、"民族"：难以取得共识的概念

观察民族问题，研究民族理论，似乎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何谓"民族"？对此历来众说纷纭。

汉文中本没有"民族"这个词，古代经常使用的是族、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种人、部人、族类等，"民族"只是20世纪初引进西方民族理论后才普遍使用起来。1903年梁启超先生首先介绍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J.K.布伦奇利的关于"民族"的说法，据说"民族有八个特征：(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经济)"[②]。其说面面俱到，但显然把现代的民族与古代的民族、部落乃至种族、人种的一些含义统统装进了其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406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302页。

所谓的"民族"的大筐子里。

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中国，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被认为精炼地概括了民族的基本特征，为我国学术界普遍接受。但是把这个理论全盘搬到中国，不是没有问题的。斯大林言之凿凿地断言，前资本主义时期没有Нация(民族)，只有Народность(部族)，如此说来，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不是连汉族也都是部族？为此展开了近四十年的争论，但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诠释。

事实上民族是有层次的，如中华民族与汉民族、回民族等就不是处在一个层次的。民族是有处于不同状况和历史时期的，有的历史悠久，而有的才几百年；有的正在形成，而有的却已消亡；有的经济高度发达，表现出首先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联系，有的还受封建宗法制度的严重束缚，甚至还有个别则处于血缘联系的原始状态。这些不同层次、形态各异、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在汉语表达中只有一个词——"民族"，以至于不得不以广义、狭义、特指等补救方式来应付，但仍存在混乱和讨论中的争讼不清。在外文中有与我们广泛使用术语"民族"相当的许多词汇，但也大量存在着因人而界定各异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这些词汇[①]：

nation/нация/volk：一般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有"民族社会共同体"的涵义，如英吉利民族、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等。在某种意义上nation与国家同义。德国政治理论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说："作为人在历史上借以起作用的绝对基本形式的'民族'，原始的家，原始的居住区，各民族的迁徙——这一切都是1789年的nation和1813年的volk所表达的动人

①"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民族研究》，1986年6期。

心弦的反映，这两个词分析到最后都来自英格兰和清教的自恃精神……在今天，对我们说来，世界史的意义就是诸民族的历史……其他一切东西，文化、语言、才华、宗教都是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是民族的形式。"[①]虽然这是斯宾格勒认为必须推翻的"浪漫的观念"，但它反映的是18至19世纪西欧国家、民族一体的思想，其意义在于nation意味着国家与民族互为表里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下文中展开分析。

nationality/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显然是由nation/нация派生而来，一般指阶级社会以来的所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如汉族(Han nationality)、维吾尔族(Uygur nationality)。nationality与nation的原则区别在于，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所具有的国家、民族互为表里的意义。然而，近年nationality与nation指向范围有吻合趋势，但它与nation的细微差别仍在于偏重文化习俗方面的意义。

ethnos/этнос：在欧美语文献中使用相当广泛，它既可表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也可表示前资本主义各个时期的民族共同体，甚至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氏族，只有联系作者论述问题的时代背景和上下文关系，才能领悟其使用者的真实用意。西方学者使用这个词时常有将民族和种族相混淆的情况。由它派生出来的还有：(1)ethnic group/этн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种族集团），通常被解释为"社会集团或居群范畴，由一种共同种族的、语言的、国民性或文化上的纽带予以维系，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显示出与其它集团有所区别"[②]。(2)ethnic communty/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按美式解释是少数民族或移民集团，照欧洲式解释是nation形成前的某些民族共同体[③]。照苏联式解释则是包括部落

①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229页。

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503页。

③吉野耕作："民族理论的展开与课题"，原载日本《社会学评论》，37卷4号，1987年。汉译载《民族译丛》1989年1期。

(пле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和民族(нация)的历史上形成的稳定人类社会群体总和①。

people/народ(ы)本义是人民,用于民族学科指广义民族,大体相当于ethnos/этнос,但侧重于政治、社会方面,有时又与nation/нация同义,如the Chines people(中华民族)。

народность:这是俄文中比较新的概念,指的是历史上继部落(племя)之后、民族(нация)之前形成的并具有同一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产生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②。常译作部族,但与中国历史上的部族并不等同。

以上各种文字的对应关系和解释只是相对意义的,在实践中它们的内涵外延因使用者而相对、相容、交叉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没有一个词像"民族"这个词被用得更随便、更不周密,但又没有一个词比它需要经受更严格的批判。选用有关词汇可以反映作者关于"民族"概念的认识,但更重要的是从中把握作者的基本观念,正因为基本观念不同才反映出概念认识上的五光十色。关于"民族"认识的基本观念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一些:

其一,血缘、人种观念。这种观念以为民族即血缘集团,民族是种族的同义词,也就是来自同一祖先,不混有任何外来血统的亲族,故此考察的基点仅仅限于肤色、眼色、发色、发形、血型等人体体质形态上具有的遗传特征。俄国民族学者希罗科戈洛夫曾给этнос下过一个定义:"этнос就是共同生物起源的人的集团。"③这种观念推到极端就是种族主义(racism)。法国社会学家戈比诺(Gobineau J.A)的《种族不平等论》(1853年),即是种族主义的经典之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否认现代民族是由血缘联系的民族

①《苏联百科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922页。
②同上,215页。
③ P.伊茨:"关于苏联的民族学",《民族译丛》1987年6期。

发展而来，但从根本上否认现代民族的血缘联系。斯大林明确指出："民族并不是种族的人们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人们共同体"，他批判奥地利人鲍威尔"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与部落这一人种志范畴混淆起来了"[①]。其实种族不同于民族，属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在远古，人的共同体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族、部落，但由于部落战争、迁徙，氏族外通婚都导致人种因素的混合，即便在遥远的古代，绝对纯血统的集团也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天生就具有语言、宗教、思想文化意识，它们的获得是受教育的结果，而不是来自生物学上的遗传。因此血缘、人种因素对于民族、尤其是现代民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在某些地方，比如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碾碎了原有的民族差别，从民族学意义上，那里有的是美利坚民族，无论欧裔、亚裔还是拉丁美洲裔居民都是美利坚人。而大量社会问题与其归结为民族问题，不如说是种族问题。因此美国人对民族与种族概念区别总是不甚了了。他们看到华北人和华南人体质形态上的差别甚至不以为汉族是一个民族。

其二，宗教文化观念。这种观念历来就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指出："基督教徒从一开始也觉得他们自己是一种Magi型民族，而其他人，希腊人（'异教徒'）及犹太人对他们也是这样看待的……基督教徒则从自己一方面把它种信仰的民族称为ταεθνη（异教徒，字面意思是nation或people）。"斯宾格勒因此提出："在帕提亚时代，在波斯人和犹太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深刻的本质变化，它使部落性的结合不再成为民族的标记，而使宗教信仰成为民族的标记。一个犹太人如果信仰马兹达教义就变成了一个波斯人，一个波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33页、25页。

斯人如果变成了基督徒就属于聂斯托利民族。"[①]自中世纪以来的伊斯兰教也是这样，如马克思指出："可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②]今天我们经常见到所谓"穆斯林民族"的说法，这大概是按宗教信仰特征对民族的一种简便分类，但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的某些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近年杜撰了一个"文明模式"，支持其理论模式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一种文明就是民族的最高文化组合"，而"文明因历史、语言、文化和传统不同而异，而且最重要的是因宗教的不同而异"。他解释道："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要想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那就比较难了。"[③]然而这种以宗教文化观念垄断民族概念的理论是荒谬的。比如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赫然出现了一个令民族学学究大惑不解的"穆斯林族"[④]。近年，同属南部斯拉夫人且基本上操同一语言的人们竟以"民族、宗教不同"为理由而互相杀戮，有关波黑战事的消息几乎天天见诸报端，世人不能不为这种表现在民族问题上的极端宗教文化观念而忧虑。

①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303~304页，316页。Magi是作者赋予特殊意义的术语。据说："从地理角度和历史角度看来，The Magian Culture都处于这一组较高级的文化的正中心——它是在空间方面和时间方面几乎和一切其它文化发生了接触的惟一文化(331页)"。通俗的说Magi文化指的是一种文化中心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卷，第180页。

③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

④这个问题在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有过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宗教信仰集团，不是社会历史范畴上的"民族"，应视其祖先籍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分别归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或黑山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在漫长历史上已形成一个独特民族。1959年铁托表态：给穆斯林确定民族成分是没有意义和缺乏根据的，结束了这场争论。

其三,语言文化观念。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应是没有疑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也是肯定的,但问题是能否把语言文化认定为区分民族的绝对的惟一标准。有人提出,“民族乃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这种看法遭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①。泛突厥主义者就精心论证语言联系优于种族、国家、地理环境、政治势力和意志的力量。据说:“这种联系是共同的教育和文化,也就是思想感情。人们在初级教育时期接受其最真实内在感情。还在婴孩之时,他通过常听的摇篮曲受到母语的影响,所以他最喜欢的是他的母语。正是通过这种语言,他吸收所有的宗教、民族和美学感情来充实他的灵魂。……民族不是种族、血亲、地理环境、政治和意志的集团,而是一个由分享共同语言、宗教、道德、美学,也就是受同样教育和许多人组成的团体。土耳其农民表达说‘民族即他的语言就是我的语言,他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②这就是泛突厥主义的理论标本,也是极端的民族语言文化观念的典型。其实,语言学家告诉我们,目前世界的语言有数千种之多,仅仅新几内亚一个岛屿就有700多种语言。在语言研究过程中,根据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特点,以语系、语族和语支构筑语言图谱。而泛突厥主义把语言学上的语族混同于民族,旨在虚构一个现实不存在的统一的“突厥民族”。

其四,心灵或心理观念。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了一大部头书《西方的没落》,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是:“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据说“历史上许多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民族所做成的;那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每一种行动都改变行动者的心灵”③。如果说此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29页。

②孜牙·乔加勒甫:《突厥主义原理》,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编《“双泛”研究译丛》第二辑,1992年。

③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298页。

说过于玄乎，那么泛突厥主义者则直言不讳地说："惟一的结论是应承认那些自称'我是突厥人'的人为突厥人，如果有人背叛突厥民族，则应加以惩罚。"[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要素之一。它被解释为"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从科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但这也只能是一种原则性概括，有些问题很难准确把握，斯大林也承认这"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②]。日本学者宇多文雄说："民族是一种归属意识，是与其他集团对比基础上具有最初意义的一种意识，但它往往是一种缺乏客观根据的感情的东西。" 他甚至引述一句欧洲谚语："所谓民族，就是对自己的祖先抱有共同的误解，对自己的邻人抱有共同厌恶的人们所结成的集团。"[③]此说近乎玩世不恭，但是面对当今形形色色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演似乎又让人们有些理解，至少它给那些热衷心灵、心理观念的民族主义者点了睛。

其五，社会经济观念。这是几乎所有西方学者所忽视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四个统一(政府、法制、民族阶级利益、关税)的民族成立的前提就是 "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资料、财政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列宁更明确地指出：民族应当包括"语言和地域。主要的(经济特征)。历史性质"[④]，强调经济因素，尤其是共同的经济联系在民族形成、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别强调"民族市场"和"民族的经济中心"为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产生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块土壤上，反映了俄罗斯、乌克兰、

①孜牙·乔加勒甫：《突厥主义原理》，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编《"双泛"研究译丛》第二辑，1992年。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28页。

③宇多文雄："关于民族问题的几点思考"，原文载日本《新防卫论集》20卷3号，汉译文刊《民族译丛》1994年1期。

④《列宁文集》俄文版，30卷，51页。

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民族的形成所经历的历史道路，应该说是科学的概括。但这种观念任意引申出的某些论断，如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以前没有民族，就没有普遍意义，至少对于中国是不适用的。再有，斯大林把这种社会经济观念政治学化，提出了与资本主义民族相对的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就大有问题。共同经济生活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有密切联系，但毕竟不能等同于社会生产经济制度本身。如果以前人们对此还可以争论一下，现在苏联解体了，不再搞社会主义了，难道前苏联的那些“社会主义民族”就倒退到“资本主义民族”？再比如，冷战时期形成两个德国，就解释为“社会主义德意志”和“资本主义德意志”两个民族，现在两个德国统一了，是不是又回归于一个“资本主义德意志”民族呢？

其六，地域、国家的观念。“共同地域”构成民族的重要特征，这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要素之一，一般来说也是正确的。但也有人不同意，如奥地利人鲍威尔和石普林格尔就认为“民族与地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民族是自治个人的联盟”，他们以此倡议的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就遭到列宁、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但是把地域观念绝对化未必妥当。列宁、斯大林都以此断定，在俄国的犹太人“与其是民族，不如说是帮会”[①]。和地域相关的就是国家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是，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国家，或者说，凡nation就必须自决直至分离建立民族国家。“国家是民族的形式”的观念在欧洲学术界和政界根深蒂固，它是18至19世纪西欧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物。列宁显然接受了这一观念，他曾写道：“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尤其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代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②]关于这种观念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下一节中还要展开讨论，这里只指出一点，与此直接联系的是民族自决权及建立民族国

---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77页。
②《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20卷，397页。

家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学者在书斋中发一通议论是一回事，而政治家据此要作出某种决策则是另一回事。1929年，当有人提出将"民族国家"作为民族第五特征提出来时，受到斯大林的驳斥："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在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①]当今，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似乎已被广泛承认，也就是说凡nation就应予以自决允许分离，如果是少数民族问题就不是nation问题，而是国内的ethnic问题，但究竟哪个民族集团是按自决分离权对待nation的呢？近年全球各地的民族分离主义，包括中国的"藏独"分子和高喊"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某些小组织在海牙搞了个无国家的民族组织，号称"小联合国"，它们或拥护血统人种观念，或宗教文化观念，或语言文化观念，或心灵心理观念，这些或许并不重要，目的都是争取其nation地位，以取得自决分离的权利，显然任意解释nation内涵、无限扩大nation外延，是远远超出学术讨论的现实政治问题。看来这正是民族(nation)概念众说纷纭难以取得共识的症结所在。其实，问题不在给"民族"下一个公认科学的定义，我们也不准备这样做，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重要的是把握它在各种有关理论中是如何界定的，只有这样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三、不合时宜的"欧洲方案"

nation的形成发展是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世纪的西欧是封建邦国林立造成的分散割据状态，它制约了人们间的联系和交往，历史学家曾用"一条政治杂乱拼凑的坐褥"来形象比喻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地图。然而通过强行征收封建地租、免役税、什一税等苛捐杂税以及封建领地、邦国间层层关税，并没能阻挠资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343页。

本主义的蓬勃发展。随着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西欧的资产阶级聚集了强大经济实力,利用城乡人民的革命运动,实行在西欧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尼德兰资产阶级"联省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荷兰nation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荷兰nation远远区别于组成它的前身——那些自古以来曾在尼德兰这块低地的nationality:克尔特人、高卢人、弗里斯兰人、巴塔维人、罗马人、萨克森人。随后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nation相继在民族国家的统一中形成。西欧的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到,实行民族统一、争取民族自决,建立单一制民族国家,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决定意义。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nation),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①]应该说,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的"欧洲方案"就是在这一背影下形成的,它开端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871年。

然而,就是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之中,所谓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的理论发生质变,问题出在用nationality偷换nation。关于这一点首先为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这里有必要比较多地引证他在1866年撰写的《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的经典论述:

路易—拿破仑,这个"上奉天命、下承民意"的皇帝,于1851年coup détat[政变]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称。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es)——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nationality的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6卷,174页。

是Nationalities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的peoples的残余叫做nation，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的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nation。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nation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nation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nation的主体合并了。……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同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的民族(nations)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旧论点之间，是有差别的。……

这里恩格斯认定的是：

1. nation与nationality不容混淆。

2. 所谓“民族原则”与“旧论点”(有分离的独立的生存权利的论点或曰“欧洲方案”)不容混淆。换句话说，“原则”对于“方案”而言变了质。

不要以为这是学究式的咬文嚼字，恩格斯关注的是这种“民族原则”运用于东欧的波兰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东欧，如恩格斯指出的：“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入侵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涌来，把一大堆一大堆混杂的民族碎片留在岸上，直到现在民族学家也只能勉勉强强地把它们区别开来；在那里，十分混乱地杂居着土耳其人、操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以及近一打斯拉夫部落。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恩格斯分析了当时沙俄插手于

东欧的波兰，推行强权政治，尖锐地指出：这种"民族原则"是"绝顶荒谬的"，"是一句便当的空话，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事实上"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所有这些可以说明两点：

1. "欧洲方案"，即实行民族统一，争取民族自决，建立单一制民族国家的理论模式，是建立在西欧nation的基础上，不适用于多民族(nationality)的东欧。

2. "民族原则"是变了质的"欧洲方案"，"方案"要旨是实现西欧nation的统一，而"原则"是以nationality为据的分离，因此它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实践上是大国推行强权政治的阴谋诡计。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两种民族理论的基本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科学的，远见卓识的，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仍有指导意义。

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进入高潮，这场革命面临着俄国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

早在1902年，列宁第一次提出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此后他围绕这一口号同波兰社会党人、黑帮十月党人、取消派分子谢姆柯夫斯基、崩得分子李普曼、乌克兰民族社会党人尤尔凯维奇等展开激烈辩论，同时也与自己的同志卢森堡、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发生争论，其精神集中在两点。

其一，拥护自决、分离。列宁认为："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半岛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独立和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趋向。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俄国及其邻邦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

条。""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组织独立的民族国家"①。

其二,不宣传分离、反对分离。列宁相信大国进步论,如他所说:"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巨大的历史步骤,除了通过这种国家(同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因此他又在各种场合下强调,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的要求",这种要求"毫不排斥反对分离的鼓动和宣传","分离绝对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但我们拥护分离权"③。

又是拥护自决、分离,又是绝对不宣传分离、反对分离,如何理解列宁的这一思想呢?归纳起来,至少有这样几种看法。

1. 认为列宁的这一思想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当年列宁的反对者就提出这种质疑,近年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伊凡·麦斯特连柯就此向列宁提出指责④。

2. 认为列宁承认民族自决权仅仅是策略上的考虑,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认为:"在俄国列宁是惟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直言不讳地宣布多民族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有权自决直至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家。他甚至认为乌克兰也有这种权利,这使他的学生们感到吃惊,使他的敌人感到害怕。列宁的目的当然不是肢解俄国,但是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可以通过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的办法争取俄罗斯各族人民。承认这种权利就可以确保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约占全

---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71页,163页。

②同上,128页。

③同上,96页,85~86页。

④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23~25页。

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七！)支持他夺取政权。俄罗斯族布尔什维克有义务承认这一权利，俄国非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有义务宣传不要退出俄罗斯——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策略。"①

3. 认为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斯大林1924年解释道：压迫民族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被压迫民族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对问题未加思索的人"来说，或许是"有矛盾的"，但除实行这个原则以外，别无选择②。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解释道："列宁有时候把民族自决的论点，用'为了联合而分开'这个简单的规则表达出来，你们想一想'为了联合而分开'这句话吧，这甚至有点像奇谈。但是这个'矛盾'的定则，却反映着马克思辩证法的活生生的真理，这一真理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攻占民族问题方面最坚固的堡垒。"③迄今为止的宣传列宁的民族理论的文章大体都是按照斯大林定下的这个调子进行论证的。

仔细地再三推敲列宁的这一思想，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矛盾的命题，我们当然不同意某些人在指责列宁时所持的反共立场，因为无论说是"策略性"的，还是"辩证"的，它还是为十月革命成功起了重要作用的。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辩论最多的是民族问题。阿·阿夫托尔汉诺夫就此评述道："对于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来说，民族问题一向起着显著作用。现在在内战高潮时期，当邓尼金将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为统一与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斗争'的口号时，民族问题成了整个白色运动，特别成了它的多民族高加索后方的'阿喀琉斯的易伤的脚踵'(致命要害)。布尔什维克党正好看中这个'致命要害'，针对'统一与不可分'的口号提出个反口号'民族自决权'……富有弹性的策略家列宁晓得，郑重承认'民族自决权'，不仅是博得非俄罗斯民族好感的最恰当的武器，而且使他们

①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217页。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276页。
③同上，371页。

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对立的正确无误的手段。"[①]俄国没有被肢解，多民族的苏联的建立和巩固，是列宁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的成功。列宁、斯大林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但是这个成功的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祸根。1919年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布哈林、皮达可夫把民族自决权解释为："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权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②]请注意："手段"和"策略"几乎同义，目的是高尚的——社会主义，但把"民族自决权"说成是"劳动群众的自决权"，逻辑上是偷换概念。1920年，斯大林就公开地"坚决驳斥边疆地区与俄罗斯分立的要求，认为这是反革命的企图"[③]。随后成立的苏联，是由一个个单一制民族共和国构成，这一点上体现了"自决"的思想；同时又以社会主义联盟的形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联合"的思想，从而达到"自决"与"联合"的"矛盾的"、"辩证的"统一。但问题是，第一，这种单一制民族国家是成问题的。比如在中亚，当时还残存着的多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布哈拉、希瓦汗国，而一些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还处于某些血缘联系的古老状态，不要说是一般人，甚至连许多学者都弄不清那里的民族成分和构成。1924年后组建的五个民族共和国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基础上的，这些民族是以政府行政方式"识别"出来的，怎能与西欧的nation等同。第二，联盟是联邦制形式，列宁曾认为联邦制"削弱经济联系，

①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292页。

②《斯大林全集》，4卷，29页。列宁批评了这一观点(《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462页)。有人据此认为列宁、斯大林之间存在尖锐对立，甚至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他们之间的矛盾(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但这种看法并不成立。在联合建大国方面，列宁和斯大林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列宁更加注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痛恨和警惕，而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在列宁逝世前夕开始暴露。

③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122页。

它对于一个国家说是一种不合适的形式”,坚决反对联邦制[1]。但是1917年列宁决定实行联邦制,同样坚定地说,这是“把俄国各民族最牢固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苏维埃共和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2]。显然在政治家那里需要的是:因时、因地地处理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提出最符合革命利益的决策和口号,这正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但不能不看到,政策上的大幅度摆动是理论贫困的表现。联邦制就真的那样糟糕吗?瑞士就实行联邦制,但它的稳定性是久经考验、不容置疑的。其实形式、名称并不特别重要,实际内容才是根本。应该说,十月革命后苏共实行那种“联邦制”是当时历史条件、环境下的明智的抉择,但把它僵化、永恒化,那就势必走向反面。第三,共和国联盟在理论上遵循的是自决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法律上规定民族共和国有分离独立的权力,而联盟只是以革命和社会主义维系起来。那么在不要革命、不要社会主义之后,在种种因素作用下,一方面是民族分离主义泛滥,另一方面是大俄罗斯主义膨胀,苏联的瓦解也就难以遏制(苏联瓦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仅仅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因为不是全面讨论这一问题,其它因素就不多谈了)。从这一点看,苏共民族理论最终还是失败了。它的失败说到底就是没有如同恩格斯那样从理论深度上看到nation与nationality的区别,没有认识到西欧形成的“方案”搬到东欧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本身就是“绝顶荒谬”的。

“欧洲方案”所表现的西方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在解决当时西欧的民族问题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时过境迁,早已不合时宜。如学者所指出的,它毕竟“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某一横断面上,即产生于近现代欧洲殖民者向美洲、非洲和亚洲残酷殖民统治

①《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19卷,第501页。

②同上,27卷,第190页。

和扩张的这一时期和过程。这些理论和学说缺乏人类古老文明系统中所具有的那种大跨度的纵深历史感和时间感的观察和记录，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多少历史，或者说自身编年史太短的民族史"[①]，因此它就无法解决全球范围的多变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对西方的民族理论也是有批判的，认为它的视野仅仅"限制在一些主要只是关系于'文明'民族的问题的狭隘范围以内"，"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几万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落在他们的视野以外"[②]。列宁、斯大林在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上是有巨大贡献的，比如他们把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联系起来的论点是有开创意义的，但是在nation理论上没有同西方民族理论最终划清界线，这应该是苏共民族理论上的致命弱点。

"欧洲方案"和"民族原则"迷雾依然笼罩着当今世界的民族理论，但它不同程度地受到怀疑和批评。大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经过一段曲折的认识过程，终于确定在民族自决、分离与国家统一完整的争论中否定了一些按照民族重新划界的企图和要求。非洲著名历史学者玛兹鲁伊强调："20世纪西方不是在可能实现自决的那些方面影响非洲，而是相反，它使民族基础上的自决不能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宣布的那种自决原则完全可能变成'退向部落制'的警告。"俄罗斯学者在总结非洲的经验时指出："现在，国际集团实际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坚持必须遵守领土完整的原则，不仅如此，在西方的政治和学术界，有利于把分离权从具有各种形式的'自决'概念中排除出去的呼声很高。"[③]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委员会主席（原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博士认为："更广泛的世界经验表明，依照民族原则去建立国家是不可

①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3期。

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163页。

③埃廷格尔："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

能的，而且本来民族国家(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这个概念就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纯粹’民族意义的国家恐怕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①]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我也想强调，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今天往往与民族自决直至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混为一谈，如果抱定这种态度，那么在世界上就可能出现几千个经济上薄弱的主体”，“在民族自决的掩盖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完整性都受到怀疑，使之分化和分立主义将会没有止境”[②]。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就国体而言是“单一民族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дной нации)，或如1992年《宪法》表述的“自决的哈萨克民族国家”(фор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ости самоопределивщейся казахской нации)。在这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政府现行民族纲领是复兴哈萨克民族文化，强调“土著”哈萨克族占有“优先”、“核心”地位。问题是既以哈萨克民族“自决”立国，又不给国内其他民族以任何形式“自决”或“自治”，表现出理论和逻辑上的混乱。正因为如此，哈萨克斯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民族问题，近年来的焦点表现在围绕双重国籍和第二国语的争论上[③]。美国兰德公司一资深的高级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内部存在一个根本矛盾，究竟是建立一个哈萨克民族家园，还是建立一个多民族民主国家[④]。哈萨克斯坦一学者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19世纪末时建立过民族国家。当时全世界都患了民族主义的病，并确认人的价值的特殊地位，可以说只有那时有过纯粹的民族国家。如果在多民族的社会做出类似的一切，则意味着对

---

①“俄罗斯政府应更新其民族政策中的立场”，原载《俄罗斯消息报》，1992年5月5日，汉译文载《民族译丛》，1993年2期。

②埃廷格尔：“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

③王智娟、潘志平：“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焦点”，刊《中亚研究》，1995年1~2期合刊。

④格雷厄姆·富勒：“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前景”，刊美《后苏联时期前景》，1994年10月号。

现存社会公然埋下种族炸弹(этническая бомбы)。"他呼吁放弃单一制民族国家国体，变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为"公民国家"(гражданское гос.)，尽快撤出笼罩在国家上空和社会里的种族炸弹[①]。

如果说哈萨克斯坦面临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内的民族矛盾，那么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冲突就把整个欧洲、美国都卷了进去。这一地区是多民族林立杂居的地方，虽然那里的一些斯拉夫人族源相同，语言接近，但历史上民族仇杀造成极深的历史积怨。二次大战后建立起的南斯拉夫国家虽然保持国家统一几十年，但它是按照"民族原则"建立的六个单一制民族共和国组建的联邦制国家，和原苏联一样，它的统一始终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威胁。它又地处欧亚大陆几大文明、几大宗教势力交会处，一向是欧洲列强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因此南斯拉夫的解体既有内部的民族问题，又有外部插手、干涉的重要因素。1992年西方大国承认波黑独立点燃了波黑战火，几年来人们看到万斯—欧文计划到代顿和平协议一类和平方案，无一不是在"民族原则"的光环下按居民的nationality分界线进行版图分割，一方面是净化民族控制区，一方面是难民如潮，在多民族杂居地方如此分割，必然是各种控制区的犬牙交错、飞地林立。"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和一百多年前一样，是大国"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的东西，前南斯拉夫的悲剧是人为的，很大程度上与这个"绝顶荒谬"的东西有关。

中国人民对于西方所谓的"民族原则"是有深切体会的。如曲解中国的国家起源和中国民族发展史，把汉族等同于中国人，把中国的少数民族说成是非中国人，挑拨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从三四

---

①杜瓦罗夫："双重国籍：政治的死胡同"，刊《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4年1月21日。

十年代策动“满洲国”独立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到近年支持煽动“藏独”，无一不是在“民族原则”的光环下妄图肢解中国的卑劣行径。和自由、民主、博爱、人权观念一样，“方案”本来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它变质、异化成“原则”，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推行强权政治的卑鄙手段。历史和现实表明：重要的是必须破除对不合时宜的“欧洲方案”的迷信，摈弃“民族自决直至分离，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绝顶荒谬的“民族原则”。

四、狭隘的民族情绪和民族分立主义

在本文开头我们说到，20世纪某种意义上是民族运动世纪。但是在20世纪初，恐怕许多人并不能有如今这样的体会。1913年英国历史学家詹姆士·布勒斯宣称：

今天旅行家们在印度、非洲、两个美洲、澳大利亚、太平洋群岛看到什么？他们会看到，在文明人的打击下，弱小的、落后的民族正在变化或者消亡，他们的部族组织在瓦解，他们的风俗在衰落……出现一个混合种族民族，更强有力的文明人在这一新的民族中注定要占上风……八大强国主宰着地球的政治命运……几种欧洲语言推广到各个大陆……到2000年前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类将只用二十多种语言，这是完全可能的①。

这种大国、“文明人”胜利而弱小、落后民族消亡的观点在当时欧洲学术界占据主要地位。还是在1913年列宁也有两个著名的预言。

其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觉醒”：

①转引自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17~18页。所引汉译文中表述为“种族”，但从文中所表达意见来看，“民族”可能更合适，故改之。

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①]。

其二是殖民体系瓦解后占优势的是"统一"的趋向：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国际统一的形成。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②]。

关于列宁的第一个预言，已为生活所证实。首先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几万万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其次是自60年代以来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浪潮由北非向撒哈拉大沙漠以南黑非洲发展，至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非洲独立国家达50个，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有13个国家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全面崩溃。

关于列宁第二个预言已部分得到验证。首先是1958年西欧共同体成立，它从关税同盟、农业一体化起步，经过20多年发展至1986年，成员国由6个发展到12个，国民生产总值占西欧6/7，世界的1/4，对外贸易占世界的40%，它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起成为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实体。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遍布全球，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59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75年）、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年）、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1986年）、东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1981年）、中西

---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64页。

②同上，110页。

亚经合组织(1964年)、安第斯条约集团(1969年)、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75年)、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1968年)、中美洲共同市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南亚联盟等等。进入90年代,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势头有增无减。苏联解体了,但独联体一体化的呼声却愈来愈高。东南亚联盟已宣布要建立东南亚共同体,印度洋国家正筹建印度洋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国家也在讨论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的可能性,拉丁美洲1995年刚成立南方共同市场立即同安第斯共同市场进行合并谈判,并且除古巴之外美洲34国达成在2005年前结束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近日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拟议创建大西洋共同市场。不过在规模和成熟程度最高的是由西欧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欧洲联盟,刚刚接纳瑞典、芬兰、奥地利,基本完成"北上战略",正继续实施"东进"和"南下"战略,成立欧洲中央银行,实行单一欧洲货币,建立有19个国家的欧洲统一市场,将在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领域进行自由流通。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欧洲议会立法权,拟议"联邦型国家联盟",在防务上以"一个声音说话"等,欧洲政治一体化也在稳步进行中。所有这些,正应了列宁的"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的预言。它代表着人类的进步,时代的进步。

但是,这些"国际统一"的趋向只表明"民族壁垒"在某些地方如西欧某种程度的破坏,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觉醒"异化成民族"分离"而导致"民族壁垒"森严。五六十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革命的号角,今天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而在埋葬原苏联的废墟上一下子出现15个独立国家。近年车臣事件集中反映出俄罗斯1989年联邦主体的许多地方的分离、分立趋势。已分裂成五块的前南斯拉夫,分立的冲劲依然充足,波黑战争前塞族在克宁、西斯拉沃尼亚、东斯拉沃尼亚建立三个自己的政权,同时还成立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近日签订的代顿协议虽然保住了

波黑，但这个国家一分为穆克联邦和塞尔维亚共和国两个平行对立实体而由此可能成为空壳。在分割领土时塞族尽可能划分整齐，其意是将来的分裂，而只要这种分裂一露头穆克联邦也会走向分裂。在代顿艰难的谈判中总有人一再提议在各自控区边界线上砌筑水泥墙。从这一点看，某些地方的民族壁垒不是削弱而是更加严峻。

总的看来，当今世界上同时并存着"国际统一"(一体化)和"民族分离"两个方向相反的进程。今天当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也不能证明世界如列宁预言的"正向社会主义转变"。殖民体系瓦解后，对于新兴国家生存造成威胁的是，表现"民族复生"(the ethnic revival)特别是小民族的复生为特征的"民族分离"趋向。这不仅是列宁当年始料不及的，也是与近代西方学者如前面提到的詹姆士·布勒斯的预测完全相反的。围绕"民族复生"问题，学者展开激烈讨论，产生各种理论观点，如原初主义(primordialism)和境界主义(boundry approach)、表现主义(expressivism)和手段主义(instrumentalism)、永存主义(perennialism)和近代主义(modernism)等，还有试图在这些理论观点中架设桥梁的"传统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观点①。这些观点的理论意义在于建筑在各自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但明显的是，所有这些实证研究远远不够充足，或具有相当的片面性而解释不了更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即便如此，这些争论无疑是有某些学术价值的。比如"传统的创造"认为，民族复生的契机有两个：其一是"剧烈的社会变动"，其二是"社会间对抗的必要性"。所谓"传统的创造"就是"回归"到认为是传统的东西，比如苏格兰的传统和通常被看作是传统服装的kilt(苏格兰裙子)、风笛等，过去被看作野蛮的象征而被否定，而近代为了有意识地与他人——英格兰、爱尔兰相对抗，结果成了从具有自己的象征

①吉野耕作："民族理论的展开与课题"。

的必要性出发而“创造”出来的“传统”。以这种理论模式观察富于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化的复古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似乎还可以理解一些问题。但是仅仅依靠这些理论模式显然不够，我们认为，表现“民族复生”为特征的分离趋向，既受封闭狭隘的民族情绪激励，又受以实现“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为目标的民族分离主义(ethnic separatism)鼓舞，如果认识不到这点，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一，封闭的民族自我意识，对于民族自决直至分离权利的偏执，对于建立单一制民族国家憧憬，贯穿于当代精神，这种精神既受到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几十个独立国家的形成的影响，又由于苏联崩溃后大小民族加入要求自决潮流的鼓舞。因此，不仅众所周知的东帝汶问题、库尔德及泰米尔人问题进一步活跃，而且那些民族问题似乎早已解决的西欧、北美的魁北克、科西嘉、巴斯克人的问题也重新被提出来。在这里，民族和宗教是最容易蛊惑人心的旗帜。

第二，寻求对灾难、贫困负责的“替罪羊”，以为自决、独立可以改变一切的狭隘思维，往往导致民族偏见的滋长。例如把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全盘归罪于所谓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归罪于联盟中央的“剥夺”。在乌克兰曾有个臆想的神话：以为分离出去便可小麦如山、牛奶似海，其实这一神话非但未成现实，而独立后经济破落得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另一方面看，经济因素对民族问题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常常是诱发民族分离主义的温床。

第三，在“民族原则”精神的氛围中，民族归属意识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为了它不仅可以视死如归，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残忍地杀戮无辜的“异族”人，但这种归属意识是建立在众说纷纭的“民族”概念之上的一种缺乏科学依据的非理性东西，正因为如此，它又具有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在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几十年来本

已和睦相处,但在大国政治的策动和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残杀、流血,反过来又强烈地刺激民族情绪,终究导致民族悲剧愈演愈烈。再如,车臣分离主义自以为是为崇高的“民族原则”而奋斗,但这种斗争竟以残害妇女儿童的恐怖主义方式走向极端,正说明所谓“民族原则”既非天然合理,又非人道正义。

第四,民族的客观存在是民族意识的基础,民族主义则是民族意识强化的产物。表现民族意识的民族尊严、民族自豪感之类的民族感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一个民族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动力,比如当年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击、战胜日本法西斯。但是民族感情又经常表现有盲目的非理性弱点,有时甚至带有自欺欺人性质。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就述说过这样一件事,据说,1919年有一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代表团跑到巴黎和会上要求承认他们的自决,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格鲁吉亚的语言与俄罗斯的语言不同,并且带来了一个译员,据称是为把他们的方言译成法语。可是恰巧在场的有一位英国记者懂俄语,当时就明白听到他们以及他们的译员私下交谈完全说的是俄语。汤因比就此的评论是:那些格鲁吉亚人,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只要不是强迫他们非说俄语不可,倒反而会自发地、不自觉地使用俄语来讨论政治问题[①]。语言确实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激烈的民族抗争中,语言问题对于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着无与伦比的利用价值,语言受到障碍就是聋子、哑巴和瞎子,它可以激动各阶层所有人的情绪。列宁对此有过精辟见解,他指出,随着俄国社会发展,“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知道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棍子逼迫也会学会俄罗斯语言的。而强迫(棍子)只会引起一种后果,使伟大而雄壮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传人其他民族集团,更主要的还在于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

①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348-349页。

隔膜等等"[1]。因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感情由于封闭、狭隘会走向极端的民族情绪,从而起着异常的消极作用。

民族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然而作为国际政治理论范畴却是在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的。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它也经常造成人类兄弟阋于墙。近世以来,民族主义政治化的发展,使其与爱国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等一系列政治理论和概念交汇在一起。郝时远先生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论文就是这一问题的精湛论述[2]。本文这里谈的还是那些既受封闭、狭隘民族情绪激励,又受以实现"民族原则"鼓舞的民族分离主义。面对21世纪的民族关系,冲突、摩擦与融合、交汇并存,这种状况可能还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实现列宁的梦想,"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国际统一的形成",代表着人类进步、时代进步。"民族原则" 驱使下的封闭、狭隘的民族情绪和损人不利己的民族分离主义,是当今"世界统一"的反动,历史进步的反动,当代政治的反动。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迎接21世纪民族和解基础上的历史前进,应是我们执著追求的崇高目标。在当前,首先应该批判、摈除的正是貌似公理的nation的国家、民族一体的观念,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驱除民族问题上的迷雾。至于面对世界性民族问题挑战如何构筑、不断完善、丰富我们的民族理论,则任重而道远。

---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36页。

②郝时远:"极端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载《世界民族》,1995年1期。

民族平等：理想、乌托邦和现实

一、永恒的真理

二、理想还是乌托邦

三、代价的选择

四、选择的导向

讨论世界民族问题时,民族平等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般来说,狭隘、排他的民族主义是主张民族不平等的,其中种族主义是最极端的,约瑟夫·阿瑟夫·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不平等》就是这种反动意识形态的经典作品。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他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就是以优等民族雅利安人统治劣等民族为理论基石的。当然,今天恐怕还鲜有人公开主张民族不平等,但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民族平等的要求、企望和呼声从未停止过,可以说,民族平等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未解决。有人以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凡是能够基本奉行民族平等原则的,就能把民族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导致相对的民族和平、社会稳定和民族发展;反之,凡是存在民族不平等的国家,就难免出现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不同民族间的歧视、偏见、隔阂、猜疑、摩擦、矛盾、纷争以至武力冲突层出不穷。”[①]这一分析或许能说明许多地方的问题,但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如此之复杂, 这样的断言似难成为“铁的规律”,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前南斯拉夫问题。

前南斯拉夫宣称实行的是国内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铁托宣布:“任何不遵守平等原则的人都是有意反对我们各民族的团结”[②],并为这一信念奋斗终生。1989年一位日本学者认真研究了前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认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马其顿为一个民族,实行各少数民族以母语接受教育,并且在工作中也能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政策,可以说,他们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公正的”。然而,这位学者同时预言:“南斯拉夫也许很快就会瓦

①熊锡元:“民族平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基础”,《民族研究》1997年4期。

②《民族译丛》1981年增刊,12页。

解。"[1]这一预言却不幸被言中。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前南斯拉夫的废墟中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的丑行。由此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被认为"非常公正"地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前南斯拉夫何以竟葬身于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前南斯拉夫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民族平等问题。

一、永恒的真理

民族平等首先是一种平等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发展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孤立地谈论这一问题。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2]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为之热烈欢呼,他认为,平等就意味着社会正义,平等是"一种原则、一种信条、一种信念、一种宗教","现存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3]。应该承认,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的提出,是针对着封建的等级制度的,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但它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在南部农场主的反对下删除了谴责奴隶制的条文,因此,这种平等观点是有其阶级的局限的。连有的资产阶级学者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冲突,汤因比就说:放任个人自由,则强者横行,弱者向隅。没有自由,人的本性就不能有创造性;但对个人自由不加压抑,则社会正义就不

①[日]柴宜弘:"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民族译丛》1991年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4卷,239页。
③[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25页,序言。

能彻底实现。

汤因比甚至认为民主也不是个好办法，说:“它就仅仅是掩盖自由和平等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真正冲突的烟幕。真正能调和这两种冲突的理想方法，只有在‘博爱’这个居中的理想里去找。”[①]但有没有普遍的超阶级的爱呢，这显然是个问题。连费尔巴哈也承认：“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人所想的是不同的。”[②]从这一点看，与自由、博爱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是虚伪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了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

……无产阶级平等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

这样，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 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③]。

或曰平等观念就是平等权利的要求。然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

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

①[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14~4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卷，238页。

③同上，447~448页。

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马克思同时又指出：

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1]。

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经典阐述，它虽然写于一百多年前，但其丰富内涵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值得认真研究。我认为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即平等的观念、平等的要求、平等的选择，从来都是相对的。

平等的观念，“说它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这意味着，它同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其它观念一样，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平等的要求，有经济的、文化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归根结底是阶级的政治要求，从这一点看，它就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平等的选择也不是绝对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尺度或参照系。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就是条件、尺度或参照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就是条件、尺度或参照系。然而法律总是人制定的，它总体现统治阶级某种意志的，而真理也不是永恒的，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终极真理。再比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的是“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似乎要求都要如同奥运会那样有一对简单的起跑线和终点线。然而批评者说，竞争的起点从来都是不平等的，大家从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人质疑：“即使我们愿意承认并愿意为天赋及个人的努力所带来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304~305页。

更多成果付出更多报偿，又怎么可能将这两个因素同少年时期的教育区分开来呢？一个富翁或教授的子女无疑比一个穷汉或文盲的孩子成长期占了便宜。既然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可以在终点时让占先的人作出补偿？"[①]还有人建议："要实现平等，我们今天是让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呢？还是给予少数申请者以先跑的资格呢？当然设计这种先跑资格是为了弥补这些申请团体过去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及其可能的不良后果。"[②]我却认为，奥运会似乎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它对于不同国家、民族、肤色、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运动员来说，都是一对起跑线和终点线，但男女却是分别竞争的，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不同公斤级是分开竞争的，这里的问题似乎是尺度、参照系或规则是否公平。但在复杂的社会里，公平本身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马克思在批驳《哥达纲领》的所谓"公平的"分配时诘问："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③]其实，从逻辑上看，用"公平"论"平等"是循环论证，并无价值。

平等，一方面是从一定平等观念提出平等要求；另一方面是面对各种平等要求的选择。如果涉及民族领域，那么民族平等的要求就是理想追求的理论问题，民族平等的选择就是代价权衡的实践问题——这就是下面集中讨论的两个问题。

二、理想还是乌托邦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关于一般的平等理论有过精辟的分

①郑也夫：《代价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62页。

②[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等编：《宪政与权利》，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8页。

析，那末面对俄国复杂民族问题的列宁、斯大林则对民族平等理论进行认真的探索。

面对沙皇俄国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列宁在1914年提出《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草案最重要的两点是：

1. 居住在俄国境内的一切民族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 对俄国的任何一个公民，不分性别和宗教信仰，都不得因为他的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而在政治权利和任何一般权利上加以限制[①]。

就是说，公民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民族平等的要求而言，它强调的是个人，不应因民族出身而受到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并不局限于公民平等，诚如他关于这一问题的阐述是：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政治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②]。

据此，当时列宁的民族平等的要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面前公民平等，一是法律面前民族群体的平等。前者，自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在形式上承认了这一要求，而后者则是列宁首次提出来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伟大创造和贡献。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一，"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固然表现了对民族平等要求的高度热情，但提法还需斟酌。因为和一般的平等一样，民族平等也是相对的，世上不存在绝对的民族平等。第二，民族群体的平等与民族自决权联系在一起，其出发点是非殖民化，固然是对沙俄殖民主义民族压迫的否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43页。
②同上，69页。

定， 但是与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分立主义完全划清界线是困难的，尽管列宁为此不断地进行解释，误会一直难免[1]。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铲除了剥削制度，也消除了民族压迫，但民族问题远没有解决，这就是列宁、斯大林提出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列宁认为：

……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对于无产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最大的信任。那末需要什么呢？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需要这样或那样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过去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2]。

列宁所谓“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是“不信任”、“猜疑”、“侮辱”之类的民族感情问题，他在另一处警告：“要特别谨慎地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3]

在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列宁谈了两次，那末斯大林就谈得相当多，这里引证一段经典论述：

我们已经宣布了法律上的平等，并且正在实现这种平等，这种平等虽然在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史上有极重大意义，但是它毕竟同事实上的平等还相距很远。所有落后的民族和部族在形式上和我们联邦内其他一切先进民族享有同等权利。可是不幸的是：有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无产者，没有经过甚至没有开始工业的发展，

①潘志平：“民族问题与民族分立主义”，《世界民族》1997年1期；“苏维埃民族加盟共和国模式：一场失败的试验”，《中亚研究》1996年3-4期合刊。

②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527页。

③同上，456页。

文化上极端落后，完全没有力量享用革命给它们的权利。同志们，这是一个比学校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把学校和语言问题放在第一位，问题就解决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单靠学校是无济于事的，学校本身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可是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一切不满和磨擦的根源。在这里单靠学校和语言不能解决问题，还需要我们给文化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以真实的、经常的、真诚的和无产阶级的帮助[①]。

看来列宁和斯大林的共同认识是：(1)法律上的平等(个人的和民族群体的)即"形式上的平等"，在革命胜利后已经或正在实现；(2)革命胜利后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3)"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列宁、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对于刚刚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如何认识民族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应看到，列宁和斯大林关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认识和思路并不一样。列宁把"事实上的不平等"大体归结为"民族感情"问题，实际上是从政治上看待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让步"、"温和"、"抵偿"也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斯大林则把这一问题简化成：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差距。当然他主张经济文化上帮助少数民族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但问题在于：难道经济文化上有差距，就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吗？就是"一切不满和磨擦的根源"吗？众所周知，在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差距或大或小总是绝对地存在，那么所有的"一切不满和磨擦"就只能归于这或大或小的差距吗？此论若成立，哪里有民族和谐和团结可言呢？

列宁和斯大林把"事实上的不平等"都归结为历史遗留下来的

①《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5卷，200~201页。

问题，也就是说，造成这种状况是资产阶级和旧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看，"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是新旧社会交替中的暂时的问题。这正是斯大林自20年代后期以后不再提这一命题的根本原因。因此不问时间、地点地套用上述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大谈民族间的"事实上不平等"，甚至借此推论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间在政治上"事实上不平等"的结论，无意或有意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违背列宁、斯大林的本意的，亦是不可取的。

然而，如果把"形式的平等"严格界定在"公民平等"范围，而把"事实的平等"看成是民族群体间平等，要处在多民族环境中，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平等要求就可能存在。前者要求，作为公民的个人在法律上平等，而不因民族出身受到不同待遇，形象地说要求人人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后者要求，作为民族群体、特别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某些方面得到照顾、优惠和扶助，形象地说要求不同的起跑线。这两个方面的平等要求应是对民族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如果民族群体意识强烈地存在，且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看问题，那么这两方面要求的对立和矛盾就可能格外突出，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更是如此。极端地要求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无视或排斥另一个方面的要求，只能激化民族对抗和冲突，因此，均衡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是理智的，民族平等的理想境界是这两个平等均衡的最佳点。以为有绝对的平等，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地实现，那是空想、乌托邦。有代价，就有代价的选择——这就是下节中进一步讨论的民族平等的实践问题。

三、代价的选择

如果说民族平等是个要求，那么就有从公民个人角度或民族

群体角度的要求。如果说民族平等是个选择，那么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府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就有面对各种要求的选择，而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即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府，都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府首先的选择是平等还是不平等的选择，它可以宣布自己的民族政策是平等的，但有些具体做法却不一定如此。比如斯大林坚定地宣布："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地位，每个民族都是与其它任何民族平等的。"[①]同时，斯大林举杯祝贺感谢俄罗斯人，说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②]。苏联的领导人和苏共的报刊则鼓吹俄罗斯是苏联"第一位民族"、"老大哥"[③]。如此做法怎能同各民族平等原则联系在一起呢？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不能认为是民族平等的选择。

抬高某一民族的提法、做法不止发生在前苏联，在今天刚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就把哈萨克民族说成是"尊贵"(титульная)民族、"核心"民族，尽管哈萨克民族主义者以此自诩，并声称哈萨克民族"优先"，但其他民族对此厌恶之极，难以容忍[④]。亚洲的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实行"土著主义"，"土著"即当地人，在经济文化上拥有优先权、特权。比如，斯里兰卡的民族关系紧张，民族冲突旷日持久，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泰米尔人被当做"非土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了歧视，是其中重要的因素。苏联解体前夕民族关系紧张，斯里兰卡民族冲突不断升级，在相当程度上是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381页。

②《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428~429页。

③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37页。

④王智娟等："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焦点：双重国籍和第二国语"，《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3期。

这种民族不平等政策付出的沉重代价。

民族不平等的选择要付出沉重代价，民族平等的选择，无论是“形式的平等”，还是“事实的平等”的选择，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形式的平等”就是坚持公民平等的原则。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被普遍承认的原则。然而欢呼这一原则的皮埃尔·勒鲁也承认：“作为事实的平等和作为原则的平等之间，存在着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天壤之别’。”[①]另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也尖锐地抨击：“堂而皇之的法律；‘形式平等’，实际上极不公正。”[②]比如美国的黑人问题，印度的种姓问题及许多国家经常发生的类似问题，正是这一极端选择所付出的代价。

“事实的平等”就是考虑到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现实，在政策上给予照顾、优惠和扶助。近年美国官方也开始考虑到这一问题，对某些种族集团实行极有限的“照顾”，如在教育机构为它们保留一定工作、位置。这种做法虽极其有限，但也受到广泛批评，有人说：“这种‘反歧视’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拒之门外，却允许那些不怎么够格的人，用他们这个团体很早很早以前受到的歧视来‘捞好处’。”[③]印度也是如此，近年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及社会上教育上“落后”的群体以“优惠”，如在教育机构保留位置，在公职上保留位置，也引起广泛不满。一些人认为，好处全让那些不够格的人得去了，这使“落后性”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照顾性的保留政策的扩大甚至激起反对者骚乱，1985年在古吉拉特联邦的骚乱持续了将近四个月，严重的暴力事件导致多人丧生[④]。再如巴基斯坦，自立国不久起就实行按民族分配名额招聘文官制度，后来这种照顾政策扩展到国营企业、自治或半自治的职工招收和高校招生等

---

①《论平等》，20页。
②《宪政与权利》，118页。
③《宪政与权利》，131页。
④《宪政与权利》，132~133页。

方面。自它实行以来,要求废止这一制度的呼声不止。批评者认为:它的问题在于"给了一些民族公平对待,另一些民族则失去了公平对待,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虑所暗示的地区或民族集团哪些为优等,哪些为劣等的令人反感的比较"①。

在资本主义国家,照顾、优惠、扶助被认为是种福利性事业,如论者所言:"倘若是为老、弱、贫、残谋福利而制定一些特殊的措施,适用这一原则该不会有什么严肃的反对,但倘若分类是基于种族(美国)或种姓(印度)则不免引起严重的争吵。"②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才会相当严肃地考虑和实现这种选择。在前苏联,由于列宁、斯大林的努力,进行这方面可贵的尝试。十月革命前列宁反复强调:"国内各民族绝对一律平等,任何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特权都应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事情。"③十月革命后,列宁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同大俄罗斯主义作斗争,他疾呼与之"进行决死战","绝对坚持"由各个民族的人轮流担任联盟中央主席,并主张"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一些,多温和一些","对待民族利益惟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④。如果说,列宁主要是基于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的扶助的话,那么斯大林则主要基于经济、文化上帮助少数民族,他提出的实际措施是:"1.研究落后民族与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2.发展它们的文化;3.向它们进行政治教育;4.逐渐而慎重地使它们与最高的经济

①[美]查尔斯·H.肯尼迪:"从招聘文官的名额分配制看巴基斯坦的民族政策",《民族译丛》1985年3期。

②《宪政与权利》,131页。

③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56页,65页,105页,110页,126页,153页。

④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522页,528页,523页。

形式结合起来;5. 建立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①

苏联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帮助取得一定成绩，许多少数民族从处于殖民地地位上的落后封建时代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阶段,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取得迅速发展。同1913年相比,1940年大工业的总产值在乌兹别克斯坦增加了6倍,在哈萨克斯坦增加了19倍,在格鲁吉亚增加了26倍,在吉尔吉斯斯坦增加了152倍,在塔吉克斯坦增加了323倍②。许多地方从前几乎都是文盲而苏联时期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发生根本改观。一位塔吉克作家谈到:"过去,也就是革命前,我们村里毛拉被认为是最有文化的人。不久前,我回到故乡,了解到如今那里没有文化的人只剩下了一个毛拉。"③但是这个成功的本身也是付出代价的。

首先,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民族利益,联盟中央主席由各民族成员轮流担任，这一要求其可贵之处在于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但未免多少带有空想成分而脱离实际。因为世上没有绝对的平等,也没有抽象的民族利益,其中有的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要求并非吻合;况且对于大俄罗斯主义来说族籍或许并不特别重要,列宁在批评奥尔忠尼启泽(格鲁吉亚人)、捷尔任斯基(波兰人)时就发现"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④。斯大林的族籍是格鲁吉亚,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化。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169页。

②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98页。

③转自王沛:"苏联中亚地区的宗教现状",《中亚研究》1984年1期。

④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525~526页。

其次，对少数民族的让步、照顾、扶助是必要的，但做过了头就可能变成民族"优先"，突出表现在大学招生、参加工作和干部晋升时过度放宽条件。1987年哈萨克共和国科学实践会议披露的材料表明，哈萨克族学生在高校比例已上升到75%，而当时哈萨克族仅占共和国人口的38%[①]。苏联学者批评这种"放宽条件"的照顾政策"使一部分居民产生了民族的特殊感和优越感，而在另一部分居民中则不断引起不满"[②]。

再次，"语言平等"、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有积极意义，但把它当做一种僵死的教条也有问题。学者指出："这一政策还有一些离奇可笑之处。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即在20年代建国时命名的某个民族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语言，或者已习惯于使用别民族的语言。然而，苏维埃政权却硬性规定，作为行政单位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拥有并使用一种自己的语言……更离奇的是，他们还组织一些语言学家把只有几百人的小部落才说的一些地方方言变成书面的文学语言。尽管很穷，苏维埃国家却把大量的力量和费用用于这种文化发展，有时甚至去无中生有地生造文化。"[③]苏联政府盲目地"弘扬""繁荣"民族历史文化，却对历史文化因素也可能激励封闭、狭隘、排他的民族分离意识起着消极作用，缺乏基本认识，其灾难性后果是始料不及的。连西方学者都看出："这点不可否认地应归功于苏联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得到了苏共二十大和在民族问题上鼓励自由化的人的推广。但这种功劳隐藏着危险。"[④]

苏联的瓦解是历史的悲剧，当然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多方

---

①《苏共民族政策的列宁主义原则和族际主义教育的紧迫任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97页。

②"苏联民族关系四人谈"，《民族译丛》1989年2期。

③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14页。

④同上，270页。

面的。这篇短文仅仅从民族平等的角度略加分析：一方面大俄罗斯主义搞民族不平等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没有疑义的；另一方面，在民族平等，特别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问题，同样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后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前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前南斯拉夫地区民族和民族关系历来就特别复杂，迄至20世纪初，在那里才出现第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王国，但那是个谁都不满意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领导的南共和前南各族人民在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高举民族团结大旗建立起南斯拉夫联邦。前南的民族政策是国内大小民族一律平等，这一政策的坚定实施，至少建国的前二十年在这个民族和民族关系特别复杂、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地方，大体实现了民族和谐。但是，前南斯拉夫平等基于民族群体的平等，即我们说的"事实的平等"，其特点是不断趋向极端化、绝对化。铁托在一次谈话中甚至"坚决反对关于少数民族的提法"，"因为，当人们谈到少数民族问题时，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有一种不平等的味道，似乎指的就是二等公民"①。前南斯拉夫学者解释说："在南斯拉夫的各级《宪法》中，非主体民族一词被用来指国外通常称之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集团，避免使用少数民族这个比较通用的词，是因为少数和多数从来不可能处于平等的地位。"②这种说法本身就令人困惑不解。少数和多数之说只是数量、比例的客观说法，何以有什么不平等的味道呢？主体与非主体之说反倒有主次之分，何以更平等呢？

其实，前南的主体民族(narod)有"本土民族"、"南斯拉夫的"

---

①《民族译丛》1981年增刊1，11页。

②[南]基罗·哈季瓦西莱夫："民族平等与社会自治"，《民族译丛》1981年5期。

民族之意，指的是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1971年后增加了“穆斯林族”，是为六大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包括narodnosti和nacionalnast。前者含义为“其祖国是南斯拉夫邻国的民族成员”，或“其成员生活在南斯拉夫而其种族发源地在其他国家的民族成员”，如阿尔巴尼亚人等；后者似乎指人数特别少的民族集团[①]。主体与非主体，本土与非本土，“南斯拉夫的”与“非南斯拉夫的”区分是根本区分，其理论意义在于，前者有建立民族共和国、并有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并独立的权力，后者就没有，至多有建自治省的权力；其实践意义则在于削弱塞尔维亚的“多数”地位。因为在许多塞尔维亚人看来，黑山、马其顿及穆斯林族都是塞尔维亚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塞尔维亚人在前南总人口就不是40%左右，而是70%左右。当然这种看法一直被南共批判为大塞尔维亚主义，对此塞尔维亚方面总不以为然。一位塞尔维亚著名院士著文道：南共“用党的决定制造新的民族，首先是黑山族，然后又用自治的名义制造出穆斯林族——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民族。这样就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和历史的分歧和对抗，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四分五裂”[②]。这种说法无论带有多大的情绪，但它生动地表明：大塞尔维亚主义在前南地区民族关系中是一个敏感而严重的问题。它的存在是南共实施绝对的“事实的平等”政策的最大障碍——至少铁托为首的前南共联盟是这样认为的。问题是历史上不仅有大塞尔维亚主义，还有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等等，特别是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斯洛文尼亚白卫军、阿尔巴尼亚族“民族阵线”对其他民族都有过民族压迫的残暴记录。塞尔维亚在

①郝时远：《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中的民族危机》，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63~65页。

②南多布里察·乔西奇：“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历史与现状”，《民族译丛》1991年5期。

南斯拉夫各民族中经济文化也仅仅是处于中间状态，它的惟一而重要的优势就是人口占“多数”。前南斯拉夫实现民族平等实践的主要倾向是通过分权、分立“抑塞”。

前南斯拉夫建国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并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六个平等的自治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此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还建有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自治省。六个共和国中的五个是按民族特征组建的，分属五大“主体”民族，因此共和国与共和国关系大体反映国内的主要民族关系。人口几乎是其他几个主体民族总和的塞尔维亚与其它五个主体民族都是处于绝对平等地位，在联邦民族院中塞尔维亚与只是其人口零头的黑山席位都是一样。当然这时的联邦制完全是苏联模式，联邦政府权力很大，共和国政府还徒有形式，缺乏实质性权力。中央集权虽然限制共和国的自主权，但却可以把任何形式的民族分立主义消灭在萌芽之中。

“情报局事件”发生后前南斯拉夫开始抛弃苏联集权模式，这首先从经济分权、自治着手，地方主义随之开始膨胀，染上民族色彩后，民族分立主义由此而生。60年代经济改革，联邦中央失去宏观调控职能，在向下放权的过程中，各共和国实行“权力截留”，扩大权力，实际上到了70年代形成八个权力中心(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八个市场，民族间经济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并迅速政治化。

60年代修改《宪法》大大扩大自治省的权力，塞尔维亚共和国实际上被一分为三。70年代初的修改《宪法》进一步提高自治省地位：自治省也按对等原则参与联邦机构，联邦主要领导职务轮流担任中，自治省也有一份。塞尔维亚和两个自治省在塞议会中实行“协商一致”原则，重大问题必须同自治省协商，否则决议不得通过。塞族的不满情绪由此日增，在铁托去世后便公开化。与此同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民族分立主义也随之急剧膨胀，彼

此的怨恨发展到公开的辱骂，最后在民族冲突和种族清洗的内战中共同葬送了前南斯拉夫。

因此，前南斯拉夫和苏联有着两种相反的动向，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支持：一个是贬低塞尔维亚，一个是抬高俄罗斯。抬高俄罗斯，引向大俄罗斯主义，当然是民族不平等；贬低塞尔维亚，意在遏制大塞尔维亚主义以求“事实的平等”，但如果是站在其他民族的狭隘、排它的民族主义立场，并走向极端，是不能达到和谐，而只能削弱民族间向心力而陷入不可挽回的民族分裂。前南斯拉夫与苏联殊途同归，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平等是人类美好愿望的追求，但民族平等总是相对的，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形式的平等”与“事实的平等”。如果说民族平等的选择是把双刃剑的话，那么“形式的平等”与“事实的平等”的选择是它的两面刃，无论怎样切都可能是对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或既得利益的伤害，这就是代价。“形式的平等”极而行之，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群体将无法摆脱落后状态，甚至更加落后，必然恶化民族间的关系。“事实的平等”极而行之，一方面是对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切身利益伤害过度引发更多的怨恨，另一方面诱导既得利益者的要求无止境，甚而导致失去活力而仍陷于落后，非但“事实的平等”良好愿望落空，付出的代价最终还是民族关系恶化。重要的是在诸多选择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得各方互谅、互让，以促进民族和谐和民族间向心力的加强，而不是导向民族分裂和民族向心力的削弱。导致民族分裂和民族间向心力的削弱的选择付出的将是最沉重的代价。“促进”、“导致”、“导向”，表明我们的选择还有个方向问题——这就是最后要讨论的选择的导向问题。

四、选择的导向

如前所述，只要处于多民族环境中，“形式的平等”和“事实的平等”的要求就可能存在，寻求这两个平等均衡的最佳点是付出最小代价的最佳选择，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最佳点并非静止、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它必然随之处于运动状态。尽管当前许多地方仍存在民族不和、民族对抗甚至民族冲突，但这只是历史的过程，总的趋向如同列宁85年前预言的那样：

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国际统一的形成[1]。

就是说，民族差别的消除、民族的最终消亡虽然还很遥远，但民族壁垒的削弱乃大势所趋，民族壁垒的削弱就意味着民族范式的淡化。在这一历史进步发展过程中，那种强调民族群体间“事实的平等”的要求势必弱化；与之同时，强调不分族籍公民个人的“形式的平等”的要求会推动民族范式的弱化。因此，这两个平等均衡的最佳点会因历史的进步朝着“事实的平等”弱化的方向发展。在这里选择的导向基本上有两个：一是长期固守、甚至强化“事实的平等”的选择，导向民族壁垒森严和民族范式强化，且愈来愈偏离均衡的最佳点。这是逆历史潮流的，当然要为此付出愈来愈多的代价。前南斯拉夫，还包括原苏联的一些实践，如果说一开始把“事实的平等”绝对化，就有一些空想成分，那么后来几十年一成不变，两个平等的失衡日益突出，民族分裂的总爆发就不是偶然的了。二是顺应历史潮流，在发展中追踪均衡的最佳点，可以使民族和谐、团结不断步人最深层次的和谐、团结，这应是可取

①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10页。

的选择导向。

结论简而言之：民族平等的选择导向，要面对现实、面对未来，顺应历史进步趋向，促使民族和谐再和谐。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巨大贡献，篇幅所限，将另专文讨论。

泛突厥主义文化观透视

一、历史简述

背景

泛突厥主义产生的背景复杂，分析起来，大体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突厥学的实践。当"突厥人"早已遗忘了自己的古文字和历史时，欧洲学术研究的发展开始发掘这谜一般的历史、文化，他们最先注意到的是草原上残存千年的古突厥文碑铭。事实上，欧洲学术界关于突厥和古代突厥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古突厥文的语言研究展开的。应该承认，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许多学术大师的研究态度是严肃的，也是非政治性的。但是"突厥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是有问题的：不加分析地接受波斯人、阿拉伯人的说法，机械地把突厥和突厥语族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粘连在一起，并试图从中探寻其历史、文化的"共同性"，并非科学。其中，俄国、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的一些学者治学路子存在严重缺陷，即以语言学研究取代、偷换历史学研究，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忽视了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和内涵的模糊不清。"突厥学"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不宜把"突厥学"简单等同于泛突厥主义，但其最大弊病在于实践上有意无意地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包装。

欧洲"民族国家"的理论及"民族原则"。欧亚草原早期的国家形式多为游牧行国，如突厥既是古代民族，又以突厥汗国闻名于世，但那些可汗的头脑中并没有什么国家和国民概念。中世纪是封建王朝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化后，民族观念与宗教混而为一。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宗教、民族和国家是同一的，如奥斯曼帝国，就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其首领苏丹因为自己当时的强大而自称哈里发，自认为对全世界的穆斯林有发号施令之权。18~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取得全面胜利，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近代民族在资产阶级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同步形成。这种国家与民族互为表里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导致新的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独立，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在这里，民族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下打破血缘、氏族、宗教联系和封建割据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nation)。这种近代西欧的民族观念、理论、原则，无论是不是普世公理，必然对东方产生影响。其实当时欧亚草原的"民族"(nationality)还滞留在血缘、宗教联系之下，但受西欧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影响，泛突厥主义以近代民族主义面目出现，只能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泛"思潮的兴起。西欧的民族统一运动发生在王朝国家和语言集团(一个用同一种书面语言的社会)及在地理上基本一致的地方。其经济基础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些语言发展和阻碍在文艺上巩固这种语言的一切障碍。"但是1848年以后，它发展的一般趋向是追求强盛，和使每一个用文化与种族纽带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其极端走向是对政治权力的疯狂崇拜，对种族优越学说的盲从，以及对民族荣誉的幻想。如果说当时的泛意大利主义是一般趋向，那么俾斯麦时代的泛日耳曼主义则是极端走向。在西欧"泛"主义影响和推动下，泛斯拉夫主义首先发端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萨格勒布。尽管斯拉夫人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相分离，但自以为的共同的起源和语言，泛斯拉夫主义得以崛起，其中披着泛斯拉夫主义外衣的大俄罗斯主义愈来愈具有好战的种族主义色彩，正如恩格斯指

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1]泛突厥主义的应运而生，既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威胁的反抗，又受到它的启蒙。

这样，泛突厥主义在突厥学的实践，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理论、"民族原则"和"泛"思潮(特别是泛斯拉夫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的发生。

发展的四阶段

泛突厥主义自诞生以来的一个世纪里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兴起：俄国的"鞑靼斯坦"。泛突厥主义以"大土兰"思想为先声。匈牙利东方学者万伯里1865年写道："既然由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联系了众多同胞，为与实际相符，突厥王朝即奥斯曼王朝就应当建立一个从亚德里亚海滨直到中国的帝国。"以"大土兰"思想为先声的泛突厥主义在当时的匈牙利广为流传，而真正落实成一种思想运动则首先在俄国统治下的"鞑靼斯坦"。"鞑靼"原为蒙古各部的泛称，13世纪后随着蒙古人西征逐渐传遍整个欧洲。16~19世纪"鞑靼人"成了俄国境内使用突厥语各族的泛称，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南俄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受俄国人统治最长，受大俄罗斯主义压力最大，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处于异族包围之下，反抗精神最强。18世纪以来鞑靼人中开始出现活动积极的商业资本集团，并开始同俄罗斯商业资本展开竞争，针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泛突厥主义恰为这个中产阶级提供合适的思想武器。

克里米亚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1851~1914年)、玉素甫·阿克楚拉(1876~1935年)，高加索鞑靼人阿里·胡赛因扎德(1864~1941

---

①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卷。

年)是早期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中伽思普林斯基名声最大，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教育、语言改革和报刊宣传。为了与沙俄当局和守旧的穆斯林毛拉对抗，把自己的泛突厥情结表达得十分小心，主要体现在他那句经常重复的口号："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三统一)。"他出版《译文报》，积极推销一种自己制造的介于奥斯曼语和鞑靼语之间的"共同语"，身体力行地参加当时鞑靼伊斯兰的"扎吉德"宗教改革运动。"扎吉德"意为"新的教学法"，主张用欧洲方式改革伊斯兰教学校，他的泛突厥主义就是在"扎吉德"运动中与泛伊斯兰主义找到了联系的纽带。1905年以后他的活动向政治化显露。他组织俄国的"穆斯林联盟"、"促进穆斯林文化发展协会"，其公开宗旨是把俄国全体穆斯林团结在共同语言的旗帜之下，小心翼翼地用泛伊斯兰主义掩盖他的泛突厥主义。把泛突厥主义主张由文化转向政治的则是伽思普林斯基的亲戚阿克楚拉。他深深卷入了1905~1908年俄国泛突厥主义政治活动，明确主张把所有突厥集团结合成民族同盟。而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教授(1890~1970年)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曾积极活动于1916年"杜马"，十月革命时组织"突厥斯坦民族委员会"，总部设在布哈拉，目标是在中亚地区——布哈拉、希瓦、费尔干纳、谢米列契(七河)等地建立一些独立国，然后将他们联合起来，实现宏伟的泛突厥计划。十月革命前后，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拉、托甘等鞑靼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事业，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事实如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加比杜林和阿尔沙鲁尼所指出的："泛突厥主义是俄国现实的产物，它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只是找到拥护者和崇拜者。"

土耳其：重新发现了"突厥"。当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奔走呼号之时，土耳其还沉浸在苏丹哈里发哈米德二世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知识精英认为"突厥"一名带有某种贬义，因而选择了"奥

斯曼主义"型的民族主义。在欧洲突厥学影响下，土耳其开始重新发现"突厥"，发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发现了他们语言的丰富多彩和文学的绚丽多彩。法国人德·居涅关于突厥、匈奴和蒙古的历史著作，英国人拉姆利·戴维斯奉献给苏丹的《土耳其综合语法》在土耳其知识界引起震动，他们似是而非地获悉了诸如此类的虚幻的臆想："欧洲历史上的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他们是突厥人最早的祖先"，"突厥这个名称是指分布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和西伯利亚内地的一个重要民族"，"世界上如今有八千万到一亿源自突厥的人民。这个不断增长的突厥大众生气勃勃，将永远存在、增长下去"，等等。

如果说伽思普林斯基是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的鼻祖，那么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年)则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祖师爷。他先是写诗召唤"突厥人的故乡既非土耳其，也不是突厥斯坦，故乡是块广大、不朽的地区——土兰"，以毫不含糊的泛突厥口号号召摧毁俄国。他在泛突厥主义地位的奠基之作是《突厥主义原理》，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第一部使泛突厥主义系统化、条理化的经典。孜牙·乔加勒甫认为突厥人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可分三类：(1)土耳其境内的突厥人；(2)乌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的土库曼人，基本上具有与土耳其突厥人一样的共同文化，与土耳其合起来形成乌古思斯坦；(3)雅库特、吉尔吉斯、乌兹别克、钦察、鞑靼等较远的突厥人，他们具有悠久的语言和血缘关系，与突厥文化相近但不相同。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大突厥斯坦"或土兰。按照他的看法，只有第一类即"土耳其主义"已成为现实，那就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二类"乌古思主义"将来也许可能成为现实；而第三类包括1亿人民的"土兰主义"则要等待遥远的将来。以上列出的土兰的小、中、大方案，其理论表述达到一定深度，原先狂热的泛突厥情绪有所冷静，他的"突厥主义"实际上是由泛突厥主义后撤到土耳其主义趋向。

奥斯曼帝国末期，各种思想争相兜售的市场上，泛突厥主义只是被谈论到的几种思想之一。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青年土耳其党为了制约受到苏丹哈米德二世大力扶植的泛伊斯兰主义，首先选择奥斯曼主义。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实际上行使三种并行的政策：奥斯曼主义仍然是国内政策的基调；突厥主义是处理与俄国鞑靼人关系的基础；泛伊斯兰主义则是与帝国内阿拉伯人及北非、中东其他地方穆斯林关系的基石，但愈来愈倾向于泛突厥主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与德国结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之一杰马尔日帕夏(1872~1922年)说："就我而言，我首先是个奥斯曼人，但并没有忘记自己也是个突厥人，而且任何东西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念，即突厥种族才是奥斯曼帝国的基石。"三雄中的另一位恩维尔·帕夏(1881~1922年)对泛突厥主义最为热情，他坚信这个主义作为一种扩张主义政策在将来有特别重要作用。他一直梦想建立从土耳其到中国的以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大突厥国。奥斯曼帝国参战并倒向德国同盟国一边，据说与恩维尔的泛突厥情绪有关。十月革命时，恩维尔·帕夏指挥土耳其军队加人干涉俄国革命的活动。1921年恩维尔·帕夏为实现他的撒马尔罕之梦，窜人中亚亲临指挥巴斯马奇匪帮反苏维埃的叛乱，毙命于战场。

发展：一次次失败的记录。俄国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继续发展，泛突厥主义分子分别进人两个对立阵营：一是站在白卫军一边的巴斯马奇叛乱。巴斯马奇的社会基础是中亚的反动封建巴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两面旗帜。巴斯马奇匪帮一度横行中亚，气焰嚣张，但不久便被彻底扫荡和镇压下去。一是进人苏维埃政权内部，其代表人物是曾高居民族事务委员部委员的鞑靼族俄共党员苏丹·加里也夫。苏丹·加里也夫派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作为"同路人"参加革命，但是他们认为："对于我们来说，需要付出代价的是欧洲革命和

推翻帝国主义，而苏维埃政府只是暂时存在的"，其目标是促进苏联东部地区"土兰国家"的形成，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诚然，苏共在处理苏丹·加里也夫事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放整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些做法，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矛盾，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泛突厥主义受此沉重打击，至苏联解体，也未形成有组织的活动。

泛突厥主义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纲领如总统凯末尔宣布的："伊斯兰团结和土兰主义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原则或必然的政策。因此，新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是坚持独立，立足于土耳其民族边界之内自己的主权之上"，是为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官方一般不赞许和鼓励政治性的泛突厥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族统一主义因素。这时，第一代泛突厥主义骨干分子有的已相继去世，有的改辙易帜向凯末尔主义靠拢，但是泛突厥主义在文化领域仍根深蒂固，一有机会便要表现。30年代德国法西斯在西欧横行，新一代的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分子开始活跃，其代表人物是胡赛因·尼哈勒·阿齐兹(1905~1975年)、纳查德·桑查尔(1910~1976年)、雷哈·乌古思·蒂尔罕（1920~？）、奥尔汉·赛义菲·鄂尔浑(1890~1972年)。他们都有自己的半秘密的小组织，并出版刊物。其中只有鄂尔浑重复着伽思普林斯基的"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的较温和口号，其他都有反苏、反共和露骨的极端种族主义倾向。蒂尔罕办《苍狼》杂志，以"苍狼分子"声名狼藉，他的口号是"突厥种族高于一切"，"突厥种族优于其它种族"。阿齐兹摆出一副类似希特勒的架式，呼喊着："关键是突厥的团结，而民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血统问题。"当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时，这批泛突厥的种族主义者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土耳其加盟轴心国向苏联宣战，1944年5月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自我败坏了名声。第二次大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的活动集中在从泛突厥角度反共、反苏、反华。阿齐兹1950年为泛突厥

主义者重新定义为："一个突厥人，他相信突厥种族的无比优越，尊重民族的历史，准备为突厥集体牺牲，为反对不共戴天的仇敌莫斯科而牺牲。"但土耳其政局经常动荡，时常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这些极端政治性泛突厥活动的空间并不大，泛突厥主义只得在文化领域出没。1965年，在管制松动之时，泛突厥主义控制了保守的共和农民与民族党，后改名为民族主义行动党，企图以堂堂正正的身份跻身于土耳其的政治主流中，但是活动空间仍有限，到1969年在国民议会450席中只占1席，被认为是极右翼，毫无群众基础。1980年军事管制后，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被取缔，泛突厥主义只得又退到文化领域中藏身。总之，十月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泛突厥主义在苏联完全被扫荡，而在土耳其虽一再向政治领域冲击，但只留下一次次失败的记录，大体上藏身于文化领域里发展。

后冷战时期：极端地反现政府。苏联解体，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五个被认为"突厥语国家"独立，给泛突厥主义分子以新的兴奋点。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曾在世界上引起一片哗然。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更是直言不讳地鼓吹实现从南斯拉夫到中国的"突厥斯坦"的"三统一"（语言、思想和行动统一），他特别强调说："突厥化、现代化和伊斯兰化"这一口号涵义已反映在阿塞拜疆的国旗上。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在土耳其又被重温起来。但是，从独立喜悦冷静下来的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愈来愈不感兴趣。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他的新著《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写道：土耳其总统与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不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强大突厥国家联合体"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让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然而，世上只要发生风吹草动，泛突厥主义总要向

政治领域蠢蠢而动，这已成为一条规律。90年代后半期，“三个主义”，即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在中亚崛起，成为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等极端组织愈来愈活跃，对中亚国家现政府构成极大威胁。然而，分析家认为：IMU的政治目标依然含糊不清。其缺陷在于，圣战是它的惟一选择，它还没有其它政治形式可以借用。然而2001年5月传来的消息是：IMU头目纳曼干尼组建新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该党将目标定为在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穆斯林聚居区新疆，实现伊斯兰化。IMU的这一新的政治定位非常引人注目。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府官员以及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媒体纷纷评论说：IMU近来扩大了它的目标，并宣称组建了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据此，重新命名的新运动如今将新疆和克什米尔的分裂主义分子招募其中，以便于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其目标也被认为是建立一个东起西中国，西至里海的伊斯兰国家。面对各方舆论反映强烈，一位IMU的高级领导人说：“我们的组织并不仅仅为了乌兹别克人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伊斯兰组织，成员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甚至维吾尔人。”IMU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杂烩，以泛突厥主义整合力量，是它的一个政治选择。看来，泛突厥主义对于这一地区各种反现政府的极端势力是有较高的政治利用价值的，换句话说，当代泛突厥主义的新动向——极端地反现政府，它也生动地体现出中亚的“三个主义”正在寻求合流。综上所述，泛突厥主义迄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大体可概括为：

1. 作为对泛斯拉夫主义反应的俄国鞑靼斯坦的“语言、思想、行动”的“三统一”活动。

2. 19~20世纪之交，奥斯曼精英“重新发现”的泛突厥的历史文化。

3. 十月革命以来，从土耳其、中亚到新疆的以反共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活动。

4. 后冷战时期的极端地反现政府活动。

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主义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以后，不仅沦为极右翼反动思潮，而且对许多国家的安全、稳定乃至生存构成威胁。

二、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内容、本质

存在决定意识，一定的文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扭曲的反映。当然，泛突厥主义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有各自的特点。即便同一国家、地方的同一时期，泛突厥主义者因立场、观念差别，宣传、鼓动着不尽相同的内容，因此它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严密的文化观。我们只能从其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国家观几个方面就泛突厥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的比较中进行大致的归纳、分析，以探讨其文化观念的本质。

民族观：语言因素和种族主义色彩

泛突厥主义属于民族主义范畴，因此，如何认识"民族"、"突厥民族"，以及这样的认识的意义，对于分析泛突厥主义文化观至关重要。比较系统地"阐述"上述文化观的是泛突厥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孜牙·乔加勒甫。

第一，他认为，民族最重要的联系是教育和文化，也就是思想感情，具体地说是母语。他特别引述了土耳其农民的表述："民族即他的语言就是我的语言。"他还批判种族、血统、地缘泛突厥主义，认为民族不是种族、血亲、地缘环境、政治和意志的集团（五个"不是"）。

第二，他认为："突厥"是一个民族的名称，一个突厥人只能有一种语言和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应承认为土耳其民族作出伟

大贡献的人为突厥人,应承认那些自称"我是突厥"的人为突厥人(两个"应承认")。

第三,他认为强化上述民族意识意义重大,因为"一个民族一旦获得一种民族意识,它就不可能长期甘于被奴役的地位,迟早都要赢得自身独立,成为一个同质、联合、独立的政治统一体"。

看来,孜牙·乔加勒甫的民族定义的核心是语言;民族观的要害是民族分离、独立,现实目标是突厥主义,即土耳其主义;中期目标是乌古思主义,这实际上是泛突厥主义;远景目标是大土兰,即超级的泛突厥主义,至于五个"不是"和两个"应承认",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策略和手段。他精心设计的这种理论体系貌似精致,在语言因素和独立意识上打有西方民族理论的深深烙印,但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关于语言因素,学者有透彻分析:"语言……在欧洲民族主义盛行时期,语言比其他任何标准都更经常地被援引,不像地理;语言是人类现象,不像历史是连续性的,并可以表示许多事件和人物,语言把人类分成若干不同的集团。此外语言更紧密地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现代性意味着互相依存,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之间的语言和书面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如此,我们有几个理由说,语言不是民族的一个恰当的标准。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政治形式的语言与语言形成的政治同样多。例如,欧洲的语言划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0~15世纪的王朝疆域。在世界的其它许多地方,语言区域作为现代民族的恰当背景既显得太小(赤道非洲)又显得太大(拉丁美洲、阿拉伯中东)。如果把世界语言区划图与60年代的政治疆域作比较,结果会发现二者大致的重合处仅仅有20多个国家,而且它们主要在欧洲。"其实,最要命的是,关于语言因素的沉闷的说教,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民众就太抽象、费解。如何"面向大众"是泛突厥主义者认真考虑的问题。这样,最有煽动性的种族主义成了他们的重要选择。

尽管孜牙·乔加勒甫小心翼翼地避开种族主义,但其民族、种

族至上的观念是固有的，比如他就情不自禁地宣称："对于我们来说，突厥文化是已经出现和将会出现的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最优美的文化。"尽管有孜牙·乔加勒甫的告诫，但他的同志一个比一个热衷于种族主义鼓吹。伊敏·尤尔达迪勒为"突厥种族"讴歌，阿克楚拉鼓噪要把"突厥种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阿齐兹呼吁"突厥团结的关键是血统问题"，蒂尔罕声称"突厥种族高于一切，优于其它种族"，等等。他们甚至摆出一副希特勒的架势声嘶力竭地论证："血统是突厥种族最好的，或许还是惟一的纽带，这个种族伟大、辉煌，优于其它所有种族，因而最大的危险就是在突厥血统中混进其它的血统。"

归纳起来，泛突厥主义民族观中极端的语言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种观念深奥，令人费解，因此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泛突厥主义者以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煽动、蛊惑一般民众，他们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其心理是相当阴暗的，其民族观念是反动的。

宗教观：与泛伊斯兰主义并无实质区别

泛突厥主义在俄国"鞑靼斯坦"最初发生时，横在其面前的主要有两个障碍：沙俄专制制度和守旧、反动的伊斯兰宗教界。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它表现得极其软弱，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喀山的泛突厥主义者以穆斯林身份游行示威，高唱俄国国歌，为沙皇的健康而祝福，"表现了空前的爱国热情"。伽思普林斯基在推行泛突厥主义的"三统一"运动时，在向守旧、反动的伊斯兰教交锋的同时与泛伊斯兰主义达成同盟，在"扎吉德运动"(新的教学法)中找到联系的纽带。他们在1914年写道："原来，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吉尔吉斯人、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以及逊尼派、什叶派都是统一的穆斯林，是手足同胞，具有共同的需要，尽管生活各异，也曾彼此为敌、相互残杀，

但仍然是同胞兄弟，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和睦相处。"事实上，这些泛突厥主义分子没有与宗教狂热分子认真交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根本立场，在"扎吉德运动"的旗帜下，泛突厥运动在鞑靼知识"精英"中逐渐发展，同泛伊斯兰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一直到最后也没同它公开分裂，只是偶尔对它有所攻讦，大多数情况下用泛伊斯兰外衣小心谨慎地掩盖泛突厥真面目。

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理论家孜牙·乔加勒甫十分看重伊斯兰宗教的作用，他在谈到土耳其农民关于"民族即他的语言就是我的语言"的同时又强调"他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但他对泛伊斯兰主义关于"民族是穆斯林的总和"有异议："穆斯林的总和只能称为同一体，而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甚至认为："政治经验告诉我们，泛伊斯兰主义实际上阻碍着穆斯林民族的进步，也阻碍着他们赢得独立。"但他更多地强调："一个民族要么是东方的，要么是西方的，就像一个人不能信仰两种宗教"，"突厥主义者希望在保持突厥人和穆斯林本色的前提下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进入西方文明"。

作为十月革命"同路人"的苏丹·加里耶夫派认为："在民族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协调一致，因为从伊斯兰教观点看，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存在的。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宗教和民族是同一的。在伊斯兰教教义面前，只有惟一的国际伊斯兰教，只有一切民族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当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识完全是错误的，其实他们大体上是坚持伊斯兰正统的宗教观，而政治化倾向是明显的，如他们所言："对于我们鞑靼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如果说得更广泛些，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生存问题，以及所有受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

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那里，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一体的，正如他们的典型口号所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

教是伊斯兰教。"他们蛊惑人心的煽动是:"如果我们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话,就会被同化和消化掉。"

归纳起来,泛突厥主义的宗教观,它与泛伊斯兰主义并无实质区别。泛突厥主义者面对伊斯兰教在突厥语族广大群众中有广泛、深刻的影响的现实,从来就未打算同宗教界人士占统治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体系决裂,相反地尽力加强同他们的联系,有时简直就像个泛伊斯兰主义者,有意不表现出泛突厥主义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时候则充分地利用伊斯兰宗教,从事极端政治活动。

历史观:社会唯心主义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是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则是人们的主观行为,它既可能是科学的严肃的学术活动,又可能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特别是政治目的的臆造、伪造历史的行径。历史对于极端民族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

和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一样,泛突厥主义十分重视历史,但那纯粹是一种虚构、臆造的历史。和近代的"泛"思潮相同的是,泛突厥主义在寻找共同根源时,意图"重新发现"突厥的悠久历史文化,把这种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实体,充做证据,来证明与其它文化不同的、超越其它文化的某种共同遗产。泛突厥主义把重点放在语言、历史和文学上,其重要性显然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列。对于许多泛突厥主义者来说,存在"共同语言"足已证明讲这种语言的人全都是同一民族的成员,但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要从历史、文学、文化、神话、传说,甚至是自己头脑中臆造的东西来证明这一点,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他们认定为不容争辩的"历史证据"。他们采用的是历史循环的论证方法:一是"寻找",二是声称"已找到",三是立即证明了自己瞎编的"证据",从而"重新发现"、"确认"自己的历史文化,并以此创建包括自己愿意认定多少就是多少的同胞在内

的"民族"及"民族国家"。因此,他们可以信口开河地狂呼:"啊,突厥种族!啊,铁与火之子!啊,一千个祖国的创建者!啊,一千顶王冠的佩戴者!"现实并不存在的"突厥民族",但在他们笔下生花,成了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的东西。

泛突厥主义理论家孜牙·乔加勒甫在阐述自己的历史观时毫不掩饰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拜倒在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唯心主义之下。他乞求"突厥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源于"集体表征"。什么叫"集体表征",他宁愿用实例来解释。他们这样论证:在1908年以前,土耳其虽然生活有大量突厥人,但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还没有"我们是突厥民族"的观念,所以突厥民族也不存在。但是一旦宣称"我们属于突厥民族",我们就应该在语言、艺术、道德、法律甚至神学、哲学中显示出与"突厥民族"的文化趣味和意识相应的独创性。所谓"集体表征"并不仅仅限于集体概念,神话、史诗、民间故事、传说、轶事、教条、道德、法律、经济及技术规划、科学、哲学观点等都是"集体表征",甚至被看作是与信仰和理论相对的宗教仪式和实践活动也是"集体表征"。"集体表征"在巨大危机关头被强烈的感情激发后就获得惊人的力量和威力,这时它们被称为"思想"。而"思想的形成和建立依靠于享有巨大道德影响的天才、救世主。现在我们就拥有这样的天才、救世主"。孜牙·乔加勒甫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以天才、救世主自居。他的"思想"就是:"危难之间,何以救世主首先的任务必须毫不停顿地在我国(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唤醒和增强民族意识。因为民族意识不仅是所有进步的惟一根源,也是民族根源和基石。"这就是泛突厥主义历史观的功能和实质。

国家观:大突厥国家大到什么程度

泛突厥主义者的言论中最热衷的词汇是"故乡"、"祖国",如前所述,他们的共同嗜好是突厥种族的统计数字,对于散居于欧亚各

国“突厥血统”的统计数字从5 700万、6 500万、8 284万、9 920万到1亿，甚至1.5亿不等。突厥主义、乌古思主义、泛突厥主义、大土兰主义，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对于泛突厥主义“泛”到什么程度，大突厥国家大到什么程度的限定。这归根结底首先是跨国民族统一主义。以色列籍学者雅各布·莫·兰道的研究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是："民族统一主义是近东、中东一种久已有之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某个民族国家对居住在边疆之外的同一血统的少数民族的幸福，从思想意识或组织行动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比较温和的民族统一主义只是要求保护那些少数民族免遭歧视和同化，比较极端的则公开声明其目的在于兼并那些人所居住的领土。这种现象虽然不算非常普遍，却也比认为要更加广泛。迈伦·韦纳教授曾就巴尔干人的情况对这一问题做过简略分析，但他所述也大多适用于后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在那里，民族统一主义主要表现为泛突厥主义思想。泛突厥主义运动的主导目标是：在仍有确实是或者认为是源自突厥的民族之间，造成某种文化或实质的，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联合，不论其是否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后来是土耳其共和国）疆界之内。”

雅各布·莫·兰道的上述研究确实十分透彻，但他主要就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而言，至于亚欧各国的泛突厥主义而言，则是自称突厥民族的民族分立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统一、完整都构成威胁。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所谓“突厥语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只是主体民族为操突厥语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则是民族国家的构建，泛突厥主义对其独立和统一也是威胁。因此，泛突厥主义的国家观只对土耳其有政治利用价值，除此之外不会为任何国家欢迎。

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最终还是归结为破坏国际关系和秩序的国家观，所集中体现的文化观，本质是不合时宜，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端民族统一主义和极端民族分立主义，不过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既不受群众欢迎，也得不到各国现政权支持，因此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三、泛突厥主义文化观的特点与批判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这里所谓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一般政治性的宣判，而是在有理有据的分析基础上的冷静价值评估和判定。本文关注的是有关泛突厥主义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及其是非，至于那些诸如突厥语言学的考证、研究成果的纯学术价值评判，则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

评判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依据。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在评判泛突厥主义文化观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应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封闭而又超时空的意识形态

文化是人创造的，它往往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文化又是开放的，文化一旦产生，就必然发生交流。人们一旦发现一种文化的好处，就必然会学习，即使在遥远的古代，民族间也在交往，从古到今，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周恩来指出：“各民族间互相侵扰，本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2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是件坏事情，但在客观上也产生过好的后果。它造成了民族杂居，进而互相通婚、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各民族的长处容易结合起来。"[1]毛泽东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2]。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开放性的经典论述。

文化泛突厥主义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否认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具有发展活力的机体；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加强文化交流和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双方互利的过程；毫无根据地随心所欲地把所谓的"突厥文化"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最伟大的"、"最优越的"、"独一无二的"，而把其它文化说成是"文字落后"、"文化落后"、"愚昧好战、侵略成性"、"所到之处是一片废墟，不可能使文化繁荣"。孜牙·乔加勒甫这位最大的泛突厥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而文明是国际的，二者很难相融。在他看来，文化是"突厥人"的根本，泛突厥主义者的使命就是发现、发掘这个最伟大的、最优美的"突厥文化"。这种把文化与文明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奇特的，但正是在"捍卫突厥文化的特性"的信念下，在文化价值观念取向上表现出强烈的封闭性，严重阻碍操突厥语诸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文化泛突厥主义在表现强烈封闭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反历史的超时空观。虚构、臆造、附会、猜测、夸大、假托历史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按照他们的说法，突厥的历史有1万年以上，比古埃及的历史还早5 000年，"突厥祖国"的界线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

---

①《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民族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149页。

②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这完全是毫无史实根据的虚构、臆造、附会、猜测。

事实上，关于突厥起源、先世的传说虽然古老，但突厥部落联盟之强盛，初见于史籍在公元6世纪中叶。其时，包括突厥部落联盟在内的操突厥语诸部落还是游牧于亚洲北部草原上的游牧民。历史考古资料表明，操突厥语的一些部落大规模地南下中亚—塔里木盆地，并改变其游牧方式转入定居，与当地操伊朗语的农耕居民融合，则是在8~9世纪以后的事。现代操突厥语民族有几十个之多，它们语言相近，文化上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地方，但这是生活在这一广阔地域的许许多多古代部落长期以来比较频繁地相互交流、交融的结果，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尽管它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共同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历史进程，还是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现代民族：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卡拉卡尔帕克、土耳其、阿塞拜疆、鞑靼等。其中有的早已与所在国的主流文化融为一体，如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裕固族和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泛突厥主义的所谓"突厥文化共同体"是超时空的，由此直接引发两个问题：一是模糊居住在不同国家、并在文化上已经或正在融入所在国主流文化的操突厥语诸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为在这些国家策动民族分裂提供所谓的文化背景。二是否认当代操突厥语诸民族的现实存在，从而对那些被认为是"突厥语国家"的主权国家本身的存在构成威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危害和破坏有关主权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恶化和毒化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因此这种封闭而又超时空的意识形态，不仅阻碍操突厥语诸民族本身的进步，而且也是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反动。

封闭而又超时空的意识形态，完全是对历史的玩弄。历史应

该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但文化泛突厥主义搞的则是地道的伪学。如学者所指出的："历史通常像个标签储藏库，民族主义者本能地从中挑选他们所需要的标签。由于他们的历史浪漫主义，他们常常曲解以至杜撰刚刚过去了的崩溃了的朝代或外来入侵的社会历史。因此，悠久历史的荣誉感（真实的或想象的）便成了他们为美好未来而进行的斗争中反对刚过去的社会帮手。'忘记，而且——我敢说——曲解历史，是创建一个民族的必要因素'。"

文化泛突厥主义从来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诗人，如其所言："啊！突厥种族！啊，铁与火之子！ 啊，一千个祖国的创建者！啊，一千顶王冠的佩戴者！"——这正是他们"重新发现"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浪漫主义"。恩格斯抨击泛斯拉夫主义是"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1]。其实，泛突厥主义作为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应，同样也是从几个操突厥语民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的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

狭隘、排他的种族沙文主义

文化泛突厥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突厥文化"无比优秀与种族、血统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尽管孜牙·乔加勒甫小心翼翼地避开种族主义，但他的同志一个比一个热衷于为种族主义鼓吹：

——突厥种族高于一切（泛突厥主义杂志《额济纳河》封面上的座右铭）。

——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泛突厥主义杂志《苍狼》的座右铭）。

——坚信突厥种族的无上优越，不断从各方面促进突厥主义

①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卷，第56页。

（蒂尔罕语）。

——一个突厥人，他相信突厥种族的无比优越，尊重民族的历史，准备为突厥集体牺牲（阿齐兹语）。

——种族泛突厥主义最为可行（里扎·努尔语）。

种族泛突厥主义坚持认为血统是突厥种族最好、或许还是惟一的纽带，这个种族伟大、辉煌，优于其他所有种族，因而最大的危险就是在突厥血统中混进其他血统①。这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种族，什么是民族。种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人群集合体，而且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人群划分单位。种族是指对人类体质形态在"生物因素"上的划分，民族则是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历史（社会）因素"上的划分。一个种族可以包括不同的民族，如我国北方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大体上同属于东亚人种；同样，一个民族中也可以包括不同的种族，如我国的汉族就包括东亚和南亚两个人种。

种族和民族容易混淆的部分原因是，种族是以人的体质及遗传的血缘关系来划分的，而民族内也常常有着婚姻血缘上的规定，表现出某些血缘联系。但这两者的血缘联系的内容和实质是不同的。种族的血缘联系是受到地理环境的自然隔离而形成的，而民族的血缘联系却受着宗教、文化、经济及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的限制和规定。随着人类交往的增进，自然地理不再是严重障碍，民族的"纯粹"血缘，即便是在相当古远的年代也是不存在的。就现代操突厥语诸民族而言，自最东部的东西伯利亚勒拿河流域的雅库特人到西部的鞑靼人、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在人种上明显地表现为蒙古利亚人种向欧罗巴人种的渐进过渡。

体质人类学者研究认为："维吾尔族的种族组成（人种成分）并

---

①雅各布·莫·兰道：《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民族统一主义研究》，《"双泛"研究译丛》第二辑，新疆社会科学院，1992年。

不单一，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新疆维吾尔人中，除中亚两河类型外，还存在接近南西伯利亚类型的成分，这是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混杂类型。""如和田和于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邻近地的维吾尔人比较接近中亚两河类型，沿叶尔羌河中游、柯坪、阿克苏和法扎巴德的维吾尔人以接近南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种占优势，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地区可以追踪到这种类型存在。在中亚的西南地区，也可能包括新疆的帕米尔地区可能分布有接近印度—阿富汗(地中海东支)类型因素。而在罗布泊一带操突厥语的维吾尔人中，还可能存在华北类型的渗透"①。因此，仅仅根据语言因素，虚构出一个"突厥民族"就十分荒谬，再进一步臆造出一个纯粹的"突厥血统"就更加荒谬绝伦。

把民族混合于种族进而宣扬种族至上论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人类种族在智力和道德发展能力上不相等，种族差异决定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是与一定的社会阶级结构相联系的。从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囊括全球的殖民体系从发展、形成到衰落的时期，这也正是种族主义从开始理论化到被唾弃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纳粹分子臆造了雅利安人是"优秀种族"的神话，种族主义达到顶峰，被他们无辜杀害的犹太人达600万人之多，举世震惊。种族主义因而被认为是人类生活中的灾难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

平心而论，说泛突厥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也未必准确，但是

---

①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156~157页。

即便是在最不主张种族、血缘论的孜牙·乔加勒甫那里，所谓与"突厥血统"联系的"突厥文化"优越论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泛突厥主义一再划地为牢，但他们的狭隘、排他的种族论并非独创，在早期显然受到泛斯拉夫主义的狭隘性、排他性的启示，在后期则更多地受到法西斯种族论的鼓舞。

泛突厥主义属于民族主义范畴。民族主义大致可以划分成"国家的"、"社会的"和"种族的"。"国家的"，大体相当于一般意义的爱国主义，是由主权国家支持的，并囊括其全体国民而无视其族裔或文化背景；"社会的"，是包括拥有共同的(民族的)文化身份的全体民众的；而"种族的"则是建立在被认为拥有一个共同祖先和独自的血统基础之上的，它有着强烈的狭隘性和排他性。泛突厥主义虽然主要从社会语言因素入手，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总是情不自禁地强调所谓的"突厥血统"，然而这种"突厥血统"本身就是虚构的、捏造的，因此其狭隘性、排他性又是盲目的异乎寻常的极端和反动。

泛突厥主义文化观念取向尽管很庞杂，但它还是有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苍狼。苍狼就是它的旗帜、灵魂，总的文化取向集中表现出狭隘、排他的沙文主义，既是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蔑视和排斥，又是对逆历史而动的诸如种族文化观的欣赏和顶礼膜拜。因此这种文化取向，对操突厥语诸民族的现代化转型，不是福祉，而是祸水。

腐朽、没落的贵族"精英"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表现在观念形态上的文化中的社会意识形态部分，如哲学、宗教、历史、法律思想、道德伦理、政治思想和相当多的艺术作品，带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因为在阶级对立还存在的社会中，阶级、政治制度的分立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分立。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

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1]列宁认为,每个民族里面有两种文化成分,一是劳动群众的文化,一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资产者的整个利益要求散布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2]。劳动群众的文化,既表现民族前进的方向,又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是整个民族根本利益的体现。贵族"精英"文化,往往脱离劳动群众,甚至与之对立,是对整个民族根本利益和历史潮流的反动,因此是腐朽的、没落的。

泛突厥主义形形色色,但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的鼓吹者、奔走呼号者、身体力行者,始终是凌驾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上的一小撮贵族"精英"。其所谓"突厥文化"既是超时空的,又是超阶级的,根本上是腐朽、没落的"精英"文化。

如前所述,泛突厥主义首先是从书斋中发起的,在它的发展历史中,其积极成员始终是一小撮自称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兰道研究认为:"它一直是个小范围的、精英分子的运动,由知识分子领导,受到学生及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在所有'泛'运动中属于相当典型的一类。它的规模很小,经常可能只有几百到一两千、两三千人……与其他许多'泛'运动一样,泛突厥主义也绝少有效的组织,各个团体间争吵不休。分歧并非由于最终的目标不同,而是产生于个人的对立和战略、战术的不同选择。此外,由于其特点和人数很少,泛突厥主义者大多使用文字宣传即小册子和大量杂志。但这些杂志寿命都不太长,短的仅能存在几个星期,较长的也不过有几个月。除了出版各种资料外,还举办文化与艺术集会,包括讲演、音乐、演出等等。但所有这些东西以及召开大会、组织游行都未能使泛突厥主义者建立起他们号召的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65页。

②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37页。

兰道讲的是文化泛突厥主义最兴旺的土耳其的情况， 在其他国家，搞文化泛突厥主义的情况就更不景气了。

泛突厥主义的大理论家孜牙·乔加勒甫本人就是精神贵族，他崇拜天才、救世主，如他所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天才，没有他将所有突厥人团结在突厥主义思想周围，将运动从毁灭的危险中挽救过来，所有突厥主义运动将毫无成效可言”，“一个享有巨大道德影响的救世主……如果一个民族拥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巨大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天才、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那么，他就能轻易地以自己的才能影响所有的变革。”在他看来，天才、救世主决定一切，但他心中也明白，他们所搞的那一套缺乏民众基础。因此他提出“面向大众”的问题，提议“为了充分影响人民，精英应该与人民共同生活”，“这对于土耳其青年来说，那就是深入到乡村中去，担任中小学教师”。然而，泛突厥主义关切的只是在书斋中虚构出来的令人费解的东西，而那些牵动千家万户的社会经济问题却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孜牙·乔加勒甫的洋洋十万言的大作中只用几百个字提到“民族经济”问题，且不着边际。

事实上，泛突厥主义所有的工作和想法都在于捏造一个上下1万年、纵横几万里的“突厥民族”，却对操突厥语诸民族人民的经济发展毫无兴趣，从不加考虑，完全脱离广大民众。泛突厥主义之存在，完全充当了极端民族统一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的政治工具，其作用是把操突厥语诸民族引向歧途，从而完全背离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泛突厥主义文化是一种封闭的而又超时空的意识形态，狭隘、排他的种族沙文主义，腐朽、没落的贵族“精英”文化。这种文化观念的一般取向，是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反动，也是阻碍操突厥语诸民族进步和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其价值观是不可取的。

主要参考文献

雅各布·莫·兰道：《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民族统一主义研究》，伦敦，1981年。孜牙·乔加勒甫：《突厥主义原理》，雷登，1968年。

哈·札·加比杜林，阿·米·阿尔沙鲁尼：《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论》，伦敦，1990年。

滨田正美："民族主义运动在新疆的传播"，《中亚杂志》1991年4期。

刘宾等："文化泛突厥主义研究"，《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1994年。

纪大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及其对新疆的渗透与破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新疆社会科学院，1993年。

陈延琪："有关泛突厥主义的几个问题"，《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新疆社会科学院，1993年。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埃·捷尼舍夫：《突厥语言研究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4期。

“东突”恐怖主义：由来与发展

一、由来：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二、“东突厥斯坦”：外人之余唾

三、“东突”：宗教极端化、恐怖主义化

四、“内乱裂变”的别动队

五、中南亚的地缘政治与“三股势力”

六、人民公敌，人类公害

“东突”恐怖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纲领、行动的恐怖主义。它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80年代后半期明显地极端宗教化，90年代以来则恐怖主义化，是集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为一体的邪恶势力，是以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手段企图将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极端民族主义。

一、由来：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民国初年，新疆孤悬塞外，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停滞，政局日趋动荡。三四十年代，军阀混战、民族仇杀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涉，新疆一片大乱，在此期间先后出现过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就是今天的“东突”势力的由来。

“东突”势力在新疆的滋生，源于境外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渗透。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1914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潜入新疆阿图什，以办学为名鼓噪泛突厥主义。新疆资格最老的泛突厥分子麦斯武德，早年留学土耳其时接受了泛突厥主义，1915年回到家乡伊犁，聘用土耳其教员传播泛突厥主义。阿图什人萨比提大毛拉游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在那里接受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墨玉人伊敏出于宗教狂热而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英吉沙人艾沙，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安集延领事馆，从当地乌孜别克人那里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伙人形成一个帮派，竭力鼓吹“东突厥斯坦独立”。

1933年春，哈密民军伙同甘肃军阀马仲英围攻省城迪化（乌鲁木齐），新疆全境陷人无政府的混乱之中。伊敏在墨玉县搞暴动，攻下和田、莎车、英吉沙、巴楚等地，建“伊斯兰教国”，自封为王。秋

天，配合哈密民军和加尼亚孜部攻占南疆重镇喀什。11月中旬，南疆各地的泛突厥分子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喀什公然宣布成立以和加尼亚孜为“总统”、萨比提大毛拉为“总理”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鼓吹“我们的旗帜是蓝色的，总统府是金色的，东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但这个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仅几个月便垮台。

1944年秋，新疆伊犁巩哈县牧民发动武装起义，并很快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三区，即新疆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蒋家王朝覆灭之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如毛泽东所评价的：“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三区革命”前期的领导权被为苏联所派遣的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泛突厥、泛伊斯兰分子所把持。1944年11月12日成立的临时政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为《解放的东突厥斯坦报》，民族军军旗上书写着“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前进”的口号。40年代，泛突厥主义分子在新疆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新疆的老牌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投靠蒋介石政府，1947年分别出任新疆省主席、建设厅长、省府委员，与一度窃取“三区革命”政府主席要职的艾力汗·吐烈，分属新疆两个营垒，但其思想和行动却是同一的：“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出现的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西方的“民族自决”思潮孕育出的怪胎。前者主要表现为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以所谓“民族原则”的光环肢解中国的阴谋，后者则是当年苏联出自利己的沙文主义动机，插手“三区革命”的某些表现。苏联曾深受打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旗号的巴斯马奇叛乱之苦，在本国严禁这两个主义，但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向新疆施加影响时肆意纵容和利

用了这两个主义。

二、"东突厥斯坦":外人之余唾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疆,民族众多,且在宗教、文化、语言、习俗上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一些民族相同或相似,因此,新疆的政局往往受到周边地缘政治及地缘文化的强烈影响。"东突厥斯坦独立论"的根子就是近一百多年横行于亚欧腹地的泛突厥主义,或者说,泛突厥主义是"东突"恐怖主义搞民族分裂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泛突厥主义是一种封闭而超时空的意识形态,狭隘、排他的种族沙文主义,腐朽、没落的贵族"精英"文化;虚构、臆造、附会、猜测、夸大、假托历史是其惯用手法,诸如"突厥"、"突厥人"、"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等概念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要把这些理清楚、向一般读者说明白,不大容易。前些时候,一些媒体对此做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似乎还不大到位。这是件严肃的工作,必须认真做,否则不能以正视听。

突厥　古代漠北游牧部族,公元6世纪兴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建突厥汗国,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唐末衰败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所谓的有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拥有上亿人口的"大突厥族",纯粹是泛突厥主义者臆造出的神话。国外宣传"突厥族"说,多别有用心。我们的媒体上偶有"突厥族"的说法(如《环球时报》2001年11月9日文《中亚有个怪地方》),显然是无知。

突厥人　与"突厥族"一样,"突厥人"也是被泛突厥主义分子滥用、歪曲的一个概念。其实,"突厥人"真正的含义指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历史表明:公元7~8世纪的阿拉伯人发现:欧亚草原上许多民族说着和突厥部族同样的语言,于是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把所有这些人都称作"突厥人"。语言与民族有联系,但并不等

同。语言学家根据语言特征将不同的语言以语系、语族、语组若干层次分类。按此分类，今天欧亚腹地有几十个现代民族的语言，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耳其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学家把它们统称为“操突厥语诸民族”，但并不存在民族学意义上的统一的现代“突厥族”和“突厥人”。

突厥斯坦　这里的“斯坦”，源于波斯语，意谓“某某人的居地”。“突厥斯坦”，最初是中亚伊朗—塔吉克人对自己语言完全不同的北方邻人居地的泛指。“突厥人”逐水草游牧，并没有固定居地，因此，所谓的“突厥斯坦”也只能是类似香格里拉那样的历史地理概念。但这一概念由阿拉伯人为媒介传到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学术界，并为后者所接受。19世纪，沙俄征服中亚后，在其新领地建“突厥斯坦总督府”。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曾在原“突厥斯坦总督府”辖区建“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当局很快认识到“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如苏联地理学家穆尔扎也夫指出：“(突厥斯坦)这一名称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居住在中亚的民族，并不全部属于操突厥语民族。1924年进行民族划分以后，突厥斯坦这个地名开始为另一地名中亚所替代。”

东突厥斯坦　18世纪至19世纪初，俄国和欧洲的一些人开始将新疆南部称作东突厥斯坦，而与中亚/西突厥斯坦相区分(这与历史上的突厥汗国曾分裂成东突厥、西突厥的事毫无关系)。1827年俄人齐姆可夫斯基提议以“中国突厥斯坦”取代东突厥斯坦，1829年俄人比丘林著文反对此议，而后，这两个名称——东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只是在俄国和西方作者中经常使用。在泛突厥主义传入之前的新疆，就根本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一概念。维吾尔大史学家毛拉木萨应是很有学问的，他1904年出版的《伊米德史》一书广泛地讲述了新疆的历史、地理，但一字未提到“东突厥斯坦”。“东突”分子为分裂祖国，一口咬定“东土耳其斯坦”(其实是

"东突厥斯坦")是自己的"祖国",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拾外国人之余唾,数典而忘祖。

三、"东突":宗教极端化、恐怖主义化

历史上的泛突厥主义总是与泛伊斯兰主义相互勾结、相互依存、相依为命。"东突"势力也是如此,它经过一个时期的蛰伏,随着80年代崛起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活跃起来,比较明显的是,它与宗教极端势力相勾结,本身也宗教极端化。整个80年代,在它的鼓噪下,新疆一些地方经历了宗教反弹、宗教狂热和非法宗教活动泛滥的过程。宗教狂热的结果是,从乡村到城镇的大范围内营造出一个极不正常的浓厚的宗教氛围。"东突"分子依仗浓厚的宗教氛围为掩护,利用非法宗教活动,制造动乱。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81年1月13日,他们以叶城一座清真寺失火为由煽动不明真相群众,从中作乱。1989年5月19日,乌鲁木齐的好几座清真寺和新疆伊斯兰经文学校的教徒、学员聚众数千人,冲击自治区党委、人大重要机关,打伤机关、公安、武警干部、战士154人。

进入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苏联一分为十五,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特别是车臣分立、恐怖分子甚嚣尘上,"东突"势力如注入兴奋剂一样日益嚣张起来。1990年4月5日,一小撮暴徒发动武装叛乱,攻打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政府,致使我武警、民兵8人死亡,7人重伤。暴乱分子甚至于毫无人性地用斧头砍下武警干部的头颅,其罪行令人发指。自"巴仁乡事件"后,"东突"明显地恐怖主义化。据不完全统计,1990~2001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制造了200多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恐怖活动的方式主要有:

爆炸

——1992年2月5日,在乌鲁木齐市52路、30路等公共汽车、录

像厅和文联家属楼制造系列爆炸案，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乌鲁木齐"2·5"爆炸案）。

——1993年6月，在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制造10起爆炸案，造成2人死亡、36人受伤。

——1997年2月25日，在乌鲁木齐市10路、44路、2路公共汽车上制造5起公共汽车爆炸案，炸死9人，炸伤68人（乌鲁木齐"2·25"爆炸案）。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在叶城县连续制造6起爆炸案，致使3人受伤，并炸坏天然气输气管道。

暗杀

——1996年3月22日，杀害新和县伊斯兰教协会常委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5月12日，刺杀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大毛拉阿荣汗·阿吉。

——1996年4月29日，将库车县阿格哈格乡原乡党委书记卡吾力托卡一家5口杀死。

——1999年8月23日，杀害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政法委副书记胡达白尔地·托乎提及其子。

——2000年1月25日，在乌什县袭击两家汉族群众，杀死7人，杀伤2人，其中最小的孩子年仅2岁。

纵火

——1998年5月23日，在乌鲁木齐市15个繁华商场投放40多枚土制化学燃烧弹纵火。

投毒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投毒案，致4人中毒、1人死亡、多头牲畜毒死。

制造大规模骚乱

——1995年7月7日，制造骚乱，冲击、打砸和田地委、行署和公

安机关。

——1995年2月5日至7日，在伊宁市制造大规模骚乱事件，打死7人、打伤200多人，砸毁汽车20多辆(伊犁“2·5”骚乱)。

“东突”恐怖主义以“圣战”为动员令，歇斯底里地鼓吹“杀汉”、“杀奸”。在他们广为散发的“宗教”小册子里，引证《古兰经》、《圣训》的条文，反复鼓吹、叫嚣：——为圣战而死可上天堂。

——为安拉而圣战一次，胜过做60年乃玛孜(祈祷)。

——穆斯林当前最迫切的任务第一是圣战，第二也是圣战，第三还是圣战。

——我们的同胞不怕杀人，只是没有勇气去杀汉人和民族败类。

——所有的人，鼓手、诗人、毛拉、历史学者、知识分子，都要上前线，立即投身于反汉、杀汉的圣战。任何不参加圣战和心无圣战的人都要像败类一样地死去。

——如果谁敢阻止圣战，将会被以叛徒处死。

杀人，疯狂地、歇斯底里地杀人，这就是“东突”恐怖主义的“宗教”，这种“宗教”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打着伊斯兰旗帜的恐怖主义。

什么是恐怖主义？我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或民族分离、分立、分裂，或宗教极端，或极端地反现政府、反社会)，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爆炸、暗杀、纵火、投毒、劫机、绑架、制造骚乱等残暴手段袭击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在内的平民，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而将其政治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企图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标。

“东突”分子的政治目标鲜明：将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东突”分子罪恶行动经过精心组织、严密计划。如，乌鲁木齐“2·5”爆炸案和伊犁“2·5”骚乱，都是选择在汉族群众欢度春节的假日；乌鲁木齐“2·25”爆炸案则是发生在举国哀悼邓小平逝世的

日子。

"东突"分子恐怖活动既有针对武警、公安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也有一般平民百姓,被其惨无人道杀害致伤的有各个民族的妇女、儿童和老人。

"东突"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在一般平民中造成大规模的恐怖气氛。身临其境者都还记得:乌鲁木齐的数起公共汽车爆炸案发生后,乌鲁木齐全城笼罩在极度的恐怖之中,社会治安遭到破坏、人们的心理受到极大伤害。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今天的"东突"分子已成了一伙毫无人性的恐怖分子,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内乱裂变"的别动队

"东突"势力的反动核心是搞民族分裂。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分裂活动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策动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割取我国边疆领土的内应力量。新疆近代史上的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及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搞的"满洲国"、"蒙疆政府",就是明证。

半个世纪的历史也表明,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庞然大物的苏联顷刻瓦解,是部书,人人皆可解读。在国外敌对势力看来,鼓励"敌人"的"内乱裂变",可能比那种"和平演变"方式更具杀伤力:策动分裂中国,如同当年苏联那样地四分五裂;肢解中国,如同肢解南联盟一样。因此,我比较同意香港《信报》上一篇文章的观点:即它们"西化"、"分化"中国的重点已定位于搞"内乱裂变"。"东突"分子一直在寻求"国际支持"。在他们的小册子里公开鼓噪"去破坏中国的经济目标","有必要保持社会的破败景象,如果来了外国人,肮脏的街道、残破的桥梁、贫穷的居民区,都将成为声讨殖民统治的证据"。2001年8月"东突"分子在库车县制造了一起恐怖事

件。在瑞士的"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对此表示的"负责意见"是:"圣战组织"的目的,是要对此前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富商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

"东突"恐怖主义为实现其罪恶目的以乞求"国际支持",不惜杀人放火、为非作歹,正是国外敌对势力在中国搞"内乱裂变"的一支别动队。

五、中南亚的地缘政治与"三股势力"

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三个恶化国际大环境的基本动向: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寻找新的"敌人",在这里,中国愈来愈为那些冷战斗士所看中;二是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泛滥,它突出表现在苏联解体和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车臣危机"和科索沃战争;三是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其重要成果是,阿富汗塔利班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一般认为阿富汗属西亚地区,但它邻近中亚、南亚,在文化传统上与西亚的中东、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确有相当大的差别。近二十年的阿富汗内战始终牵动着中亚、南亚国家的神经。"9·11"后美英打响了针对塔利班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讨论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时,我们引出"中南亚"这一概念,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当代政治分析的考虑。事实上阿富汗的北部与伊朗的东北部在历史上大体属于中亚文化圈,从这里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的大多数居民在宗教信仰上又是共同的,有史以来就是几大文明的边缘、连接地带,其北部草原经常出现一些庞大的游牧"行国",但来去匆匆。南部绿洲多为小国寡民,中世纪以来,只有奥斯曼帝国、帖木耳帝国,还有一个由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耳后王在今印度河流建立的莫卧尔帝国,显赫一时。

此后乌兹别克诸汗国的领地还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北的阿姆河左岸。从这一文化背景看，不仅阿富汗属于这一文化区域，而且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也在这一文化区域之内。正是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南亚"的地缘政治。

近些年，对中南亚及其附近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急剧膨胀，形成恐怖主义的"双月"带：

车臣——中亚——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

中南亚的主要极端、恐怖组织除众所周知的塔利班、车臣非法武装外主要还有："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中亚的"伊扎布特"(HT)以及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一带的伊斯兰公社(JI)"、"伊斯兰贤哲会(JUI)"、"圣战者组织(HM)"、"辅士运动(HUM)""穆斯林军(JEM)"、"传统穆斯林公社(JUAH)"、"拉什卡"(LT)、"巴基斯坦加法尔党(TJP)"、"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军(SMP)"、"巴基斯坦圣门弟子兵(SSP)"等。由于它们的横行，形成阿富汗、克什米尔和费尔干纳三个火药桶，这三个火药桶相连成一紧贴新疆的危险的"恐怖带"：阿富汗、克什米尔与新疆接壤，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分割的费尔干纳谷地与新疆南疆喀什、克孜勒苏地区仅一山之隔，IMU的基地加尔姆、吉尔加塔尔、塔维尔达拉和这两年IMU出击的巴特肯山区距中国边境伊尔克什坦也仅有200多公里。从这一点看，新疆已处于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的最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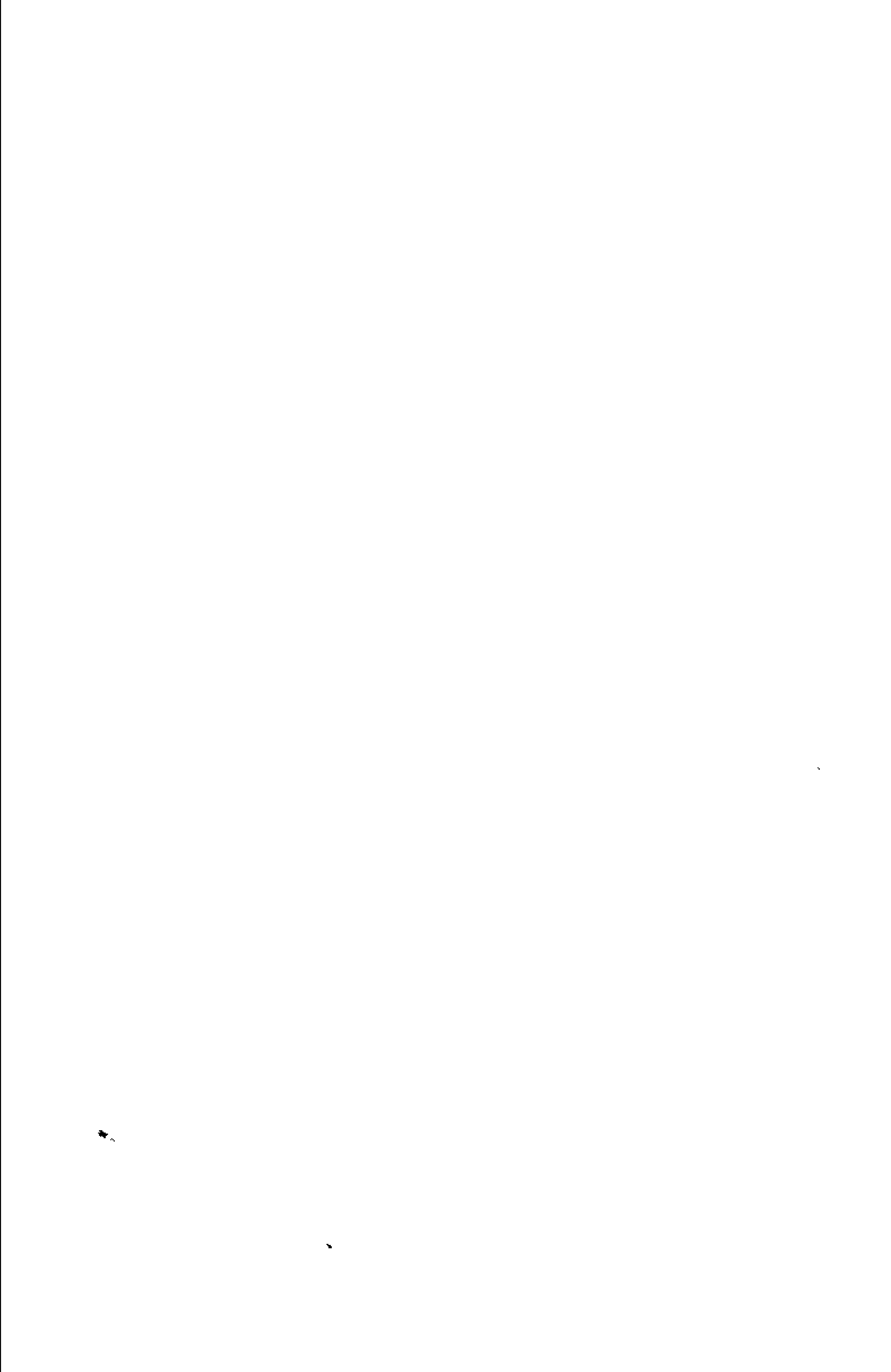
六、人民公敌，人类公害

"东突"组织在境外林立，大部分恐怖分子集中在中南亚地区。他们接受本·拉丹及这一带极端组织的资金、武器援助，在塔利班

的训练营地受训，并积极参加阿富汗、车臣和费尔干纳的“圣战”，以学习恐怖实战技能。其战斗人员在车臣、阿富汗等地被俘、被击毙，已世所共知。事实说明，“东突”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是中南亚“三股恶势力”的方面军。

“东突”恐怖分子近年活动的特点是，境外指挥、境内作战，最近十年来新疆的恐怖暴力事件大多就是这样发生的。它对中国国家的统一、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对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对中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造成极大损害。因此，它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公敌，也是全人类的公害。我们应高举反对民族分裂的大旗，依法严打“三种恶势力”，并将“东突”恐怖主义的罪行昭示于全世界。

附录



浩罕王统考

一、史料

二、考述

三、谱系表

一般来说，愈是接近近代的事情，我们愈是知道得多些，但也有例外的。瓦姆别里(G.Vambery)在1873年写道："我们关于一百年来亚洲一些国家前景的知识愈来愈详细、可靠，而外乌浒水(Transoxanien)地区则完全相反，愈是接近现代，掩盖当地凄凉景象的烟雾也就愈浓……这些烟雾首先淹没了阿施塔尔哈尼朝(Astarkhanid，1599~1753)最终崩溃和芒吉特朝(Mangit，1753~1920)兴起的那个时代的细节。"[①]济明(Л.Зимин)也指出："18至19世纪布哈拉、浩罕和希瓦这些中亚汗国的历史是东方历史研究最肤浅的部分。"[②]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今天。浩罕汗国前后延续达167年之久，一度称雄整个锡尔河流域，为中亚当时最重要的汗国之一，但至今连它的王统世系还未弄清楚。苏联学者罗莫金(B.A.Ромодин)在1973年曾排出一份简单的浩罕统治者年表，但他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同时强调："对18世纪的明格朝(Ming)一百年浩罕领地的历史研究仍很肤浅，迄今甚至还没有建立起18世纪统治者的年表……此外，迄今对浩罕汗晚些时候，即19世纪初发生事件的年代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爱里木汗和爱玛尔汗的统治年代也不能确切断定。"[③]日本学者佐口透、苏联学者别伊谢姆比耶夫(Т.К.бейсембиев)也做了这样的工作[④]，但提出的年表，疑点还很

---

①Г.Вамбери，История Бухары или Трасоксании.СПб，1873.Том.П，р.15.。

②Л.Зимин，Зерцало побед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истории Коканд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ПЗСТКЛА.1913.год 17-й.р.31.。

③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Москва，1973，вып.1，р.224~225.。

④《亚洲历史事典》，东京，1962，№Ⅳ，Р336.Т.К.Бейсембиев."Тарих-и Шахрухи"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точник，Алма-Ата，1987，Р.154，Р.159~162。

多,更没有系统考证。本文试图综合汉文文献档案、中亚穆斯林和其它史料继续这一工作。

一、史料

研究浩罕汗国的史料不外乎三类:

其一,清代汉文史料。浩罕与清发生直接官方联系有一百多年(1759~1876年),浩罕汗国的事情在清代史籍、档案中有大量记述。汉文史料的最大优点是时间概念极为准确。俄国汉学家比丘林(H. Бичурин)曾指出:这些材料的作者"在描述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毗邻民族中,都只以官方提供的事实为根据,而这些事实,都是事件发生时记载下来的"①。这一点对我们考察浩罕王统世系意义重大。汉文史料的缺点是零散、不齐全,尤其缺乏18世纪上半叶和阿古柏霸占南疆时期(1865年以后的)材料。

其二, 中亚穆斯林史料。19世纪浩罕汗国历史编纂学相当活跃,为我们留下大批历史文集,这是研究浩罕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它对当时有关事件始末记录得丰富、生动,但其作者多凭记忆、传闻写作,时间概念有些混乱,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宜反复辨析、要特别谨慎。

其三,西方史料(包括俄国史料),其中一些属于帝俄征服中亚时的材料,它对于研究19世纪下半叶浩罕行将崩溃时期的历史,意义重大。另外一些大多虽不是第一手材料,但它毕竟是上个世纪在当地搜集的,如纳利夫金(Наливкин)的《浩罕汗国简史》,其中资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罗莫金的工作主要依靠的是三部浩罕作者的作品:

---

①Н.Бичурин,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Фухунора с 2282 года до р. х. До 1227 года по р.х. 1883.Том.1-2,P.5。

1.《沙赫纳麦》(Шах-наме),又称"Тарихи Омар-хани",作者米尔扎·卡兰达尔·伊斯法拉,成书年代在1822/1823年;

2.《历史撮要》(Мунтахаб ат-товарих),作者穆罕默德·哈克木罕,成书年代在1842/1843年;

3.《沙鲁赫史》(Тарих Шахрухи),作者毛拉尼牙孜·穆罕默德,成书年代在1871/1872年。

别伊谢姆比耶夫主要利用了毛拉尼牙孜的《沙鲁赫史》,此外还利用了一些中亚穆斯林史料。

罗莫金、别伊谢姆比耶夫没有认识到汉文史料的价值,完全没有使用汉文史料,工作起来不免困难。佐口透使用了汉文材料,也使用了西方史料,如霍渥斯(H.H.Howorth)和斯凯勒(E.schuyler)的著述,还借助了纳利夫金、巴托尔德(в.в.бартолвд)、罗莫金的研究,间接使用了中亚穆斯林史料,但他基本上做的是编纂工作,遗留下的问题还很多。

我们的工作中将充分使用清代汉文文献,特别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珍贵档案材料。此外,我们还将广泛使用新疆穆斯林学者的一部重要著作《东方全史》[①],作者为塔城塔塔尔人库尔班外力·哈力德,生卒时间大概是1846年至1913年。《东方全史》取材主要为三个方面:(1)丰富的中亚穆斯林史料;(2)作者亲身的社会历史调查;(3)作者父亲的见闻,其父是个商人,曾游历中亚各地。库尔班外力在引述这些材料时一般都认真交代出处,对一些重要史料还做了认真的考订工作,其著述态度是比较严肃的。这是一部史

①库尔班外力·哈力德:《东方全史》(Tawarikh khamis sarki),喀山,1910年。该书过去曾译作《东方五汗国史》、《东方五族史》或《五部史集》,但从这部书的内容上看,它既不是五汗国的历史,也不是五民族的历史,其形式也不是五部。Khamis,在字面上有"五"的意思,其词源于阿拉伯文的"五肢军",即中军、前后卫、左右翼,引申下去则是空间的五个方位。当它与tawarikh相结合时,与其作"五史",不如作"全史"。

料价值较高的史籍。

我们的原则是,充分估计汉文史料时间概念准确这个特点,以准确的汉文史料为尺度,考查、鉴别、辨析丰富的中亚穆斯林史料和其它史料,以求得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

二、考述

浩罕明格王朝是从其第一位统治者沙鲁赫(Shahrukh)即位的1709/1710年开始的。《东方全史》指出:"费尔干纳汗国,自希吉勒历1121年(公历1709/1710年)沙鲁赫即位以来就有详细的记载。"[①]一些史料中还有沙鲁赫先世阿尔丁别什(Altun Besik)的故事,但不可信,对此我另有专文《中亚明格朝前史初探》[②]深究,兹不赘述。

由于史料匮乏,学者对18世纪上半叶浩罕统治者的活动语焉不详。巴托尔德只提到沙鲁赫、阿卜都尔噶里木(Abdal-kerim)和额尔德尼(Erdana)三位比(伯克)的名字,只谈到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在1746年[③]。罗莫金和别伊谢姆比耶夫排出的年表是[④]:

	罗莫金	别伊谢姆比耶夫
沙鲁赫	1709/10~1721/22年	1709~1721年
阿卜都尔热依姆(Abd al-Raym)	1721/22~1734年(?)	1721~1733年
阿卜都尔噶里木	1734(?)~1750/51年左右	1733~1750年
阿布都尔满(Abd al-Rahman)	1750/51年左右至1751年左右	1750年
额尔德尼	1751~1770年	1751年
巴巴伯克(Baba Beg)		1752~1753年
额尔德尼(第二次)		1753~17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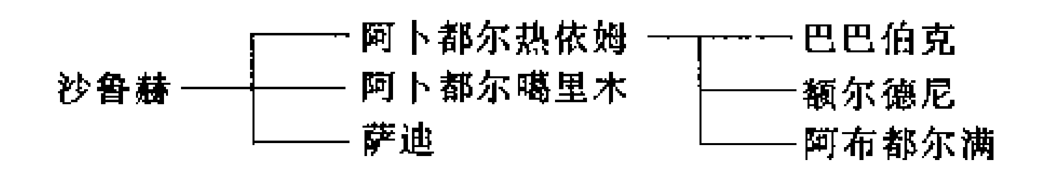
①库尔班外力·哈力德:《东方全史》,喀山,1910年,第5页。

②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

③Бартольд В.В.Соч.Том.Ⅲ,Москва,1962,p.462.。

④罗莫金、别伊谢姆比耶夫上引书。

佐口透提出的谱系表[1]是：



现需要研究的问题有三个：

其一，阿卜都尔热依姆与阿卜都尔噶里木执政更迭时间。

其二，阿卜都尔噶里木去世时间及其后的政权更迭情况。

其三，阿布都尔满在世系表中的位置。

在考察这些问题前有必要引述一下《东方全史》的有关记述：

沙鲁赫汗是希吉勒历1121年(公历1709/1710年)登位的，他当了十二年汗，在第十三年去世。他留下三个儿子：阿卜都尔热依姆伯克、阿卜都尔噶里木伯克和萨迪伯克，阿卜都尔热依姆承继父位，也做了十二年汗，于希吉勒历1146年(公历1733/34年)去世。其后，阿卜都尔噶里木即位，他当过十八年汗，于希吉勒历1164年(公历1750/51年)死去，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后，他的儿子阿布都尔满继位，但不到九个月就被废。他的叔叔阿卜都尔热依姆汗的儿子额尔德尼即位。额尔德尼委任阿布都尔满为玛尔噶朗的阿奇木。一年后额尔德尼也被废黜，接着即位的是阿卜都尔热依姆的儿子巴巴伯克，只过了一年，巴巴伯克被杀，额尔德尼第二次登汗位[2]。

必须强调的是，《沙鲁赫史》的说法与《东方全史》所述完全吻合。这两部史籍都一致确认阿卜都尔热依姆汗统治时间在1721/1722~1733/1734年间。纳利夫金则认为阿卜都尔热依姆在位时间是1721/1722~1739/1740年间[3]，他的著作《浩罕汗国简史》，史料丰

①佐口透：《亚洲历史事典》，东京，1962年，336页。

②库尔班外力·哈力德《东方全史》，喀山，1910年，第10~12页。

③V.P.Nalivkin：Histoire de Khokand，Paris，1889，第71页，75页。

富，但时间概念异常混乱，且究属二手，似不可取。故此，阿卜都尔热依姆与阿卜都尔噶里木政权交替时间取1733/1734年恐更适宜。

阿卜都尔噶里木去世时间有二说：即1746年说和1750/1751年说。孰是孰非，还得依据其它史料来鉴别。所幸的是，从浩如烟海的清代汉文史料中竟钩得一条宝贵记录，这就是《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己丑条，据记载：

正月初九日，所郡主颇罗鼐告称，访得策卜登台吉已获罪被杀……新立台吉年幼，同事之人，彼此不合，惟恐阿卜都尔噶里木、哈萨克、土尔扈特、喀尔喀等处发兵袭之，所以防范卡座甚严。

就是说，到1747年阿卜都尔噶里木还健在，看来《东方全史》、《沙鲁赫史》的1750/1751年说恐更接近事实。

阿卜都尔噶里木去世后政权更迭频繁，这在《沙鲁赫史》中亦有明确记载：

巴巴伯克是热依姆（阿卜都尔热依姆）的长子。当阿卜都尔噶里木称速檀时，卡尔梅克的军队从卡伊纳尔开来，包围了浩罕城堡。由于没有力量抵抗，阿卜都尔噶里木被迫把巴巴伯克作为人质交出来。在得知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后，卡尔梅克人把巴巴伯克派回浩罕，说："要知道他是热依姆汗的长子，他应得到政权。"浩罕接受了这个指命，让他登王位将近一年。不到一年高级官吏将军队聚集到别什·阿雷克，将巴巴伯克杀死在那里，额尔德尼重新称汗[①]。

就是说，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后，额尔德尼与阿布都尔满争夺政权时，准噶尔假借支持巴巴伯克进行了干涉。准噶尔与浩罕的斗争在汉文、俄文史料中亦有反映。《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乙亥条记：

噶尔丹策零在阿卜都尔噶里木看视行兵之路。遣回子巴克达呼逊、雅都喇呼沙、巴勒宾等四十人前往。彼处人猜疑，杀死三十三

①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ов и Киргизии.Москва，1973，вып.1，P233。

人，惟七人逃归。噶尔丹策零愈怒，派鲁特兵二万四千、哈萨克兵四千、吉尔吉尔兵二千，令伊族台吉策卜登图拉尔满积图拉尔、衮都尔图拉尔，于今年正月内起程前往。

俄文资料亦证：1745~1746年准噶尔同абдыкарымцы人交战[①]。此абдыкарымцы当指阿卜都尔噶里木。看来，起初阿卜都尔噶里木被迫向准噶尔称臣，但后来准噶尔由于内讧也极度虚弱，在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后曾想插手浩罕宫廷的权力之争，但终究未能得逞，最后胜利的还是额尔德尼。

要弄清1750年初期浩罕宫廷的权力之争问题，还要弄清阿布都尔满在世系表上的位置问题。中亚穆斯林史料一致确认阿布都尔满是阿卜都尔噶里木之子。但《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月己巳条记："额尔德尼伯克从弟阿布都尔满与霍集雅特之丕色勒伯克交通，谋害额尔德尼，事泄被杀。"佐口透认为阿布都尔满也是阿卜都尔热依姆之子，大概就是根据这条材料。其实，这是误解。此条汉文史料是当时清驻扎大臣派当地人去中亚探得信息，当然十分可靠，问题是，在中亚和新疆诸民族中，亲弟、堂弟、表弟一律称uka，并无区别，所以反映到汉文史料中的"从弟"一词，并不能确定阿布都尔满与额尔德尼是亲兄弟关系。细细推敲这条史料不禁要问：阿布都尔满为什么与霍集雅特伯克交通？他与霍集雅特伯克关系为何如此密切？霍集雅特即忽毡（Khojent）的异译，据纳利夫金报导，阿卜都尔热依姆在世时，忽毡为阿卜都尔噶里木的封邑。阿卜都尔热依姆身患重病时到忽毡养病，在那里被自己的亲信们所谋害[②]。如此看来，阿布都尔满当是阿卜都尔热依姆之子，额尔德尼认为，自己更有理由承继权力。而准噶尔以巴巴伯克是阿卜都尔热依姆长子为由，唆使巴巴伯克夺权。这样，堂兄弟、亲兄弟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先是巴巴伯克被杀，后阿布都尔满被废

①参阅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стдние.1958，No4.

②纳利夫金上引书，P75。

则不甘寂寞,求助于其父封邑地方势力搞复辟(这是最合乎逻辑的事),而最终亦死于非命。这大概就是阿卜都尔噶里木死后浩罕宫廷权力斗争的真相吧!

总之,通过以上考察,可以认定《东方全史》、《沙鲁赫史》关于浩罕早期统治者活动的记述,基本可信。在没有更可靠的材料时,这一时期浩罕统治者的世系就依库尔班外力、毛拉尼亚孜之说。

1759年至1820年间,浩罕成为清西北边外附属国,与清王朝有直接的密切往来,因此这一时期浩罕统治者的活动在汉文史料中有大量记述,这些具有精确时间概念的汉文材料是确定这一时期浩罕统治者世系的最可靠根据。

这一时期浩罕的统治者主要是额尔德尼、那尔巴图(纳禄博图,Narmatu)、爱里木(Alim)和爱玛尔(Umar)。爱里木和爱玛尔是那尔巴图的次子和三子。那尔巴图的长子曰迈玛迪敏(Muhammad lmin),早逝,此人在《清实录》上有过记载[①]。另据祁韵士记,迈玛迪敏统辖玛尔噶浪[②]。那尔巴图另有庶子三,但只知道长曰鲁斯坦(Rustan)[③]。爱玛尔弑其兄爱里木登上王位,他还将爱里木的长子沙鲁赫(Shahrukh)杀死,将爱里木另两个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和木拉特(Murat)流放到喀尔提锦地方[④]。那尔巴图还有两个异母弟弟:沙鲁赫(Shahrukh)和阿吉(Haji),此沙鲁赫曾受封于那木干,亦早逝,阿吉则与其兄那尔巴图发生龃龉而亡命塔什干,后被其侄爱里木杀死[⑤]。阿吉亦有三子:兀鲁格(Ulug)、希尔阿里(Sir Ali)、别克奥利(Beg Oli)[⑥]。易卜拉欣、木拉特、希尔阿里都相继参加了争汗位的斗争,这是后话了。这里主要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①《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年十一月庚辰条。

②祁韵士:《西陲要略》卷4《霍牟路程记》。

③纳利夫金上引书,P93,96。

④纳利夫金上引书,P124,126。

⑤纳利夫金上引书,P97。

⑥罗莫金上引书,P232;并参阅纳利夫金上引书P97。

其一，额尔德尼和那尔巴图交替问题。

其二，那尔巴图和爱里木交替时间。

其三，爱里木和爱玛尔交替时间。

关于第一个问题讨论如下：

额尔德尼无男姓后裔，其死后便是一场争权夺利内讧。纳利夫金说：额尔德尼死后，萨迪之独生子绥拉满(Suleiman)被拥立为浩罕伯克。萨迪是阿卜都尔热依姆的幼弟，受封玛尔噶朗，卒于希吉勒历1162年(1748年)。绥拉满就任浩罕伯克仅三个月被杀(《东方全史》说六个月)，随后浩罕贵族拥立阿布都尔满的长子那尔巴图，时希吉勒历1192年(公历1778年)[1]。成书1772年的《回疆志》卷4"蒿汉"节记有：

回目额尔德尼遣头目拜默特等，为使觐内附贡纳方物以来，嗣立之酋长绥拉满、那尔巴图亦俱节年差使入觐贡物，至今不绝。

中亚穆斯林史料亦证实，在额尔德尼与那尔巴图交替之中还有个绥拉满短命政权，但所记时间出入较大。《沙鲁赫史》和《东方全史》都认为是希吉勒历1176年(1762/1763年)。别伊谢姆比耶夫据此认为额尔德尼死于1762/1763年，那尔巴图在希吉勒历1177年(1763年)即位，而绥拉满在希吉勒历1176~1177年(1762/1763年)做了些日子伯克[2]。罗莫金则认为额尔德尼统治一直延续到1770年，只是在1763/1764年中有三个月或六个月的中断，其时政权归绥拉满[3]。巴托尔德依据一位俄国军士的报告断定那尔巴图是在1774年才即王位的[4]。这些说法都不对。

我认为，额尔德尼和那尔巴图交替在1769~1770年间，在这个

---

①纳利夫金上引书，P84~85，P78。

②别伊谢姆比耶夫上引书，P159。

③罗莫金上引书，P225。

④巴托尔德上引书，P462。

交替中有个绥拉满短命政权，根据是：

1. 查《清高宗实录》，1759~1768年间与清王朝打交道的浩罕统治者始终是额尔德尼，从未中断。其中1762年七条（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己巳条，六月壬寅条，七月乙亥条，十一月戊辰条，十二月戊戌条、辛丑条、乙卯条）；1763年五条（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壬戌条、己巳条，三月癸本酉条，四月丁酉条，六月丙午条）；1764年七条（乾隆二十九年五月癸亥条，七月丙寅条，九月庚申条、戊寅条，十月乙未条，十一月乙亥条，十二月己丑条），提到的都是浩罕伯克额尔德尼其人其事。一直到1768年初还有一个额尔德尼派遣的使团在北京活动。这证明，绥拉满执政只能在此之后。

2. 《清实录》记载，那尔巴图派遣的首次朝觐使团抵北京的时间是1770年秋后[1]。考虑到该使团从浩罕出发到北京总要走三五个月，那尔巴图即位不晚于1770年初。

3. 纳利夫金说，绥拉满被杀后，那尔巴图在好长时间里拒不执政，只是在浩罕贵族向他庄严誓忠后才同意执政[2]。由此推算，绥拉满执政和被废都在1770年以前。

4. 那彦成查旧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浩罕遣使至喀什噶尔达三次[3]。如此频繁地遣使喀什噶尔，在浩罕与清关系史上是异常的[4]，定有要事向宗主国报告。所谓要事，莫过于额尔德尼之死，绥拉满上台和被废等事。

综上四证，结论是：1769年额尔德尼死，绥拉满执政了数月被废，1770年那尔巴图即位。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那尔巴图和爱里木交替问题，众说纷纭：

①《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戊寅条。

②纳利夫金上引书，P85。

③《那文毅公奏议》卷19，页4。

④时浩罕一般是两三年才遣使一次，有时甚至五六年才来一次。

在1797年至1808年间[①]。要确定这一时间还要依据有精确纪年的清史料：

1.《清实录》关于那尔巴图活动最晚的记录在嘉庆三年八月己酉条，即1798年10月间。故此那尔巴图之死不早于1798年下半年。

2.《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4上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报告："臣等恭查嘉庆四年(1799年)浩罕伯克爱里木差额尔沁恳请进京时，因例不筵外藩，钦奉特旨矜恤暂停进京。"据此，爱里木登位不会晚于1799年。

看来，嘉庆四年爱里木差额尔沁恳请进京的使命是向清廷报告自己即王位事宜。故此我断定，那尔巴图和爱里木交替时间在1799年。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爱里木和爱玛尔交替时间问题，亦是众说纷纭：有说在1816~1817年(纳利夫金、哈克木罕)，有说在1809年(阿布都克里木)，有说在1810年(库尔班外力、毛拉尼亚孜)。巴托尔德依据纳扎洛夫(Nazarov)的《札记》和一份注有希吉勒历1225年珠马达费勒月(公历1810年6月)日期的带有爱里木名字的文件确定，爱里木去位不早于1810年，大概在1810年至1813年之间[②]。巴托尔德的说法是谨慎的，本文的征求意见稿中曾写道："目前只能大致确定爱玛尔即位在1813年或稍早些时候，精确年代尚待研究。"近年查得档案，竟可完全解决这一难题。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初五报告：

据称，探得爱里木暴虐贪残，原已众心不附。昨于上年十二月

---

①说 1797 年的有霍渥斯；说 1798 年的有别伊谢姆比耶夫，库特卢科夫(M. Кутлуков)；说 1798/1799 年的有巴托尔德、罗莫金、佐口透；说 1800 年的有伽佛罗夫(Б.Г.Гафров)，(Б.Джамгерчинов)，胡尔苏特(Хурщут)；说 1808 年的有纳利夫金。

②巴托尔德上引书，第 463 页。

十八日自带夷兵至塔什谦地方驻扎，差头人海特黑带人至拔斯堪萨木拉等处掳掠。于正月十七日抢得人畜物件，回至塔什谦地方，并未歇息，云将该头人痛加责打，以致激变众心。于正月十八日，海特黑及爱里木之母勇雅满库里、依底斯库里、巴杂巴图尔、色得黑等倡率群夷，在塔什谦将爱里木及其长子沙鲁克并其妻妾亲丁共计七口，全行害，即拥立爱里木之弟爱迈尔为该处阿奇木。爱迈尔即将掳到人畜送还各本处，委任伊父旧日亲信头人，通好诸夷部落，尽反爱里木所为，该处人心颇为悦服[1]。

这是清朝喀什噶尔当局从浩罕侦察得来的情报。据该文书所述，清朝探子是二月三日返回喀什噶尔的。一般来说，当时从浩罕到喀什噶尔路上需行走20日左右。看来，浩罕发生政变之后，清朝探子立即返回并及时地向喀什噶尔当局报告这一消息。这份文书中关于政变经过的报告，与中亚穆斯林史料所述是吻合的，它最宝贵之处是，记录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嘉庆十六年正月十八日，即1811年2月11日。文书中所谓爱迈尔，即后来唆使张格尔窜扰喀什噶尔的浩罕著名汗爱玛尔。毫无疑问，爱里木与爱玛尔执政的交替时间就是1811年2月11日。

1820年至1876年，浩罕脱离了对清王朝的依附，成为清西北边外邻国。中亚穆斯林作者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叙述，大都是当地人记当时事，说法上也趋于统一，故此以下以述为主，必要时提出汉文史料加以印证。

一般认为，爱玛尔死于希吉勒历1237年（相当于公历1821年9月至1822年8月间）。《清实录》关于爱玛尔最后一次遣使记录在道光元年八月，即公历1821年9月，所以，如大多数学者确定爱玛尔死在1822年，出入不会很大。

---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下简称“档案”），军机处录件、民族类、嘉庆十六年三月初五日铁保为差人探查浩罕酋长情形片。

接替爱玛尔汗位的是他的儿子玛达里(Madali)、也就是汉文史料中一再提到的迈买底里汗(Muhammad'Ali)[①]。1842年浩罕为布哈拉攻破,迈买底里和他的弟弟速檀马木特被处死[②]。《清实录》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癸酉条记:"布噶尔伯克夺占霍罕地方,差人进卡递禀。"档案中存有这一禀文,禀文曰:

我们托上天的福,遵经典上的礼,信兵的气力,今年三月卅日是我们虎年好日子,我们将浩罕地方得了,我就在浩罕居住,因此事,我差我的心腹人密拉尔伯克伊布依木、帕尔察霍卓二人来与参赞大人禀知道[③]。

查希吉勒历三月卅日,相当于公历5月11日。就是说,迈买底里败亡于1842年5月11日,这与中亚穆斯林史料记述是吻合的[④]。

同年浩罕贵族拥立阿吉伯克的儿子希尔阿里。希尔阿里因其父被爱里木所杀,长期流亡在塔拉斯布鲁特人中间。《东方全史》说:希尔阿里起兵,布哈拉委任的阿奇木伊布拉依木的统治还不到三个月[⑤]。据此,希尔阿里驱走布哈拉入侵者在浩罕执政,当在1842年8月初。这点可在汉文档案中得到证实。道光初年浩罕唆使张格尔窜扰喀什噶尔,道光十年(1830年)浩罕出兵攻喀什噶尔,最后迫使清朝在全面妥协基础上与浩罕媾和[⑥],令清朝十分头疼。因此清朝喀什噶尔当局对1842年布哈拉与浩罕交战极为关注,不断派出探子赴浩罕搜集情报。

1. 据七月初九日(1842年8月14日)返回喀什噶尔的探子报告,

①《新疆简史》说玛达里是爱玛尔之弟,实误。

②纳利夫金上引书,P176;库尔班外力上引书,第24~25页。

③档案: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图明额道光廿日奏折,附件二。

④别伊谢姆比耶夫据中亚穆斯林史料断定这一事件发生在1842年4月21日至5月21日间(别伊谢姆比耶夫上引书,P161)。

⑤《东方全史》第31页,第36页。

⑥参见本书下文:"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

浩罕确已被布噶尔兼并，但只字未提希尔阿里起兵之事[1]。据此，希尔阿里起兵不早于1842年8月。

2. 据八月十六日（1842年9月20日）返回喀什噶尔的探子报告，浩罕伯克迈买底里族叔希尔阿里已将伊布拉依木赶出，夺回浩罕地方数处，布噶尔头目伊布拉依木带领数千人要与希尔阿里打仗[2]。据此，希尔阿里起兵不晚于1842年9月。

3. 据十一月初十日（1842年12月11日）从浩罕返回的探子报告，布噶尔伯克七月廿七日（1842年9月1日）来围浩罕城，打了三仗，并未将城亲开，于八月廿八日（1842年10月2日）撤回[3]。

4. 十一月初一日（1842年12月1日）希尔阿里使节抵喀什噶尔递禀报告："如今将我先人的地方平定了。"

档案材料表明：希尔阿里于1842年8月起兵驱走布哈拉入使者，并登上王位，同年年底基本上控制了浩罕政局。

希尔阿里恢复重建了汗国，做了三年汗，1845年被爱里木汗的儿子木拉特杀死。但木拉特仅当了七天（一说九天）的汗就被浩罕权臣木素满库里（Mussulman Kuli）杀死。木素满库里把希尔阿里汗的大儿子萨木萨克（Samsak）杀掉，立希尔阿里的年仅十二岁的幼子胡达雅尔（Khudayar）为汗[4]。1846年初曾有浩罕明巴什木素满库里派遣的额尔沁到喀什噶尔，时清当局不知其真伪，派人去浩罕侦探[5]。不久，即得报："探明前次差来额尔沁，完系木素满库里所遣，并非卡杂克之伪造，及木素满库里扶立胡达雅尔伯克等情。"[6]

---

①档案，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布彦泰道光廿二年七月十九日奏。

②档案，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图明额道光廿二年十一月初九日片。

③档案，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图明额道光廿二年十二月廿日遵探布噶尔与浩罕起衅原由折，附件一。

④《东方全史》，第37页。

⑤《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戊申条。

⑥《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甲午条。

从胡达雅尔统治起，浩罕陷入频繁的宫廷政变之中。胡达雅尔本人亦三次被赶下汗位。

第一次发生在1858年。胡达雅尔被其兄迈里(Malla)夺去汗位，被迫亡命塔什干、布哈拉[1]。

第二次发生在1862年。迈里执政仅三年。据毛拉尼牙孜所述：浩罕权臣阿林沽(Alim Kuli)于希吉勒历1278年沙班月24日(1862年2月24日)，谋害了迈里汗，并拥立萨木萨克的儿子沙木拉特(Shah Murat)为汗[2]。沙木拉特执政仅两个月，胡达雅尔借布哈拉之力复辟。对此清档案亦有报导：

浩罕伯克迈里被属下众头目谋杀，沙木拉特已占浩罕。前任浩罕伯克胡达雅尔带兵相争，沙木拉特已将浩罕伯克让与胡达雅尔，两相说合[3]。

胡达雅尔第二次称汗时间很短，布哈拉军队在浩罕立不下脚跟，胡达雅尔只得随同撤退再次亡命布哈拉。权臣阿林沽再立迈里汗年幼的儿子速檀赛义德(Sultam Seyyid)。从迈里汗被杀到速檀赛义德上台，都发生在1862年一年里[4]。

1865年5月9日，沙俄大举入侵浩罕，攻打塔什干，阿林沽领兵抗击阵亡，浩罕再次陷入混乱中。速檀赛义德逃亡，胡达雅尔再次复辟[5]。正如库尔班外力所说："在这一时期，费尔干纳汗国政局变幻莫测，一会儿是胡达雅尔，一会儿是沙木拉特，一会儿是速檀赛义德，简直是走马灯似的……蒙在鼓中的百姓只有恐惧。"[6]胡达雅

---

①《东方全史》，第39页。

②Извлечние из Тарих Шахрухи Бартольд В.В.Соч.Том Ⅱ(2)，P.383.

③档案，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奎英等同治元年五月廿九日奏。

④《东方全史》，第45~47页。

⑤《东方全史》，第51页。

⑥《东方全史》，第48~49页。

尔第三次称汗维持到1875年。这时浩罕遭沙俄侵略，山河已破，国家将亡，1875年浩罕爆发大起义，穷途末路的胡达雅尔出逃投奔俄国当局，并永远地离开了汗位。

胡达雅尔出逃后，浩罕贵族拥立他的儿子纳斯鲁丁(Nasir al-Din)为汗。纳斯鲁丁的目的就是称汗，当俄军进犯首都时，纳斯鲁丁开城欢迎。他执政不到半年[1]，沙俄已不再需要什么傀儡，1876年2月19日沙俄政府宣布"原浩罕汗国改称费尔干纳省"，中亚最大的汗国之一浩罕至此覆亡[2]。据M.A.Терентьев说：俄国当局计划把吞并浩罕日期订在2月19日，即俄皇登极的日子，但俄军实际占领时间在2月7日。

后来，费尔干纳还出了一个自称是木拉特的儿子福拉德汗(Furad)，和来历更不明的伊提木江汗(Yitimjan)，也只喧闹了几天。正如库尔班外力说："汗早为人民唾弃，在希吉勒历1293~1294年(公历1877~1878年)这片土地上再看不到汗的人影，后来连汗这个词也无影无踪了。"[3]

三、谱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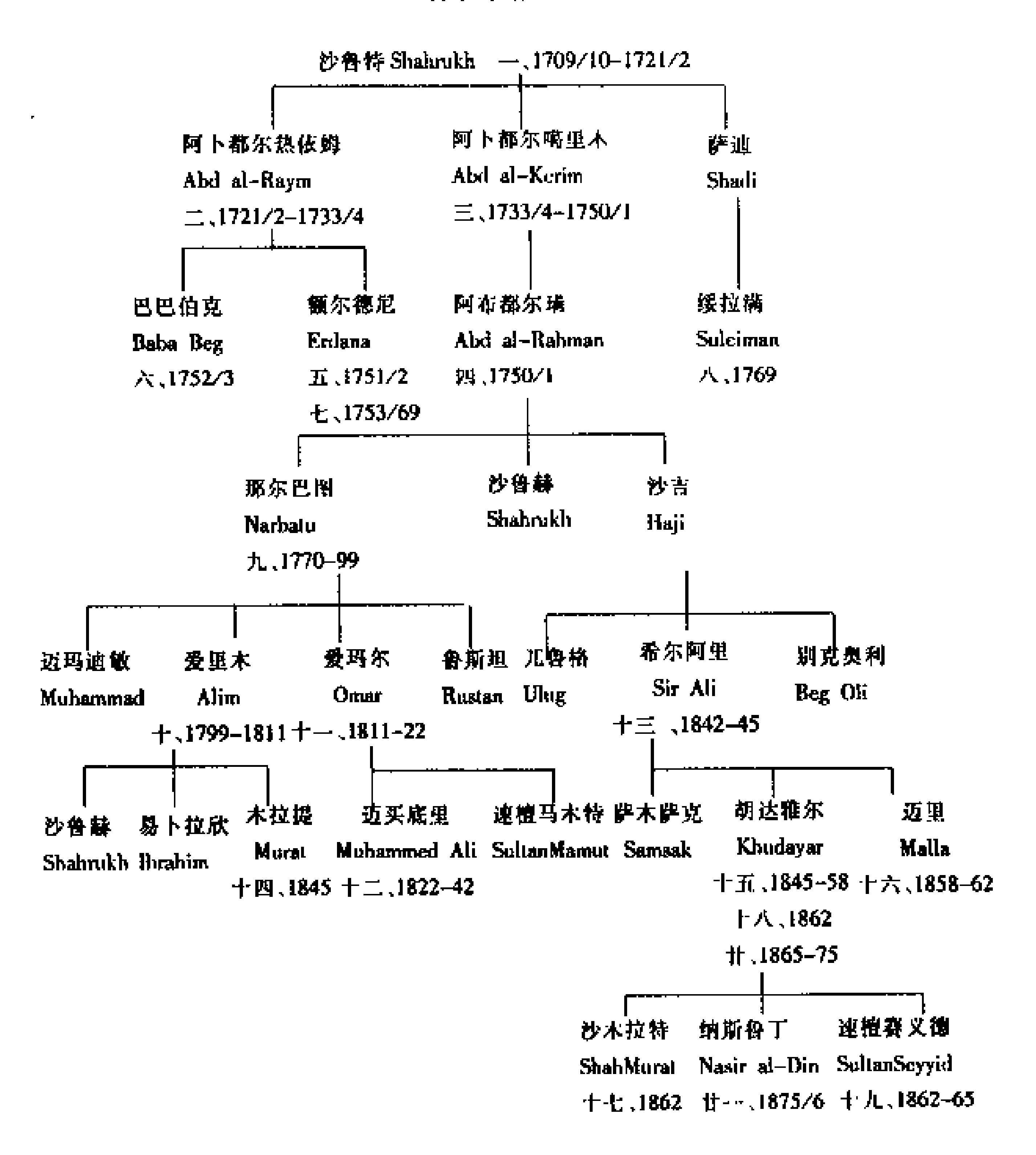
根据以上考述，我们作出浩罕王统谱系表如下：

①《东方全史》，第55页。

②M.A.Терентьев，История завосн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СПб.1906，Том Ⅱ，P406~407.

③《东方全史》，第58~59页。

浩罕汗谱系表


沙鲁特 Shahrukh 一、1709/10-1721/2
阿卜都尔热依姆
Abd al-Raym
二、1721/2-1733/4
阿卜都尔喀里木
Abd al-Kerim
三、1733/4-1750/1
萨迪
Shadi
巴巴伯克
Baba Beg
六、1752/3
额尔德尼
Erdana
五、1751/2
七、1753/69
阿布都尔瑞
Abd al-Rahman
四、1750/1
绥拉满
Suleiman
八、1769
那尔巴图
Narbatu
九、1770-99
沙鲁赫
Shahrukh
沙吉
Haji
迈玛迪敏
Muhammad
爱里木
Alim
十、1799-1811
爱玛尔
Omar
十一、1811-22
鲁斯坦
Rustan
兀鲁格
Ulug
希尔阿里
Sir Ali
十三 、1842-45
别克奥利
Beg Oli
沙鲁赫
Shahrukh
易卜拉欣
Ibrahim
木拉提
Murat
十四、1845
迈买底里
Muhammed Ali
十二、1822-42
速檀马木特
SultanMamut
萨木萨克
Samsak
胡达雅尔
Khudayar
十五、1845-58
十八、1862
廿、1865-75
迈里
Malla
十六、1858-62
沙木拉特
ShahMurat
十七、1862
纳斯鲁丁
Nasir al-Din
廿一、1875/6
速檀赛义德
SultanSeyyid
十九、1862-65

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考

浩罕是中亚乌兹别克人所建三汗国之一。乾隆中期清政府统一新疆，浩罕成为清帝国边外藩属国。19世纪20年代，浩罕唆使和支持新疆伊斯兰贵族和卓叛乱，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不满。在平定了张格尔和卓之乱后，清政府下令禁止浩罕贸易，驱逐寄寓南疆的浩罕商人并抄没其屯积的茶叶、大黄等，目的是"待其款关求贡而后抚而用之"①。但是浩罕统治者并未因此就范，道光十年(1830)，他们打着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和卓的招牌直接出兵喀什噶尔、叶尔羌地区。是年年底清政府征调各路援军3万开赴南疆征剿，浩罕人侵军主力在清军抵达前逃窜出卡。后经过一年多交涉，于道光十二年(1832)夏，清与浩罕媾和，恢复了对浩罕中断五年之久的贸易，是为1832年清与浩罕议和。这一事件是当时新疆、中亚最大的历史事件，亦是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处理的最重要的军机事务。不同史籍对此仅有粗线条的叙述，所述亦相去甚远。本文通过第一手材料的分析和研究，试图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1832年清与浩罕之议和，魏源是这样叙述的：

……是时，浩罕闻官兵大至，将由伊犁、乌什、喀城三路出讨，浩罕亦于二边界筑墙防拒，又遣使求贡俄罗斯，欲以乞援。俄罗斯以浩罕新构衅中国，拒其使，不许入境。浩罕既无外援，乃有求市意。……七月，长龄抵喀城，则浩罕已遣三头目来呈诉前事，并请通商，此外别无所请也。长龄遣还其二使，留其一使，令缚献贼目，释回被虏兵民，两月不报。十月，浩罕始遣还前同往之伯克归报，言被虏兵民可以释还，惟缚献夷目之事，回经所无。且无通商外，要求免税，并给还前所抄没赀产，较前次所求反奢。长龄奏言："安边之策，振威为上，羁縻次之。浩罕与布噶

尔、达尔瓦斯、喀拉提锦诸部落犬牙相错，所属塔什干、安集延等七处均无城池。其临战皆以骑贼冲阵，然不能于马上施铳，倘遇连环鸟枪，则骑贼先奔。又卡外布鲁特、哈萨克皆受其欺凌，争求内徙，而卡内回众亦俱恨其虏掠。果欲声罪攻讨，但选精锐三四万人，整旅而出，并于伊犁、乌什边境，声称三路并进；先期檄谕布噶尔等部同时进攻，则不待直捣巢穴，而其附近仇部，已群起乘衅，四面受敌，可一举扫荡。惟是一出塞外，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千六百余里，中有铁列克岭为浩罕、布鲁特交界，两山夹河，仅容单骑，两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险，不值劳师远涉。拟遣还前所留来使一人，令伯克霍尔敦寄信开导，为相机羁縻之计。"上命一切如其所请。浩罕大喜过望，遣使来抱经盟誓，通商纳贡[2]。

维吾尔史家毛拉木萨·赛依拉木的说法却是：

可汗（指清帝）的军队残酷地处治了那些曾受俸禄后又帮助张格尔的官吏……消息传到 浩罕以后，迈买底里汗十分痛心，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为了忏悔这些罪过，他准备了厚礼，派爱连巴依为使，出使和台（中国），向伟大的可汗提出如下要求：伟大的可汗以神威荡平了敢于反抗陛下的人，望陛下开恩赦免那些还未成年的无罪的孩子和妇女；在哲德沙尔（指南疆七城）诸城设安集延人阿克萨卡尔，以随时向我通报反人的线索，由我惩办，以减少圣心忧虑；如此等等不少甜言蜜语。使者来到可汗的都城。可汗以极隆重的礼仪接待了负有使命的使者。使者递上禀文，宽宏大量的可汗立即允诺所有要求，并以马、牛、羊、食品相送[3]。

英人贝柳（H.W.Bellew）这样写道：

1831年春，清朝看到浩罕再次入侵边境的事实，派遣了四名使节前去浩罕表示愿意和睦相处。浩罕派遣使节爱连巴依到北京去交涉的结果，缔结了如下四条协定："（1）浩罕对由回教徒商人带到"阿特沙尔"（指南疆六城）各城的商品，有根据伊斯

兰法课税的权力;(2)作为政治代表而派驻在喀什噶尔的浩罕监督官,有在各城任命征收这些赋税的代理人"阿克萨卡尔"的权力;(3)居住在各城的外国(浩罕以外的国家)回教徒,应该完全置于这些代理人的控制之下;(4)作为以上的代价,浩罕汗应该监视、抑制和卓家族,不准他们入侵回部。1833年,这个使节由北京回来的途中,被任命为浩罕驻喀什噶尔的监督官,借地开设官署④。

瓦森(W.H.Wathen)、瓦里汗诺夫(Ч.Ч.Валиханов)、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格里戈利耶夫(В.В.Григорьев)、库罗巴特金(А.Н.Куропаткин)等人亦有类似的论述⑤,看来这种说法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古列维奇、库特卢科夫就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说法,库特卢科夫强调:"谈判以1832年1月签署和平条约(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而结束。"⑥美国弗莱彻(J.Fletcher)教授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论述是出色的,但他也基本上接受这种观点,他甚至认为清政府与浩罕的议和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China's first unegual treaty settlement 〈1835〉)⑦。日本学者佐口透在引述贝柳的资料时指出:"但是,在上面所提到的清朝史料中,根本找不到北京缔结这样协定的记载,只有1831~1832年撤销了浩罕商品的关税一项是确实的。如果贝柳的记载是属实的话,就是《清实录》里把这个北京协定给遗漏了?"佐口透就此评论道:"浩罕和清朝的其他朝贡国不同,它和清朝之间存在着应该说是对等的外交关系。"⑧

归纳起来,需要澄清的主要问题是:

1. 议和是哪一方主动提出来的。
2. 议和谈判的地点。
3. 议和的主要内容。
4. 议和过程中有无成文的双边协定或条约。
5. 议和双方的关系,即是否是对等的。

二、文书的转写与研究

我们认为，魏源著述的根据是清官方档案材料，可靠性较高，但失之于简。贝柳之说与毛拉木萨的虽然相近，但其来源显然是同类的传说材料，如果完全据此作研究，就难免有较大局限。要弄清史实真相必须深入到第一手原始材料中去。这里我们介绍的是1832年浩罕伯克给清朝的一份禀告文书，这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原始材料，也是本文引证的最基本的史料。文书用当时较流行的nastalik体察合台文书写（影印件附后），自右往左，共十一行，其右上方有一"双耳罐"形的浩罕汗王印鉴。要使用这份材料，则必须将原文准确地用拉丁字母转写，再译成现代汉语。

经研究，其拉丁转写如下（左端数字为原文书的行数）：

1. **Cüngtâng Cângcüng Ambânlarga**
   (呈) 中堂　将军　诸参赞

2. **söz šol-kim ilgäri Mirzâ Işmät yanip kelip**
   我要说的是　从前　密孜　爱斯玛特　回来(时)

3. **ḥâkimbäg　ibärgän Îšân Ḥâci bilä yetip kelip bizning**
   (是和)阿奇木伯克　派出的　依山 阿吉 一起　到 来　我们的

   ḫudâ vä räsûlimiz buyurmagan sözni dedi
   真主 和　圣人　没有指示过的　话　说了

4. **bol säbäbdin älcinglärni yândurup Îšân Ḥacîni**
   因　此　把你们的使节　送回　把依山阿吉

   munda toḫtatip qâlduq bizning muddäâmiz
   在这里　留　下　我们的　目的

5. **šol-kim ilgäri-ki ţarlangan Kâšqarning yärliki Qôqandning**
   是这样的　从前的　被离开的　喀什噶尔的　本地人　浩罕的

   säbäbidin ţarlangan-dep boḥtan qilğudek ḥili(?)bulami
   原因　被离开的 因此　诬陷　一样　把这些人

6. tiläymiz gunâhidin ötöp yândursälär musulmânlarning
我们请愿 罪过 赦免 你们收回 穆斯林们的

ḫâniya bolgan yär ḥoli čâyini
汗王的 所有的 土地 院落 茶叶

7. yândurup bärdürsälär qaravûlning tašidin kirgän
退还 你们使给 从边卡 进来的

ḫalq âdämilärning fuqrâlikini
人们的 臣民身份

8. älčilär bilän kelgän kârvânlarning bâcini bärsängiz
(把和)使节们一起 来的 商队的 税 您如给

andin song Îšân Ḥâcining
然后 (如)依山阿吉的

9. aytqani mening birlä Aḥmad Bây Dôkär Bâylarni
说过的 (您把)我的 一起 迈玛特哪海 吊喝尔拜 等人

qâsüng bu tört qismi išni qobûl tutsa
加上 这 四 部分 事 如能接受

10. tamgaliq yûṭi-ḫäṭ elip kälsun musulmânlarning
盖印的 谕帖 (让他们)拿来 穆斯林们的

rafâḥiti bolardur dedi bol säbäbdin
放心 是 他说 因此

11. Aḥmad Bây birlä Dôkar Bâyni Îšân Ḥâciga qašup bol
(把)迈玛特哪海 和 吊喝尔拜 (随)依山阿吉 加上

muddäälarni qobûl qiling dep tiläp ibärdük 1248
其目的 (请您)接受 因此 希望 (我们)送去 (回历)1248 年

需要说明的是:

1. 我们使用的是国际通用转写体系。
2. nastallk体受波斯文影响较大，故又称波斯体察合台文，即

清史料中所谓“帕尔西字”。阿拉伯字母中本无 پ，چ，گ，ژ个符号，它们是在波斯文影响下出现的。在实际使用时，ب 和 پ，ج 和 چ，ك 和 گ，ي 和 ژ 经常通用。这种情形在这份禀文中一再出现，如第6行“茶叶”一词，就写成جاي，而不写چاي。

3. 人名是按清史料译出，与原读音相去甚远，如Ahmad Bay译成迈玛特哪海，但为了叙述方便，也只得如此。

4. 有几个地方在转译时随上下文作些处理，如：

第2行 يانيپ 原转作basip kelip，经米尔苏里唐先生指教，应转作：yanip kelip，“回来(时)”意，与清通事译文亦吻合。

第5行 بهتان 原意“诬陷”，联系上下文意译为“因……受牵连”。

第6行 تيلايمز 原转成tilaymiz（我们咒骂），这是受到清通事译文“怨恨”的影响，但这样上下文很难联结。经滨田正美教授指教，现转成tiläymiz(我们祝愿)，顺上下文意思应是：我们为之请愿。

第6行 خانيه (ḫäniyä)与bolgan合起来，直译“成为汗王的”，意译“官府抄没的”，也就是清通事译文中的“官收”。

第7行 fuqrälik ，原意为“百姓身份”，经滨田正美教授指教，认识到，fuqrälik是第8行bersängiz的的宾格，在翻译时据上下文语气加上“管束权”。这实际上是“设置商头”的外交上的委婉词令。

第9行 ايتقانى منينگ 经再三推敲，应为aytqani mening，与后文(10行)dedi呼应，成直接引语。

第10行 يوتيه 应是汉语借词，即“谕帖”的音译加意译。汉语借词“谕帖”进入19世纪察合台文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根据以上拉丁字转写，我们很容易得出汉译：

呈中堂将军、诸参赞：

从前，密孜爱斯玛特回来时，阿奇木伯克派来的依山阿吉一起到来。他们说了些真主和圣人所不允许的话，因此我们把(其他)使节打发回去，只把依山阿吉留下。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前被迫外出的喀什噶尔人均因浩罕之事流往各地，他们受到牵连，我们要为之请愿，(要求)你们能将他们赦免收回；(还要求)你们

将官府抄收的穆斯林们的土地、房屋、茶叶退还；并请你能把从卡外进来的人们的臣民身份(管束权)和随使节一起来的商队的税务(征收权)交给(我)。后来，依山阿吉说："您让我随同迈玛特哪海、吊噶尔拜等人(前去)，如能接受所要求的这四件事，就让他们带回盖印的谕帖，让穆斯林们放心。"因此，我让迈玛特哪海、吊噶尔拜随依山阿吉一起去(你处)，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请求。1248年(公历1832年)。

关于这份禀文，清档案中存有一份当时清通事的汉译文：

浩罕伯克呈中堂将军参赞的字儿：前者密孜爱斯玛特回来，阿奇木差依山阿吉一同到来，将经典上不准的话询问我们说了，因此将他们遣回，将依山阿吉留下了。我们心里想着，上次充发喀什噶尔回子俱说，因浩罕的人闹事，因此发在各处，有从各处逃回的都怨恨我们，如今求着把他们都赦回来。再求，将官收我们的房子、土地、茶叶也求着赏还我们。再求，卡外进来贸易的外夷回子求准我们设商头管束。再求，贸易来的货物也免我们的税。后来依山阿吉告诉我，叫我派迈玛特哪海、吊噶尔拜一同前去，将我的心里所求的四件事情，若是准了，给我带一个盖印的谕帖来，两下里和好，与所有里外的回子都好呢。因此派迈玛特哪海，总要求准行才好呢[29]。

可以看出，它将浩罕禀告文书大意基本上转译过来，但不够准确。首先，这份译文多少改变了原禀文的基调。浩罕禀文中毫不客气地提出四项要求，特别是谈到扣押清使依山阿吉之事时，其语气强硬、态度蛮横。但清通事译文中，其语气就不那么咄咄逼人，其所要求之事也译成"请求""赏还"，似乎有藩属王应有的乞求口吻[30]。其次，这份译文大体是意译，如原禀文中第三件要求并没有"商头"(阿克萨卡尔)的字样，但意思有了，清通事译文就写得更明白、更直截了当。至于"两下里和好，与里外的回子都好呢"一句，原文书中就没有，这大概是清通事的想当然之作。

最后，浩罕禀文中右上端有"双耳罐"形汗印鉴，字迹不清，极

难辨认,经再三推敲,试读如下[①]:

上部边缘阴文为年代1242年(公历1826年)和真主的各种尊称;

下部边缘阴文为《古兰经》赞语;

右:真主是最善于保护的,也是最慈爱的(12章64节)。

左:"平安!"这是从至慈主发出的祝辞(36章58节)。

下部中心阳文为浩罕汗的封号、头衔和名及父名,即:

上:Qôqand Šaar Amir al-musulman Ĝazi

浩罕城穆斯林的艾米尔、阿孜

下:Muḥammad ʿAli(?) Ibn Umar Ḥan

迈买底里(?)本·爱玛尔汗

其中还有些疑问,以?标出。如众所周知,迈买底里汗(Mu ammad ʿAli)是回历1238年(1822/1823)即位的,为什么汗印上刻有1242(1826)年呢?据《东方全史》(Tavarihi Ḥämsä Šerqi)记载:"就在他的时代,张格尔在喀什噶尔取得了胜利,他还去过喀什噶尔,同躲在古丽巴格的中国人打过仗,因而获得阿孜(Ĝazi)头衔(意"圣战获胜者")……在费尔干纳诸汗中,除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个被称为"阿孜"的人"[②]看来这颗汗印正是为纪念他1242年(1826)出征喀什噶尔所制。

三、议和过程

通过上述文书、《清实录》及一些第一手档案材料,我们可以大致描述出议和的全过程。

清政府剿灭张格尔之乱后,决定断绝浩罕贸易。当时浩罕遣人至喀什噶尔投书贺喜。清钦差大臣那彦成传谕来使:

天朝威武,以前所灭各国,尔等皆知,此次生擒张逆,又何足道喜?尔等部落,弹丸之地,在中国仅一州一县之大,大皇帝如果兴师问罪……又费兵力几何?

那彦成拒见其使,令押送出卡[③]。道光八年(1828)十月、十二月,浩

罕两次遣使喀什噶尔，低声下气地乞求："大人施恩，准我们照从前作买卖。"清朝方面认为："此时若以其言欲修好，即信以为实，必致伊夸耀外夷，岂非堕其术中。"那彦成仍拒见其使，只是令阿奇木伯克伊萨克出面正告其使：

你们居奇者不过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自天朝看来亦不要紧，将来至极不过又一张格尔，只要一两万兵便可平定。你们现在通买卖为第一要事，却不肯恭顺恳求，仍作大言，此地大人们倘或永远禁止通商，于你们大不好[①]。

浩罕求市不成，遂以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和卓的名义出兵入侵喀什噶尔、叶尔羌地区。清虽然击退了浩罕的入侵，但面临着与浩罕长期对抗的形势，不得不在南疆部署重兵。一份报告中就披露了回疆常年军费剧增的事实：

道光八年(1828)前　　　岁需77 931两。

道光八年后　　　岁需315 332两，超出238 301两。

道光十一年(1831)后　　　岁需402 362两，超出324 431两[②]。

日益空虚的国库已无力承担这一沉重的军费压力。为摆脱这一困境，清对浩罕媾和的愿望也日益迫切。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1831年3月28日)，主持南疆军政的长龄将军撰拟清字檄谕一道，一面抄录呈报清帝；一面译成"帕尔西回字"，钤盖扬威将军印信移交哈朗阿、阿芳钤盖参赞大臣印后，即发往浩罕。檄谕曰：

尔等如将滋事之明巴什爱散、木散及逃走之伯克伯(博)巴克等拿送喀什噶尔，尚可通商。

二月二十九日(4月11日)，道光硃批曰："依议行知(之)可也"，批准了长龄这一行动[③]。这是清朝方面为争取议和向浩罕采取的第一个外交步骤。

浩罕方面面临清重兵云集喀什噶尔、阿克苏一线未免张皇失措。从浩罕逃回的清兵证实：浩罕人听说清大兵来的甚多，"俱各害怕，意欲逃躲[④]"，清档案材料与俄国史料都表明：浩罕遣人到俄罗斯、布哈拉、达尔瓦斯等地求援，但处处碰壁[⑤]，处境孤立的浩罕也

愿与清议和。道光十一年七月浩罕使者来,"呈递亲供,追叙七十余年通商纳贡之悃诚,申诉五年以来断绝贸易之苦累,哓哓置辩,总以抄没驱逐为词,吁求奏恳天恩,照旧通商"。长龄传见浩罕使节,责令献贼目,送出裹去民回,然可商议。浩罕使者表示,尚须回去报告,情愿留下一人候信。八月七日(1831年9月12日),清朝方面派五品伯克迈买热依木、依山阿吉等人偕同浩罕使者往浩罕,浩罕使一人吊噶尔拜留下[⑨]。

浩罕使者一去多日,杳无音信,清当局议和心切,其主意一变再变。九月,长龄奏报:"现在该夷使尚未旋回。霍罕狡诈异常,即此次人来,竟能遵谕献出贼目,亦未可全信以为真,自当防其诡诈。如果实在悔罪投诚,许其通商交易。"长龄的意思是不一定要拘泥那两点先决条件,道光则认为其"所论俱是"[⑩]。十月,道光帝谕令长龄:"若该将军等明示霍罕以示大皇帝天恩浩荡,许该夷仍旧通商,其茶叶、大黄俱在所不禁,并免其货税……其缚献贼目送出民回一节竟可置之不问,以示大方"[⑪]。就是说,清朝方面的先决条件均可放弃,此外还可提供"免税"的优惠。

实际上,清方代表在浩罕遇到了麻烦。根据迈买热依木后来的报告:清使一行走了22天到浩罕,见到浩罕伯克迈买底里与明巴什阿哈胡里。迈买底里看到长龄谕帖并无一语,明巴什却说:"你们要人,回子经典上并无此规矩。"又过了十余日,清使才再见到浩罕伯克、明巴什等。依山阿吉前说:"我们要博巴克等,若不给与,事不能成明(命)。"浩罕明巴什说:"依山阿吉,你是知经典的人,怎么也说此话。"随即将清使一行三人看守起来。过了两日,浩罕伯克将迈买热依木放回,把依山阿吉扣下,并让迈买热依木传话:"如不要人,准我们通商,大家和好,就把留在喀什噶尔的吊噶尔拜打发回来。"长龄闻此当然十分恼怒,但在权衡利弊后认为不能再同浩罕开战。他在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1832年1月1日)的奏折中写道:

该夷怙恶不悛,夜郎自大,其贪狡殊为可恶。查浩罕与布噶尔、达尔瓦斯、喀拉提锦诸部落,俱属犬牙相错,明巴什贪黩妄为,

其附近各部落无不虎视眈眈,即安集延等众俱愿及早通商,被明巴什一人阻挠,众心积怨如是。我兵挑精锐四五万人,整旅而出声罪致讨,再于伊犁、乌什两处卡伦扎营排队,作为三路进兵之势;先期檄谕布噶尔等处,咸使闻知,则兵威速振,不待直捣浩罕巢穴,其附近不睦诸夷必乘机群起相攻,浩罕三面受敌,不难趁势翦除,可使近卡各爱曼永免侵陵,益坚诩戴,从此西陲可期数十年安静,所谓一劳永逸,实无有善于此者。然而言之非难,行之不易。一出边卡,主客之形既异,劳逸之势悬殊。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一千六百余里,适中有铁列克塔坂至姑鲁邪两站与浩罕接界,系布鲁特额提格讷爱曼,该处两山陡峻,中夹大河一道,只容单骑,依山沿河而行,须两日方能出山,此地最为险要;且添调官兵前来,程途辽远,费饷需时。奴才等再四熟商,此时添兵招佃极意经营,原为夷情叵测固守边圻起见,固不值劳师涉远;究不敢不妥筹控制以逸待劳。兹拟将前留浩罕来使吊噶尔拜等遣回,并令作霍尔敦寄信谕知该伯克,不献贼目断不能为其奏恳通商,责以大义示以大方,严词峻拒以崇国体[1]。

但实际上作霍尔敦受命给浩罕的信并没有那么强硬,信曰:

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台吉作霍尔敦问浩罕伯克好。我差去的人回来述你的话。回子经典不得将本教中的人送与外人,我也知道经典上是有的。自从禁止贸易后你们属下的人生计苦累的光景我也知道。如今我已向中堂将军、参赞大人回明,并求奏恳大皇帝格外施恩,准你们浩罕仍通买卖,你们属下的人照旧受大皇帝恩典,便可不致苦累。业经中堂将军参赞大人应允代奏,未能知蒙允准否。这些话我都告诉吊噶尔拜知道。他回去说了,你就赶紧再差人前来,恳求只管些买卖来,我替你们料理。如果大皇帝施恩,准你们通买卖,就是你们的造化[2]。

然而,道光帝接到长龄奏折为议和不顺极为焦虑,遂迁怒于长龄,当即颁谕训令:

朕自上年九月派长龄前往新疆……并未特令向霍罕缚献贼

目、送出民回。该将军沾沾要人,堂堂天朝转为霍罕牵制,岂不为外夷所揣摩。……倘霍罕遣使求通商,当明示大皇帝天恩浩荡。尔等如要通商,我当奏闻大皇帝,许尔仍旧通好,其茶叶、大黄俱在所不禁,从前抄没安集延物件,亦可发还,兼可免货税[2]。

长龄接此上谕,立即令作霍尔敦再修一信,信曰:

我前交吊噶尔拜带去的信,想你必收到。我所说的话想来你都知道了。你们所求通商买卖之事,中堂将军参赞大人奏明。业经奉到谕旨,蒙大皇帝怜念你们的人穷苦,仍准照旧入卡做买卖,并免你们货物纳税,连茶叶、大黄都不禁止。中堂将军、参赞大人叫我给信告诉你,这是大皇帝格外天恩,实在是你们浩罕所有人的造化,以后必当加倍感激、恭顺。我遵著中堂将军参赞人大吩咐给信与你知道,你可即速差人前来谢恩[3]。

在这种情况下,浩罕再派吊噶尔拜等人到喀什噶尔,其所呈禀文文书即本文第二节所介绍的察合台文书。根据清朝方面理解,浩罕来禀提出四件"请求",即:

1. 通商免税;
2. 派设商头;
3. 讨还田产、茶叶;
4. 释回从前喀什噶尔等城发遣回犯[4]。

浩罕使吊噶尔拜还一再表示:"以上四件事情若是准,我们伯克情愿同众头人各具团结进表求恩,永远恭顺。这是我们伯克一片诚心,再不改悔。"长龄与伊犁将军玉麟会商后,撰写一道回谕,由参赞大臣哈朗阿等交吊噶尔拜,吊噶尔拜在清使爱里木陪同下于三月九日(1832 年 4 月 9 日)持谕出卡。长龄回谕曰:

谕知浩罕伯克知悉。据你差来的吊噶尔拜、迈玛特哪海到喀什噶尔,你所递禀帖上求的四件事本扬威将军、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都看过了。你们浩罕自乾隆年间受天朝厚恩,就准你们进卡做买卖,至今七十余年,你们也狠受过大皇帝恩典。如今你们既知道悔罪,本扬威将军、伊犁将军、参赞大臣替你们奏明,想

来大皇帝必就不治你的罪了。所求仍进卡做买卖免税的事,大皇帝已经有过恩典,准你们的人照旧做买卖,并免你们的税。再你们设立商头的事,既准你们做买卖,就仍准照旧安设。所有你们八年(1828年)上入官的田地、茶叶,据吊噶尔拜等说,你属下的安集延都是穷苦的,还求赏还他们。查前年伊犁哈萨克王江霍卓也曾求过,经大皇帝施恩,将他们入官的茶叶都赏还了。如今你既来求,本扬威将军、伊犁将军、参赞大臣替你奏明,想来大皇帝也必照江霍卓的事一样施恩赏还。这些事情都可以准你的。至于各城发遣的回子,实因他们跟着张格尔闹事,所以才治罪的,如今既是你们恳求,我们天朝规矩,臣下不敢作主,必须奏恳大皇帝施恩,听候旨意,或者大皇帝施恩允准,亦未可定,为此特谕[①]。

长龄同时向清帝报告:"(浩罕)所求四事尚非窒碍难行,自宜宣布皇仁乘势开导,晓以利害,以示羁縻,方足以靖边圉而崇国体。"[②]道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832年4月13日)清廷颁谕:

浩罕伯克遣夷目递禀所求四事,尚属可行,第四条亦照议允。

长龄接旨,照译回字钤盖将军印信,交哈朗阿等会印再于四月九日(1832年5月8日)派人送往浩罕[③]。

浩罕方面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当然十分满意。道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1832年6月14日),浩罕使者吊噶尔拜在清使爱里木陪同下再来喀什噶尔,呈递浩罕伯克的表文,文曰:

浩罕伯克迈买底里表呈高福高寿管万民的大皇帝上。前者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使依山阿吉前来送字儿,内言浩罕各处地方有贸易回子,准其出入贸易,并求免抽税,因此使人给信等语。正是大皇帝上赐天高之恩,难以形容。至有恳求四件事俱奏大皇上允准,浩罕所属小回子都沾上大皇帝上如天之仁,如日之明,俱各欢喜,从此就过平安好日子。迈买底里身子虽是外国人,心里与中原人一般,以后,此心万不能改变。浩罕在天朝从无

背叛之事,如今一切坏心俱已去过,惟有恭顺。以后,迈买底里如再改悔前言,至令回子受害,即是迈买底里重罪。为此秉心抱经发誓,惟有永远恭顺,常念天朝恩典,为此用图书表文叩请圣安"[①]。

此文书现仅见汉译本,据称,此系"回务章京福奎译出,详加查核"。当然不能保证它与本文在措词、语气上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内容大概不会有太大出入的。

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1832年6月23日),主持喀什噶尔军政的参赞大臣哈朗阿会同各提镇在大营正式传见浩罕使者吊噶尔拜。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长龄将军已返京师。看来清朝方面认为议和已成,长龄将军没有必要再驻扎喀什噶尔,交换议和文书之事由哈朗阿出面,这样也避免抬高浩罕方面的身价。据哈朗阿报告:"奴才等核对赍递表文与阿奇木呈出稿底无异,复将奉到恩旨允准各条当面晓谕,详细开导,示以利害。吊噶尔拜等伏地叩头感激之忱,形于词色。"[②]六月一日(6月28日),哈朗阿筵宴浩罕使,据报告:吊噶尔拜表示:"从此受天朝恩典,再有何说。"[③]这样,经一年多的交涉,双方终于媾和。

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秋,浩罕遣使爱连巴依进京朝觐,在京其间,他曾投书理藩院继续有新的要求,但均被驳回[④]。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

1. 议和是双方的希望,开始浩罕主动,后来清朝方面较迫切。

2. 议和地点在喀什噶尔,不在北京,爱连巴依去北京,是议和达成后两年的事,其主要使命是朝觐皇帝,与议和毫无关系。

3. 关于议和的主要内容。清方面先有缚献贼目等两项先决条件,但很快自动放弃了。浩罕方面有通商免税等四件要求,均得满足。清朝方面从未要求浩罕监视、抑制和卓家族。

4. 议和过程中只有双方换文,即清朝方面或由长龄将军发给浩罕的回谕,或阿奇木伯克奉令书写的信件;浩罕方面则有汗王给长龄将军、给清帝的禀告文书,并无双边协定,更没有什么“北京协定”、“和平条约”,所谓“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之说是没有史料根据的。

5. 议和过程中,清朝方面虽一再作出让步,但主要是通过阿奇木伯克等维吾尔官员与浩罕方面进行具体交涉的,最后才由参赞大臣在大营里正式接受浩罕的“乞恩”,“天朝”的尊严始终是坚定地维持着的。所谓它们之间的对等外交关系的认识,是没有史料根据的。

注　释

①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90 页。

②魏源:《圣武记》,第 194~195 页。其中,霍尔敦,实误,应为:作霍尔敦。

③موللا موسا سايرامى:《تارىخى ھەمىدى》(现代维吾尔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54 页。

④H.W.Bellew:History of Kashghar,in T.D.Forsyth ed.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Calcutta,1875,p.185.

⑤W.H.Wathen:Memoir on the Usbek state of Kokan,properly called Khokand (the Ancient Ferghana)in Central Asia,JASB,1834, Ⅲ,pp.369~378;Ч.Ч.Валихан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2.А-А.,1962, стр.328;Г.Н.Потанин: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Сведений о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ей странах,Т.2.Вып.1.СПб., 1873,стр.44;В.В.Григорьев: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Азия К.Риттера.Восточный и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Вып.2.Дополнение,СПб.,1873,стр.457; 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Кашгария.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траны, ея военные силы,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СПб.1879,стр. 119.看来,最初提出这种说法的是 W.H.Wathen。

⑥В.С.Кузнезов: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3,стр.97 ~99;Б.П.Гуревич: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XV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М.1983,стр.247 ~248;М.Кутлуков: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ения Ц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с Кокандским ханством——Китай и сосед в новое и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М.1981,стр.209~211.

⑦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Cambridge,1978,p.370~382.

⑧ 佐口透:《18~19世纪东トルキスタソ社会史研究》,东京,1963,p.489,496.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简称"档案")外交类,军机录副,656卷4号附件。

⑩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据那彦成查证,自乾隆二十四年以后的五十年中的23份浩罕来禀,经清通事翻译后,那些"不恭"语气都改掉了。

⑪ 汗印试解如下:印鉴上部边缘为年代和真主的各种尊称:



印璽上部邊緣陰文爲年代和真主的各種尊稱：

١٢٤٢ (1242) سنه

يا رحيم　يا رحمن

(?)　يا حافظ الله　يا ملك

下部邊緣陰文爲『古蘭經』實辭.

右邊： [illegible]

即：真主是最善於保護的，也是最慈愛的（12：64）

左邊： [illegible]

即："平安！"這是從至慈主發出的祝辭（36：58）

印璽下部中心陽文：

قوقند	Qoqand
شهر	Šahar
امير	Amir
المسلمان	al-musulman
غازي	Ġazi
محمد علي (?) ابن	Muhammad 'Ali(?)Ibn
عمرخان	Umar Han

⑫ خالداولى قربغلى :《تواريخ خمسهٔ شرقى》, Казань, 1910, 第 16 页。

⑬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 北京, 1933 年, 32 页上。

⑭ 同上, 50 页, 53 页;《那文毅公奏议》卷 79, 43~52 页。

⑮《清宣宗实录》道光十三年正月丙申条。

⑯ 档案,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长龄折。

⑰ 档案, 外交类, 中俄关系, 第 656 卷, 第 8 号。

⑱ 档案, 道光十一年七月十日杨遇春折; 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哈朗阿折;《清宣宗实录》道光十一年九月戊辰条; Китай и сосед в новое и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стр.208.

⑲ 档案, 外交类, 军机录副, 656 卷, 第 13 号。

⑳《清宣宗实录》道光十一年九月戊寅条。

㉑ 同上, 道光十一年十月壬寅条。

㉒ 档案, 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长龄折。

㉓ 档案, 道光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长龄折。

㉔《清宣宗实录》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壬申条。

⑰ 档案, 道光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长龄折。

㉖ 档案, 外交类, 军机录副, 656 卷, 第 4 号。

㉗ 同上。

㉘ 同上。

㉙ 档案, 道光十二年四月九日长龄折。

㉚ 档案, 外交类, 军机录副, 656 卷, 第 7 号。

㉛ 同上。

㉜ 档案, 外交类, 军机录副, 656 卷, 第 8 号。

㉝《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四年七月戊辰条, 道光十五年正月戊寅条。

浩罕伯克呈遞原字

جونکما نینک جانجونینک ایشان لاریغه

سوزیمیز شول کیم ایلکری میرزا ایلچی مات کلیب

حاکم بیک ایساربیک کان ایشان حاجی بیلامیب کلیب بیزنینک خدایار سولیغیمیز توبه باکان سوزنی دیدی

بول سبب دین ایلچیلیک لارنی مایدور روب ایشان حاجی ایلمو ندا آلو خطابیت قیلدوق بیزنینک مدعا

سوزیمیز ایلکری کافرلاکان کاشغر نینک ریکی وقند نینک سیبیدین فارلاکانیدیب ایشان قیلغو دیک

تیلا نیب کاسیبیدین اوتوب باندور سه لار مسلمانلار نینک خاطیره بولکان یرجولی جایانی

باندوروب برورسه لار قوراول نینک ماستیدین کیرکان خلق آدمی لارنینک

ایلچیلار سیلان کلکان کاروانلار نینک باجی لار برسا کیرا اندین سونک ایشان حاجی نینک

ایستغالار نینک برله احمد بای دوکار بای لارنی فاشونینک بولورت قیسی ایلشی قبول تورت

تامغه لیق بولطی خط الیب کلکان مسلمانلار نینک تا بستیق لار دور دیدی بول سبب دین

احمد بای برله دوکار بای نی ایشان حاجی غه قاشو سبول مدعالارنی قبول قیلماک دیب تیلاب ایجابت ۱۲۴۸

霍罕路程·浩罕界

一、"霍罕路程"考

二、"浩罕界"考

本文考察的以下两个问题，应是新疆史、中亚史、中国边疆史地的两个重要问题。

一、"霍罕路程"考

史料明确记载，自1759年至1810年50年间，浩罕的使节至喀什噶尔达23次，进京朝觐9次；同期，清朝方面也常遣使至浩罕，但由满蒙大员领衔负有重大使命的出使仅有四次。这些使臣的行走路线就是当年新疆赴中亚的传统交通线。

1759年夏，达克塔纳作为清朝第一位使臣赴浩罕，是由乌什出发的。由于当时的喀什噶尔一带还在大、小和卓控制之下，达大臣径直溯托什干河入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尔帕，越费尔干纳山，取道安集延抵浩罕。索诺木车凌、穆齐图、四十七分别于1760年、1763年、1764年由喀什噶尔赴浩罕，现只有四十七的出使报告公诸于世[①]，而这份报告中也只有这条路线的粗线条的披露，即：

喀什噶尔—鄂斯—玛尔噶浪—浩罕。

然而，嘉庆年间成书的《西陲总统事略》卷4附有《霍罕路程记》（以下简称《霍记》），为清朝方面关于喀什噶尔至浩罕的最完备的记录，兹录如下：

喀什噶尔至木什卡伦九十里。

木什卡伦至汗玉罕六十里。

汗玉罕至特尔勒克六十里。

特尔勒克至库舒乌珠黑六十里。

---

①王熹、潘志平："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关系之一——1764年四十七使浩罕报告"，《中国边疆天地报告》1992年3~4期。

库舒乌珠黑至鄂克苏噜尔三十里。
鄂克苏噜尔至峨斯克奇克七十里。
峨斯克奇克至色尔哩克野塞三十里。
色尔哩克野塞至纳哈尔察勒迪四十里。
纳哈尔察勒迪至伊根二十里。
伊根至托海巴什五十里。
托海巴什至依克依杂克达巴罕十里。
依克依杂克达巴罕至依克依杂克布拉克三十里。
依克依杂克布拉克至库库苏四十里。
库库苏至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下三十里。
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下至达巴罕十里。
过岭至色哩库楚克七十里。
色哩库楚克宿一日,至塔尔噶拉克六十里。
塔尔噶拉克至图巴尔拉克塔木三十里。
图巴尔拉克塔木至古勒沙四十里。
古勒沙至图古尔克托海七十里。
图古尔克托海至鄂什九十里。
鄂什至阿拉班五十里。
阿拉班至明图伯四十里。
明图伯至扈巴六十里。
扈巴至玛尔噶浪六十里。
玛尔噶浪至阿克图伯四十里。
阿克图伯至布拉克巴什八十里。
布拉克巴什至霍罕六十里。

值得注意的是,该记玛尔噶浪条后有注文:

……玛尔噶浪有纳尔巴图之子迈玛迪敏统辖伊等……

纳尔巴图,又作那尔巴图,为额尔德尼之子,1770~1799年在浩罕伯克位。迈玛迪敏为纳尔巴图长子,《清仁宗实录》嘉庆二年(1797)十

一月庚辰条有其人活动的报导。可见《霍记》反映的是18世纪末清朝方面关于这条路的知识。再,《霍记》中,鄂什(斯)经玛尔噶浪至浩罕为七日程,与四十七所记七日程相合,因此四十七很可能走的就是《霍记》报导的这条路。从喀什噶尔西北去一直到鄂斯,系布鲁特游牧地,所有地名都是柯尔克孜语,《霍记》译成汉文时,很难准确表达地名原音,许多地方究竟相当于今天何地,还需对照现代地图考察。清末编纂的《新疆图志》(以下简称《图志》)卷82记有这条道路新疆境内的里程:

(疏附)城西六十里木什素鲁克卡,六十里明约路内卡,六十里喀浪圭内卡,五十里安鸠安卡,八十里坎素,逾达坂八十里库什阿依托海,六十里乌胡素鲁克卡,九十里也斯克奇克卡,循河西行七十里乌鲁克恰提目光,分二路,一西行七十里沙哈尔,九十里至爱坎什唐木,一西北行八十里业干卡,一百里至爱坎木唐木,达俄国费尔干纳之鄂什县城。

与《图志》相配的《新疆全省舆地图》(宣统元年石印本,以下简称《舆图》),其44图(疏勒府总图)和46图(疏附县图),绘有这条道路,标明的地名有(左:44图,右:46图):

44图	46图
木什	木什
明瑶路	明瑶路营卡
喀浪圭	喀浪圭
安鸠安	安鸠安
黑子阿依	黑子阿依
堪苏	堪苏
	芍布拉克
库什阿依托海	库什阿依托海
倭胡素鲁	倭胡素鲁
业金	业金
伊尔克什他木	伊尔克什坦木

以克则克　　　　　　　　以克则克

以上史料、地图上地名译写很不一致，所述里程也不完全吻合，排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所幸的是，俄国军官库罗巴特金1877年至1878年两次往返此路，在他所著《喀什噶利亚(Кашгария)》(以下简称《喀》书)①对鄂斯至喀什噶尔行进路线、里程和沿途地理、人文景观有详细记录。库罗巴特金负有军事侦察任务，携有现代测绘仪表，他的报告当然极有价值。库罗巴特金的大致路线诚如他所言：

由Ош城到Талдык狭谷的入口处为18俄里，到Гульча堡49俄里，到Кызыл-курган地区为16.5俄里，到Сарыкучук地区为36俄里，到Кок-су河28俄里，到喀什噶尔的Иркештам卡伦23俄里，到Егин卡伦20俄里，到Улугчат堡18俄里，到Уксалыр卡伦40俄里，到Кургаши-кани堡27俄里，到Кан-Джуган卡伦22俄里，到Мин-юл卡伦30俄里，到Янги-шар要塞(离喀什噶尔7俄里)44俄里(стр.23)。

Янги-шар要塞，为喀什噶尔新城，亦喀什噶尔汉城，即今天的疏勒县城。库罗巴特金认为，这条通过Терек-даван的路是喀什噶尔和中亚之间用于通商的最好驮路(стр.23)。Терек-Даван，即《霍记》中的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今图作帖列克达坂。以下综合《图志》、《舆图》、《喀》书资料，并对照现代地图，着重就《霍记》进行考察。

木什卡伦。《图志》作"木什素鲁克卡"，案《西域水道记》说木什素鲁克为木什庄和素鲁克庄。《舆图》有"木什"。《喀》书说"Муш"村附近有"一座早先为中国人修建的瞭望塔，现已毁坏"(стр.251)。《霍记》说木什卡伦距喀什噶尔九十里，而《图志》说六十里，其里程有些差距，可能是不同时期卡伦设置地方有异，但显然都在距今喀

①А.Н.Куропаткин：《Кашгария》，Спб.1879，中译本有《喀什噶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喀什噶利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什市约30公里的疏附县木什乡(Муш)境内。

明约路。《霍记》上未有其地。《图志》作"明约路内卡",并注文曰:"一名明瑶路,即乌兰乌苏卡。"《舆图》有"明瑶路"(44图),"明瑶路营卡"(46图)。《喀》书说在卡伦附近有条小路通木什庄(стр. 252)。明约路是座著名卡伦,其名依然留在今天,在疏附县木什乡西部明尧勒(Mingyol,意"千路")村,该村委会驻Korul(卡伦)村。

喀浪圭。《霍记》上未有其地。《图志》作"喀浪圭内卡"。《舆图》作"喀浪圭"。《喀》书说,在明约路附近有座被废弃、毁坏的中国城堡叫Караталым,据说原先在城堡里曾经有500名中国驻防军(стр.249)。看来,喀浪圭、Караталым为一地,即今图"喀浪沟律克"(Karangguluk)在乌恰县和疏附县交界地方。

汗玉罕。《图志》作"安鸠安卡",注文曰:"一名堪朱干。"《舆图》作"安鸠安"。《喀》书说,从Кан-Джутан卡伦到明约路卡伦,行程30公里(стр.249)。安鸠安、堪朱干、Кан-Джутан和《霍记》上的汗玉罕为同一地的不同译写,也就是今乌恰县城南县羊场驻地坎居干(Kajugan,意"鲜血染过的地方")。

特尔勒克。除《霍记》外,各书、图缺载,其地大概在今黑孜苇乡的铁热克(Terek,意为"白杨")。

黑子阿依。《霍记》、《图志》均未有其地,但《舆图》明示,在安鸠安卡附近。《喀》书说,在Канджуган附近的盆地以Кызыл–ой(意红色的沟壑)命名的(стр.248)。今乌恰县黑孜苇乡,柯文写作Kiziloy,意为红色的洼地。故黑子阿依、Кызыл–ой,即今黑孜苇。

库舒乌珠黑。《图志》作"坎素",注文曰:"一名科克申堪苏。"《舆图》作"堪苏"。《喀》书说,在距Кан-джттаг行程22俄里处为Кургашин-кани,附近有铅矿和煤(стр.246)。案,Кургашин-кани转自柯文,意"铅矿"。故,坎素、堪苏、科克申堪苏、Кургашин-кани和《霍记》中库舒乌珠黑似为一地,即今天产煤、产铅的康苏矿区。

芍布拉克。汉文图籍中仅见于《舆图》46,方位在堪苏附近。

《喀》书说Кургашин-кани附近溪水又苦又咸(стр.246),看来芍布拉克即为今康苏附近的硝尔布拉克(Xorbulak)。

库什阿依托海。《霍记》未见其名。《图志》说,坎素逾达坂八十里库什阿依托海,《舆图》亦有库什阿依托海。《喀》书说,在Кургашин-кани附近山口的另一面有宽阔的Кош-юки(意为鸟雀栖息之处)谷地(стр.245)。查《乌恰县地名图志》,在与康苏毗邻吾合沙吾乡境内有库什乌依库(Koxuyka),Koxuyka柯语意雄鹰居住的地方。看来,库什阿依托海,似为今图之库什乌依库。

鄂克苏噜尔。《图志》作乌胡素鲁克,注文曰:"一名乌什拉尔,又名鹅和苏罗。"《舆图》作"倭胡素鲁"。《喀》书说,有玉子巴什(百人长)指挥的一座要塞(стр.243)。乌胡素鲁克(鹅和苏罗)、倭胡素鲁与《霍记》中鄂克苏噜尔为一地,应是今天吾合沙鲁(Uksalur)乡境内。

峨斯克奇克。《舆图》、《喀》书未见其名。《霍记》上"峨斯克奇克",似与《图志》的"也斯克奇克卡"为一地。从方位上看,它应在今图乌鲁克恰提乡的加斯(Jaskeqi)。

色尔哩克野塞。《图志》、《舆图》均未见其名。《喀》书说在乌鲁克恰提附近浅滩前边地方叫Сары-камыщ,那里有茂密柳丛(стр.242)。今图乌鲁克恰提乡东克孜勒河南岸有一片次生林,其地叫萨热喀米什(Sarikamix),意"黄色的芦苇",这大概就是《霍记》上的"色尔哩克野塞"。

乌鲁克恰提。《霍记》未载其名。《图志》作"乌鲁克恰提卡"。《舆图》作"乌鲁克恰提"。《喀》书说Улугчат有一座大卡伦,卡伦内连同家眷约四五百人(стр.241)。今地亦称"乌鲁克恰提"(Ulugqat,意"雄伟的山口"),为乌恰县一个乡。

纳哈尔察勒迪。《霍记》作"纳哈尔察勒迪"。《喀》书说在Егин河与克孜勒河交汇处有Награчарда (стр.240),《舆图》未见其名,但《图志》提到乌鲁克恰提之西有沙哈尔。今图吉根河上与克孜勒交

汇处为“那格拉察勒”，又名“萨喀勒恰提”。看来这几个地名指的是一地。

伊根。《霍记》作“伊根”。《图志》作“业干卡”，注文曰：“一名依旦，即纳格恰的。”《舆图》作“业金”。《喀》书说有座卡伦(стр.228)。伊根、业干、依旦、业金为一地，即今乌恰县吉根(Jigin)乡。至于“纳格恰的”似是“纳哈尔察勒迪”，《图志》注文或有误。

托海巴什。《图志》和《舆图》都未见此地名。《霍记》上“托海巴什”似为《喀》书提到的“Токай-баши”山谷(стр.238)，当是今图斯木哈纳附近的“托阔依巴什”(Tokaybax)。

爱坎什唐木。《霍记》未有此地名。《图志》作“爱坎什唐木”。《舆图》作“伊尔克什坦木”、“伊尔克什他木”。《喀》书说，阿古柏在Иркешгам建有卡伦(стр.227)。这显然是今天我国最西的口岸伊尔克什坦。

以下各地已在清季新疆境外，《图志》和《舆图》就缺载了。

依克依杂克达巴罕。《霍记》上“依克杂克达巴罕”，应是《喀》书Ике-икезяк п.(стр.235)，也就是现代地图上的以克则克山口，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依克依杂克布拉克。《霍记》上“依克依杂克布拉克”，应是《喀》书上Ике-икезяк р.(стр.236)，也就是现代地图上的以克则克河边的以克则克，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库库苏。《霍记》上“库库苏”，应是《喀》书上提到克孜勒河上源Кок-су河谷，这大概是现代地图科克苏河与东帖咧克河交汇地，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下和达巴罕。《霍记》中这两处相距十里。《喀》书说Терек-Даван的最高处为Тютяк之下不远处为Таш-уй(стр.232)。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Терек-даван，应是今图帖咧克达坂。故此《霍记》中“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下”似为今图帖咧克达坂附近Таш-уй河谷，而“达巴罕”、Тютяк为一地，为今图帖咧克达坂，

均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色哩库楚克。《霍记》所谓过岭的“色哩库楚克”，应是《喀》书所说的Терек-Даван附近的Сары-кучук，大概是现代地图帖咧克达坂附近的沙雷库秋克。

塔尔噶拉克。《喀》书说在与Сары кучук附近有Таргалык狭谷，与Гульча河谷相连（стр.228）。此Таргалык应是《霍记》所说的“塔尔噶拉克”。

图巴尔拉克塔木。除《霍记》外，各书、图均未提及其地。从方位上看，它当在《喀》书提到的Кызыл-курган和Гульча之间地方，在今吉尔吉斯斯坦。

古勒沙。《霍记》所说的“古勒沙”，显然是《喀》书所说的Гульча（古里察），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图古尔克托海。《霍记》上“图古尔克托海”之名不见现代地图。从方位看似为《喀》书所说的Ош与Гульча之间的Талдык（塔尔迪）狭谷。

鄂什。《霍记》所指鄂什，即四十七报告中的鄂斯，当是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Ош）。阿拉班。

《霍记》所谓“阿拉班”，应是今图的Араван（阿拉万），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明图伯。《霍记》所谓明图伯，不见现代地图，大概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地方。

扈巴。《霍记》所谓扈巴，似应今图的Кува（库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玛尔噶浪。《霍记》所谓玛尔噶浪，当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Маргалан（马尔吉兰）。

阿克图伯。《霍记》所谓“阿克图伯”不见现代地图，具体方位待考。

布拉克巴什。《霍记》所谓“布拉克巴什”，不见现代地图，大概与四十七距浩罕城一日程的宿营地——Ebelekasi haksilak的不远处。

综合以上考察，排列如下表：

《张罕路程记》	《新疆图志》卷 82	《新疆舆图》	《喀什噶利亚》	今地
木什卡伦	木什素鲁克卡	木什	Муш	木什
——	明约路内卡	明瑶路营卡	Мин-юл	明尧勒
——	喀浪圭内卡	喀浪圭	Каратальм	喀浪沟律克
汗玉罕	安鸠安卡	安鸠安	Кан-Джуган	坎居干
特尔勒克	——	——	——	铁热克
——	——	黑子阿依	Кызыл-ой	黑孜苇
库舒乌珠黑	坎素(科克申琪苏)	堪苏	Кургашин-кани	康苏
——	——	乌布拉克	——	硝尔布拉克
——	库什阿依托海	库什阿依托海	Кош-юки	库什乌依库
鄂克苏噜尔	乌胡素鲁克卡	倭胡素鲁	Уксалыр	吾合沙鲁
帐斯克奇克	也斯克奇克卡	——	——	加斯
色尔哩克野塞	——	——	Сары-камыш	萨热喀米什
——	乌鲁克恰提卡	乌鲁克恰提	Улугчат	乌恰克恰提
纳哈尔察勒迪	沙哈尔	—	Награчарды	那格拉察勒迪（萨喀勒恰提）
伊根	业干卡(依只)	业金	Егин	吉根
托海巴什	——	——	Токайбаши	托阔依巴什
—	爱坎什斯木	伊尔克什坦木	Иркештам	伊尔克什坦
依克依奈克达巴罕	——	——	Ике-икезяк	以克荆克山口
依克依奈克布拉克	——	——	Ике-икезяк р.	以克则克河
库库苏	——	——	Кок-су	科克苏
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下	——	——	таш-уй	таш-уй
达巴罕	——	——	Терек-даван(Тютяк)	帖克达坂
色哩库楚克	——	——	Сары-кучук	沙鲁库秋克
塔尔噶拉克	——	——	Таргалык	Таргалык
图巴尔拉克塔木	——	——	——	Кызл-курган附近
古勒沙	——	——	Гульча	古里察(Гульча)
图古尔克托海	——	——	——	塔尔迪Талдык
鄂什	鄂斯	——	Ош	奥什(Ош)
阿拉班	——	——	——	阿拉万(Араван)
明图伯	——	——	——	?
库巴	——	——	——	库瓦(Кува)
玛尔噶浪	——	——	——	马尔吉兰(Маргелан)
阿克图伯	——	——	——	?
布拉克巴什	——	——	——	?

二、"浩罕界"考

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俄在天山西部、帕米尔地区不存在共同边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规定："西疆……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浩罕亡于俄后，此"浩罕界"就成为中俄在这一地区划定边界的依据。但所谓的浩罕界是条传统习惯线，是浩罕与清朝长期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只有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全面考察、研究，才能弄清它的基本走向。

乾隆二十七年(1762)浩罕伯克额尔德尼向清提出要求："以喀什噶尔岭为界"，当即遭到清朝方面的严厉训斥①。这是文献中关于清与浩罕分界的第一次记载。据黄盛璋先生考证：喀什噶尔岭即阿赖岭。19世纪末，C.E.Wright著《亚洲俄国》所附图，在天山之西喀什噶尔与安集延间标有Kashgertash，其中有"Terdk pass"与"Talyk Pass"。Kashger tash即喀什噶尔岭，据其中两个山口名称，此Kashger tash可断定为阿赖岭。又，Henry Lansdell在《俄国中亚》中说："位于南边的大山脉长期被称为无意义的喀什噶尔达坂(Kashger-Dawan)——即进驻喀什噶尔的山口。"此喀什噶尔达坂即阿赖岭②。喀什噶尔内属布鲁额德格纳部游牧地就在阿赖岭北的鄂斯。如前所述，乾隆二十七年(1762)鄂斯为浩罕武力霸占。为了迫使浩罕退出鄂斯，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清使穆齐图出使浩罕。浩罕虽然许诺退出鄂斯，但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使四十七再赴浩罕时，浩罕官员在鄂斯迎送，四十七对此未有异议，实际上是默

---

①《清高宗实录》卷676，23~24页。

②参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3期。

认了。但是这一时期的清代官方文献《西域图志》、乾隆《一统志》仍把鄂斯作为喀什噶尔属境，就是说浩罕占有鄂斯当时还未为清朝官方正式认可。直到嘉庆年间，情况才发生变化。《西域水道记》曰：

霍罕与回部分界处有二岭：曰噶布兰、曰苏提布拉克，额德格纳部布鲁特居之，岭东为回部、岭西为霍罕。

前文所考察的《霍罕路程记》的"古勒沙至图古尔托海七十里"条后注文曰：

有柴水草，中间噶布兰、苏提布拉克二处达巴罕。

而"图古尔托海至鄂什九十里"条后注文曰：

此处有土城一座，霍罕所管三百余户回民住所。此城有办事一人，名曰阿克呢杂尔；又有营兵一人，名曰伊尔哩虎哩；又有一河，名曰阿克卜古拉尔，有水草无柴。

现代地图表明：奥什到古里察的现代公路长81公里，与《霍罕路程记》所记里程完全吻合，其间奇基尔奇克(Чыгырчик)山口位于奥什、古里察之间，离古里察约20公里，正是清史料中的噶布兰、苏提布拉克。就是说，嘉庆年间浩罕界在今奇基尔奇克山口。这正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集中"新疆"图)表现的清与浩罕边界的走向。参加1892~1895年远征帕米尔的俄国军官鲍里斯·塔格耶夫，在他著的《在耸入云霄的地方》书中附有这座山口的图片。1814年到过浩罕的俄国人纳扎洛夫在他的旅行记中写道：

一名军官负责引导我们到离玛尔噶浪150俄里的安集延城。该城位于中国边境一侧的源于喀什噶尔达坂山的锡尔河河岸，来往于中国的商队在鄂什海关交纳货税。我们远远看到官道右侧的喀什噶尔达坂的狭长山谷中有两座古建筑物……①

看来，纳扎洛夫所说的喀什噶尔达坂即阿赖岭。浩罕在鄂什设立海关的报导也证实，当时鄂什附近是浩罕边界。

①纳扎洛夫：《浩罕旅行记》，巴黎，1925年，58~59页。

后来，浩罕势力再向东侵。道光元年(1821)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报告：

安集延所属之古勒什地方之布鲁特等，均已垦地开渠，布种禾麦[①]。

当时，清朝文献一般将浩罕称"安集延"，古勒什即古勒沙(古里察，Гульча)。这条史料说明浩罕势力越过奇基尔奇克山口，将边界推进到古勒沙。稍后，道光十一年(1831)长龄将军的一份奏折也证实这一点，据称：

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一千六百余里，途中有铁列克塔坂，至姑鲁邪两站，也浩罕接界，系布鲁特额德格纳爱曼。该处两山陡峻，中夹大河，只容单骑，依山沿河而行，须两日方能出山，此处最为险要[②]。

铁列克塔坂，即前文所考铁叶尔哩叶克达巴罕(терек-даван)；姑鲁邪，即古勒沙(古里察，гульча)。可见，浩罕已将边界推进到古勒沙和铁叶尔哩叶克达坂一带。

阿赖岭之铁叶尔哩叶克达坂作为浩罕之最东界，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浩罕灭亡为止。1870年俄人费德琴柯进入阿赖岭山，他在《突厥斯坦旅行记》中写道："浩罕汗国所占领的领土完全以天然界线为界，东南面伸展到阿姆河的克孜尔苏(苏尔哈巴)柯上游——以阿赖之名面出名的地方，最后止于铁列克达坂。铁列克达坂那边的吉尔吉斯人(布鲁特人)纳贡于喀什噶尔，浩罕与喀什噶尔界即铁列克达坂。"1873年另一位西方人斯克禄尔访问过鄂什，当时浩罕在鄂什的长官塞尔凯尔对斯克禄尔说："要进入阿赖山是不可能的，因为住在那儿的吉尔吉斯人曾经起来反抗汗国，派遣到那里的收税者已被掳劫，几乎剥光全身，被打回来，又另派遣一个也已被

---

①《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4，9~10页。

②《清史稿》卷367。

杀。"英人福赛斯在《1873年访叶尔羌使团报告》中记录了团员托罗塔尔1874年访问铁列克达坂情况。据守卫达坂的哨兵说，该达坂为属喀什噶尔奈曼部所守，其任务是"反击从浩罕那边来的劫掠者"[①]。1876年库罗巴特金由鄂什前往喀什噶尔，据他说："越过山口后"就进入喀什噶尔境内。

综上所述，浩罕边界由侵占鄂什开始，不断向东推进。

噶布兰、苏提布拉克（奇基尔奇克山口），古勒沙（古里察），最后止于铁叶哩尔叶克达坂（帖列克达坂），但始终未能越过阿赖岭。

①费德琴柯、斯克楼尔、福赛斯的话均转引自黄盛璋"驳无耻的浩罕遗产继承论"，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兰州，1979年。

布鲁特(柯尔克孜)诸部落考

一、布鲁特诸部名之考察

二、稽察布鲁特诸部之卡伦

　　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的有关卡伦

　　乌什所属有关卡伦

三、清季布鲁特诸部地理分布

　　中属布鲁特诸部

　　俄属布鲁特各部

四、布鲁特诸部之亲缘关系

　　左翼和右翼

　　瓦里汉诺夫的三分说

　　Отуз-уул和Ичкилик

　　“内部”和“外部”

　　几个问题

Kirghiz在清代文献中常作“布鲁特”，可以说，“布鲁特”特指清代Kirghiz。我国学者依据汉文史料就布鲁特诸部名称、部落组织做过有益的探讨[1]，苏俄学者则完全依据俄文史料研究布鲁特各部落关系及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诸部分布情况[2]，但还有许多没有弄清或没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近年我就有关问题做过专题研究[3]，本文则试图在以上基础上作系统综合考察：首先解决布鲁特诸部之名称和稽察布鲁特诸部卡伦之定位问题，进而研究布鲁特诸部的地理分布和亲缘关系。

一、布鲁特诸部名之考察

清史料关于布鲁特诸部一般分东布鲁特、西布鲁特两个群体叙述。乾隆四十七年(1772年)成书的《西域图志》卷四十五曰：

东布鲁特，在准噶尔部西南，回部西北，天山北麓，近葱岭，东

---

①《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Джамгерчинов Б.: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иргизии к Россия.М.1959.(以下简称Джам.)。Валиханов Ч.Ч.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ления.Алма-Ата.1958(以下简称Вали.)。Бартольд В.В.:Киргиз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ик. Бартьльд В.В.Соченения,Т.Ⅱ(Ⅱ)(以下简称Бар)。Минаев:Сведения О Странах по верховьям Аму-дары.СП6.,1879.Н.Ситняковский:Перечисление некоторых родов киргиз обитающих в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родов Ферг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Ташкент.1900.его же Таблица киргизских родов Ошского уезда.Ташкент.1900。

③潘志平："布鲁特各部落及其亲缘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2期；潘志平："清季布鲁特(柯尔克孜)诸部分布"，《西域研究》，1992年3期。

北距伊犁一千四百里,东面距阿克苏七百九十里。其部有五,最著者三,曰萨雅克鄂拓克,头目不一,而图鲁起拜为首,户一千有奇;曰萨拉巴哈什鄂拓克,头目不一,而车里克齐为首,户亦四千有奇;又一部旧居塔拉斯,其头目不一,而迈塔克为首,户四千有奇。诸头目不相统属,推一年长者有事则告,俾与闻而已。头目之长玛木克呼里,则兼辖诸部。

又曰:

西布鲁特,在喀什噶尔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逾葱岭而至,与东布鲁特相望。部落凡十有五,其最著者四:曰额德格纳鄂拓克,曰蒙科尔多尔鄂拓克,头目阿济比兼辖之,户七百有奇;曰齐里克鄂拓克,头目由玛特,户二百有奇;曰巴斯子鄂拓克,头目噶尔住,户千三百有奇。部落虽分,而驻牧同地;东南扼葱岭,西迄于布哈尔诸部落,共二十万人,逐水草,事游牧。

这里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所谓的东西布鲁特之说。《西域图志》以后的清文献都以为"布鲁特分东西部",然而,这仅仅是清朝方面的主观认识。可以说,没有材料证明,布鲁特自身有过这样的认识。清兆惠将军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甲寅的一道疏奏中录有"萨伊克"头目图鲁起拜的报告:

我布鲁特右部十鄂拓克,左部五鄂拓克。我等居右,今迁于哈尔哈里固勒米、图古斯塔老。其左部呼车、萨老、贺泰三鄂拓克共千余户,距右部有十五日之程,俱可令其头目来见。其余左部二鄂拓克在安集延,右部八鄂拓克与喀什噶尔相近……

这是清朝方面得到关于布鲁特部落的最早信息,收在《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十六,它原始地记录了布鲁特头人的说法,史料价值较高(下文征引它,简称《平准》正五十六)。按照布鲁特自己的说法:共十五部,十部居右,五部居左,左右是其基本划分。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在天山之北平定阿睦尔撒纳的进军途中接受了游牧哈尔哈里固勒米(楚河上源Каракуджур)、图古斯塔老(纳伦河附近Тогуз-тороо)的萨雅克、萨拉(尔)巴噶(哈)什部归附,又招

抚了塔拉斯附近游牧的布鲁特部落,是谓东布鲁特。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在天山之南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招抚了喀什噶尔至费尔干纳附近的布鲁特部落,是谓西布鲁特。由此看来,东西布鲁特,是清朝方面由东向西前进时形成的概念,并非布鲁特诸部落的内部联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布鲁特部落的地理分布。以下就所谓东布鲁特和西布鲁特各部分别讨论。

关于东布鲁特诸部,只有萨雅克、萨尔巴噶(哈)什两者最为明确,其余各部说法不一。比如,民国时期成书的《清史稿》说东布鲁特五部,先列举了萨雅克、萨拉巴噶什、塔拉斯三部,接着又列举了霍索楚、启台、萨娄三部。东布鲁特五部何以有六个部名呢?《柯尔克孜简史》的解释是:"《西域图志》所说的旧居塔拉斯的头人叫迈塔克的部落毫无疑问也属东布鲁特,《清史稿》所说的塔拉斯部必定指的就是这一部落。《清史稿》所列东部其它三个部落霍索楚、启台、萨娄,均不见于上述诸书,但绝不会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它们应当就是别的作者所不了解的那几个东布鲁特部落。不过所谓萨娄,很可能就是萨尔巴噶什的简称。所以,东布鲁特有五部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萨雅克、萨尔巴噶什、塔拉斯、霍索楚、启台五部。"[①]我同意《柯尔克孜简史》所说的"霍索楚、启台、萨娄""绝不会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但把萨娄比附于萨尔巴噶什的简称,似不可取。霍索楚、启台、萨娄之名虽不见《柯尔克孜族简史》所列诸书(包括《西域图志》、《新疆识略》、《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新疆图志》等),但显然是抄自魏源的《圣武记》,是书曰:

布鲁特分东西部,东部五,西部十五。东部在天山北,准部之西南,近葱岭,距伊犁千四百里。每部长皆以鄂拓克为名。旧游牧于特穆图泊左右,为准部所迫,西迁寓安集延,王师定伊犁,始复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将军兆惠等追厄鲁特逃贼至其界,遣侍卫往谕其头目。萨雅克部、萨拉巴噶什部两鄂拓克不自主,别推一年长者玛木

①《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91~92页。

克呼里主之。年九十余，体硕趺坐，腹垂至地，不能远行，遣使献牛羊百头。将军等燕而示之讲武，咸诧服……于是兼抚定霍索楚及启台两鄂拓克。六日至其地，并上四部共二千余户，而萨娄鄂拓克亦于七月以所部五千户来归，东布鲁特五部皆遣使入朝。

《圣武记》的这一说法可以在《清实录》中找到证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壬辰条记：

定边将军兆惠等疏报，布鲁特部落萨喇巴哈什头目车哩克齐、图鲁起、尼沙等归诚。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癸卯条记：

定边将军兆惠等疏报：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归诚，遣舍第舍尔伯克等入觐……

《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条记：

定边将军兆惠等疏报：左翼布鲁特霍索楚鄂拓克头目迈塔克、启台鄂拓克头目喀喇博托，遣其弟侄等归诚。

看来，以迈塔克为头目的霍索楚部，正是《西域图志》所说的"边远塔克为首"的"旧居塔拉斯"一部。塔拉斯为地名，非部落名，《清史稿》把它说成是部落名，同一部落重复提及，五部就这样弄出六个部落名。因此正确的说法是：清文献中所谓东布鲁特五部为：萨雅克、萨尔巴噶什、霍索楚、启台、萨娄。其中霍索楚三部远在塔拉斯、楚河上流一带，与清朝方面接触甚少，因此在许多史书中不见记录。俄文史料中谈到塔拉斯、楚河上流的布鲁特有Кушру、Кытай、Саруу[①]。而前引《平准》正五十六提到的呼车、贺泰、萨老，指的也正是这三个部落，其对应关系当为：

霍索楚——呼　车——Кушчу。
启　台——贺　泰——Кытай。
萨　娄——萨　老——Саруу。

因此，把萨娄推测为萨拉巴噶什的简称，是不成立的。

另外在伊塞克湖附近还有两个布鲁特部落。

①参见Джам.стр.14~15。

其一曰布库。《新疆识略》(卷十二)说,萨尔巴噶什亦名布库。《清史稿·玉麟传》提到该部,作"布呼"。《那彦成奏议》卷八十谈到"布格依部"。彼·彼·谢苗诺夫的《天山游记》谈到布库与萨拉巴噶什人在伊塞克湖的剧烈争夺,说布库是从萨拉巴噶什氏族分裂出去的[①]。

其二曰察哈尔萨雅特(《新疆识略》卷十二、《新疆图志》卷三),又作察喀尔(《那文毅公奏议》卷八十)。该部名不见俄文史料,但俄国的社会调查资料表明:萨雅克占有两块地,一大一小,小者在伊塞克湖西北角。那个居寓伊塞克湖西北角的可能就是察喀尔萨雅克,是为萨雅克之一分支。

关于西布鲁特诸部,《新疆识略》(卷十二)、《那文毅公奏议》(卷八十)《新疆图志》(卷三)都有比《西域图志》、《清史稿》更详细的记述,所提各部落大体相同,惟有译写略有不同。现列表如下:

《西域图志》	《新疆识略》	《那文毅公奏议》	《新疆图志》
额德格纳	额德格讷	额德格讷	额德格讷
蒙科尔多尔	蒙额勒多尔	蒙古思多尔	蒙额勒多尔
齐里克	奇里克	奇里克	奇里克
巴斯子	巴斯奇斯	巴锡奇	巴奇斯
	苏勒图	苏勒团	苏勒图
(等十五部)	诺依古特		诺依古特
	冲巴噶什	冲巴噶什	冲巴噶什
	胡什齐	霍什奇	胡什齐
	岳瓦什	岳瓦什	岳瓦什
	奈曼	奈曼	奈曼
	希布察克	希布察克	希布察克
	萨尔特	萨尔特	萨尔特
	图尔额依格尔	托拉尔根	图尔格依格尔
	色勒库尔		色勒库尔
	提依特	提依特	提依特
		喀拉提依特	
	喀尔提锦	喀拉提锦	喀尔提锦

①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171~172页。

额德格讷，俄文史料作Адыгене。《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庚申条记》:

定边将军兆惠等奏：前因堵截逆贼等逃路，遣侍卫达克塔讷等传檄霍罕额尔德尼伯克、玛尔噶朗、安集延、纳木干等城，并布鲁特之额德格讷等部落。兹据额德格讷之阿济毕，遣沙喇库楚克等，呈称额德格讷阿济毕，与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俱同心归顺，并赍呈阿济毕之书。译文云：……今奉到将军传谕，我等情愿投诚，布哈尔以东，我等二十一万人，皆为臣仆等语……

看来，额德格讷部为西布鲁特最大、最重要的部落。

奇里克，又作齐里克、齐哩克、其力克，俄文史料作Черик。乾隆二十四年末至二十五年初，齐哩克部归附清王朝，并遣使呼达呼里进京朝觐，并受清帝敕书[1]。受此殊荣的布鲁特部落除额德格讷外也仅此齐哩克部。

蒙额勒多尔，又作蒙科尔多尔、蒙古思多尔，俄文史料作Монголдор。

巴斯子，又作巴斯奇斯、巴锡奇、巴奇斯、巴俟斯，俄文史料作Басыз。

冲巴噶什，又作崇巴噶什、充巴噶什、穷巴噶什，俄文史料作Чонбагыш。

胡什奇，又作呼什齐、霍什奇、胡什齐、库秋，俄文史料作Кутчу。

岳瓦什，又作交务士，俄文史料作Джоош。

提依特，又作提伊特，俄文史料作Теит。

奈曼，又作乃蛮，俄文史料作Найман。

希布察克，又作希皮察克、乞卜察克，俄文史料作Кыпчак。

萨尔特，属希布察克分支，俄文史料作Сарт-Кыпчак。

图尔额依格尔，又作图尔爱格、图尔厄依格尔、吐勒额依格尔、

---

①《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条，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乙卯条，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条。

托拉尔根，俄文史料作Торайгыр，属希布察克分支。

色勒库尔，又作色呼库勒。色勒库尔是地名，即今塔什库尔干，该部应是塔什库尔干境内的一支布鲁特人，属希布察克[1]。

喀尔提锦，又作喀拉提锦。同色勒库尔一样，喀尔提锦是地名，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可能是该境内一支布鲁特人。

诺依古特，俄文史料作Нойгут。

苏勒图，又作苏勒团、索勒团，俄文史料作Солто。《新疆识略》称该部"在喀什噶尔城西乌帕喇特卡伦外游牧"，应为西布鲁特，但《清宣宗实录》道光十年(1830)七月甲子条说它在"那林河北"，俄文史料也说它在楚河下流。看来，该部由南向北迁徙了。

综上所述，清文献提到的布鲁特各部落是：东布鲁特的萨雅克、萨尔巴噶什、霍索楚、启台、萨娄及两个分支布库和察喀尔萨雅克，西布鲁特的额德格讷、蒙额勒多尔、奇里克、巴斯子、冲巴噶什、胡什齐、岳瓦什、提依特、奈曼、希布察克、萨尔特、图尔额依格尔、色勒库尔、诺依古特、喀尔提锦、苏勒图等。

19世纪50年代，俄国人来到中亚，首先接触到的是天山北麓伊塞克、那林山区和塔拉斯、楚河一带的布鲁特各部，这些布鲁特人被称作北吉尔吉斯人。19世纪70年代俄国征服浩罕后，进入费尔干纳、阿赖和喀什噶尔附近山地，并把这一地区布鲁特人称为南吉尔吉斯人。所提及的主要部落是：

北吉尔吉斯人	南吉尔吉斯人
Адыгене(额德格讷)	Саяк(萨雅克)
Мундуз	Сарыбагыш(萨尔巴噶什)
Кесек	Бугу(布库)
Теит(提依特)	Кушчу(霍索楚)
Нойгут(诺依古特)	Кытай(启台)
Чонбагыш(冲巴噶什)	Саруу(萨娄)

[1]《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91页。

Кутчу(胡什齐)	Солто(苏勒图)
Дёёдёс(岳瓦什)	Черик(奇里克)
Найман(奈曼)	Мондущ
Кыпчак(希布察克)	Басыз(巴斯子)
Сарт-Кыпчак(萨尔特)	Багыш

与东西布鲁特一样,南北吉尔吉斯并非布鲁特方面的认识,是沙俄南侵中亚时形成的概念。可以看出,俄国史料中的北吉尔吉斯大体等同清文献中的东布鲁特,南吉尔吉斯则大体等同西布鲁特。只是东西部基本上以那林河为界,而南北部分界地则在那林河南的卡拉河。故此那林、卡拉河之间的奇里克、巴斯子等部的归属就不一样了。这种东西、南北的划分,对于研究布鲁特各部的地理分布有某种意义,但对于研究布鲁特部落间的亲缘关系价值并不大。

二、稽察布鲁特诸部之卡伦

卡伦(Karawul),或作喀伦、卡路、喀龙,为清朝政府在北方边疆地区广泛设置的更番候望之所。《大清会典》曰:"于要隘处设官兵望月卡伦。"要隘不一定在边境地方,边境地方的卡伦亦不正在边界线上,其去边界线可以很远;清政府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乌什的卡伦,距城不十分远,一般在绿洲边缘、人山的要隘,控驭布鲁特游牧,稽察通往"外番"、"夷地"的道路。清文献关于布鲁特诸部分布的记述都是以这些卡伦为主要坐标的。因此考察、研究布鲁特各部的地理分布,必须考订这些卡伦的位置。《新疆识略》、《回疆通志》、《回疆志》等较早期史书是研究这些卡伦地理位置的重要资料,但所述粗疏,方位、里程都不甚准确,且各书说法不一,有关地名译写不一,所绘舆图则类山水画,只有大概方位,难于精确定位。《新疆图志》是后期资料,所附舆图系光绪三十四年所制,图中标有纬度线和经度线(距京师),比前期舆图进了一大步,但与实际方位仍有相当大的出人。英人斯坦因曾多次来新疆活动,所著《亚洲腹

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中的地图保存一些重要卡伦资料。民国24年(1935),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三十万分之一图,也记录有一些卡伦资料。这些地图是按现代科学方法测绘的,参考价值较大。

另外,我们还大量使用了国家测绘总局出版的十万分之一图、二十万分之一图、二十五万分之一图、一百万分之一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编制大型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1995年,以下简称《新疆地图集》)及近年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州及各县地名办公室在普查地名基础上确定了标准地名,出版了一些《地名图志》,都极有价值。一些清代卡伦之名已不复存在,但还有一些卡伦原驻地仍以喀尔果勒、喀如勒、喀尔乌勒等名命名,这显然是Karawul(卡伦)的不同译写,为考订这些卡伦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我还于1987年夏在喀什、克孜勒苏一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通过文献分析、古今图籍排比、实地考察,大致弄清有关卡伦的实际位置。

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的有关卡伦

乾隆中，平定大小和卓后，清政府即在此地设大小卡伦十几座。平定张格尔后，这些卡伦有所调整,《清宣宗实录》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癸卯条曰:

……喀什噶尔所属卡伦八处,内喀浪圭、图舒克塔什、乌帕拉特三卡,为通霍罕等外夷要路,该三卡适中之明约洛地方,著筑土堡一处,遴派得力都司守备一员,管带绿营兵二百名驻守,其贸易亭即建设堡内;并于巴尔昌、伊兰瓦斯、伊斯里克三卡适中阿尔瑚庄西,及玉都巴什、伊尔古楚两卡适中之马厂地方,均筑土堡一处,……英吉沙尔所属卡伦五处,惟乌鲁克通各外夷及布鲁特要路,著于该卡建筑土堡兵房,遴派得力千把总一员,管带绿营兵六十名驻守。其余图木舒克、特尔克奇克、特比斯、铁列克四卡,各派兵十名,责驻堡千把总周历巡查,足资控制。

这条史料列举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的最重要的卡伦。具体方位考订如下：

喀浪圭卡伦。喀浪圭，又作喀浪归。今图称喀浪沟律克[1]属乌恰县。1876年俄人库罗巴特金亲眼见到"这座被废弃和毁破的中国城堡"，称之Караталым[2]。喀浪勾律克方位是东经75°21′，北纬39°36′，此即喀浪圭卡伦的坐标。

图舒克塔什卡伦。图舒克塔什之名不见现代地图。《回疆通志》说，图舒克塔什卡伦在喀什噶尔城西北90里。《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说，图舒克塔什内卡临图舒克塔什河，该河发源于苏约克冰岭，汇察克玛克河流向阿斯图阿尔图什庄。显然这条河就是今地图上的恰克玛克河。《回疆志》说畲舒克他什在玉思图阿尔图正北25里。畲舒克他什即图舒克塔什。玉思图阿尔图即小阿图什，也就是今图的阿图什县上阿图什乡。据此，今天两个地点值得注意：一是距上阿图什乡政府11.5公里处的阔纳喀尔果勒(Kona—karawul)村；一是距上阿图什乡政府15公里处喀尔果勒(Karawul)村。《阿图什县地名图志》说，前者"维语老哨卡，因该处从清朝起就设哨卡而得名"，后者"过去曾设过哨卡，因而得名"。这两处均在恰克玛克河边，如果从"Kona"的"老"、"旧"的意义上看，阔纳喀尔果勒村更可能是清朝图舒克塔什卡伦驻地。兰斯代尔的《中国的中亚》(1893年)附图上标有TyshikTash，其方位与阔纳喀尔果勒村极接近[3]，可以证实我们的分析。今阿图什县上阿图什乡阔纳喀尔果勒村方位为东经75°44′，北纬39°42′，当是图舒克塔什卡伦的坐标。

乌帕拉特卡伦。乌帕拉特卡伦是座著名卡伦，其名依然保存到今天，在疏附县乌帕尔乡政府西北13公里Uplat农场附近。卡伦设在Uplat村东南1.5公里高地上，在此可俯瞰Uplat村，控驭道路。据当地

---

①《新疆地图集》156页。

②A.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54~255页。

③Lansdill，H：Chinese Central Asia，London，1893。

老人乌拉音祖农说,解放前此地仍驻兵,营卡方圆30亩,四周围墙高约10米,厚3米。解放后遗址土墙建筑都作为肥料挖净。现在只能见到建卡伦的戈壁平台。斯坦因地图上标有Oplat—Karaul,与今图上Uplat方位吻合,其方位东经75°24′、北纬39°21′,此即乌帕拉特卡的坐标。

明约洛卡伦。明约洛卡伦也是座著名卡伦,其名依然保存到今天,在疏附县木什乡明尧勒(Mingyol)村,该村委会驻库如勒(Korul)自然村。1876年俄人库罗巴特金访问过这座卡伦,说这座卡伦"是由四方形的墙围起来,墙上有侧翼防御的炮楼,正面墙长33俄丈。卡伦内有几座带顶的房屋,墙同各处卡伦一样很薄"①。我1987年亲临该地访问当地老人乌斯曼吾守尔(当地1902年曾有大地震,老人当时年7岁)。据老人指示,明尧勒村委会北百米左右有一条百米长2米高的土埂,即为当年卡伦后墙基。在卡伦东百米处还有约5米高的土岗。据说,过去那里有座小庙,庙内有六尊佛像,是卡伦官兵祭祀地方。老人说,当时卡伦的士兵留有长辫,出巡时,好几百人从村头排到村尾。光绪年间清将刘锦棠在此歼灭阿古柏一支残部,并在此立庆功石碑一块,现石碑存自治区博物馆内。明尧勒库如勒村方位是东经75°32′,北纬39°34′,此即明约洛卡伦的坐标。

巴尔昌卡伦、伊提约尔卡伦。《新疆识略》卷三说巴尔昌卡伦在喀什噶尔东北160里;《回疆通志》卷七说巴尔昌卡伦在喀什噶尔东北150里;《新疆图志》八十二说,巴尔昌内卡一名巴羌卡,其舆图46(疏附县图)中巴尔昌卡伦亦在喀什噶尔城东北,距离约140里。据此,巴尔昌卡伦当在今乌喀公路七盘水磨附近。七盘水磨当地名为Bax Baqan,此西北约5公里一放牧点,名曰巴羌(Baqan),又名阔纳喀尔果勒(Kona Karawul,"旧卡"义)。《阿图什县地名图志》说:"因

---

①A.H.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55页。

此地是交通要道，从清朝起开始设卡，故称阔纳喀尔果勒，维语老哨卡。"看来，七盘水磨附近的阔纳喀尔果勒(巴羌)，为清代巴尔昌卡伦的驻地，今十万分之一图上其方位为东经76°21′，北纬39°49′。

巴尔昌卡伦之东还有一名伊提约尔卡伦，亦是稽察布鲁特游牧之卡伦。根据《新疆图志》(卷八十二)的说法，巴尔昌内卡东一百里为苏洪内卡，一名素封，即伊提约尔卡。斯坦因地图上有Sughum—Karaul，方位约东经76°46′，北纬39°58′。今二十万分之一伽师县图，巴长(巴尔昌)之东北40公里处有一游牧点曰"苏公卡"，方位为东经76°41′，北纬39°58′，此应苏洪内卡(伊提约尔卡)之方位。

伊兰瓦斯卡伦。伊兰瓦斯，又作伊兰乌瓦斯。《新疆识略》、《回疆通志》说，该卡在喀什噶尔城东北120里，巴尔昌卡伦西70里。《新疆图志》卷六十八说，伊兰乌瓦斯卡伦临伊兰乌瓦斯河，该河源出托古里买特南，流至伊兰乌瓦斯内卡，"至此分两支：一经阿尔湖庄、巴尔昌卡一带止不流；一经阿斯图庄与图舒克塔什河会"。案：托古里买特即今阿图什县吐古买提乡；阿尔湖，在清史料中又作阿尔湖、阿尔扈、阿尔胡等，显然是今图之阿图什县阿湖乡(Agu)政府驻地。阿斯图庄，又作阿斯图阿尔图什，即今天的阿图什市。由此看来，清文献中伊兰乌瓦斯河即现代地图上的博古孜达里亚河。博古孜达里亚河源出吐古买提，在今阿湖乡农场处分流：一支流向阿湖乡，一支流向阿图什市。斯坦因地图上此分流处为Yilan-hos-karaul，即伊兰乌瓦斯卡伦。阿湖乡农场驻地现名喀尔果勒村。《阿图什县地名图志》说："场部驻喀尔果勒。因此地是通向吐古买提乡和苏联的要道，自清朝起便在此设卡。"故此，今阿湖乡农场部喀尔果勒当为伊兰乌瓦斯卡伦驻地，在今十万分之一图上方位是东经76°3′，北纬39°50′，这与斯坦因图Yilan—hos—karaul大体吻合。

伊斯里克卡伦。伊斯里克之名不见现代地图。《新疆识略》说它在喀什噶尔城正北110里，伊兰乌瓦斯卡伦西60里，图舒克塔什卡伦东60里；《回疆通志》说它在喀什噶尔城北150里，伊兰乌瓦斯卡

伦西60里,图舒克塔什卡伦东50里。按此方位在斯坦因地图上可找见一卡伦名Islak—karaul。对照今十万分之一图东经75°48′,北纬39°50′处有一喀如勒(Karul)村,属乌恰县铁列克乡。看来这正是伊斯里克卡伦驻地。

玉都巴什卡伦。这是座著名卡伦,其名仍保存至今天地图上。今乌帕尔南喀什至塔什库尔干公路上有居鲁克巴什(Juluk—bax)村,现属阿克陶县喀热开其克乡。居鲁克巴什即玉都巴什,此地与《回疆通志》、《新疆识略》所述方位吻合。斯坦因地图上记有此卡伦,名Yudongh—bashi,方位是东经75°31′、北纬39°13′。我在乌帕尔南居鲁什巴什附近见到这座卡伦遗址,其精确方位应是东经75°33′,北纬39°13′。遗址靠公路西侧,现仅剩两座高约7米相距15米的土堆。居鲁克巴什村老人巴拉提阿孜木说,这是惟一通道,这土堆即当年卡了(卡伦),卡子里驻有军队,路上设有横杆,路面定期用马拖树枝条扫平,作为査迹线(土地松浮,人过即留足迹)以此稽察过往行人。

伊尔古楚卡伦。伊尔古楚,又作伊勒古楚、伊勒噶尔,其名已不见于现代地图。《新疆识略》说,伊勒古楚卡伦在喀什噶尔城西南150里,玉都巴什南50里;《回疆通志》说,伊勒古楚卡伦在玉都巴什卡伦南15里;《回疆志》说,他什密里克卡伦正西5里是伊勒噶尔,设小卡伦一处。案他什密里克即今疏附县塔什米克(Taxmilik)乡。按此方位,在盖孜河边人山口附近有恰勒马艾列克(Qamxierik)村,据解放初期在塔什米里克当过区长的司的克托乎提说,该地旧名Yurkluk。看来Yurkluk就是伊勒古楚,虽然其遗址荡然无存,但也可大致确定此处为伊勒古楚卡伦驻地,其方位为东经75°34′,北纬39°6′。

图木舒克卡伦。《回疆通志》说,图木舒克卡伦在英吉沙尔城西北60里,与喀什噶尔所属伊勒古楚卡伦相邻。《新疆识略》说,图木舒克卡伦与伊勒古楚相距110里。《新疆图志》舆图五十八(英吉沙尔厅)中标有图木舒克卡伦较明确方位:它在改子(盖孜)河一支流

与库山河交汇处南，库山河与新开渠分叉处附近。图木舒克，维吾尔语意为鸟嘴，为常见地名，一般都是命名在河流分汊处似鸟嘴地方。从以上文献、图籍分析，图木舒克卡伦似在今英吉沙县艾古司乡康帕(Kampa)村附近。该地距县城30公里，扼守库山河出山口，库山河与特比斯渠之分叉处，所谓特比斯渠即新开渠。此外还有几点旁证：(1)斯坦因地图中库山河分汊鸟嘴处有Chong—karaul，意为"大卡伦"。民国24年国民党测绘地图，这里作"昌卡"，系Chong—karaul译音。Chong—karaul方位与康帕方位吻合。(2)《回疆通志》、《新疆识略》都说，图木舒克卡伦领有一小卡伦汗达喇克，两者相距20里。现康帕溯库山河而上的10公里处为汗铁列克(Hanterek)，此汗铁列克似为汗达喇克卡伦地。(3)《回疆通志》说，英杂尔(英吉沙尔)城西北50里有喀木帕尔卡伦，此卡伦领有罕特赖克小卡。看来，早期图木舒克卡伦为喀木帕尔卡伦，喀木帕尔可能是Kampa(康帕)另一译写。(4)康帕往南不远戈壁滩现代地图上名为吐木休克亚尔江尕勒。根据以上几点，康帕极可能为图木舒克卡伦驻地，其方位是东经75°49′，北纬38°58′。如是说成立，这就是图木舒克卡伦的坐标。

乌鲁克卡伦。"乌鲁克"意为大、伟大。乌鲁克卡伦是英吉沙尔所属最重要的卡伦，但其名已不见现代地图。《回疆通志》说，乌鲁克卡伦在英吉沙尔城西南90里。《新疆识略》说，乌鲁克卡伦在英吉沙尔城南100里，其图所示，在托布拉克军台西南入山口处。案托布拉克当为今英吉沙托普鲁克(Topluk)乡，由托普鲁克西南入山口为英也村(Igiz—yar)。《新疆图志》舆图五十八(英吉沙尔厅图)表示，乌鲁克卡伦在一介牙庄。另，《回疆通志》说英杂尔西南有额格资雅尔卡伦。案一介牙、额格资雅尔都是Igiz—yar的不同译写。张大军还写作"依格孜牙"，斯坦因地图上写作Ighiz—yar。此地控驭通往蒲犁、阿富汗等地的最重要山路，一直是驻军要塞，40年代国民党一个团曾驻守于此。斯坦因地图上，Ighiz—yar南不远山路上有Kona—karaul(旧卡)、Karaul和Kichik—karaul(小卡)。Kona—karaul最可能

为清代乌鲁克卡伦驻地。今十万分之一图上依格孜牙村(英也尔)南亦有一地名亦称依格孜牙，与Kona—karaul方位同，即东经76°10′,北纬38°38′。张大军记述,出依格孜牙(英也尔)乘马过一河床至破城子[1]。此破城子显然与Kona—karaul为同一地方。过破城子(比定乌鲁克卡伦)约7公里至乌大龙,又名吾日到冷。据清文献,乌鲁克卡伦领有三座小卡伦,其一日俄尔多笼,至乌鲁克大卡10里。十万分之一图中的阿克陶县克孜勒乡卡尔乌里(Karawul),与斯坦因图上Kiehik-karaul(小卡)方位同,此应俄尔多笼小卡驻地。

特尔克奇克卡伦。特尔克奇克,又作特尔格齐克、特尔洛奇克、铁列科乞克。《新疆识略》、《回疆通志》说它在英吉沙尔城西北60里,距图木舒克卡伦50里。《新疆图志》舆图五十八(英吉沙尔厅图)表明，铁列科乞克在新开渠西南侧山前地方。英吉沙县地名办介绍,现英吉沙艾古司乡先木来村特比斯渠西南侧有一大卡伦遗址。今十万分之一图上,该地名曰喀朗,喀朗者卡伦也。由此地再往西南方向则是铁热克且克阿格孜,人山口处日铁热克且克,显然铁热克且克(Terekqik)与特尔克齐克为同一地名不同译写。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喀朗为特尔克齐克卡伦驻地,其方位是东经75°56′,北纬38°54′。

特比斯卡伦。特比斯又作特维孜、提维兹、铁比思、铁五子。《新疆识略》说,特比斯卡伦在英吉沙尔城西南30里,西与特尔格奇克卡伦相距80里,东与乌鲁克卡伦相距90里。现英吉沙县乌恰乡尤喀克台赛克村,又名特比斯,在县城西南15公里处。当地人证实,该村有一卡子(卡伦)。该处当为特比斯卡伦驻地,其方位是东经76°5′,北纬38°49′。

铁列克卡伦。《新疆识略》说铁列克卡伦在英吉沙尔城东南130里,距乌鲁克卡伦60里。《新疆图志》舆图五十八(英吉沙尔厅)图示:铁列克卡伦由黑子尔庄溯铁列克水至且木伦泉附近。英吉沙县

---

①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2374页。

地名办介绍：现英吉沙东南克孜勒(Kizil)乡阿沙(Hasa)地方有座大卡伦遗址。克孜勒乡政府驻乔木伦。显然黑子尔为Kizil译写，且木伦、乔木伦都是Qamilung译写。故此阿沙地方卡伦遗址应为铁列克卡伦驻地，其方位是东经76°30′，北纬38°33′。

另外，还有一座喀什噶尔所属卡伦也斯克奇克卡，是座稽察布鲁特游牧的重要卡伦，但不见前期的史书。《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述，也斯克奇克卡在乌胡素鲁克西九十里，乌鲁克恰提东七十里。据此它可能在今图萨热布隆和加斯一带附近。

乌什所属有关卡伦

《乌什直隶厅乡土志》，乌什"城东卡伦一座，曰哈拉雅卡伦；东南一曰孔台卡伦；西南二座，曰巴什雅哈玛卡伦，毕底尔卡伦；西二座，曰卡尔布拉卡伦，巴拉艮卡伦；西北二座，曰沙图卡伦，伊布拉引卡伦；北一座，曰雅满苏卡伦；东北四座，曰贡古鲁卡伦，噶吉尔卡伦，毕德里克卡伦，英阿拉卡伦"。其中卡尔布拉克卡伦、巴什雅哈玛卡伦、沙图卡伦、贡古鲁克卡伦和毕德里克卡伦为稽察布鲁特游牧的重要卡伦。

卡尔布拉克卡伦。《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52~53页图上有标记，为卡尔布拉，在今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

巴什雅哈玛卡伦。《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52~53页图上有标记，为巴什雅克玛，1995年《新疆地图集》147~148页上为巴什阿克玛。1876年库罗巴特金过此，见到这座卡伦已被废弃。

沙图卡伦。《乌什直隶厅乡土志》述："自厅城西北行五十里至沙头卡伦。又西北行百九十里，至伊布位引卡伦。又西北行八十里，至别迭里山口。"案沙头即沙图，但不见于今图。《新疆地图集》147~148页上有别迭里山口和依不拉依木卡子(即伊布拉引卡伦)。沙图卡伦大概在吐先与喀拉尤勒滚一带。

贡古鲁克卡伦。在乌什城东北，可能在《新疆地图集》乌什县贡格拉提附近。该地东北距乌什20多公里。

毕德里克卡伦。《新疆图志》卷八十一曰：乌什"城东北六十里毕得里卡伦，一百五十里臻丹口，一百一十里至臻丹达坂抵伊犁号"。毕德里克不见于今图，从所述方位来看，大概在英阿瓦提乡境内。

以上考察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乌什所属有关稽察布鲁特游牧的二十多座卡伦的地理位置，为以下研究布鲁特诸部地理分布提供基础。

三、清季布鲁特诸部地理分布

布鲁特诸部以游牧为生，游牧者难以固守一地。这里仅就清季布鲁特诸部分布作考察。因为，无论是有关清文献还是这一时期俄文史料都比较系统。此外，这时布鲁特诸部游牧地相对稳定。问题是，此时，由于沙俄入侵中亚，布鲁特大部为俄所并，通过中俄划界，布鲁特诸部分属中俄两国，我们的讨论也就从中俄两属布鲁特的情况展开。

中属布鲁特诸部

《清德宗实录》光绪四年(1878)二月壬辰条记："红旗捷报，官军克复西四城，新疆南路一律肃清，暨外国商官等给文回国，布鲁特各部分别安置……布鲁特十九部落除投附俄国五部落外，其余十四部落愿归胡土者，即行放归。"据《新疆图志》卷十六，所谓投俄五部落为：苏勒图、察哈尔、萨雅特、巴斯奇斯、萨尔巴噶什。但实际上，中俄划界后，留在新疆境内的只有胡什齐、冲巴噶什、岳瓦什、希布察克、奈曼(大部)和奇里克(一半)。根据有关史料分别讨论如下：

胡什齐(Kutqu)，又名胡什乔。《新疆识略》卷十二说：胡什乔在乌什城东巴什雅哈玛卡伦外哈克沙勒地方游牧。在乌什边境游牧，

巴尔昌卡伦外四百余里。说明它大致方位在乌什与喀什噶尔之间的山区。《新疆图志》卷四则较详细记载该部在疏附(喀什噶尔)境内的分布:

胡什齐。(疏附)城之东二百八十里伊提约尔卡外,一名库提齐。北界巴图玛纳克、库伦杜各达坂与俄七河省萨尔巴接;南抵土鲁沙依与伽师县格达梁接;东抵辟展大山与乌什厅西鄙接;西界冲巴噶什部苏浑山。东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一十五里。辖游图五:曰巴图玛纳克、曰嘉依多拜、曰乌胡习利、曰克孜布伦可、曰巴那艮。

上述史料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稽察卡伦:伊提约尔卡、巴什雅哈玛卡。其方位上文已考。

其二,四至。

东:辟展大山。辟展,即现代标准地名皮羌(Piqan),在今阿图什县哈拉峻乡东境。辟展大山当为皮羌附近的皮羌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第52~53图上有辟展大山,定位基本准确。

南:土鲁沙依。在格达梁(Kattalak,标准地名格达良)北。据《新疆图志》舆图四十六,土鲁沙依当为今图之克孜勒、喀什噶尔山和塔特勒克苏一线。《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有土鲁沙依,其定位似稍偏南。

西:苏浑山。《新疆图志》卷五十九载:苏浑山"由托音图山分支而东径哈拉别里达坂析而南值伊提约尔卡"。再参考《新疆图志》舆地图四十四(疏勒府总图)所绘苏浑山方位,大致可以认定:苏浑山为今图之苏盖特套山、马坎套、喀拉别列斯基套山、喀热格尔灭、铁格尔缅萨依登套苏、塔什克多维一线。

北:巴图玛纳克、库伦杜达坂。即今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之Butmalak(布特玛纳克)和Korumduk(库鲁木都克)山口。

其三,游图。游图即突厥蒙古社会的Yurt(禹儿锡),指帐幕所在

地。胡什齐辖游图,即五个主要牧地。

1. 巴图玛纳克,当在巴图玛纳克(布特玛纳克)达坂附近。

2. 嘉依多拜,又作甲依推板、加依推板,即哈拉峻西之Jaydowe,标准地名为加依多维。

3. 乌胡习利。《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记:乌胡习利在甲依推板北六十里、巴图玛纳克南一百二十里。再参考《新疆图志》與地图四十六所绘乌胡习利之方位, 可推定它在哈拉峻东北之古尔库热和库铁热克附近。

4. 克子布伦可,即Kirbulak,标准地名为克尔布拉克,在哈拉峻西南。

5. 进制巴那艮。据《新疆图志》卷八十二,巴那艮即哈拉准庄,就是Karajol,现代标准地名哈拉峻。

据此, 胡什齐部牧地在今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至阿合奇县托什干河南岸地方。

冲巴噶什(Qong—bagash),又作充巴噶什。《新疆图志》卷四云:

冲巴噶什。(疏附)城北一百二十六里图舒克塔什卡外。北界博孜艾格起至库戛塔达坂止, 与俄七河省阿哈沙依及阿拉的湾拉(接);南界巴尔昌、伊兰瓦斯、伊斯里克、哈朗圭各内卡;东界苏浑山、哈喇别里达坂,西界岳瓦什部古里帖梗及也斯克奇克卡。东西六百四十里、南北二百五十七里。辖游图十有七:曰冲布霍尔罕、曰阿哈塔什、曰旦格塔、曰脱盖儿宾(买)舟(丹)、曰科科雅、曰哈那特杆、曰冲铁列克、曰牌素霍尔罕、曰恰哈玛克、曰克子冷科罗杆、曰巴尔滚、曰托允多拜、曰苏约克、曰雅哈恰提、曰安鸠安、曰坎素、曰乌胡素鲁克。

上述史料讨论如下:

其一,稽察卡伦:图舒克塔什卡伦和巴尔昌、伊兰瓦斯、伊斯里克卡伦,其方位上文已考。

其二,四至。

东：苏浑山（上文已考）和哈喇别里达坂。哈喇别里，又名哈拉别里，意黑达坂，此同名地很多，需认真研究确定。参考《新疆图志》舆地图四十六所绘哈拉别里达坂在库尔能都克河（库鲁木都克河）西，巴什苏洪至和坚特山口的骑径上，哈别里达坂应当是今哈拉别勒恰提之黑达坂，方位为东经76°19′，北纬40°19′。

南：巴尔昌、伊兰瓦斯、伊斯里克、图舒克塔什、哈朗圭（喀浪圭）一线，其方位上文已述。

西：也斯克奇克卡（上文已考）和古里帖梗。古里帖梗又作古立帖梗或叶雷古刀铁梗。据《新疆图志（卷八十二）所述和《新疆图志》舆地图（图四十六）所绘方位，当在今图之古吕提根（Gulitegen），方位在东经74°50′，北纬40°4′。

北：博孜艾格和库戛尔塔达坂。即今图之博孜艾格尔（Bozaygir）和廓噶尔特（Kurgart）山口。

其三，游图。

1. 冲布霍尔罕，又作冲壳霍尔罕或奇木霍尔罕。据《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舆地图（四十六）当在阿哈塔什和哈喇别里达坂之间的库鲁木都克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冲布霍尔罕，定位大致准确。

2. 阿哈塔什，即Aktash，标准地名为阿克塔拉，在吐古买提东北。

3. 旦格塔，又作旦格达卡。据《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述，在脱盖儿买丹（吐古买提）南五十里，伊兰瓦斯卡北六十里，旦格塔大概在今Koktam（科克塔木）附近。

4. 脱盖儿买丹，或作托古里买特，即Tugunniti，标准地名为吐古买提。

以上四游图均在伊兰瓦斯卡外，伊兰瓦斯河（博古孜河）附近，大体在今阿图什市北吐古买提乡境内。

5. 科科雅，又作克科雅或科尔雅尔，即Kok-kiya，今图为科科克牙。

6. 哈那特杆，大致在今图Karaterekto（喀拉铁克套）附近。

以上两游图均在伊斯里克卡外、伊斯里克河之上源，大体在今乌恰县铁列克乡境内。

7. 冲铁列克。《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记，在图舒克塔什北六十里、巴依和登南三十里。巴依和登即Bayukurt(巴音库鲁特)，故冲铁列克当在今图Topa(托帕)附近。

8. 牌素霍尔罕，即今图恰克玛克南帕斯阔尔滚。

9. 恰哈玛克，又作恰克玛克或察克玛克，即Qakmak，标准地名为恰克玛克。《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恰克玛克，定位准确。

10. 克子冷科罗杆，又作黑孜霍尔罕，《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记，在恰哈玛克北五十里。据此，克子冷科罗杆大约在今图之额尔暱依洛附近。

11. 巴尔滚，即今图之Bargen(巴尔根)。

12. 托允多拜，又作托云，即今图之吐尔尕特口岸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托云多拜，定位准确。

13. 苏约克，即今图苏约克(Suek)山口南。

以上七游图均在图舒克塔什卡外，图舒克塔什河（恰克玛克河)两岸，大体分属今乌恰县巴音库鲁克乡和托云乡。

14. 雅哈恰提。据《新疆图志》卷八十二和舆地图(四十六)，可大致认定在今图之塔日勒戛附近。

15. 安鸠安，又作堪朱干。即今图Kanjugan(坎居干)。

16. 坎素。即今图之Kansu(康苏)，《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坎素，定位准确。

17.乌胡素鲁克。即今图之Uksalur，标准地名吾合沙鲁。

以上四游图均在喀浪圭卡伦外，赫色勒河(Kizil河，即克孜勒苏河)北岸，地属乌恰县黑孜苇乡和吾合沙鲁乡。

据此，冲巴噶什部游牧地大致分布在今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和乌恰县铁列克、巴音库鲁提、托云、黑孜苇、吾合沙鲁乡。

岳瓦什(Joosh)，又作交务士。《新疆图志》卷四云：

岳瓦什。(疏附)城西北五百西(四)十里也斯克奇(克)卡外。北界吐子阿苏、萨瓦雅尔得等达坂,与俄费尔干省接;南抵玛尔干及哈喇特山,与希布察克部接;东抵叶雷古刀铁梗,与冲巴噶什部接;西界爱坎什唐木河,与俄倭什县接。东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辖游图七:曰也斯克奇克、曰乌鲁克恰提、曰业干、曰爱坎木唐来(木)、曰沙哈尔、曰哈拉铁列克、曰玉区塔什。

上述史料讨论如下:

其一,稽察卡伦:也斯克奇克卡,其方位上文已考。

其二,四至。

东:叶雷古刀帖梗,即古里帖梗,上文已述。

南:玛尔干山和喀喇特山。《新疆图志》卷五十九云:"黑孜尔拉提山东分一支行二百里为哈喇特山,又东行一百六十里为玛尔干山,行约百余里至别什托海止。"案黑孜尔拉提即为吉尔吉斯斯坦外阿赖岭之Kizil-Art译,《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赫色拉特。别什托海即Pθrtikay(膘尔托阔依)。据此,哈喇特山、玛尔干山即今图临克孜勒苏河南岸之托里乔尔特山和喀孜尕尔特山。

西:爱坎什唐木河。当为克孜勒苏河(赫色勒河)之Irkstam(伊尔克什坦木)。

北:吐子阿苏、萨瓦雅尔得达坂。即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之Tuziast(图兹阿苏)、Savayartor(萨瓦亚尔顿)山口。

其三,游图。

1. 也斯克奇克。当在也斯克奇克卡附近,其方位上文已述。

2. 乌鲁克恰提,今图仍作乌鲁克恰提(Ulukhqat)。

3. 业干,又作业金,依旦。即今图之Jiyin(吉根)。

4. 爱坎什唐木,即今Irkstam(伊尔克什坦木)。

5. 沙哈尔。《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记:在乌鲁克恰提与爱坎什唐木适中地。据此,沙哈尔当为Sakalqat,今图作萨喀勒恰提。

6. 哈拉铁列克。《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记,在业干北八十里。据

此，哈拉铁列克在今图吉根北Karaterek(喀拉铁热克)。

7. 玉区塔什，又作玉虚塔什。《新疆图志》舆地图(四十六)绘在古立帖梗西偏北，乌鲁克恰提北乌子他什河岸。据此，玉区塔什当在今卓尤勒于苏河上Yuxuqat(玉奇恰特)。《中国历史地图集》有玉区塔什，定位准确。

据此，岳瓦什部游牧地均在赫色勒河(克孜勒苏河)北，地属乌恰县乌鲁克恰提。

希布察克(Kipchak)，又作希皮察克、西布查克、乞卜恰克、黑皮恰克等。《新疆图志》卷四云：

希布察克。(疏附)城西一百六十一里乌帕拉特卡外，一名黑皮恰克。北抵玛尔干山，与岳瓦什部接；南抵乌鲁瓦特山，与奈曼部接；东抵玉都巴什内卡；西至黑孜尔拉提达坂，与俄之阿赖依接。东西五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三十八里。辖游图七：曰博斯唐铁列克、曰阿依阿奇、曰阿奇贝利、曰托古斯布拉哈、曰乌鲁阿提、曰棱可洛科、曰赛勒阿提。

以上史料讨论如下：

其一，稽察卡伦：乌帕拉特、玉都巴什卡伦，其方位上文已考。

其二，四至。

东：玉都巴什内卡，上文已述。

南：乌鲁瓦特山，又作乌鲁阿提山或乌鲁阿特山。《新疆图志》卷五十九记："乌鲁阿特山由喀卜喀山分支径波罗可孜达坂，倭仪水迳其南，阿依水迳其北"，又说"乌鲁阿提山东北距(疏附)县城二百八十里"。案喀卜喀山即黑孜尔拉提山(外阿赖)东支(《新疆图志》卷五十九："喀卜喀由葱岭东南译分支东行")乙倭仪水即Oytag河(奥依塔格河)，其间，Kungay山(昆盖)有Ulkhat山口(乌鲁瓦特山口)。故乌鲁瓦特山当即今乌恰县与阿克陶县交界之昆盖山。

西：黑孜尔拉提达坂，即Kizil—Art峰，上文已考。

北:玛尔干山。上文已考。

其三,游图。

1. 博斯唐铁列克,即Bostanterek,今标准地名为波斯坦铁列克。《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博斯唐铁列克,定位准确。

2. 阿依阿其。《新疆图志》卷八十二云:标里托海西一百二十里为阿依阿奇卡。标里托海即膘尔托阔依,故阿依阿其当在今图昆盖山北麓之阿克彻依。

3. 阿奇贝利。《新疆图志》卷八十二云,标里托海西北一百二十里为阿奇贝利。故阿奇贝利当为今图喀孜尕尔特山南麓之阿其贝利。

4. 托古斯布拉哈。《新疆图志》卷八十二云:阿依阿奇西过达坂循玛纳坎河西行至木虎卡,木虎"一名托古斯布拉哈,又名托古斯托罗"。据此,托古斯布拉哈即今图之Muhu,标准地名称穆呼。

以上四游图在乌帕拉特卡外,除托古斯布拉哈外,其他三游图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和膘尔托阔依乡(穆呼在木吉乡)。又据《新疆识略》卷十二,图尔额依格尔部在乌帕喇特卡伦外游牧。案图尔额依格尔又作托拉尔根,为希布察克部属下一部。因此以上四游图为希布察克图尔额依格尔部游牧地。

5. 乌鲁阿提,当在乌鲁瓦特山麓,即今图Ulukhat(乌鲁阿提)地。

6. 棱可洛科,即Suwurluk,今图或作苏古鲁克或苏吾尔鲁克。

7. 塞勒阿提。《新疆图志》卷八十二记:赛勒阿提卡在乌鲁阿提卡乌鲁阿提达坂西。故塞勒阿提当在乌鲁阿提山口不远地方。

以上三游图均在伊勒古楚卡伦外。《新疆识略》卷十二记:希布察克部所属萨尔特部在伊勒古楚卡伦外游牧。因此以上三游图为希布察克萨尔特游牧地。

以上为清季疏附境内希布察克部的分布。《新疆识略》卷十二记:西布察克在英吉沙尔城东南铁列克卡伦至西北图木舒克卡伦

外及喀什噶尔伊勒占楚卡伦外一带游牧，其库纳隆尔地方距（英吉沙尔）城200里。可知英吉沙尔境内布鲁特亦为希布察克部。《新疆识略》所谓英吉沙尔东南至西北的卡伦是铁列克、乌鲁克、特比斯、特尔克奇克、图木舒克卡伦，其方位上文已考。库纳隆尔即Qarlong，今标准地名为恰尔隆。综上考述，希布察克部游牧地在今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膘尔托阔依乡和阿克陶县喀热开其克乡、巴仁乡、克孜勒陶乡、恰尔隆乡、阿克达拉牧场和木吉乡境内。

奈曼（Naiman），又作奈满、乃蛮等。《新疆图志》卷四云：

奈曼。（疏附）城西南一百九十里依（伊）勒古楚卡伦外。北抵乌鲁瓦特山，与希布察克部接；南抵雅玛雅尔河，与蒲犁厅接；东抵倭仪塔哈阿格嘴；西抵黑牙克巴什，与俄属让库尔接。东西四百三十里、南北八十里。辖游图三：曰倭仪塔哈、曰察哈尔艮、曰孔铁列克买斯。

上述史料讨论如下。

其一，稽察卡伦：伊勒古楚卡伦。上文已述。

其二，四至。

东：倭仪塔哈阿格嘴，即Oytag—Agzi，标准地名为奥依塔克艾格孜。

南：雅玛雅尔河，又作雅满雅尔河，即今之盖孜河，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西：黑牙克巴什，今人考订为Kizil-diek（克则勒治业克），今Uz-bel（乌孜别里）[1]。

---

①黄盛璋："清代帕米尔设立卡伦"载《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又《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黑牙克巴什定位在木吉西北木虎卡附近，可能依据舆地图四十六，但该图所绘方位与《新疆图志》所述大不同，似不可取。

北:乌鲁瓦特山,上文已考。

其三,游图。

1. 倭仪塔哈,即Oytag,标准地名奥依塔克。

2. 察哈尔艮,《新疆图志》(道路志)和舆地图均缺载,可能在今布伦口乡之Qakiregil(恰克尔艾格勒)。

3. 孔铁列克买斯,《新疆图志》(道路志)和舆地图亦缺载,可能在今木吉乡Kuntibes(昆提别斯)。

据此,奈曼部游牧地大致在阿克陶县木吉、布伦口乡和奥依塔克镇。奈曼部游牧还跨出新疆至吉尔吉斯斯坦,下文再述。

奇里克(Qirik),又作齐里克、齐哩克。《乌什直隶厅乡土志》曰:"现在本境人民除缠回外,有布鲁特两部落,在西北沙图卡伦外者为奇里克,在西南巴什雅哈卡伦外者为胡什齐。"《新疆图志》(水道志)(卷七十)云:乌什东北至西南诸水均为奇里克牧地,这些河是:

臻丹水,即Zindan河,今亦名臻丹河。

英阿瓦提水,即Yengart河,今亦名英阿特河。

喀吉水,即Kayqi河,今名喀伊东河。

贡古鲁克水,即河,今名或作古古特吕克苏。

可可容水,即河,今名或作库库仑木河。

别迭水,即Bedil河,今图作别迭里河。

玉簪河,即Uzuntux河,今图作乌宗图什河。

事实上奇里克部游牧地延伸至吉尔吉斯斯坦的托什干河上源——阿克塞河。毕德里克、贡古鲁克、沙图、巴什雅哈玛卡伦(其方位上文已述),沿托什干河是该部游牧之南缘。据此,奇里克部分布在今乌什县英阿瓦提乡、牙满素乡、奥特贝希乡和阿合奇县托什干河北岸一带。

根据以上考述,可以大致画出清季新疆境内胡什齐等六部地理分布图(图一)。其时,皮山、叶城、温宿和伊犁西南山区亦有布鲁特人游牧,但清季史料缺乏明确记载,待考。

俄属布鲁特各部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布鲁特各部的活动，清史料中亦有报导，但比较零散，据此只能了解其大概方位，不能准确予以定位。所幸苏联学者根据民族志学的考察资料已绘制成地图，见于扎姆格尔契洛夫所著《吉尔吉斯归并于俄国》(伏龙芝，1959年)附图(以下简称《扎图》)比较完备。兹据汉文及其它史料再略加讨论，补充和修订。

1. 萨尔巴噶什(Sarebagash)和布库(Bugu)。如前所述，清史料中几乎一直把这两个部落看成同一部落。它们早期为同一部，后发展成经常发生冲突的两个部落。《新疆识略》说，它在伊犁西南鄂尔果珠勒卡伦外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岸游牧。《扎图》正是将这两个部落定在该湖左右，大体上正确。谢苗诺夫1856~1857年实地考察认为：伊塞克湖南岸为Терской地区，北岸为Кунгей地区；布库占其东部，萨尔巴噶什占其西部。两部分界在Барскцун河口[①]。看来《扎图》将这两个部落的分界定的偏西。又据汉文史料，玉簪河为奇里克部游牧地，而《扎图》把该河纳入布库牧地也是不对的。1877年俄人库罗巴特金曾在别迭里山口附近见到一座堡垒，据说该地布鲁特奇里克部为防御伊塞克湖的布库人而修筑的[②]。这亦可证明布库牧地并未深入到别迭里西南的玉簪河西岸。

顺便指出，《扎图》所示，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奇里克部在阿克塞(Аксай)和阿尔帕(Арпа)各地，大体正确。

2. 萨雅克(Sayak)和察哈尔萨雅克(Qahal Sayak)。《新疆识略》卷十二述，萨雅克和察哈尔萨雅克同在图木舒克塔什卡伦外距喀

①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86页。

②A.H.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291页。

什噶尔城八九百里游牧。但俄文史料中只有萨雅克，而没有察哈尔萨雅克。《扎图》中萨雅克占有两块地，一大一小，大者在纳林河中游Дюрбельджин（都伯尔津）、Джумгал（珠穆翰）和Тогуз-тороо（托古斯托罗或曰图古斯塔老）谷地；小者在伊塞克湖西北角。清史料表明，珠穆翰谷地是萨雅克部中心地区，乾隆年间兆惠将军曾派侍卫乌尔登等人到达该地宣读谕旨，萨雅克部头人图鲁启拜叩首表示归服[1]。道光年间张格尔骚扰边境，曾藏匿于萨雅克部之都伯尔津、托古斯托罗[2]。因此，《扎图》把上述各地纳入萨雅克牧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伊塞克湖西北角，那极可能是清史料中的察哈尔萨雅克。

3. 苏勒图（Solto）。《新疆识略》卷十二说它在喀什噶尔城西乌帕喇特卡伦外游牧，所据或许是乾隆时期的材料，但如前文所引道光年间的报告，它已在那林北。看来这一时期，苏勒图部进行了由南向北的迁徙。《扎图》将该部定在楚河皮什格克（今比什凯克）附近，所据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调查资料。

4. 巴斯子（Basez）。《新疆识略》卷十二说它在图舒克塔什卡伦外游牧。《扎图》将其牧地定在阿尔帕各地和费尔干纳西北山区。从喀什噶尔去阿尔帕各地一般要取道图舒克塔什卡伦。

5. 额德格纳（Adegene）、蒙古西（Mon′gush）和蒙科尔多尔（Mon′goldor）。清史料中有额德格纳、蒙科尔多尔，而不见蒙古西。俄文史料认为额德格纳与蒙古西均为南吉尔吉斯Отуз-уул联盟，又是Адыгене联盟，而蒙科尔多尔为蒙古西之属部[3]。看来，额德格纳有广狭两义两个概念，前者为包括若干部落的联盟，后者为一具体

①《西域图志》卷四十五。

②《清宣宗实录》卷90，25~26页；卷171，7~9页。

③阿里斯托夫认为蒙古西属于额德格纳。捷连季耶夫报导说：当时阿赖女王管辖着阿赖各地的额德格纳和蒙古西两个部落。

部落名。从乾隆到嘉庆年间的清朝史料都表明额德格纳在鄂什、古勒沙一带阿赖山区。《扎图》所示额德格纳在Гульча(古勒沙),蒙古西居其左右:一在Ош(鄂什),另一在Суфи-курган和Сары-Таш以西紧贴新疆伊尔克什坦木地方。这与清史料有关报导大体相符。但我们有一点修订。1893年张曜针对当时中俄划界有一道奏章曰:

伊尔克池他木与现管地方舛错大甚……现管之帖列克达湾系葱岭正干与南西现管之界同一山梁,山阴皆浩罕旧地为今俄国费尔干省之界,中间廓克苏至伊尔克池他木一带系喀属岳瓦什布鲁特牧[1]。

案帖列克达湾即Terek Davan,清史料作帖列克达坂或铁叶尔里叶克岭(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廓克苏即Koksu,为克孜勒苏(赫色勒)河从伊尔克什坦木以上河名。因此,额德格纳部属蒙古西与岳瓦什的分界当在帖列克达湾。至于蒙科尔多尔,《扎图》中定位在阿特巴什北麓那林。《新疆识略》卷十二说它在喀什噶尔城东北伊兰瓦斯卡伦外游牧,距城二百里,连奇里克布鲁特。汉文和俄文史料并不矛盾。

6. 塔拉斯河流域诸部。如《扎图》所示Кушчу(霍索楚)、Кытай(启台)和Саруу(萨娄)诸部在塔拉斯河流域。清朝方面早在乾隆时期就听说过这三个部落,但这三个部落与清政府几乎失去联系。《西域图志》列举布鲁特诸部时含糊地提到"旧居塔拉斯"的布鲁特部落。《清史稿》在列举索楚等三部时还误弄出个"塔拉斯鄂拓克",关于这一点前文已述。

7. 阿赖西部山区诸部。如《扎图》所示,阿赖山区有Теит(提依特)、Кесек(开塞克)、Нойгут(诺依古特)、希布察克、奈曼、Бостон等部。提依特部在清史料中有报导,大概方位在阿赖山区。但据《新

[1]《新疆图志》卷七,23页。

疆识略》记载，诺依古特在阿克苏城外东木杂喇河东岸，清季缺少有关记载。这一地区的希布察克、奈曼部与新疆境内的是连在一起的。Кесек、Бостон均不见于汉籍，Бостон或为Кесек之属部。总之这一地区部落分布复杂。嘉庆二年(1797年)萨木萨克和卓在这一地区纠众闹事，附和者有冲巴噶什、西布察克、奈曼、提依部的一些人。长龄在一份报告中特加说明：这些部落"在喀尔提锦一带，系安集彦(浩罕)所管"，与卡伦附近的布鲁特"名同地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军机处录制，长龄奏拿获奸细讯明供词即擒玉素普折。

《扎图》中还有Багыш(巴噶什)、Джеаигер(杰吉多尔)、Мундуз等部，均不见于清史料，其情不详。另，清史料中还广泛提到色勒库尔、喀尔提锦等部，但这些都是塔吉克地区名，或许是流寓那里的布鲁特人，还是不宜把它们作为布鲁特的独立部落。

这样，可初步绘出清季布鲁特诸部的地理分布图(图二)。我不敢贸然肯定它们的分布完全是那样的，但可以提出它们的分布有可能是那样的。

四、布鲁特诸部之亲缘关系

布鲁特诸部间有着各种层次的复杂亲缘关系。如前文所述，东西布鲁特和南北吉尔吉斯人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布鲁特部落的地理分布，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主要靠本民族自己的述说。前引《平准》正五十六中录图鲁起拜的"报告"就十分有价值。布鲁特人没有留下自己文字的历史，但民间有一批部族系谱的传诵者——Санжырачи，一些俄国军人、探险家、学者，如瓦里汉诺夫(Ч.Валиханов)、科斯坚柯(Л.Костеко)、阿里斯托夫(Н.Аристов)、米纳耶夫(И.Минаев)、西特尼亚科夫斯基(Н.Ситняковский)、韦

纽科夫(M.Венюков)、拉德洛夫(Радлов)等随着沙俄征服者来到天山、阿赖山等地活动,广泛搜集了这些传诵者的口述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布鲁特各部落、氏族形成过程、相互亲缘关系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苏俄学者利用、研究这些史料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看法。

左翼和右翼

翼是布鲁特各部亲缘关系的基本划分。前引《平准》正五十六中所述的左部、右部即左翼和右翼。据图鲁起拜之述,布鲁特左翼五鄂拓克,包括呼车(霍索楚)、萨老(萨娄)、贺泰(启台)等;右翼十鄂拓克,包括萨雅克、萨尔巴噶什等。

苏俄学者巴托尔德 (В.В.Бортодьд) 所撰《吉尔吉斯简史》(Киргизы.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写道:

瓦里汉诺夫报告了有关"Дикокамен"吉尔吉斯人(指布鲁特)部落的划分和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翔实情况。同蒙古人相仿,吉尔吉斯人划分为两翼,右翼(он)和左翼(сол)。左翼要大得多,它占据了吉尔吉斯人领地的西边,即塔拉斯一带。由此推论,根据方位判断,吉尔吉斯人是北方人,而不像是东部古老的突厥人,也不像是南方的蒙古人。右翼分为两部:额德格纳(адгэне,即адыгене)和塔戛依(Тагай)。塔戛依是最大的一部,同时分为类似的经常争斗的七个部落亦属于它管辖:布库(Бугу)、萨尔巴噶什(Сарыбагыш)、苏勒图(Султу,即Солто)、萨雅克(Саяк),奇里克(Черик);冲巴噶什(Чонбагыш)和巴斯子(Бассыз,即Басыз)据拉德洛夫(Радлов)记载,右翼有布库 (Бугу),萨尔巴噶什 (Сарыбагыш)、苏勒图(Солту, 即Солто)、额德格纳 (Здигена, 即адыгене)、冲巴噶什(Чонбагыш) 和奇里克 (Черик) 六个部落。他没有提到巴斯子(Бассыз)部。萨雅克(Саяк)部是作为额德格纳的八个氏族之一提

及的[1]。

这里瓦里汉诺夫和拉德洛夫的报导大体吻合，至于塔戛依和额德格纳问题下文将专门讨论。米纳耶夫和西特尼亚科夫斯基关于南吉尔吉斯人的调查情况是：胡什齐(Кутчу)、Мундуз、巴斯子(Базыс)、Сару Тагай、冲巴噶什（Чонбагыш)、萨尔特(Сарт-кыпчак)、岳瓦什(Джоош)、奈曼、希布察克(Кыргыз-кыпчак)等属于左翼；而蒙古西（Монгуш)、额德格纳（Адыгине)、诺依古特(Нойгут)、提依特(Теит)、Кесек、Авай等属于右翼[2]。这里与瓦里汉诺夫的调查矛盾的是冲巴噶什和巴斯子的归属问题。可能瓦里汉诺夫之说更可靠些，也就是说，冲巴噶什和巴斯子属右翼而不是左翼。

Тагай和Адыгене 如前文所引瓦里汉诺夫的报告，右翼又分Адыгене和Тагай两大部。Тагай是最大的一部，萨尔巴噶什等七部属于Тагай。Саижырачи口述资料说：Тагай有三个儿子：Богорстон的后代是苏勒图部；Койлон后代是杰吉格尔部；Кылджйр后代是萨尔巴噶什和布库部；萨雅克、阿塞克、奇里克部则是出自Тагай的养子，因此被认为是“不够格的和不能享受充分权利的”[3]。看来，Тагай是包含许多部落的部落联盟。Адыгене也是一样，如前文所述，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是额德格纳部，广义指包含一些部落的部落联盟。总之，Тагай/Адыгене划分系统对于研究布鲁特右翼诸部的亲缘关系是有价值的。

瓦里汉诺夫的三分说

瓦里汉诺夫还把布鲁特人一分为三：

---

①Бар.стр.533~534。汉译文参见李琪译：“十八、十九世纪的天山吉尔吉斯人”，刊《西域史论丛》(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Минаев，Ситняковский上引文。Джам.стр.117~118。

③吉尔吉斯共和国手稿部，оп.286。韦纽科夫：《俄国亚洲边区旅行札记》，转自Дам，стр.14~15。

其一,“真正的”(Настоящие)吉尔吉斯人,为吉尔吉斯拜的后裔,分左右翼。

其二,希布察克、奈曼、启台等部,它们在吉尔吉斯族中的地位和权力是由吉尔吉斯拜的儿子委派的氏族长认可的。

其三,Ичкилик,虽然自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吉尔吉斯拜的儿子,但其他部落不予承认[1]。

瓦里汉诺夫一分为三实际上是一分为二,即“真正的”和非真正的两类。毫无疑问,布鲁特的发展过程是在与周邻民族、部族交往中发生变化,一方面自己的一些古老部族在分解、消逝、分化出去;另一方面,他族成分也在渗透、融合进来。阿里斯托夫就指出,归属于额德格纳的蒙古西是“察合台蒙兀儿人残余统治下构成的异民族联合体”[2]。纳利夫金(Наливкин)还记述了一个关于额德格纳的传说故事:阿布都拉汗(布哈拉汗,1583~1598年在位)把一些俘虏带进费尔干纳。这些俘虏同从喀什噶尔买来的Aga部姑娘结婚繁衍近代。“据说Agalygs(额德格纳)就是起源于这些移民”[3]。有研究者推测奈曼、希布察克、Мунду-з是来自阿尔泰和卫拉特氏族联盟的,蒙古西来自图瓦人,Могол(即蒙科尔多尔)源于卫拉特人。总之,许多部族是来自异族的,只是后来吉尔吉斯化了[4]。因此,瓦里汉诺夫之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有些简单化,它还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布鲁特各部亲缘关系中的复杂现象。

---

①Вали.,стр.110。

②阿里斯托夫:《突厥部族种族成分和人口信息备忘录》,438页,圣彼得堡,1896年。

③Nalivkin V.P.:Histoire du Khokand.Paris,1889,pp.20~21。

④Вали.стр.105.波塔波夫(Потапов Л.):《阿尔泰简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年,251页。托卡列夫(С.А.Токарев):《卫拉特资本主义前的遗迹》,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17~33页。

Отуз-уул和Ичкилик

西特尼亚科夫斯基根据调查资料，提出南吉尔吉斯人划分成Отуз-уул和Ичкилик两大部落系统。他指出:“费尔干纳吉尔吉斯人分成两大部分:Отуз-уул(三十个儿子)和Ичкилик。前者分布在费尔干纳州东部、谢米列契州和喀什噶尔地区,后者占据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山区”这两个部族保持着自己古老的划分,成右翼和左翼,示意如下[①]:

	右　翼	左　翼
Отуз-уул	额德格纳 蒙古西	胡什齐 Мундуз 巴斯子 Capyy　Тагай
Ичкилик	Авай 诺依古特 Kecek 提依特	冲巴噶什 岳瓦什 萨尔特 希布察克 奈曼

Отуз-уул,柯尔克孜语的意思是“三十个儿子”,Ичкилик,柯尔克孜语的意思是“内部”.《柯尔克孜族简史》称前者为“三十姓部落”,后者称之为“伊奇克力克(内姓部落)”[②],这两者在意义上如何相对,令人费解,但不管怎样,Отуз-уул/Ичкилик系统与左右翼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南吉尔吉斯各部落亲缘关系进行划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总之,19世纪布鲁特各部落、氏族亲缘关系呈现出复杂局面。苏联研究者认为，俄国史料中记录的Санжырачи口述资料并不十分可靠,它在这些或那些部落、氏族亲缘关系的划分上有些混乱,

①Минаев,Ситияковский上引文。Джам.стр.117~118。

②《柯尔克孜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6页。

并且至今还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合理解释布鲁特各部落亲缘关系上的复杂现象[1]。

“内部”和“外部”

认真分析以上资料，我们认为，研究Ичкилик是解决布鲁特诸部亲缘关系的钥匙。Ичкилик在清文献中出现过，并且在解放后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占有重要位置。所有情况表明："Ичкилик"在研究布鲁特亲缘关系中具有特殊价值。《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庚申条记：

其去喀什噶尔之鄂坡勒岭，可通霍罕敖珠尔岭；玉斯屯阿喇图什岭俱通安集延，沿途之额德格讷、伊什克里克等部落，皆传檄晓以利害。

又，《西域图志》卷二（东西布鲁特部图）上，在吉布察克、巴斯子间有“伊斯克里克”部。显然，清文献中的“伊什克里克”、“伊斯克里克”即俄文史料中的“Ичкилик”。而与“伊什克里克”相对并称的“额德格讷”不大可能是狭义的额德格讷部落，而是以额德格讷部为代表的一些部落联合体。再，苏联学者捷尼舍夫引证胡振华先生的调查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柯尔克孜人按人种成分分为以下诸部落：希布察克、奈曼、提依特、开赛克（上述部落统称伊什克里克）、冲巴噶什、奇里克、布库、岳瓦什、胡什齐、萨雅克、萨娄、萨尔巴噶什、孟都孜、蒙科尔多尔、巴斯子（以上诸部统称赛尔特克）[2]。

为了叙述方便，笔者直接引述汉译文时，以上部落名称按习惯写法处理。

《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提供了类似信息：

---

①Джам，стр.19。

②捷尼舍夫：《突厥语言研究导论》，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423页。

柯尔克孜部落,按统属关系,基本上为左部“依其克苏克”(案:即伊什克里克)和右部“斯尔特克勒克(案:即赛尔特克)[1]。

这两份社会历史调查中有关部落归属的细节上有些出入,与俄国方面的史料也有不吻合的地方,但它们最大价值是:提出了一个与“伊什克里克”意义上完全相对的概念“赛尔特克”。伊什克里克为柯尔克孜语的(itʃkilk),意为“内部”;赛尔特克为柯尔克孜语的(Sərttəq),意为“外部”。因此,布鲁特各部不仅有左右翼,而且还有内外部之分。但是把左右翼与内外部作为同一的,是无法解释布鲁特各部的实际情况的。比如:

萨雅克部:既是右翼又是外部,属Тагай。

启台部:既是左翼又是外部。

额德格纳部:即是右翼又是外部,属Отуз-уул。

胡什齐部:既是左翼又是外部,属Отуз-уул。

提依特部:既是右翼又是内部。

奈曼部:既是左翼又是内部。

再三考虑,我们认为合理的解释模式是:左右翼和内外部是对布鲁特各部亲缘关系纵横两个方向的基本划分系统,是较低层次的局部范围上的划分。其示意如下:

<table>
<tr><th></th><th>右　翼</th><th>左　翼</th></tr>
<tr><td rowspan="2">外部</td><td>Тагай(萨雅克等)</td><td>(霍索楚等)</td></tr>
<tr><td colspan="2">(额德格讷等)Отуз-уул(胡什齐等)</td></tr>
<tr><td>内部</td><td>(提依特等)</td><td>(奈曼等)</td></tr>
</table>

这样就把俄国史料中的左右翼,Тагй/Адыгене,Отуз-уул/Ичкилик和我国历史调查中的伊什克/赛尔特克都统一到一个体系

①《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17页。

之中。据此布鲁特各部的亲缘关系的模式可能是这样的：

	右　翼	左　翼
外部 (赛尔特克)	Тагай{萨雅克 萨尔巴噶什 布库 苏勒图 巴斯子 奇里克 冲巴噶什	霍索楚 启台 萨娄
	Отуз-уул{额德格讷 蒙古西	Мундуз 胡什齐
内部 (伊什克里克)	提依特 诺依古特 Кесек	奈曼 希布察克 岳瓦什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赛尔特克"(外部)，为什么仅见于我国的史料和调查资料，而不见于俄国的史料呢？我认为，内外部的概念是"伊什克里克"方面提出来的，他们自称伊什克里克，而把俄国境内的"真正的"吉尔吉斯人称为"外部"，而"真正的"吉尔吉斯人从根本上就不承认伊什克里克是自己的同族，也就不屑于接受"赛尔特克"这个概念和说法。前引《平准》正五十六中图鲁起拜的话，"我等"指的是：当时已北迁的萨雅克、萨尔巴噶什两部，"呼车"等三部即霍索楚等三部。其余左二部、右八部虽没有列举，但看来是额德格讷、苏勒图、蒙杜孜、巴斯子、奇里克、冲巴噶什和胡什齐等"真正的"吉尔吉斯人，伊什克里克各部是不被承认的，也不屑于提及的。实际上这一点已为苏联学者注意到。扎姆格尔契洛夫就指

出:“所有这些吉尔吉斯部落(Племя)和氏族(Род)虽然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但由于经济联系松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个吉尔吉斯民族(Нация)。其中某些部落和氏族已了解到自己归属于某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但仍保持着自己部落联盟的古老的称呼。这种情况反映到划分吉尔吉斯民族成分的口述谱系史上,吉尔吉斯部落本部(собственно)被称作‘外部’(посторонние)。”[1]再一个事实是:中俄分界后,伊什克里克的各部主要在中国境内,“赛尔特克”这个概念、说法仅存于我国的文献和社会历史调查之中就不足为怪。

几个问题

布鲁特诸部的亲缘关系与其地理分布联系起来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赛尔特克(外部)和伊什克里克(内部)的分界大体在赫色勒河(克孜勒苏河)至阿赖岭一线(图三)。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学研究表明,克孜勒苏河正是柯尔克孜南北两个方言区的分界[2]。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其二,赛尔特克和伊什克里克各自的左翼和右翼的某种相错(见图三),塔戛依(тагай)、额德格讷(Адыгене)和奥托孜吾儿(Отуз-уул)联盟的各自相互形成交叉(见图四),表明布鲁特诸部的血缘界线已被冲破,而地域联系正在发生,这一点尤为重要,它标志着柯尔克孜民族历史发展的进步。对此,我们再做点讨论。以巴噶什为例,它与冲巴噶什、萨尔巴噶什在亲缘关系上可能比其它部落更为接近。按照苏联学者的说法,巴噶什是驼鹿(Лось)意,萨尔巴噶什为“黄驼鹿”,冲巴噶什为“大驼鹿”。巴尔托里德写道:

据阿里斯托夫说:萨尔巴噶什和冲巴噶什部落名称说明,吉尔吉斯人的足迹在萨彦山脉附近停留过,因为,驼鹿在天山是不常有

---

①Джам,стр.26。

②胡振华:《柯尔克孜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8页。捷尼舍夫《突厥语言研究导论》,423页。

的。难怪,在拉德洛夫的用语中完全没有意为"驼鹿"(Лось)的巴噶什(багыш)一词,也没有意为"大的"的"冲"(Чон)这个词,中国人认为,该词是吉尔吉斯人引入的外来语①。

巴托尔德所谓的"中国人认为",不知何据。《西域同文志》中有"萨尔巴噶什"条,据云:

布鲁特语萨尔刲也,巴噶什手腕也,旧传布鲁特人战此岭下刲敌人手腕乃获胜捷,故名②。

案:柯尔克孜语中似没有意为驼鹿的"巴噶什"的词。《西域同文志》的材料源于实地调查,一般来说有较高学术价值,但也常有不确之说。我们更相信巴托尔德的说法,"巴噶什"或许就不是布鲁特语,所以并不是布鲁特人能说清楚它的真实含义。《西域同文志》的编者调查时遇到的或许正是那些说不清楚其真实含义的布鲁特人。有一点还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述,在清文献中,萨尔巴噶什亦名布库,而布库(Бугу)正是柯尔克孜语,意为"鹿",就是说,早年吉利吉思人在萨彦岭活动的事还遗存在一部分布鲁特人的记忆之中。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巴噶什是古老部落的带有近似图腾色彩的名称,经过布库—萨尔巴噶什继承沿袭下来。但是,清季布鲁特诸部的分布图(图二)表明:巴噶什、冲巴噶什、萨尔巴噶什、布库各自东西南北,它们的血缘联系已被破坏。

再以霍索楚和胡什齐为例,它们的音几乎完全一致,在俄文史料中前者写作Кушчу,后者写作Кутчу,有时则完全混同。更有意思的是,它们都同属赛尔特克(外部)之左翼,尽管此时已各自东西(见图二),但很可能原先就是同一部落。

其三,在布鲁特的部落中不难发现古代中亚部族名称的再现。

1. 希布察克(Kipchak)。《元史》有钦察,其它书还作可弗叉、乞卜察兀、克鼻稍、钦叉。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11世纪向西扩展,达里海、黑海以北广大地区。据苏联学者研究,中世纪该部有两支深

①Бар.стр.537。
②《西域同文志》卷四,页17。

入中亚，一直到20世纪初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Kipchak人还保持着自己的部族特性，它们是16世纪在准噶尔部逼迫下从锡尔河下游迁来的移民[1]。在波科洛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和斯托果夫(Стогов)的文集中提到希布察克的一支图尔额依格尔(Туру-айгыр)，希布察克的各支是浩罕爱里木汗时期，即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从"浩罕的迁居到克孜勒流域上游的Kecek之后而"[2]。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附近山区的希布察克部与上述的Kipchak有某种历史联系是不能排除的。

2. 奈曼(Naiman)，《元史》有乃蛮，或作乃马、乃满，10至13世纪初在阿尔泰山脉一带游牧，称雄一时，后为成吉思汗所破。和布鲁特一样，哈萨克、乌兹别克族中有Naiman，这些Naiman部落与《元史》中的乃蛮的历史联系亦是不能排除的。

3. 启台(Khitay)。可能与历史上的西辽(Karakhitay)有关。辽王朝覆亡时，耶律大石率部西走，俨然成为当时中亚一大国。13世纪初屈出律篡权，西辽遂亡，其部散失中亚各地，居于楚河、塔拉斯流域的布鲁特启台部为其孑遗，亦是有可能的。

4. 蒙科尔多尔(Mon'goldor)应是Mon'gol(蒙兀儿)的复数，该部形成或许与蒙古人在中亚的活动有关。

总之，如前文所引扎姆格尔契洛夫所言：某些部落和氏族"仍保持着自己部落联盟的古老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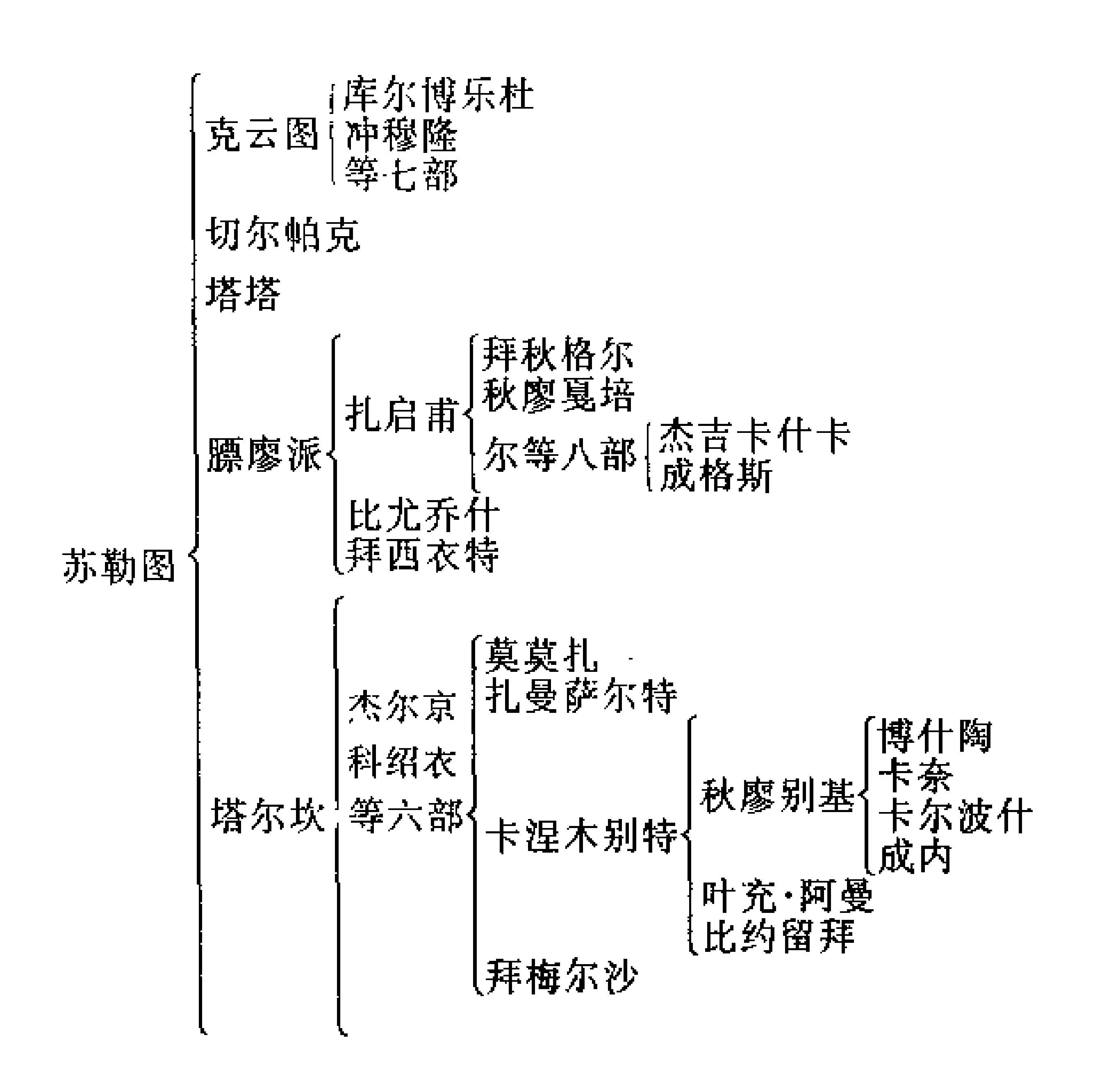
其四，游图问题。布鲁特部落氏族组织是有多种层次的。在部落之下有氏族和更小的分支。清文献中有鄂拓克、游图、爱曼、阿寅勒等术语表述。苏联学者则用Племя(部落)、氏族(Род)、Подрод(亚氏族)等术语来表达。俄国史料中存有不少布鲁特部落、氏族、亚氏族谱系资料，例如苏勒图部就有如下层次组织[3]：

---

①沙尼亚佐夫："十月革命乌兹别克民族中的基普恰克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集团的民族过程》，莫斯科，1980年。

②Бар.стр.528。

③同Джам.стр.15。



按苏联学者的意见，布鲁特社会的基层组织是бир атанын балдары，柯语意思是“同一父亲的孩子”，这大概相当于“阿寅勒”，7~15个阿寅勒组成юрт（游图）。游图一般来说也受血缘关系支配，具有图腾色彩名称，如希布察克的支系图尔额依格尔，俄文作Троайгыр，柯尔克孜语意思是“枣红色的牡马”[1]，但是清季史料中布鲁特一些部落下游图不再具有图腾色彩的名称。属于该支的游图是博斯坦铁列克（Bostan terek），意为“有杨树的绿洲”；托古斯布拉哈（Toguz bulak），意为“九个泉”。此时游图大量以当地山水草木为名。如：

①同Джам.стр.15。

哈拉准(Karajol)——黑色的路。

嘉依多拜(Jaydowe)——坟丘。

克子布伦可(Kirbulak)——台坎上的泉。

脱盖儿买丹(Tugurmiti)——水磨。

阿哈塔什(Aktash)——白石头。

冲布霍尔罕(Qim Kurgan)——草皮堡。

科科牙(Kok-Kiya)——青崖。

哈那特杆(Kara terektoo)——大叶杨山。

恰哈玛克(Qakmak)——闪电。

牌素霍尔罕(Pes Kurgan)——矮堡。

冲铁列克(Qong terek)——大杨树。

克子冷科罗杆(Kir Kurgan)——台坎上的堡。

也斯克奇克(Yilikiqki)——坟多。

乌鲁克恰提(Ulukhqat)——大叉口。

沙哈尔(Sakalgat)——胡子叉口。

哈拉铁列克(Kara terek)——大叶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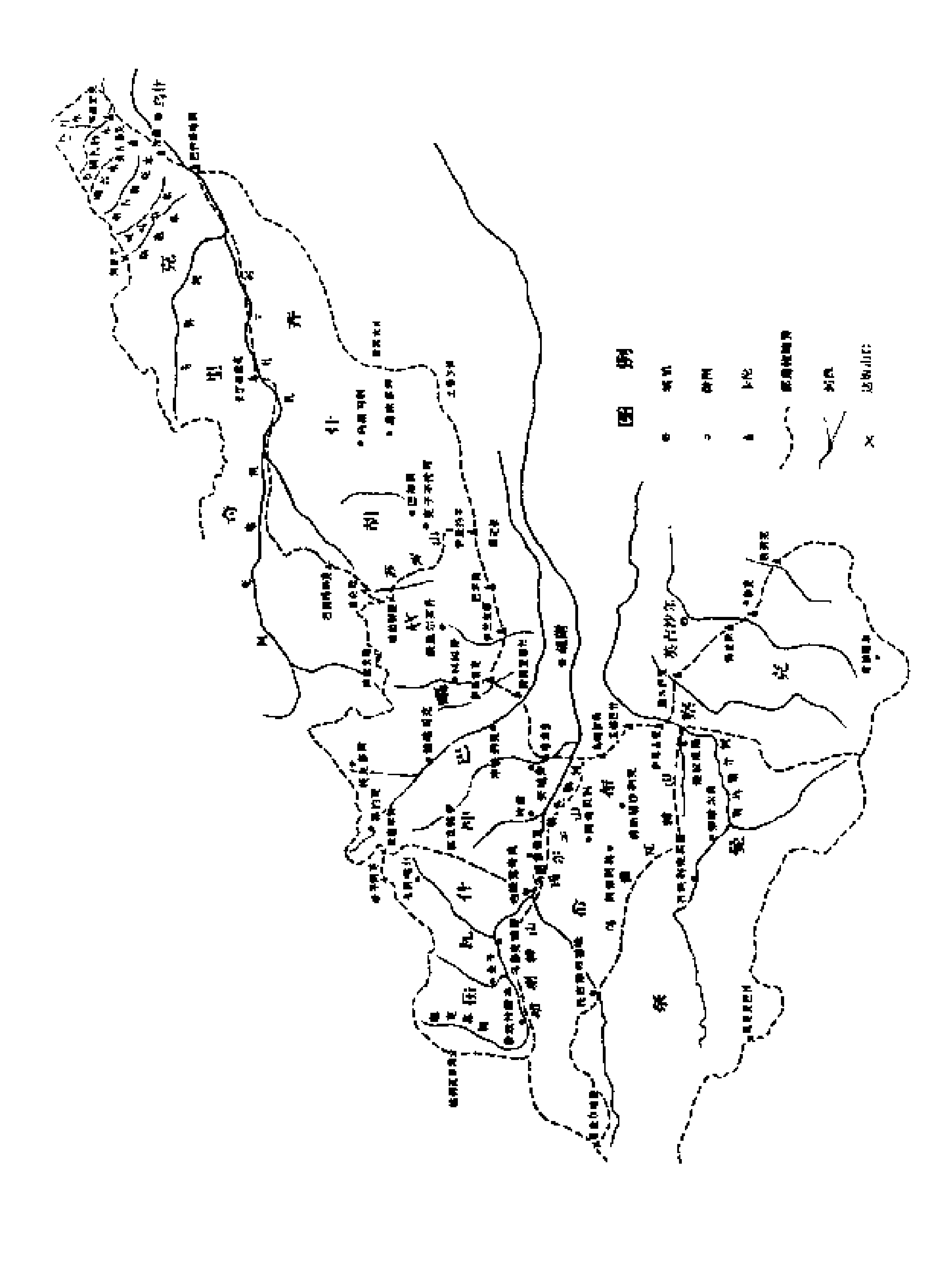
梭可洛科(Sugurluk)——灌水口。

库纳隆尔(Qarlung)——四条沟汇合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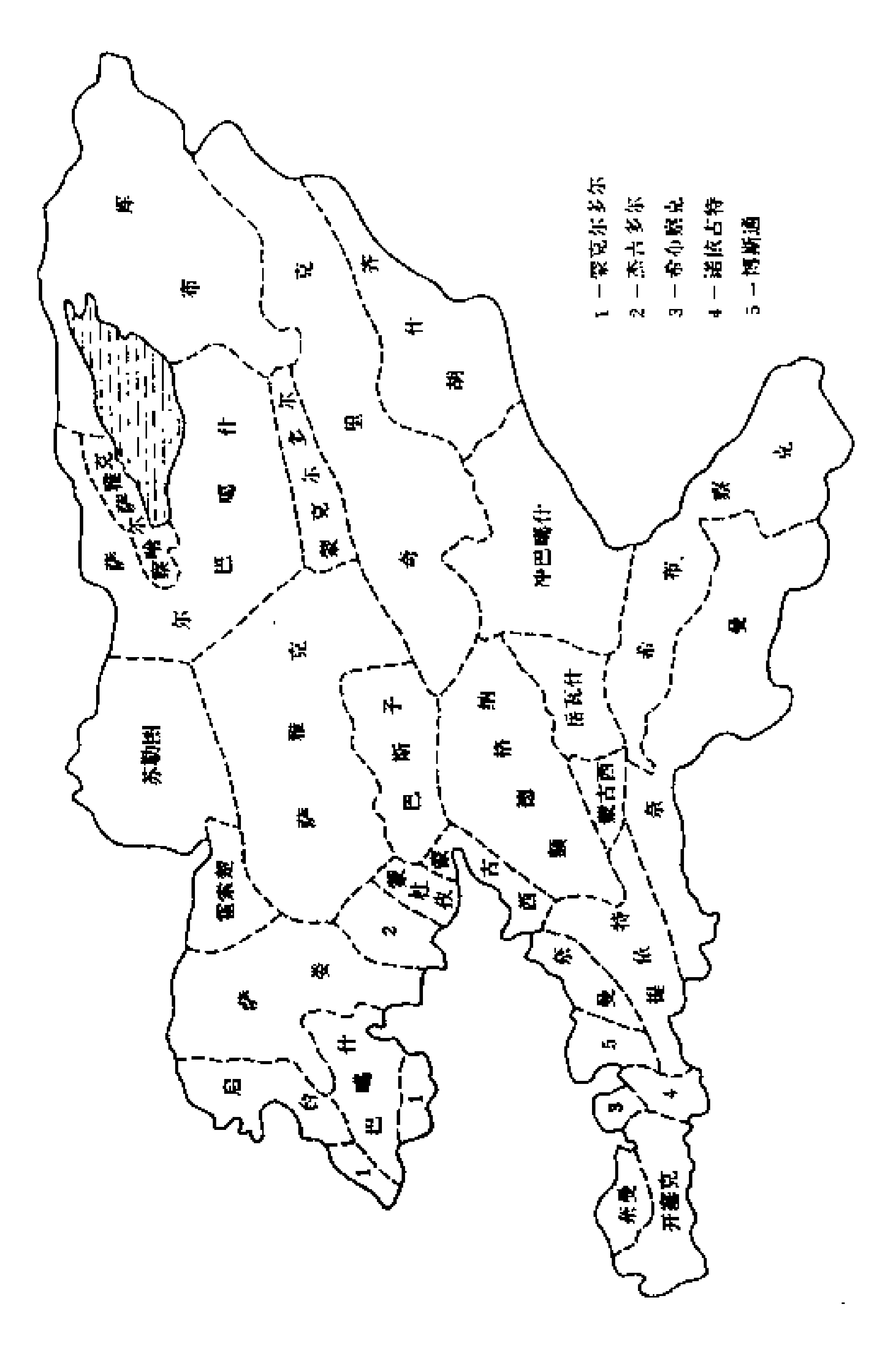
倭仪塔哈(Oytag)——深山沟。

孔铁列克买斯(Kuntibes)——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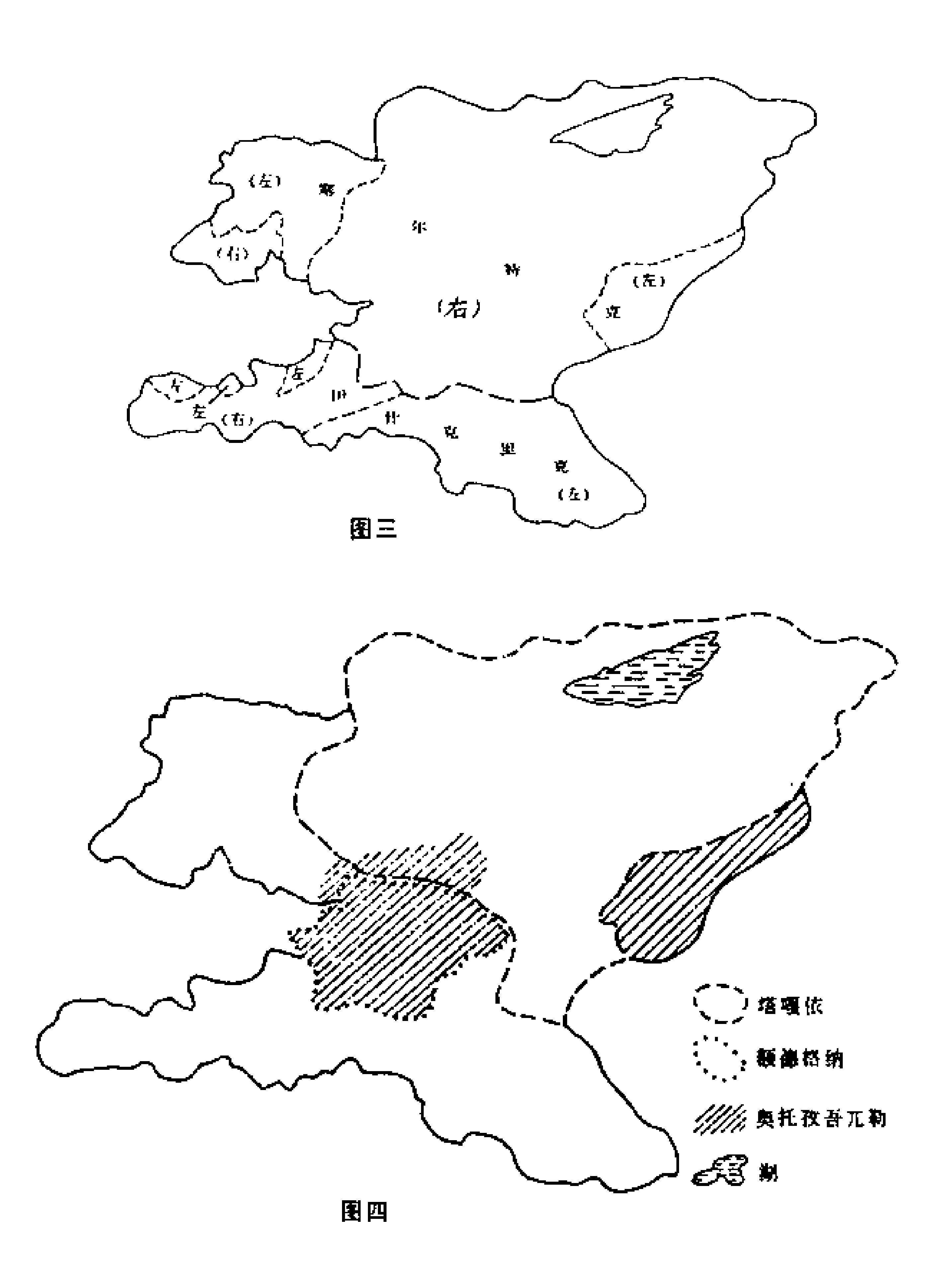
上述游图已完全地名化,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证明:在清季,布鲁特基层组织血缘联系已相当普遍地为地域联系所取代。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